

# 方法和视域:中国当代生态批评理论构建研究

黄 轶,杨高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中国生态批评理论构建的多维性或者称为“芜杂”,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生态批评面对的“中国话语”,其内涵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生态环境问题的“中国式现实”和“中国式成因”,二是生态批评理论在中西对话中复杂而又独特的学术资源、思想倾向和文化根基。如果能够在这个基本事实上予以理解和包容,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生态批评理论是充满活力的、多元丰富的,也是具有生成原生自洽潜质的。换言之,正是由于和西方不同的“中国话语”内涵,使得生态批评在中国形成了不少可以视为“原生性”“创见性”的理论构建特点,具体体现为其理论构建的基本路径是“西学转化”和“古为今用”,其理论的主要视域既强调“自然之维”又突出“人文关怀”,形成了一种温和的“人本生态主义”的主流批评观。

**关键词:**生态批评;理论构建;中国话语;人本生态观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5.00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5-0001-08

生态批评是文学和文化领域对全球化生态危机的一种综合性回应,它在理论背景上广泛结合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学科,既突出地表现为后现代视域下对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又存在着对前现代古典文化的浓厚兴趣、对现代人文主义的重新理解,甚至对后现代本身也保持着谨慎的审思态度。自20世纪后半叶兴起以来,生态批评的发展一直保持着激昂的态势,始终关注着当代社会最具焦点性、最有现实感、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表现出从生态的角度在文学研究中向外辐射,涵括了社会正义、地域、种族、性别、人性、生命、自然、精神等众多批评维度。有学者指出,“生态批评还不能由单一的方法论或理论维系,而是由‘环境问题’这个共同的‘焦点’所联结”<sup>[1]</sup>。美国生态批评家布伊尔认为,生态批评不像形式主义、新批评、现象学、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那样,“以一种主导方法的名义进行的革命”,它“更像是女性主义之类的研究,可以利

用任何一种批评的视角,而围绕的核心是一种对环境性的责任感”<sup>[2]</sup>。而在全球化语境下,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更具当代社会的普泛意义,就如同当前肆虐的疫情一样,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无法搁置、回避以及拖延。因此,当我们还在对生态批评在理论的“合法性”上表示犹疑时,说明启蒙生态意识仍是一项值得重视的基础工作,生态理论也并非简单地探究人类中心还是生物中心的问题,其根本立场还是人文关怀,本质上也并没有僭越“人学”范畴。更具体地讲,我们发起生态批评和对生态批评的研究,虽然强调其在生态启蒙层面的重要意义,但从来没有将建设生态文明的任务全部寄托于此,生态批评的主要职责还是面对人的思想和精神问题,解决生态危机最终还是要依赖所有人的参与,生态理论所提供的就是人应该以怎样的态度、立场和思想方式来对所生存的环境尽责。

在面对生态批评这个课时时,我们首先要思考

**收稿日期:**2021-07-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生态批评研究”(19BZW114)

**作者简介:**黄轶(1971—),女,河南南阳人,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生态批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杨高强(1987—),男,河南驻马店人,黄淮学院讲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生态批评、中国现当代文学。

的还是全球化语境,客观来讲,生态环境让全球化语境更加凸显了它的必然性,所谓“地球村”的理念到现在仍不过时。但作为一个布满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它又绝非可以超越现实阻隔的“形而上”概念,在强调全球化的同时,还必须正视生态环境深具地方性、历史性的文化时空差异,所以中国生态批评界始终有着理论上自觉的“中国话语”意识。生态批评的“中国话语”可以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它面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中国式现实”和“中国式成因”,另一方面是生态批评理论在中西对话中复杂而又独特的学术资源、思想倾向和文化根基。反过来讲,也正是由于和西方不同的“中国话语”内涵,使得生态批评在中国形成了不少可以视为“原生性”“创见性”的理论构建特点。

### 一、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作为透视理论的一种依据

生态主义思潮所体现的思想嬗变正在成为影响人类“新文化”生成的巨大推动力,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批评方法,透过它可以展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生态批评1960年代发轫于美国,1990年代走向成熟,先后涌现出生态中心主义、环境公正、多元文化性、跨文化对话等多种环境思想理论,也出现了一批卓有影响力的生态批评学者,如劳伦斯·布伊尔、帕特里克·D.墨菲、斯科特·斯洛维克、乔纳森·贝特等。

国外生态批评理论的传入对中国的生态批评有重要的影响。不过,与西方不同的是,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置的中国,生态批评并非诞生于“后现代”的文化语境,而是与1970年代末的文化思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伴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走过的探索之路发展到今天,已然蔚为壮观。

当代中国生态批评四十年间历经了如下三个阶段的嬗变:

①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萌芽到1990年代的理论初建:1978年黄宗英《大雁情》描写了科学家为维护生态环境做出的努力和牺牲,1983年张炜的《三想》表达了对现代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这是生态意识的萌芽期。1984年高桦在《中国环境报》副刊《绿地》第一次提出“环境文学”的概念,接着徐芳的《人与大自然关系的艺术思考》、曹天成的《对近年来小说中自然意识的探讨》、张韧的《环境意识与环境文学》等发表,是把生态批评运用到文学评论的开端,到1994年前后学界开始以“生态美学”作为文学、美学生态批评的理论起点。

②以1999年“生态与文学”国际学术会议的召

开为标志,中国生态批评进入理论自觉期:新世纪伊始,大量国外生态批评理论著作译入,一批国内生态批评理论建构的筚路蓝缕之作问世,如“生态文化丛书”“文艺生态探索丛书”等;王诺、陈茂林、陈晓兰、韦清琦、刘玉、盖光等的参与,也扩大了本土化生态批评的影响力;2006年鲁枢元的《生态批评的空间》全面阐释了生态文艺学学科的理论建构理据,胡志红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首次对西方生态批评发展历程给予全面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学界多次召开生态批评学术研讨会,厦门大学、苏州大学、山东大学等先后建立生态批评研究机构或创新团队,进一步扩大了生态批评的影响力。

③2007年后,生态批评学术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厦门大学研究团队推出“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丛书”,曾繁仁、鲁枢元分别出版力作《生态美学导论》(2010)、《陶渊明的幽灵》(2012),其他专著如程相占《中国环境美学思想研究》、盖光《生态批评与中国文学传统融合与构建》等如雨后春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大力支持生态批评相关研究课题的申报,年轻学者不断充实到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研究的学术队伍中,生态批评正成为中国人文社科研究重要的学术增长点。

目前,中国生态批评领域已经出现一大批优秀的专门性、分类性学术成果,根据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译介或研究西方生态批评的成果,如日本学者岩佐茂《环境的思想与伦理》(冯雪译)、美国学者查尔斯·哈珀的《环境与社会》(肖晨阳译)、纳什的《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杨通进译);第二类是在某种环境思想下构建自己的生态批评观,如傅华《生态伦理学探究》、余正荣《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鲁枢元《生态文艺学》、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等;第三类是对某个历史阶段或某位作家的文学作品和生态思想做批评研究,如冯肖华主编《贾平凹作品生态学主题研究》、汪树东《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黄轶《中国当代小说的生态批判》、李玫《新时期文学中的生态伦理精神》等;第四类是对中外生态文学史、生态批评史做文献整理和系统研究,如王诺《欧美生态文学》、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史》、汪树东的国家社科课题“中国生态文学史暨生态文学大系整理”(2016)、黄轶的国家社科课题“中国生态批评研究”等。

中国生态批评从萌芽、初创到“爆发”已历经40年,研究成果已蔚为壮观,可以说是和“改革开放四十年”共成长,目前到了应该做整体梳理和全面评价的时候,有以下几个关键性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①中国生态批评思想史的清理及学术队伍的考察：中国环境思想史与生态批评是在西方生态主义思潮和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双向影响下的产物，在借鉴与“本土化”创新中其发展还不够成熟，生态中心主义哲学（包括深层生态学、东方宗教哲学等）、环境公平与正义、地域本质主义、文化多元性原则等边界尚存模糊，呈现出芜杂纷繁、不易辨析的一面，对生态批评家的甄选也尤需审慎。

②立足“中国经验”，分析生态批评理论建构的得失：中国当前的生态批评存在一定偏误，或者过分倚重西方生态批评理论，或者过分夸大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理念在现代性反思中的理论自新和实践功能，脱离了生态书写的文化背景，对生态问题的“中国经验”观照不够。

③辩证看待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2007年我国就已经提出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目前虽成效显著，但因为大面积区域发展滞后也显得步履维艰，这就要求在理论批评中理性辨析生态文明与物质需求、环境公正与经济建设间的对立统一，找到生态批评的平衡点。

这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对中国生态批评理论建构的系统梳理问题。西方生态批评理论丛生繁多，但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再次走向环境公正、生态乌托邦、多元文化生态批评等，思想史脉络相对清晰，理论观念已经成熟；而中国生态批评的产生虽然比西方晚，但中国当前的现代性发展呈现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存的文化景观，再加上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与当下的生态主义思潮相互渗透，因而中国生态批评理论发展呈现出纷杂的局面，显现出不同的理论创建途径，例如：在跨学科视域下的生态文艺学建构，存在主义视域下的生态美学建构，后现代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人本生态观建构，中国传统儒释道自然观与生态批评的“本土化”等。中国生态批评理论构建的多维性或者称为“芜杂”，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生态批评面对的社会现实、文化和学术环境呈现为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复杂、深广的情形，如果能够在这个基本事实上予以理解，那么也可以说中国生态批评理论是充满活力的、多元丰富的，也是具有生成原生自治潜质的。

## 二、“西学转化”和“古为今用”：中国生态批评理论构建的基本路径

20世纪80年代，中国生态批评理论开始萌芽，主要表现在生态文学评论的出现，以及“生态文艺学”“精神生态学”“生态美学”等概念的提出。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研究的

相继兴起，生态批评理论形态逐渐形成。21世纪元年，以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徐恒醇的《生态美学》、余谋昌的《生态哲学》等一系列著作的出版为标志，中国生态批评正式步入理论建构阶段，在此后近十年间，始终处于充满活力地开疆辟土的状态。在这期间，2001年“全国首届生态美学研讨会”和“建构生态文艺学”学术座谈会、2002年“文化生态变迁与文学艺术发展”学术研讨会、2003年“中国首届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研讨会”等学术会议的举办，意味着中国生态批评界形成了规模化的学术团体；厦门大学、苏州大学、山东大学等先后建立生态批评研究机构或创新团队，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生态批评的学术派别；《精神生态通讯》《鄱阳湖学刊》等专门性的内资和学术刊物，以及《文艺报》等报刊专栏，为生态批评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和园地；鲁枢元的《生态批评的空间》、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和《生态美学导论》、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龙娟的《环境文学研究》、张华的《生态美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建构》、胡志红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王晓华的《生态批评：主体间性的黎明》、盖光的《生态文艺与中国文艺思想的现代转换》和《文艺生态审美论》、汪树东的《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王茜的《生态文化的审美之维》、刘文良的《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程相占的《中国环境美学思想研究》等大批学术专著问世，呈示了中国生态批评理论本土创建、体系构造、多元开拓的壮阔声势。至2010年前后，中国生态批评界开始整体进入到回顾、总结、反思和试图重建的进程中来，其表现如下：

①出现了鲁枢元、曾繁仁、曾永成等学者的专题研究，肯定了他们对生态批评理论建构的奠基价值，大致梳理出了中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主要脉络。

②展开了对中国生态批评理论之研究，胡志红的《中国生态批评十五年：危机与转机》一文，以及马治军的专著《道在途中——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生成》，相对系统地回顾了生态批评理论的阶段性历程。

③针对中国生态批评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性评估，如王诺的《当下生态批评亟需直面重要问题》、黄轶的《生态批评的偏误》、王为群的《当前生态文艺学研究的得与失》等文章，引发了理论界的省思。

④相比前一阶段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的热潮，2010年以后生态文学研究或生态批评视野下的文学研究明显更居主流，如唐克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动物叙事研究》、李小江的《后寓言：〈狼图腾〉深

度诠释》、余晓明的《文学研究的生态学隐喻》、李会君的《生态意识与叙事精神》、张晓勤的《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黄轶的《中国当代小说的生态批判》、赵树勤的《当代中国生态文学景观》等著作。或许这并不能说明理论发展的乏力,但无疑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上谨慎地缓慢下来。

⑤学术界对生态批评理论空间的拓展和发展方向,普遍提出了两条路径:一是加强与西方生态批评界的交流对话,二是促进对中国古典生态理论资源进行现代转换。

在中国生态批评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形成了以生态文艺学和生态美学为主要理论形态、以借鉴西方生态批评理论、发掘并阐释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思想资源为主要学术依托的基本路径。首先,我们需要厘清生态文艺学和生态美学之间的关系,这是目前研究中往往被忽略或回避的问题,论及生态批评理论,总是笼统地将二者并入一起。最早刘锋杰在构想生态文艺学的理论之路时,从学理逻辑的角度做出过辨析:“任何文艺学问题的讨论,说到底,都是关于美的问题的探讨。有什么样的美学理论,往往就有什么样的文艺学。因此,若说生态文艺学是一种新型的文艺学,那么,它在美学理论上,也必然是坚持着一种新型的美学观,这样,它的出现才是理由充足的。学界对生态美学的研究,正为生态文艺学提供着最直接的理论依据与说明。”<sup>[3]</sup>按照这一说法,生态文艺学研究依赖于生态美学理论的支持。曾繁仁进一步指出:“相对于生态美学而言,生态文艺学的研究还没有在哲学思考上对生态学和文艺学的结合进行理论提升,但是它在生态意义上提出了人一自然—文学艺术三者的同源,而且指出生命存在在生态环境与文学艺术中的本体地位。这种对生态文艺学的界定,与生态美学所提倡的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处于生态平衡的审美状态的理论旨趣是相同的,因而体现出生态文艺学与生态美学的同源性。”<sup>[4]</sup>言下之意,生态美学能够给予生态文艺学在哲学思考和理论高度上的指导,这也源于美学本身就依附于哲学的优势。

其次,通过探察中国生态批评理论建构的轨迹,不难发现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的借鉴,一方面是梳理和推演的基础性研究,另一方面则是整合与重释的创见性发展。鲁枢元等人的“生态文艺学”研究,广泛吸收了西方现代生态学、环境科学、生态哲学和伦理学等理论资源。

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一书,系统梳理了从近代自然哲学到当代生态批评理论的诸家学说,但更

注重通过推演的方式来构建“生态文艺学”论题,他所探讨的重点不在于论证生态环境危机的事实以及历史根源,而是本着“接着说”和“另辟领地”的原则,集中探讨在生态危机的背景下“文艺何为”“生态文艺如何为”的问题,所以他将生态问题自然地接引到人的“精神生态”问题,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本在于人的精神危机,生态治理最终要归结到人的精神和思想改造,而文艺恰恰是作用于人的精神和思想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这样在学理上为生态文艺学和生态批评搭建了“生态—精神—文艺”的论述逻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生态批评通过文学来回应生态环境问题的“合法性”自证难题。

曾繁仁等学者在致力于生态美学研究中,特别强调中国提出“生态美学”的“原生性”贡献,在曾繁仁看来,中国生态美学的产生和发展存在着诸多影响性的因素,所以它在美学理论上的超越和突破也有多个方面的表现:“首先,从美学学科的哲学基础来看,标志着我国当代美学的哲学基础将由传统认识论过渡到当代存在论,并从人类中心过渡到生态整体;其次,从美学理论本身来看,标志着我国美学理论将由无视生态维度、过分强调‘人化的自然’到重视并包含生态维度;第三,从自然美的理论来看,标志着从自然的完全‘祛魅’到部分的‘复魅’,亦即部分地恢复自然的神圣性、神秘性和潜在的审美性;第四,从思维方式来看,标志着从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过渡到消解主客的生态现象学方法。”<sup>[5]</sup>中国生态美学理论所取得的成就,也体现了其在多种因素和条件背景下开展研究的多向维度,曾繁仁将其2012年前的生态美学研究总结为两大论题,“一个是作为生态美学哲学基础的当代存在论美学”,“另一个是中国古代的‘中和论生命哲学’”<sup>[6]</sup>。近年来,他又重点关注了“生生美学”、中西生态—环境美学比较研究等论题。其实曾繁仁的研究,也代表了中国生态批评界的基本理论路径。

总结起来,中国生态批评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是在后现代语境下通过探讨生态批评所依存的生态学理论、存在论哲学、生态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美学理论传统等,来阐释生态批评的范畴、价值观、批评实践等具体问题,从而建构超越传统文学批评,也区别于西方的中国生态批评范式;二是通过研究和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尝试提出新的生态批评论题,在中西生态批评的比较视域下,主张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更进一步说,中国生态批评总体上趋向于强调理论的自主性和创新意识,其研究路径可以化繁就简地描述为

“西学转化”“古为今用”两个方面。

### 三、自然与人文：中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主要视域

在全球化生态危机的背景下,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了当代社会最广泛也最迫切的核心议题。有论者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目前的生存危机除了战争威胁,可能最广泛而迫切的就是人与自然的问题,甚至战争的威胁本身有时也是人与自然矛盾的一部分。”<sup>[7]</sup>生态主义思潮认为,西方哲学传统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长期处在二元化的对立、分裂状态,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启蒙运动,这两次重大的文化变革都一再强化了人对自然的权利,形成了强大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因此,当欧美发达国家爆发生态环境危机时,自然地就引发了对工业社会及其主流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西方学者开始对工业革命时期的启蒙文化产生怀疑,提出以超越工业文明缺陷为目的而发起“第二轮启蒙运动”,生态主义思潮和运动也被视为这场“新启蒙运动”的核心组成部分。

生态启蒙的核心议题就是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西方当代哲学和伦理学中出现的一次重大转向就是生态中心主义的演进,其主要理论学派包括“大地伦理学说”“动物中心论”“生物中心论”“深层生态学”等,基本主张是要求将道德权利从人扩大到自然界的动物、土地乃至一切“非人”存在物。生态中心主义的提出和影响,也引发了激烈的论争,论争焦点就在于生态关怀和人文关怀孰是孰非、孰优孰劣的问题。中国生态批评理论虽然深受西方影响,对于生态中心主义中的“大地伦理”“深层生态学”等理论学说也颇为认同和支持,但并不是完全地照搬和援引,更倾向于以辩证的眼光和态度去批判地吸收、转化。这是因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现实,以及“以人为本”的文化思想传统,决定了中国学者不可能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采用线性思维而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当然,即便是西方那些激进的生态中心主义者,也并非完全背离人的社会性,单纯从理论上指责生态主义属于“见物不见人”之偏至论的批评意见,其实也存在对生态理论的不同程度误解。

中国生态批评理论中一个突出的倾向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实践论和人本生态观的指导,很少有学者过分地纠缠于人类中心还是生物中心的“辩难性”选择。相对而言,在价值立场上,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和”思维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颇有异曲同工之理。中国学者更强调生态关怀和人文关怀的兼顾性、融通性和协调性,主张

以生态关怀为指导,在生态批评中贯穿人文关怀,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进行批判,但不认同生物中心论,始终认为:生态理论的本质还是“人学”理论,生态批评的目的还是服务于人自身的和谐优化生存。因此,明确把新人文主义或者生态人文主义作为生态批评的旗帜,这是中国生态批评理论鲜明的立场和原则。

鲁枢元在他主编的《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一书中,就曾经指明了把“自然”和“人文”两个维度结合起来而形成生态批评视域的学术方向。他认为,西方生态批评面对的是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占据思想主导地位的“直线社会进步论”“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在探讨“生态解困”的方案上,这种科学理性的思维仍然影响西方人的观念和表达,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就提出与之对立的生态中心主义,批判“技术至上”就倡导“反技术主义”或者寄希望于技术的改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则主张对自然进行“复魅”,这些理论学说看上去为人们勾画了诱人的前景,但从根本上仍然还是无法摆脱二元化的思维方式,以一种方案代替另一种方案,这是环保主义者和政治行动家的职责和做派。如何为生态解困而倡导人与自然的亲近关系,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精神生活也许更具当代性的启发意义。西方一些哲学家倡导的观念,如海德格尔提出的“诗意的栖居”,罗尔斯顿所说的“恢复大地与人类的亲情关系”,戈尔提议的“恢复人与自然的精神纽带”,怀特海阐发的“人与万物平等”的思想,都很容易能够在中国儒道佛文化以及民间文化和社会生活现象中得以呼应,这从西方学者对中国道家等传统文化表达的敬意就可以体现出来。鲁枢元指出,中国文化对于当代生态理论建设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对于‘自然—人文’同一性的坚守”,所谓“同一性”,一方面是指中国文化的诸多流派像儒家、道家、禅宗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核心论述,具有相近融通、互释互补的特点,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第一个“轴心时代”,也即是先秦时期的诸家学说,创造出了像“天人合一”这样足可视为“原点”“根脉”的文化思想,并且千年来始终没有对之背离,“只是在固有的原点上不断地复述着、阐释着”<sup>[8]</sup>。尽管这种坚守也使得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缓慢,甚至“愚昧落后”,但时移世易,中国古人的思想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生活,在当代建设生态文明的语境下却体现了一种生态智慧,得以在生态视域中重新焕发生机。

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自然—

人文”的同一性,决定了中国生态批评必然沿着“自然—人文”一体化的方向。作为“生态文艺学”的主要创建者和理论奠基人,鲁枢元在生态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关注人与自然的问题,切入点是“精神生态”,在谋求生态解困的动机下提出了“重振文学艺术的自然之维”的路线。鲁枢元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人格和经济模式,解救生态危机的途径在于根本性地调整人类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明取向,追求人类精神与自然精神的协调一致,因而,生态危机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科学管理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问题、哲学问题、信仰问题和诗学、美学的问题;同时,由于工业时代导致的文明的偏颇,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与人类精神文化的衰落是生态危机的一体两面,对精神的救治需要引入自然的诗意,而对自然的救治则需要“一场话语和观念上的革命”“一种精神上的改造运动”,文学艺术作为精神活动,它应该在这样一个人与自然被严重割裂的时代发挥作用,“填平物质与精神之间的鸿沟,抚慰人和自然之间的创伤,开创新时代的和谐与均衡”<sup>[9]</sup>。

中国学者在发起生态批评时不仅重视文学艺术在生态时代“何为”的问题,也注重文艺通过生态批评如何促进自身发展和内部完善的问题。鲁枢元在《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一文中分析到,人类文明史上曾经出现神学、物理学、生物学这三种知识系统,文学批评理论因此表现出不同的话语和形态,而生物学的整体观正是生态批评得以发生的哲学基础。生物学的整体观让文学艺术内涵在涵括社会、文化、地域、性别、人性内涵的基础上,又汇入了种族、生命、自然和精神内涵,从而让生态批评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拥有明确目的和意义的批评,一种拥有责任和道义的批评,一种包含历史文化内涵的批评,一种富有现实批判精神的批评”。这与西方生态批评的文论主张是契合的。陈茂林指出,“生态批评从以地球为中心的视角进行文化研究”<sup>[10]</sup>,从而为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文论的融合找到了恰当的结合点。但西方的生态批评在走向生态主义和环境公正之后,逐渐模糊了人本主义的立场,从而导致生态批评无界限的泛化。因而,王晓华认为,“能够在逻辑上真正扬弃主体论文艺学的,迄今为止只有生态文艺学一个流派”,但中国生态文艺学表现出更为鲜明的建构品格,“自在的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文艺学”<sup>[11]</sup>。在生态批评理论的思想体系上,中国生态文艺学提出了精神生态和自然生态相统一的关系模型。鲁枢元在开放的学术视野中结合生态学的概念

和理论,形成了“生态—精神—文艺”三维一体的学术思想结构。曾永成认为:“对精神的本体性的肯定,把精神纳入人的生命本体的整体之中,从根本上揭示了精神在人性生态中的地位对于人性生成的生态意义,而这也正是文艺生态性的基础所在。”<sup>[12]</sup>王先需表示:“建设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思考的重点要放在推动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要放在推动国民健康的生态观和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的消费观、人生观的建设上面。”<sup>[13]</sup>张皓提出了“三个世界、三种生存、三种生态”——“我们生活在三个世界中,即物质的世界、精神的世界,还有文化的世界”,因此应该拥有三种生存方式:“物质的生存、精神的生存和文化的生存”,“由此需要关注现实物质的生态、精神生态和文化生态。”<sup>[14]</sup>

#### 四、如何对话、怎样融合:中国生态批评理论之批评

中国生态批评学者非常强调“中国话语”,试图通过中西对话、古今融合的路径来实现中国生态批评理论的独特建构。就目前而言,中国生态批评理论最富有创见性、最贴近中国社会文化、最合乎中国生态环境思想的生态批评观,可以概括为“人本生态观”。从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等研究者提出的主要理论可以发现,其共同的倾向就是坚持人本生态的价值立场,主流的生态批评表现为一种温和的、以人为本的生态批评观,这是可以和西方形成对话的“中国经验”。王先需早在1990年就发表文章,倡导“圆形批评”,主张以人为本来建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就坚持对马克思的美学思想进行研究,运用系统原理对“自然向人生成”说进行过程论阐释,并作出本体论与价值论相统一的理论定位,以此作为学术起点;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历经从系统论到生态系统论、再到人类生态系统论的学术视野延伸,终于走进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阐释,并归结提出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他的学术思想体系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为哲学基础,以独特的生命信息机制“节律感应”解释了审美活动的对象性特征亦即生态本性,较圆满地实现了人本主义与生态主义的统一。近年来,曾永成、曾繁仁、程相占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倡导人本生态美学、人本生态文艺学研究,在学界具有独树一帜的意义和影响。马克思主义人本生态观契合了中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中国化语境,与中国倡导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高度统一的立场,符合当前中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主流趋势。

与人本生态观相对立的是西方激进生态主义思想,在中国生态批评的进程中,也有不少学者盲目追随,致使对西方生态批评理论过于倚重。有研究者曾经认为,“人类一步步走向绝境”,将原因统统归咎于人文主义对人的盲目信仰,提出严格遵从生态主义的三点序言,即:“自然为本”“反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理性激情”,彻底“摆脱人文主义的思维定式,实行生态主义的互滋教育”<sup>[15]</sup>。对此,已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和反思,认为西方生态批评的后现代语境和中国当前的现实存在错位,后现代主义的内涵是对“现代性”的解构、批判和超越,这与发展中国家吁求“以‘现代性’为核心的价值体系”<sup>[16]</sup>难免冲突,也就根本地注定了盲目跟从西方立场或者简单认同生态批评的超越性势必导致思想和理论的“偏误”。由于中西生态思想以及生态文化和文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有不少学者提出,为避免中国生态批评重蹈“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覆辙,在援引西方生态理论时应密切关注中国的现实,力图开辟生态批评的“中国化”。

事实上,日益严重的全球化生态危机作为直接动力和宏观背景,促进了人类社会向生态文明时代迈进,在此进程中,中西方的生态化道路及其经验有着明显的区别。美国城市生态学家理查德·瑞吉斯特认为,在建设生态城市的道路上,中国可以“另辟蹊径”,因为“中国不仅有思想基础,有实证经验,而且也有能力和潜力去改变这个世界。这个思想基础就是中国五千多年来积淀的天人合一的人类生态观和儒释道诸子百家融于一体的传统文化;这个实证经验就是中国传统农耕村社朴素的自力更生传统和风水整合、阴阳相济的乡居生态原则”<sup>[17]</sup>。在生态批评理论的构建中,中国学术界也充分认识到依托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来实现本土化理论创建的重要意义。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认为,传统西方伦理学未曾考虑生物学客体,强调科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导致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严重,要突破这种局限,“也许佛教禅宗能够对我们有所帮助”。贝尔德·克里考特《地球的智慧》一书中指出:“发展出一种基于中国古代思想土生土长的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潜力是巨大的。”<sup>[18]</sup>也有研究者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民间文化,指出在当代文学创作中不少作家“在对田园的回顾和现代性的省思中,带有神秘色彩的民间文化再一次开始了对大地的‘复魅’。敬畏自然的民间文化走出了‘寻根’的意图,和环境危机下的生态关怀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sup>[19]</sup>。

中国研究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生态思想阐释和

研究,基本涵括了《周易》、儒家、道家和佛家禅宗文化。从整体研究的成就来看,曾繁仁在生态美学的论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发更具宏阔性和系统性,在理论转化上也体现出强烈的创见意识。一方面,在曾繁仁的生态美学研究中,他广泛地关注到了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理论的各个方面,包括《周易》和儒家、道家、佛家文化,也包括《诗经》的风体诗、比兴手法,到后世的境界论,再到现代宗白华的“气本论”等文论和美学思想,另外他还将生态美学研究和中国戏曲、绘画、音乐等艺术相结合,不断衍生出新的理论阐发的资源空间,所探究的传统美学范畴非常丰富;另一方面,曾繁仁更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文论和美学思想进行创造性的理论转化,将它们融入当代生态存在论审美观的理论内涵中,并且还具有创见性地提出了一些生态美学论题,比如“中和论生态—生命美学”“生生美学”等。

曾繁仁指出:“西方真正的生态哲学与美学话语大多受到了东方儒道佛文化的影响。因此,探索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不仅是发掘中国文化宝藏的需要,还是真正弄清西方生态美学真谛的需要。”<sup>[20]</sup>在探究中国古代文化中生态审美智慧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把握核心论题,也就是用一种探究本质的方式去理解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思想内核,这也是当代思想和理论研究强调从“轴心时代”去寻找理论资源的趋势。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时代”就是先秦时期,这个时代的理论具有文化原初性和独特性,在哲学上具有“天人相和”“保合太和”的特点,体现了一种生存论内涵,和西方工业时代所强调的逻辑与理性哲学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在“后现代”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超越的当代文化语境中,具有文化思想的原初性、本真性和原生性价值。曾繁仁认为,中国哲学的基点是“天人合一”,它所体现的生态智慧促成了中国哲学的生态本位性质,与其对应的审美也就是一种生态的审美。那么,如何对这种古典形态的丰富的生态美学话语进行归类阐释呢?曾繁仁提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古代美学就是一种“中和论生态—生命美学”,所谓“中和论”是指“天地交感”所体现的哲学思想。《礼记·中庸》有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曾繁仁认为,这种“中和论”思想首先体现了《周易》“生生”之学的生态观和生命观,同时也贯彻在儒道佛各家哲学和美学思想中,包括儒家“仁者爱人”的“爱生”思想,道家“阴阳相生”的生生之规律,佛学中“普度众生”的“护生”思想等。在曾繁仁看来,中和论的生态和

生命美学思想贯穿整个中国古典哲学与美学,构成了“天人”关系中特有的生命意蕴,也渗透在艺术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特殊的东方审美境界。

以“天人合一”论为代表的中国古典生态文化资源经过系统的阐发,成为中国当代生态批评的重要思想基础,确立了崇尚自然的生态审美态度,构成了当下追求和谐的生态美学境界,树立了以“回归”自然为生态追求的精神方向。不过,中国古代生态理论资源在古为今用、古今融合的转换与创新程度上尚且不足,在充分发掘整理的过程中还未能真正做到吸收精华、剔除糟粕,一味盲目地崇尚传统,也致使其中一些趋于神秘化、玄学化的成分混杂进入今人的思想。总而言之,对中国传统儒释道自然观的研究,既是中国生态批评理论“本土化”建构的重要路径和拓展空间,也是其发展中必须审慎对待的问题。

#### 参考文献:

[1]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8.  
[2]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M].刘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2-13.  
[3]刘锋杰.“生态文艺学”的理论之路[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6).  
[4]曾繁仁.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37.  
[5]曾繁仁.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产生与发展[J].中国图书评论,2006(3).  
[6]曾繁仁.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序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黄軼.中国当代小说的生态批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  
[8]鲁枢元.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C].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4.  
[9]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2-23.  
[10]陈茂林.新世纪西方文化展望:文化研究与生态批评[J].学术交流,2003(4).  
[11]王晓华.全球化与中国文艺学的生态主义走向[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1).  
[12]曾永成.精神的本体性及其在人性生态中的意义[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2).  
[13]王先霈.推动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5).  
[14]张皓.生态批评与文化生态[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1).  
[15]赵白生.生态主义序言:人文主义的终结? [J].文艺研究,2002(5).  
[16]殷国明.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449.  
[17]理查德·瑞吉斯特.生态城市:重建与自然平衡的城市[M].王如松,于占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0.  
[18]贝尔德·克里考特.道家思想中的生态学问题[C]//安乐哲,主编.道教与生态.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30-47.  
[19]黄軼.世纪之交乡土小说的大地“复魅”与生态关切[J].中州大学学报,2020(2).  
[20]曾繁仁.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探索[J].中国文化研究,2013(1).

(责任编辑 刘海燕)

##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Eco-criticism Theory in China

HUANG Yi, YANG Gaoq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multi-dimens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criticism theory depends fundamentally on the “Chinese discourse” that Chinese eco-criticism faces, and its connotation is divided into two levels: the “Chinese-style reality” and “Chinese-style cause” of eco-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complex and unique academic resources, ideological tendencies and cultural roots of eco-criticism theory in Sino-western dialogue. If we can understand and tolerate this basic fact, then we can say that China’s eco-criticism theory is full of vitality and rich in diversity, and also has the potential to generate original self-consistency. In other words, due to the different features of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with that of the West, eco-criticism has formed many “origi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two parts. Basic path of it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s “adjusting Western learning” and “learning from the past”. The main vision of its theory emphasizes both “the natural dimension” and “humanistic concern”, which forms a gentle, people-oriented ecology of the mainstream criticism.

**Key words:** eco-criticism; theory construction; Chinese discourse; People-oriented ecological view



# 寻找“灵魂”的家园

——评荷兰华人女作家林湄

林 祁

(厦门大学 嘉庚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闽籍作家林湄带着她的“乡愁”远到荷兰,开始了对异乡文化的探索,她的散文真实记录了这一心路历程。长篇小说《天望》《天外》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言情小说,也不同于一般的移民小说,它在关注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接纳和融合的同时,更注重人的精神归属问题,即寻找“灵魂”的家园。林湄的创作不仅是华文文学在海外的拓展,也是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深入或者“生长”。

**关键词:**华人作家;林湄;东西融合;“灵魂”的家园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5.00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5-0009-05

荷兰华人女作家林湄的长篇小说《天望》<sup>[1]</sup>《天外》<sup>[2]</sup>出版后,又以散文集《点亮高处的灯》<sup>[3]</sup>照耀华文创作这片独特的领域。林湄生于太平洋西岸的福建泉州市,饮闽江水长大,于黄浦江畔成家,在香港维多利亚海湾工作……生命之舟漂啊漂,有一天,竟然漂到原生存地的对角线上——大西洋东岸的北海边居住……从“在水之湄”漂到“在水之湄”,真是与水有缘啊。

我以为所有的华人华侨都与水有缘。不是说,有海的地方就有华人吗?林湄从故乡泉州到欧洲荷兰,在地图上看刚好是对角线,看起来很近,其实很远。漂洋过海,移民他国,有几多浪漫,又何等艰辛,而今全都交给记忆,交给这些文字。

《点亮高处的灯》责编蔡安、欧阳蘅、李珊珊力推此书,指出其特点——

作品内容不同于一般女性散文抒情感怀,也不同于一般文化散文异乡异域风情的描写,非一般学人散文“掉书袋”的学究气议论,而是贯注了作者作为一个地球村公民对宇宙、人生、历史、家国、民族、世界诸多层次的深邃思考与感悟、叩问生死与探究人性。

全集文思意在弘扬真善美,针砭假丑恶,体现一个历经沧桑、执着文学而九死不悔的学人式作家青翠灵魂的栩栩如生的文字影像。(封面推荐语)

是的,九死不悔!是“九死不悔”才灵魂青翠,还是灵魂青翠才“九死不悔”呢?并非玩文字游戏,这些文字是有重量的,是湿的,咸的,“海来海去”。它也许不如山那么厚重,却有海的激情。

多亏文字留住了记忆,留住了“海来海去”的中国故事。无须抒情,不必掉书袋,能够以“真情”写散文,是一种近乎奢侈的幸福。而且,这种幸福非同一般,虽然缺乏“崛起”的雄伟,却有“漂流”的浪漫。

我与林湄是忘年交,又是老乡。当年我们都从故土闽南走向世界,一个向西(荷兰),一个向东(日本),我们的生命与写作历程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 一、与西方对话

记得我刚去日本的时候,总觉得没有走出中华文化,至少举目皆是熟悉的汉字(其实陌生,那是后话)。而林湄到欧洲,举目新鲜,从文字语言到景色肤色,无不陌生。陌生感可以使旅游者兴奋,而给移民带来的就不仅是兴奋,而是浓浓的“乡愁”了。

收稿日期:2021-07-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18WZW009)

作者简介:林祁(1957—),女,江西南昌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作协会员,日本华文女作协副会长,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林涓为什么跑到遥远的荷兰去呢？也许有她说过、未说或不说的现实因素，但有一条是明确的：渴望与西方对话。因为东方遭遇西方，是近代以来中国及其中国人的命运。幸运的林涓是这场“跨”文化的实践者——

荷兰虽然没有山脉，但面向大海……还有河流、湖泊、树林和野生动物保护区等。看那春天碧绿的草地、千姿百态的花朵以及墙缝、石隙、农地里破绽而出的种种绿盈，便想到“复活”的力量和意义；夏天躺在人烟稀少的北海岸沙滩上享受日光浴，听浪涛细语，看海鸟飞翔，无喧的心境顿像大海一样的坦然和空旷；秋天漫步于林间小道，观看树叶色彩的变化和飘飞的落叶……当冬天第一场雪花出现在窗前的时候，仿佛听到时间的脚步声，它悠然、稳重又毫不留情，在无边的雪原里留下历史的踪迹。可见，意会自然不一定要面对“宏伟壮丽”“磅礴气势”或者“奇特”的风景，关键是你融入自然，了解自然，与其往来和交谈，否则，大自然就像我童年的想法一样，不过是上山砍柴、下海打鱼的地方，包含贫困无奈的意思……<sup>[3]3</sup>

林涓走过饥饿和动乱的年代，进入安静的陌生的荷兰，在融入自然、了解自然的静思中，有一种新鲜的“复活”感——

大多数人认为植物是没有语言的。荷兰人就不同。荷兰的花卉长得又鲜又好，就是主人每天见到它们便说“Good Morning!”然后再和它们交谈的结果。这里还有一种“不死草”，按照人的观念，冬季严寒，小草自然枯萎凋死，然而，“不死草”不惧风寒冰雪，依然朝气蓬勃，绿意葱葱。它为什么不怕严寒？它的生性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人能解释清楚吗？<sup>[3]20</sup>

倾听这种与大自然的对话吧，可以说这是林涓与西方的对话之一。我以为这正是她“海来海去”的意义。林涓在西方，自由自在地与大自然对话，而又何止与大自然对话，她不时在与自己的生命对话。她说，不知是大峡谷选择了我，还是我选择了大峡谷，我只留出一点心田，奇迹就在此发生。看来，人只要把握一点东西就可以过宁静的生活。希望腾出更多的空地，让那多情多波的心坐落于这座大峡谷，令余生的心灵另有一番风景——

幸好，经历令我有突破，加上我的生命

本质与自然有种特殊的“姻缘”，所以，早期接触自然虽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感性和理性仍然时有距离，但那最初的惊讶和高深莫测的印记却始终深置心中，因而一有时间依然喜欢置身于大自然。渐渐地，在尘世和大自然间的不断往返中，生命和自然日益和谐相融，成了互为相依的物象；更有趣的是，原先像凡·高自画像里那双无神的眼睛，竟然郁闷散，炯炯有神。<sup>[3]9</sup>

其实，林涓在与自然的对话中，总离不开与人的对话，与人中高人即高处的亮灯对话。她经常去拜谒大师，发出中西之间的“天问”，寻求人生的真谛。她在《他为你点亮更高处的灯——魏玛寻思》里写道：

今夏文化之旅最难忘的是魏玛之行。它是小城，幽雅宁静，除有马丁·路德、席勒、李斯特、巴赫等名人遗迹外，还有德国文学史上“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歌德和席勒的故居及墓室所在地。

想到此，我好像脚踏的不是一间书房，而是面对着大千世界里的一座精神丰碑！<sup>[3]38</sup>

与自然对话，与大师对话。她拜访卢梭与米勒的故居后留下文字：

米勒与卢梭是同行，没有“相轻”而是“相亲”，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的，如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卡夫卡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卡夫卡生前穷困潦倒，对自己所写作品缺乏信心，死前嘱咐布罗德将所有手稿毁之。布罗德不但没有照办，还四处为他寻求出版，几经挫折才得以成全。<sup>[3]57</sup>

没有布罗德，就没有今日文学史上的卡夫卡。

大凡我们这一代中国人都会联想到“文革”的“破四旧”及烧书。我的父亲，一个中国古典文学教授，当时一夜之间就被烧毁了上万册书籍。以这种被烧过书的心情与西方对话，能不添几分沉重？我一下明白了林涓在散文边缘的“括号补充”。

林涓说，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散文，是她20多年来在从事长篇小说创作时偶有灵感，不由自主地从“形象化”回到“真性情”的书写。我对这种说法不敢苟同，似乎写小说就不必“真性情”而写散文就无须“形象化”了。但强调散文的“真性情”却是有意义的。我看林涓的散文是小说之余，有如宋词是唐诗之余，又何止是诗体变革，恰恰是呼唤这种“真性情”。而我对林涓散文的不满足，恰恰是觉得她的笔力还不够“真性情”。

## 二、与故土对话

林涓的最真性情每每流露于她的“乡愁”。可以说乡愁是海外华文文学的第一主题。

说到家园，闽南是我与林涓共同的家园。闽南文化有什么特点呢？首先是它的海外性，海上丝绸之路就从泉州始航。其次便是宗教性，泉州三教共存，就是“文革”期间也不曾被毁，可谓少有的幸存者了。而且这种少有的“跨宗教”精神为什么能活在泉州？这问题暂留今后探讨。此文且说林涓出生于泉州市，从小就帮那些夫下南洋的留守嫂“写情书”，可以看出她的情商智商始自这块故土，她的宗教情怀也始自这块故土。

从地图上看，从泉州到阿姆斯特丹恰巧是对角线。林涓出生于泉州，经香港后移居荷兰，惊喜地发现这“对角线”，似乎是她命运神奇的安排。当我从闽南来到欧陆，顺访她阿姆斯特丹具荷兰传统风俗的古屋时，她兴奋地指着地图，目光随指尖久久地落在泉州这一小点上。

她的“原风景”就是泉州的海：蓝蓝的海。又黄又细的沙。风吹来沙会涌动……她记得红砖厝前石桥下就有清清的河水通往大海，有个被叫作“疯女人”的趴在清水里不肯起来。那时她还不足五岁，不知道水会淹死人。和泉州的孩子们一样，她喜欢玩水。那天她和妹妹站在海边的礁石上，等爸爸买冰棒回来，却脚底一滑掉水里了。幸亏爸爸及时赶回将她捞了起来。海对于她，是美丽好玩的，又是灾难四伏的。而今她年过古稀，可以说一生漂移都没离开过海，经历的苦难是祸是福都在笔底卷波浪，可谓“边缘作家”。我采访过各种人物，发现“原风景”影响人的一生，林涓也不例外。泉州的“算命先生”说她会去很远的地方，泉州到阿姆斯特丹在地图上虽是对角线，看起来近，飞起来远。

年少时，我对财富就比较敏感，那时住在乡村，家有外汇，生活充裕，只是周围乡亲很贫穷，遇难关时常向祖母求助。祖母一生助人为乐，左手钱来右手出去，财源不息，不愁没钱花。钱在祖母的眼里像礼品一样，记得我被哥哥欺负、无力反抗、大声啼哭时，祖母因怕哭吵声，便塞钱给我买糖去，其时几分钱就够买一把糖果了，祖母则给我1元到5元的纸钞不等。事后祖母教我花不完的钱塞入开了缝的竹筒里，竹筒装满后，祖母说“我没钱了，借给我用吧”。随之将竹筒劈开，全数收去。

从7岁到12岁，存钱的乐趣全在于劈

开竹筒后点数钞票的时候……上了初中感觉就不同了，懂得花钱买书、买布做新衣服等，并开始了私人储蓄。因祖母的疼爱，存款有增无减，十来岁便可随心所欲，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奇怪的是自己从不乱花费，好蓄存。现在想来，大概与幼年的“竹筒”乐趣有关吧……<sup>[3]175</sup>

生于华侨世家的林涓自幼跟随从事军邮的父亲流动，从泉州流到福清奶奶家，记不清上过几所学校，记得的就有梧岗小学、虞阳中学、福清一中。她自小爱好文学创作，13岁开始发表作品。与这一代许多青年一样，她也插过队，在“文革”中受过冲击。时代的大潮曾将豆蔻年华的她推向了浪尖。由于带头到农村插队锻炼，她被树为了“红标兵”，并在各地巡回作报告。但是，“文革”的冲击很快埋葬了她的大学梦，并让她初尝人生的苦涩。婚姻的不幸，谋生的艰难，让林涓对人生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1973年夏天，不甘受命运摆布的林涓，由上海移居香港，受聘担任中新社香港分社记者，参访过丁玲、巴金、冰心、钱钟书等一大批文艺界名家。她的散文小说集《诱惑》和长篇小说《泪洒苦行路》，是她步入香港文坛的标志。不知是天意还是偶然，林涓进入了香港的新闻圈，让她可以重拾年少时对文学的爱好，其间更以一部遍访中国学者名家结集而成的《文坛点将录》跻身于名记者之列。1990年她移居荷兰，专事专栏和文学创作，现已出版过长篇小说：《泪洒苦行路》《漂泊》《浮生外记》《天望》《天外》；中短篇小说集：《罗经理的笑声》；散文诗集：《生命、爱、希望》；散文集《如果是情》；随笔集《我歌我泣》；游记《带你走天涯》；访谈录《精神王国的求索者》等近20部作品。

无论什么题材和哪一类人物，都寄托了她对社会、人性、生存、高科技发展的沉思。她的作品总是哲学在场，深思飞扬，在欧华文学中实属佼佼者。

记得13年前我被阿姆斯特丹的郁金香所迷惑，更被林涓的书房所迷惑：两个电脑屏幕拼成一个大画面的《天外》原稿，正在打磨什么巨著呢。桌上茶飘着故乡的清香，窗外是欧洲柔和的阳光。《天外》这部长篇小说已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重视，谓之荷兰籍华人女作家林涓在其出版《天望》十年后的又一部扛鼎之作。这位女作家似乎喜欢“十年磨一剑”的中国方式。在谈到也是十年磨一剑的《天望》时，林涓曾对记者说过：要写好这本书是不容易的，需要作家有跨

越东西方的丰富的人生经历。我在中国受过完整的教育,又在西方社会生活了十余年,这种独特的经历对拓展我的视野,有很大的帮助。换句话说,只有所谓的“边缘作家”,才能写出这本书来。<sup>[4]</sup>

《天望》洋洋 50 万字,描摹了欧洲某国的现代生活图景:《天望》就是天人相望,现代人往往自视甚高,每天忙忙碌碌,但要问他到底忙个什么,在生活中到底要什么,他又说不上来。这说明人活得聪明还不够,还要活得有智慧。

《天望》之后的《天外》也是一种屈原式的“天问”。背景虽是欧陆华裔移民的生存际遇,实际上反映的是地球村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命运,主人公郝忻是《浮士德》迷,经自我“分裂”而身体出轨。然而短暂的快感换取短暂的解脱,随之背负道德的压力。结局归于两人以中国式的隐忍和宽容又走到一起,开创新的爱情婚姻与生活……我们看到,小说中的人物在中西文化处境中的迷茫与挣扎;还有作家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天外》的独特之处恰是来自作者一向坚守的文学观。

《天望》《天外》这两部长篇小说,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言情小说,也不同于一般的移民小说。林湄在关注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接纳和融合的同时,更注重人的精神归属问题,也就是要寻找“灵魂”的家园。而今林湄“小说之余”的散文一如既往,也在寻找“灵魂”的家园——

在耶鲁大学住校的半年时间里,最难忘的是那里的图书馆和求索心境。

寒流过后,康州又呈现原来的风貌,微寒的空气里但见路边破绽而出的新绿。二月的阳光和煦明亮,一扫冬天心田的阴影。令心湖多了色彩与温暖,加上求索的热忱,我的心,热乎乎的……

离开了亚洲到欧洲,到了欧洲到美洲,不知道地球上还有多少洲可思可寻,总之,依然是一条异乡的路……

不同的是,这条橘子路前方的拐弯处,是座闻名于世的图书馆。其外形像教堂似的,进入厚重的木门后,只见大堂天顶上有各式各样的彩雕和绘画,堂内两边放置着供索引用的电脑及存放资料的座座木柜……<sup>[3]192</sup>

像教堂的图书馆应该是一种象征,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林湄“海来海去”,寻找的依然是一条异乡的路。寻找,路漫漫而其途远矣;寻找,途中就会有无尽的乡愁。

无独有偶。日前于微信里读到福建学人杨健民对乡愁的理解:原乡情结往往始于一个记忆的谜,而结束于另一个守候的谜。他提及莫迪亚诺的小说《夜巡》里对于巴黎的描述:她是我的故乡。我的地狱。我年迈而脂粉满面的情妇。而后杨健民语之,几乎每一位具有思乡情结的游子,无论多么坚韧,都将受雇于一个伟大的民族记忆和原乡记忆。

乡愁,其实是人类共通的,所以谓之“人类的乡愁”。乡愁,其实是一种精神还乡。人在乡愁中与故土对话,回归自我,回归“灵魂”的家园。乡愁的意义就在于“回归”,在于人生途中与灵魂对话……

### 三、与灵魂对话

灵魂深处有“两个声”(福州方言,称外地人为“两个声”)。沉静中你可以听到;在海浪轻拍海岸的夜晚,你可以与灵魂对话。

林湄长期生活在欧洲,自诩是“边缘作家”,既不完全属于东方,也未完全融入西方,可以说是生活在东西方的边缘。人在边缘,就有了距离,而有了距离,才容易去观察,去思考。林湄坦言:“我在中国受过完整的教育,又在香港地区和西方社会生活了四十多年,这种独特的经历对拓展我的视野、人生经历与学识有着很大的帮助。在每一个阶段,我都是从‘零’开始,自强不息……我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但对生命、社会、人性有自己独特的感悟和思考,并通过笔端抒写成为文学作品。”其实,林湄的边缘性不仅对中国而言,就是在西方,她也是身在“边缘”的荷兰,并没有北美华文圈的热闹,而似乎有点寂寞。

寂寞中有点孤独。

林湄说,创作虽然十分孤独,但她却很享受这份孤独。因为人只有在孤独与寂寞中才会去思考,“当我一个人的时候,与宇宙对话、与自己的内心对话,也与中外数千年的文化艺术对话。我内心与精神世界无比富足,这是别人无法了解和体会得到的”。

一个人出游颇为乏味。但英国作家赫慈利特(1778—1830)在近游、散步、游山水住旅馆时均喜欢独行,他认为交换意见会破坏一个人对事物的感受且影响心绪;只有远游参观遗址、架渠、画作时才与人联袂或结伴,因为一切可以“公之于人”。法国思想家卢梭的出游或散步目的不在赏景,意在清静,即:“清”益思考,“静”助悟道。边走边想,无人打扰,无须对话,“一个孤独者散步的遐想”之作因此而出。<sup>[3]197</sup>

从散文集中可以看出,林湄也在寻找这种孤独者的智慧,并在寻找的过程中获得了世人难以理解

的平安喜乐。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人的素质,获得一个民族的真强大、真文明——

边缘令我对内心灵性的反思外,尚重建叩问和忏悔的价值,还使我有机会与宇宙亲密交往和对话,并对未知的超出人能力的种种“神秘”抱着一颗朝圣的心情……<sup>[3]236</sup>

林湄在“感受边缘”中说写作是她祈祷式的生存方式,是“坐云看世界”。在欧洲这片土地上,处处可见到教堂,加之她天性中拥有的宗教情怀,可谓水雪相融,触动她创作的新视角、新思考、新开篇……从传统的取材、思想和技巧的创作根基上,来个突变,即东西文化虽有所不同,但相通处不少,如在探求人类灵魂的救赎问题等方面。人类需要有宗教情怀,否则,无论生活在怎样的社会现实里都离不开迷茫、痛苦、烦躁和不安。

关于孤独,我总忘不了年轻时听刘再复老师讲过的孤独——他的孤独,鲁迅的孤独,他说孤独时的神情似乎在享受孤独,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直接叩击灵魂。这些年来,“海来海去”,我一直在体会着这种孤独。读林湄的散文,我也在寻找着这种孤独。孤独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如果说大师是高处的灯光,那么孤独便是大师手里举着的灯盏。它首先是光芒四射,然后才是温暖;你必须能与之对话,才能获得。如果我用这么高的要求来评林湄的散文,似乎有点苛刻。但之所以提及,是因为我对她以及所有华文作家抱有希望,希望她们能在东西方的对话中更孤独些,笔下更沉静些。

#### 四、结语:只问时间,不论西东

林湄在《论不朽》一文中写道:“裁判伟大的成功不是机会,而是时间。”“海来海去”,不论西东,只问时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间是检验艺术的准则。

林湄把写作当作“祈祷式的生存方式”,这样的

作家,在当下国内的文学创作中并不多见。也许,正是她所拥有的这种独特宗教情怀,使她的文学创作具有独特的风格,这也是欧洲华文文学的特点及其价值吧。这些具有异质审美价值的作品,其意义不仅是华文文学在海外的拓展,而是中国文学自身在海外的深入或者叫“生长”。

记得林湄早在2012年就在《文学自由谈》杂志发表“让文学纯洁”的看法,如今在越洋的微信中又重申:这是一个急功近利、浮躁而没有艺术标准的时代,多数人看重浮华,害怕寂寞,从而“轻率”充斥市场,真理和德行被认为是“傻子”。这是时代的悲哀。而最大的弊病在于批评界,有些学人的评论不是出于人情就是出于利益关系,更有不看作品就可评奖或书写评论的事实。

我可是认真读了她的作品而知人论世的,却不知我这评论是否也会落入她批评的这种“悲哀”?不知批评之笔会不会也是重重举起,轻轻落下?不知笔尖触及的一些华文创作问题是否能抛砖引玉?

作为海外华文作家,吟罢低眉无写处也是常有的。那就交给大海吧,不妨做海上漂流瓶,兴许能传递一点意外惊喜。不过,在林湄的散文里,或者说在林湄这代人那里,是很难看到“低眉”的,他们更多的是昂首,是望高处的灯,而且还要点亮!不论西东,只问灵魂。

#### 参考文献:

- [1] 林湄. 天望[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 [2] 林湄. 天外[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4.
- [3] 林湄. 点亮高处的灯[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8.
- [4] 新华网布鲁塞尔1月3日电. 专访:边缘作家的“多元化思考”:记荷兰华人作家林湄和她的新作《天望》[EB/OL]. 2005-01-04.

(责任编辑 刘海燕)

## Looking for the Home of “Soul”

—— On Lin Mei, a Dutch Chinese Woman Writer

LIN Qi

(Tan Kah Kee Colleg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Lin Mei, a writer of Fujian nationality, went to Holland with her “homesickness” and began to explore the foreign culture. Her prose truly recorded this journey. Her novels Sky Look and Sky Ask are not only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romance novels, but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immigrant novels. They focus on the conflict, collision, mutual acceptance and integr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but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piritual belonging of human beings, that is, to find the homeland of “soul”. Lin Mei’s works not only expanded Chinese literature abroad, but also deepened or “plant” Chinese literature abroad.

**Key words:** Chinese writers; Lin Mei; East and West integration; home of the “soul”

# 深度探秘自我、文化与世界的写作

——评杜禅的长篇新作《先知开花》及其他

刘海燕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河南郑州450044)

**摘要:**杜禅的“开花”三部曲,以其精彩的反讽叙事,黑色幽默的意味,各具强劲之力。《先知开花》作为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从经验到叙事,都是一部奇异的作品。就经验而言,小说写的是一个平凡人和一种奇想相遇后的奇妙旅程,同时也呈现了一个平凡人和一种奇想相遇后的不堪承受——不同的场域、不同的信仰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就叙事而言,小说以多元视角及虚构梦境动力的方式,深入探秘文化幻觉和人生幻觉,探秘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来呈现世间万象和真相。这也是它思想和艺术的先锋性之所在。

**关键词:**杜禅;“开花”三部曲;《先知开花》;“假说”;幻觉;梦境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5.003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5-0014-04

## 一、杜禅和他的“开花”三部曲

我和杜禅认识多年,但读完《先知开花》这部作品,我感到这个想象力奇异、思辨超常、能够俯瞰现实人生的小说家,陌生而遥远,我是不怎么认识的。《先知开花》从经验到叙事,都是一部新奇的作品。该书编辑推荐语为:“一个平凡人和一种奇想相遇后的奇妙旅程。”<sup>[1]</sup>这奇妙旅程穿越了世俗、儒家、佛教、道教、科学五个场域。《先知开花》是杜禅“开花”三部曲——《犹大开花》《圣人开花》《先知开花》中的最后一部。“开花”三部曲以其精彩的反讽叙事,黑色幽默的意味,各具强劲之力。

《犹大开花》《圣人开花》《先知开花》,这些书名看起来都有些奥奥的,似乎不是给大众读者看的,但其实他的作品你一旦读了,就不会中途放下,他的表达一语直抵生活本质,犀利、凛冽,启人心智;作品布局奥妙又清晰,叙事多元又节奏感强,却是好读、提神的作品。可以看出,这个作家对自我的写作是非常清醒的,他在浩瀚的文学背景里苛刻地要求自己。评论家何弘在河南主持文学研讨和评奖时,我们曾不止一次地感慨:写作的同质化,不少小说和我

们当下的现实生活是平行的,甚至把现实生活简化为欲望和功利性的经验,缺少个性和精神呼吸的空间。而作者又缺少自省,自我感觉良好。这种写作无疑是没有意义的,也造成了我们阅读的倦怠感。

杜禅盛年时从令人羡慕的职场辞呈,专事写作,作为一个文坛之外的写作者,他不在写作的名利场中,但他的写作却得到了国内评论家们不约而同的认可,乃至感动。关于《犹大开花》,北大的陈晓明教授这样评价:“《犹大开花》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实的表现,显示出了巨大的面向现实的勇气和艺术的力量。”<sup>[2]</sup>评论家白烨认为:“杜禅对于不断发生在当下文坛和文人之中的‘文化悖论’现象,是确有所感,真有所思……故事真切而又文字淋漓的《犹大开花》,不失为一面惊人又启人的反光镜。”<sup>[3]</sup>评论家孟繁华认为:“《犹大开花》有《围城》之风,写得幽默而不油滑,但它有大悲愤、大忧愤和大悲伤。作家杜禅不仅看到了这些文化人身上的丑陋和庸俗,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这个群体的精神疾患:这是一个没有耻辱心没有疼痛感的群体,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群体,是一个见利忘义、浅薄无聊的群

收稿日期:2021-05-10

作者简介:刘海燕(1965—),女,河南太康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审,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研究方向:当代文学。

体。”<sup>[41]</sup>

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对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的审视,是非常深刻、不留情面的,评论家孟繁华将之准确地描述为:“那是有痛感的文学,他们的那些作品真实地反映或表达了知识分子阶层的真问题。”<sup>[41]</sup>这些作家及其作品,对时代和民众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呈现着“民族的灵魂”应有的模样。这一文学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的当代文学中承续着,到了90年代,随着商品经济对文化生活的渗透,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变得卑微、功利,对社会和民众没有责任感;内心没有责任,没有忧患,也就没有“疼痛感”。简言之,《犹大开花》就是呈现这些没有“疼痛感”的文人群相。可以说,作家杜禅通过这部小说,表达着对鲁迅一脉现实主义传统的致敬。

《圣人开花》,关注的依然是当代文化中的现象与问题。中文系出身的杜禅从职场辞呈之前,曾做过教师、记者、编辑以及大型文化专题片制片人,对文化界中的人文知识分子非常了解,也可以说,有着题材优势。因此,他能写得妙趣横生、力透纸背。作家李佩甫在序里感叹道:“《圣人开花》是一部想象奇诡、构思玄妙、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长篇小说,甚至可以说,这是一部可与《第二十二条军规》比肩的长篇小说。有点儿向老前辈发难的意思了。”<sup>[51-2]</sup>的确,在河南作家中,杜禅是个默默下苦功夫的人。在文坛之外的他,完全凭借自己的实力,不仅得到了业内专家们的好评,也得到了不少社会读者的认可,《犹大开花》获2010年新浪文学年度十佳第三名,《圣人开花》获第三届“路遥奖”六进一提名。

著名评论家陈晓明教授居然为“开花”三部曲中的每一部都写了序,尤其是《先知开花》的序,洋洋洒洒几千字的序文,极其认真深入而且动情。他写道:“《先知开花》是小说家杜禅继《犹大开花》和《圣人开花》后的又一部探索之作,他总是探索,不知疲倦、永不停歇地探索!早年我为他的探索精神所激动,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是为他的探索精神而感动。……第三部作品要出版时,我已然垂垂老矣花甲之年了……”<sup>[61]</sup>可以看出,杜禅多年来的文学探索精神让他深深感动,这可谓是评论家和小说家之间文学精神的佳话。

## 二、《先知开花》:一个平凡人和一种奇想、“幻觉”相遇以后

大致来讲,《先知开花》写一个平凡人的“幻觉”,这幻觉不是通常所讲的那种病理上的,而是文化上的、心理上的、世俗上的。从这里思考和起笔,这是个多么大的文学野心,需要怎样的认知、思辨、

学识背景才能支撑起,又需要怎样细致而广博的经验才可使这思想型的小说鲜活灵动起来。这对于小说家是个综合考量。

小说中,芸芸众生中的中年男子方程,在世界各地媒体报道“引力波”的刺激下,突然想起少年时梦中诞生的“器官假说”,他曾把这个假说当成情书,献给他的初恋女生,也曾在不同时期给三个人讲过。“假说”大意是:如果在人的五个器官(对应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之外再多一个,会如何?他质疑人的五个器官正好与外部世界对应,既然少一个器官有可能,那么再多一个两个也有可能,那多出来的器官也得有自己的功能,发现它应该发现的东西,“世界上肯定还有许多东西,只因人们器官的缺少而不知它们的存在”。这属于少年的奇思异想,其实很正常,每个人童年少年时都有超常的想象力,都有梦幻,只是在随后的现实生存与功利性竞争中,这些“虚幻”之物被挤丢了,被风干了。

在我们的现实中,人到中年,绝大多数人都不做“梦”了,但方程又延续起少年时的梦境,并时常从梦中惊醒。那些梦境,比现实更让他感到有趣,有意义。用方程的话讲:“我的梦不是梦,而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它是我的思维在夜晚神奇的延续。”<sup>[113]</sup>他居然发现自己原来也有些先知先觉,一个普通人有先知先觉,突然从日常现实的链条里挣脱出来,思考起先知、天才、科学家思考的事情,与他们相提并论,还有关于人类的创见,这在一般人的成见里,像是堂吉诃德从小说里走到了现实里,诡异而荒谬。首先是最关心他的妻子担心他出现了幻觉,怀疑他有精神失常的可能。

在妻子看来,丈夫开始变得神神经,迷入“假说”,扮演大师,拒绝当普通人。杜禅很擅长写对话,真正有差异性的人物对话。在小说中,尤其是丈夫和妻子的对话,自然、幽默、充满隐喻,可以直接搬上话剧舞台。妻子夏帆是教师,具有训练有素的表达力,又带着幸福家庭里的那种任性、率真又狡黠的口气;方程有时较真,有时躲闪,两人都是优秀的辩手,可谓棋逢对手。

方程在梦的天空飞,呜呜的声音从梦中窜到现实。

“又下不来了?”她撇开灯。

“我也想看到太空什么样的。什么时候让我到你梦里看一看吧?”夏帆央求道。

我抱着肩膀沉思一下,好像自己是宇航员似的。

“只一眼。”她见我还不答应,条件又降低了,“眯着眼瞄一下也行。”<sup>[111]</sup>

妻子夏帆的调侃和讽刺,寓于平静而幽默的表达中,像是在说一个儿童的游戏。方程从睡梦的高空里和现实的飘飘然中都下不来了。梦永远无法像实物一样被他人看见,方程的梦境是真是假,也无法旁证。但有时在像梦一样无法旁证的生活中,人注定是孤独的。本来感情融洽的夫妻,现在被梦和“假说”隔开。正如李佩甫《圣人开花》序里写的,杜式语言如锋利的小刀,旋转似的刀法让人想笑时不由得一怵,而“小刀低语时,会有默默的哭声传来”<sup>[5]3</sup>。佩甫先生这个“旋转式的笔法”总结得很准,这也是杜禅的先锋小说艺术得以持续突破的秘籍之一。

夏帆站在高处,用俯视的目光打量着我,那种打量称得上搜索,明确地停留在一个平庸的小人物身上。

“我不喜欢你提爱因斯坦,他是他,你是你。我不喜欢你和他有什么关系。小人物就是小人物。不能胡乱做梦去攀附大人物。”

我仰头回应,“我一直没给你说,就是害怕你用平民的思维来看我,这不来了,你就是用一个平民思维来看我。总以为伟大的事情不可能和自己有关系,因为这个思维导致了你看根本看不见我,看不见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实。”

“事实?你说的事实是什么?”……<sup>[1]36</sup>

日常生活的秩序被打破以后,他们之间的生活变得不堪承受。持续的争执、惊悚、怀疑、绝望,使之前理性温柔的妻子快要变成一个不认识的人,有天晚上,妻子的情绪走向失控。方程知道跨过临界点,就是另一种毁灭性的生活。作家杜禅对于人的情绪如何失控的描述,对于生活的临界点的测探,让我悄然心惊,它提醒读到这些文字的人,以理性和智慧去呵护生活的脆弱性。

小说中,另一个人物的世俗生活——方程曾经的同事记者孟勋,部分可以看作是方程生活的镜子。孟勋在对权力的幻觉中,重复讲述自己年轻时被大领导招呼到跟前的荣耀时刻,权力欲满足的时刻。但他推开家门,却是求医无效、歇斯底里的妻子。无奈的孟勋让方程充当“先知”去治他妻子的病,方程就这样当了一回“先知”。这些故事可以交叉着读,孟勋和他的妻子就在毁灭性的生活中,这也可能是方程的未来,但方程在特殊情境中有当局外人的本领,而不至于和对手一起跌入深渊。

方程为了证明自己身心健康、没有疯,他开始寻找那三个曾听他讲过“假说”的证人——孟勋、乌女士和陶晋。而这三个人,又分属于三个场域——儒、

佛、道。在儒家场域,他被判定为功利性的“剽窃”;在佛教场域,因轮回理论,意外地被接纳,认为他前世是“先知”;在道教场域,推论出他身上可能多长了个器官,疑为“奇人”。还有,妻子让他看医生,医生认为他患了“新型妄想症”;在科学场域,他又还原为一个充满梦想的“普通人”。

不同的场域有不同的信仰体系或学理判断,他们对方程这同一个人、同一“假说”的态度,完全持不同的看法;有时候方程自己也跳出来,像个旁观者,类似尼采说“瞧,那个人”,方程看到那个人“凡夫肩膀担着重如地球的使命,更加觉得自己可怜,又不由得抽泣”。他也在自我反讽。这篇小说,有多元场域中的不同视角,也有同一场域中的不同视角,可谓真正的多元视角。最初的目的在眼花缭乱的求证之旅中,被节外生枝、迎面而来的人与事冲击着,变得像浪花一样翻滚破碎;带着方程冲向探究与表达边界的,是他那颗产生“假说”的幻想的心。

方程这个成年人的身上还流淌着童年的精神血液,他是个生机勃勃的没被现实塑造的有趣之人。这个人物,是我们的生活和小说中都少见的对什么都好奇、探究又怀疑的人,是盛开在我们现实生活链条之外的奇葩。这应是《先知开花》对当代小说的贡献之一,用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语汇讲就是,它贡献了一个没有被时代和现实所规训的个性化人物。如方程和佛教徒乌女士一起去寺院,乌女士给他讲教义,说自己相信生死轮回和极乐世界等,但从小接受唯物论教育的方程,感觉不到她所说的另外一个空间的存在,就有些怀疑她是否真信,怀疑她信的对象是否存在。到了夜晚,他就想试探和揭秘一个佛教徒,看她是否会破戒。他沿着教义的逻辑在思维上把乌女士逼到死角,在感性上诱惑,这诱惑带着撒旦式的邪恶,但不是欲望,而是出自理性的目的。他以危险性的经验方式来证实或证伪。小说涉及了佛教及道教领域,也意味着涉及了怪诞和超验,但不是为怪诞而怪诞,为超验而超验,而是建立在经验求证的基础上。

方程这个奇思异想的人,又是个经验实证主义者,他自身也充满悖论。他求证之旅的尾声——寻找当年的初恋女生,演练一次当年的情境。当他把记忆中的一切告诉她时,并没有从她那里得到验证。或许不是记忆的错位,而是虚幻与真实的错位,他把她想象为马克思的恋人燕妮,他爱的原来是时代文化塑造的一个偶像,正如妻子夏帆对他的追问,“什么叫自己?”自己的初恋都缠绕在文化的幻象里。

我看到自己站在历史深渊的边缘,俯



瞰时间之镜中那个十六七岁的女孩,那个靓丽的影子在朦胧的光线中向自己走来。

我梦一样地迎上去,脱口而出:“站住!”

她,燕妮,我的初恋,没有像当年那样躲着,而是绷不住地笑起来。“我不认识你!”<sup>[1]359</sup>

“我不认识你!”这个戏谑的否定意味深长。人到中年的方程也才认清40年前的自己,青春年代的自己,“在梦中,在现实中,在阅读中,将书中的人物转化到了现实中。”<sup>[1]354</sup>以致他把一个中国女生幻化成一个德国女性燕妮。小说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对自我与文化、自我与世界缺乏深入理性的思考与认知时,我们很可能把模仿生活当成了生活本身。

### 三、艺术的先锋性和经验的现实性

《先知开花》这部小说,以特别的多元视角、互文推进的方式,深入探秘文化幻觉和人生幻觉,探秘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来呈现世间万象和真相。这是一部有大思考的反思与创造之书。我想,这应是它思想的先锋性之所在。

在世界文学的参照系中,也不乏关于梦境题材的书写,最知名的如博尔赫斯的小说里和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中。尤其是《哈扎尔辞典》这部奇书,分红书(基督教)、绿书(伊斯兰教)和黄书(犹太教)三部分,综合了三教的史实,还有哈扎尔人独有的捕梦者宗教,古代与现代、幻想与现实、梦与非梦扑朔迷离地缠绕在一起。但《先知开花》里的梦境或者幻觉,根植于中国式的现实经验之中,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方程穿越儒家、佛家、道家的求证之旅,也是通过和当代人现实交往的方式进行的。可见,《先知开

花》是一部书写当代中国经验的奇异之书。

我好奇于杜禅怎么想起写这样的小说,读完通话问他,他说:16岁时做过此类的梦,但这部小说纯属虚构。为了写这部小说,做了大量资料研究,也去了终南山等地考察、居住,现在想起这本书的前前后后,感到疲惫至极。多年来,我是第一次听到杜禅说“疲惫”二字,可见这本书牵了他多少的心力和时光。生活中的杜禅,总是充满活力、热情和奇想,是个自由不羁的豪侠之人,他的老友、作家李洱描述他“其游离于文坛之外的姿态宛如王小波”。盛年时从职场辞呈的杜禅,也许就是想过一种以写作为精神基调的生活,这些年来,他真的实现着自己的人生愿景。的确,你的人生就是你的代表作,一个在功利性生活链条中的写作者,也许很难写出这种深度审视自我、文化与世界的奇异之作。

### 参考文献:

- [1]杜禅.先知开花[M].北京:作家出版社,2021.
- [2]陈晓明.讽刺的凯旋(序一)[M]//杜禅.犹大开花.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
- [3]白桦.悖论中的警策(序二)[M]//杜禅.犹大开花.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
- [4]孟繁华.这是一个没有痛感的群体(序三)[M]//杜禅.犹大开花.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
- [5]李佩甫.《圣人开花》的解读(序一)[M]//杜禅.圣人开花.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
- [6]陈晓明.讽刺的假说:序杜禅《先知开花》[M]//杜禅.先知开花[M].北京:作家出版社,2021.
- [7]帕维奇.哈扎尔辞典[M].戴骢,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林川)

## An in - depth Exploration of Self , Culture and the World

——Reading Du Chan's New Novel *The Prophet Blossom* etc.

LIU Haiyan

(Editorial Department,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Du Chan's "Flowering" trilogy, with its wonderful ironic narrative, black humor, each has a strong force. As the final book in the trilogy, *The Prophet Blossom* is a singular work, from experience to narrative. In terms of experience, the novel is about the wonderful journey of an ordinary man meeting a whim, and also presents the unbearable suffering of an ordinary man meeting a whim, the conflict between different fields and different beliefs. In terms of narration, the novel explores the cultural illusion and the illusion of life,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self and the world, to present the reality and truth of the world by means of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the power of fictitious dreams. This is also the vanguard of its thought and art.

**Key words:** Du Chan; "Flowering" trilogy; *The Prophet Blossom*; hypothesis; hallucination; dream

# 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发展研究

周广澜<sup>a</sup>, 俞立平<sup>b</sup>

(浙江工商大学 a. 现代商贸中心; b. 统计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普惠贸易环境下伴随着大量中小微企业涌入数字贸易产业链。这就迫切需要发展方式向自主创新型的高端价值链转变。因此,研究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互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创新数量与数字贸易之间呈现良性互动;尽管创新质量对数字贸易短期作用较低,但对数字贸易长期发展潜力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之间具有一定的良性互动关系。

**关键词:**创新数量;创新质量;数字贸易;产业链;面板数据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5.004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5-0018-08

## 一、引言

“新冠疫情”常态化、苏伊士运河大拥堵以及不时出现的大型国际海港码头封锁隔离等一系列事件,使得传统国际贸易尤其是海运贸易成本显著增加。尽管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风云变幻,中国仍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环境治理,体现了大国的责任和担当,如率先批准 RCEP,申请加入 CPTPP。未来一轮的全球国际贸易规则的变革,将会给中小企业带来可预见的跨境数字贸易新机遇。在此背景下,中国国内电子商务平台企业、贸易企业、数字服务企业以及政府主管部门正在积极布局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全链路解决方案。从国内层面来看,全球化的跨境电商对优化中国国内供给侧改革起到了相当作用,同时也改善了国内传统产业结构的比重。从国际层面来看,全球化的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对各国间经济发展不均衡有显著改善效应。

## 二、文献回顾

国际上各行各业都因疫情而带来变化,尤其是

各地“居家”“禁足”的措施使得跨境电子商务进一步深入各地民众的生活。中国有大量中小微企业,为了抓住全球跨境电商的发展机会,它们涌入数字贸易的产业链。数字贸易作为一种新型贸易手段,使得传统贸易方式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产品可以面对更广阔的市场,同业竞争环境更加剧烈。因此,创新对数字贸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提供了新的用户受众,设置了新的产品思路,开拓了新的销售渠道。目前中国尽管在经济体量上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国,但在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工程装备、新材料新能源、工业物联网产业等一系列科技研发创新相关的领域,与世界一流强国尚有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当前全球疫情常态化背景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迫切需要寻找新模式、新动能,助力新兴行业产出成果。这就需要提高创新数量与质量,进而推动产业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帮助中国从全球价值链初端向价值链高端转变,以增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研究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

**收稿日期:**2021-09-07

**基金项目:**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项目(2020LY102);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Z21JC096);国家留学基金委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202009545007);中国(杭州)跨境电商学院资助项目(2021KXYJ04);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院项目(YJG2021219,YJG2018306)

**作者简介:**周广澜(1983—),男,浙江杭州人,博士,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中心副教授,跨境电商学院硕士生导师,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对外经贸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数字贸易与电商经济发展。

的影响关系,分析其互动机制与作用规律,发现其尚未探索的概念问题,不仅可以从理论上深化拓展内生增长理论,还可以为政府主管部门的下一步应对策略提供重要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张新等(2020)<sup>[1]</sup>认为中国创新发展已进入由创新数量增长向创新质量发展的时期。尤其在“十四五”期间,这是中国创新发展的黄金期,必须推动创新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创新数量质量复合体系对国家整体经济动力、社会发展的效能,为中国建成世界综合实力强国提供坚实的创新基础。丁志帆(2020)<sup>[2]</sup>探讨了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其中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产业创新效应改善要素配置效率,深化丰富资本要素来源,并且通过技术创新和扩散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下,创新已经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产业结构调整 and 动能转换的重要内涵与核心特征。

蔡绍洪等(2017)<sup>[3]</sup>根据企业成长理论,构建了创新数量、创新质量的作用机制模型,发现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具有协同作用机制,只有同时做好创新质量与创新数量的企业才能取得较好的创新效果。高林等(2014)<sup>[4]</sup>基于国际专利分类 IPC 号发现专利知识宽度是反映创新能力的更好指标,其促进了企业利润增长;发现垄断和产业政策支持、企业规模和需求的迅速扩大等影响因素均是激励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组成部分。然而这些影响因素主要对创新数量有显著效果,对创新质量无显著效果,即影响效果存在异质性。贺亚楠等(2020)<sup>[5]</sup>以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公司削减 R&D 支出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发现在真实盈余管理动机下的 R&D 削减会导致未来更低的创新产出、创新质量及创新效率。

金培振等(2019)<sup>[6]</sup>结合涉及知识产权与环境保护的制度文本,探讨制度供给与创新质量的关系,发现高质量专利在数量、结构方面呈现空间分化趋势与可持续、协同式创新密切相关,创新要素培育与配置是制度供给影响地区创新质量的重要机制。王黎明等(2018)<sup>[7]</sup>从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视角分析研发人员的作用特征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结果表明研发人员对创新数量作用机制显著,对创新质量只有微弱的间接作用机制,对创新数量的贡献具有创新数量门槛效应、研发人员门槛效应、企业研发经费门槛效应。俞立平等(2019)<sup>[8]</sup>从创新数量、创新质量角度分析创新对外贸出口的作用机制与效应具有重要意义。认为创新数量对外贸出口作用呈现 U 形曲线,并且具有外贸出口门槛效应,即随着外贸出

口门槛水平增高,创新数量贡献的弹性增大。俞立平等(2020)<sup>[9]</sup>通过研究自主研发与协同创新的关系与绩效发现自主研发对创新数量贡献较大,对创新质量贡献较小,互动关系总体较好;协同创新对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互动关系较弱;自主研发对创新数量的贡献呈现规模经济特征,协同创新则反之;自主研发对创新质量贡献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特征,协同创新则反之;自主研发与协同创新的协调水平有待提高。张震(2018)<sup>[10]</sup>探索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与企业规模的关系。发现创新数量影响企业规模,创新质量影响企业的成长阶段;创新数量具有企业规模门槛效应,对企业效益贡献显著;创新质量没有企业规模门槛效应,与企业效益无关;并进一步推断出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水平不高是创新质量总体不高所致。

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赵胜超等(2020)<sup>[11]</sup>发现科学合作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并且对创新质量的影响高于对创新数量的影响;技术合作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但对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科学合作与技术合作对企业创新数量的影响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之间存在互补效应。郑文范等(2019)<sup>[12]</sup>专注于科技创新活动的资金链,从数量和质量上考察 R&D/GDP 作为测度 R&D 资金投入数量指标的合理性,并为按创新链配置资金链提供了可操作性标准。郭爱芳等(2020)<sup>[13]</sup>基于用户视角研究企业主导创新社区用户参与和新产品创意产出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对我国消费电子企业动态采取措施引导用户参与创新有一定指导意义。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揭示了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和研发创新之间的互动关系。互联网时代下的技术创新催生了数字贸易概念的蓬勃发展,并拓展了新贸易理论范畴。Koopman 等(2020)<sup>[14]</sup>讨论了世贸组织作为一个多边论坛的重要性,就服务业和数字贸易等未来有望增长的贸易领域提供有用的见解。Cucculelli 等(2012)<sup>[15]</sup>以意大利企业为样本,考察了新产品的发布与企业的增长机会之间的关系,为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最新实证文献做出了贡献。贾怀勤(2019)<sup>[16]</sup>厘清了数字贸易的定义,对中国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博弈提出 4 条建议。陈珉(2020)<sup>[17]</sup>指出数字贸易的发展能够对产业服务化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数字贸易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产业的总体服务化水平,并通过这一途径带来“价值链升级效应”。随着数字贸易的迅速崛起,荆林

波等(2019)<sup>[18]</sup>发现全球价值链转型正在进行,全球价值链重构内生趋势明显。中国应当以新旧驱动力融合为着眼点,培育数字经济的中国优势;加速全球数字贸易网络构建;提升全球价值链附加值获取能力。李怀政(2018)<sup>[19]</sup>根据发达国家流通产业发展经验、数字零售业相关时间序列数据认为传统商品流通体制应向数字贸易方向逐步深化过渡。同时必须进一步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零售业服务水平。建议进一步提高互联网渗透率和数字零售技术研发水平,优化数字经济跨境电商规则体系制度安排,为我国数字零售商嵌入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供应网络,增强数字零售服务国际竞争力,夯实基础并提供保障。

数字经济技术革命正在对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产生渗透和调整,进而引发国际经济贸易格局划分的重构。马名杰等(2019)<sup>[20]</sup>发现数字贸易网络市场规模大、创新环境友好的国家将占据竞争优势。优势资源和发展机遇加速向知识、人才、资本、技术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密集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流动,数字产业和数字基础设施发达的国家将在未来数字贸易中占据重要份额。在全球向智能化制造业转型的背景下,马述忠等(2018)<sup>[21]</sup>提炼了数字贸易的内外部属性,指出数字产品与服务、数字化知识与信息的高效交换奠定了数字贸易的基础,进而以创新数量与质量为主体的新型贸易活动推动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王拓(2019)<sup>[22]</sup>深入探索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应用对数字贸易产生诸多影响,这其中包含数字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技术创新、知识产权、网络监管等问题。在相关领域加强模式引领和政策设计,有助于提高我国数字贸易的综合竞争力。岳云嵩等(2020)<sup>[23]</sup>通过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进行比较后发现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增长迅猛。建议国家应该把握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机遇,推动数字服务产业创新发展。在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内容产出方面鼓励和支持企业参与全球数字服务分工,完善数字贸易创新治理体系,推动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的建设。张夏恒等(2020)<sup>[24]</sup>通过厘清数字贸易的理论边界与现实约束,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互联网科技,助力数字化生产力推动传统制造业升级、对外贸易转型,达到全球共同繁荣目标。

从当前的研究看,尽管关于创新数量、创新质量的关系及互动机制的研究比较深入,但总体上,在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以下几个方面仍然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第一,在疫情常态化下以及现有全球国际贸易框架下,中国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从长远的角度分析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互动机制的研究较少,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深入。

第二,现有的创新数量、创新质量的研究更关注微观企业在传统经营活动中的情况。数字贸易框架下的创新数量、创新质量研究要求其在宏观经济环境和视角下进行。

第三,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对数字贸易的作用如何,有何作用规律,其中存在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进行揭示。

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投资、贸易、消费所涉及的产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导产业,也是驱动创新发展的典型。基于对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20》的梳理,本文在分析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相互作用机制的前提下,提出基本假设,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创新数量、创新质量对数字贸易作用强度与作用规律,采用 BVAR(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的互动关系,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

### 三、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的互动机制

#### (一) 创新数量、创新质量对数字贸易的作用机制

##### 1. 创新数量对数字贸易的影响

创新数量的增加可以有效地增强各行各业的综合创新能力,通过增强产品的技术含量、竞争实力来扩大国家贸易份额。当创新数量水平维持在较低时,中国只能在供应链初级水平进行国际贸易,通过廉价的土地等自然资源、对外资友好的招商政策和人口红利来赚取少量利润,中国作为世界代工厂现象就是这种情况。随着各行各业创新数量逐渐增长,数字贸易市场逐渐建立起来。只有当创新数量达到一定的水平时,相关产品在数字贸易的交易过程中才有竞争力,形成独特的市场优势。

技术的创新可以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形成产业综合效益,保持国家产品在国际贸易环节中的竞争优势。在微观层面,企业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即增加创新数量可以形成企业产品在技术效率、制造成本方面的优势。在宏观层面,政府科技研发主管部门、制造行业通过出台产业、税收政策鼓励研发经费投入,即增加创新数量可使得国内整个行业技术、标准提高。若该行业创新数量投入超过一定的阈值,就会生成技术溢出效应,从而带动整个行业产品的水准,使得该行业的产品在国际贸易环节中获得一定的价格、

质量竞争优势。

技术的创新体现在新技术的开发,原有技术的提升。技术创新是生产制造行业新市场产品的开发之源。商业模式的创新体现在通过先进的技术改革、改善原有的业务流程,使得原来的业务流程、业务模式在创造性思想下形成一套新的产品、服务或解决方案。若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能够形成创新共同体,则可以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吸引更多的创新投入,不断地将创造性灵感思维转变为某种具体的产品。当创新数量提高到一定阈值,可以使得创新文化能够在全社会发展,创新氛围能够得到培育,创新企业能够更容易获得行业、市场的认同。例如,近年来在中国普及的线上教育、共享单车、线上生活等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行业,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可。企业创新数量的增加会带动企业整体技术、标准水平的提高,从而深层次推动数字贸易的增长。

创新数量对数字贸易的非线性关系:当创新数量较低时,数字贸易的市场还是蓝海,一旦产品有所创新,会扩展产品的渠道、提高产品的销售水平,因此创新数量对数字贸易的边际贡献较大。当创新数量较高时,数字贸易市场已经获得广泛认同,产品的国际影响力也获得增强,进一步提高创新数量对数字贸易的边际贡献也比较大。只有当创新数量中等时,数字贸易市场竞争激烈,产品总体影响力水平不高,因此提高创新数量对数字贸易的边际贡献较小。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一:

H1:创新数量对数字贸易贡献呈现U形曲线。

## 2. 创新质量对数字贸易的影响

创新质量的显著提升是创新的聚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创新质量帮助企业产品进入新的层次,可以形成蓝海市场。创新质量不仅仅是创新的投入,更是创新成果的实质性突破。创新质量通常出现在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生物医药、互联网等行业。这些行业对从业人员的素质与能力,技术的改进与升级要求都比较高,但是在竞争优势方面具有压倒性,会对其他行业形成降维打击。

创新质量可以有效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是因为中国的制造企业目前普遍处在全球供应链的末端。过去的产业政策并未帮助中国企业实现对国际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中国企业不仅要面对各类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的挑战,还要承受突如其来的关税壁垒。中国在全球贸易过程中面临着各类政治风险,从而引发众多的国际贸易摩擦。通

常利用核心专利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的企业,才能拥有较高的创新质量。可见,只有提高创新质量才能摆脱中国变为“世界初级产品代工厂”的尴尬境地,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创新质量具有良性反馈效应,能使得创新质量的水平长时间持续,并鼓励更多的企业对创新质量加大投入,进一步提高自身在数字贸易中的优势。这种良性循环能够促进创新质量高的产业和企业,在数字贸易市场中获得超额收益。在这种背景下,相关产业会进一步形成提高创新质量的氛围,从而使得全行业的产品在全球数字贸易竞争中持续保持优势。

创新质量对数字贸易的作用规律:创新质量的提升对数字贸易具有持续贡献,因此创新质量对数字贸易的贡献总体上呈线性关系。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二:

H2:创新质量对数字贸易具有正向贡献。

## (二)数字贸易对创新数量、创新质量的作用机制

数字贸易对于企业提升技术和强化研发有更高的要求,更容易迫使企业提高创新数量和质量。在世界贸易逐步趋向逆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面临着人口红利消失,国际政治风险加大,国内环保约束增加等一系列的问题。要想克服当前经营环境的不足,唯有提升创新数量和质量,才能清晰地展现出产品的长处和特色,重获市场竞争优势。

数字贸易对创新数量、创新质量具有正向反馈效应。数字贸易的繁荣必然会促成企业更好的收益。如果企业提供的产品能够具备在创新数量或质量方面的竞争力,会促使企业更加注重在创新数量或质量方面的投资,从而达到创新数量或质量水平的提高。

在大数据、云计算等一系列创新技术的运用之下,大量数字贸易平台涌现出来并繁荣发展。近年来,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各国之间贸易摩擦频繁,加征关税和贸易壁垒时常出现,从事传统贸易的中国企业形势严峻。面对这样无奈而激烈的贸易市场,根本原因是中国企业在技术、管理、制度层面创新水平较低,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不高所致。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类企业、产业主体需要各种途径获得创新支持。在宏观层面国家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微观层面各类企业充分运用创新技术,这些举措必然有利于提高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

综上所述,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的互动机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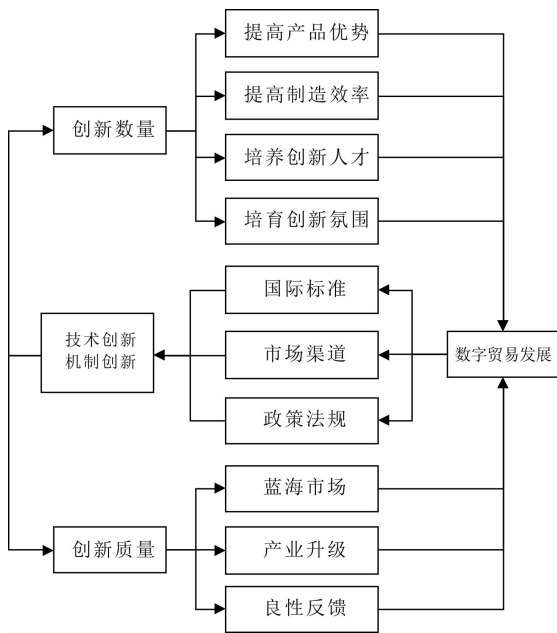


图1 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的互动机制

#### 四、研究方法 with 数据

##### (一) 面板数据模型

首先建立数字贸易影响因素模型:

$$\log(\expimp) = c + a_1 \log(rdt) + a_2 \log(rdp) + a_3 \log(olcsr) + a_4 \log(npe) + a_5 \log(rdf) + a_6 \log(nps) \quad (1)$$

用  $\expimp$  表示数字贸易额,用  $rdt$  表示市场投入时间,用  $rdp$  表示市场建设项目,用  $olcsr$  表示数字贸易增长率,用  $npe$  表示数字投资支出,用  $rdf$  表示

创新数量,用  $nps$  表示创新质量。进一步引入创新数量的2次项,得:

$$\log(\expimp) = c + a_1 \log(rdt) + a_2 \log(rdp) + a_3 \log(olcsr) + a_4 \log(npe) + a_5 \log(rdf) + a_6 \log(nps) + a_7 \log^2(rdf) \quad (2)$$

以上方程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该模型由 Mundlak (1961)<sup>[25]</sup> 首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较为成熟。面板数据模型提供了较多数据量,一般不会出现自由度不足问题,其固定效应模型对遗失重要变量不敏感,这对于本文的研究尤为重要,此外面板数据模型还能够有效降低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考虑到公式(1)和公式(2)中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为了取得较好的估计效果,采用系统广义矩法 (Blundell et al, 1998)<sup>[26]</sup> 进行估计,引入各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

##### (二) 研究数据

数字贸易的影响因素方程中,各类指标采用年鉴统计数据。数字贸易值用进出口贸易值表示,数字贸易潜力用网络交易增长率表示,企业研发投入用研发投入时间表示,创新数量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表示。关于创新质量采用专利授权数表示。

本文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由于数字贸易这一概念近几年才提出兴起,所以本文数据范围为2016—2019年。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描述统计

统计量	数字贸易额 $\expimp$ 亿元	市场投入时间 $rdt$ 人年	市场建设项目 $rdp$ 项	数字贸易 增长率 $olcsr\%$	数字投资支出 $npe$ 万元	创新数量 $rdf$ 万元	创新质量 $nps$ 万元
均值	6984.08	89179.48	12808.22	34.12	4074367.54	3703740.08	57590601.60
极大值	79969.10	621950	77940	121.30	33366963	21072031	393760563
极小值	5.91	43	21	0	2986	2602	56367
标准差	13970.47	122863.56	18370.73	16.04	5950968.63	4776827.24	79125198.17
样本量	31 × 4 = 124						

#### 五、实证结果

##### (一)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在估计面板数据时,为了防止出现伪回归问题,必须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本文同时采用 LLC、Fisher ADF、Hadri 三种方法进行检验,以提高研究的稳健性,结果如表2所示,经过一阶差分,所有变量均为平稳面板数据。

##### (二) 创新数量、创新质量对数字贸易的作用估计

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基于公式(1)估计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平均弹性系数, Hausman 检验值为 54.556,相伴概率 0.000,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估

计结果的拟合优度较高,为 0.923。创新质量通过统计检验,其平均弹性系数为 0.555;创新数量没有通过统计检验,说明创新数量对数字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贡献。但市场建设项目数、数字贸易增长率、市场投入时间弹性系数通过了统计检验,综合说明需要企业投入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在一定时间和规模后,在特定阶段中国数字贸易才能够大步发展。

基于公式(2)估计创新数量的作用规律, Hausman 检验值为 53.885,相伴概率 0.000,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继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模型的拟合优度为 0.922。市场建设项目数、数字贸易增长率、市场投入时间、创新数量的2次项通过了统计检验,创新数

量 2 次项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创新数量对数字贸易的贡献呈现 U 形曲线,这样就验证了假设一。

表 2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名称	LLC 检验	Fisher ADF 检验	Hadri 检验	结果
$\log(olcsr)$	-12.276***	73.416	11.631***	部分平稳
$\log(rdt)$	-3.269***	33.244	7.122***	部分平稳
$\log(rdf)$	-12.914***	162.172***	8.841***	平稳
$\log(rdp)$	-6.139***	105.890***	8.283***	平稳
$\log(npe)$	-3.073***	90.582***	8.738***	平稳
$\log(nps)$	-26.565***	87.209**	8.266***	平稳
$\log(expimp)$	-221.411***	468.220***	6.562***	平稳
$\Delta\log(olcsr)$	-7.493***	173.002***	57.740***	平稳
$\Delta\log(rdt)$	-3.500***	73.079*	8.378***	平稳
$\Delta\log(rdf)$	-9.368***	186.983***	6.224***	平稳
$\Delta\log(rdp)$	-8.881***	154.540***	7.181***	平稳
$\Delta\log(npe)$	-4.765***	140.104***	8.564***	平稳
$\Delta\log(nps)$	-23.802***	128.547***	7.351***	平稳
$\Delta\log(expimp)$	-176.977***	493.311***	5.109***	平稳

注: \* 表示在 10% 的水平下检验通过; \*\* 表示在 5% 的水平下检验通过; \*\*\* 表示在 1% 的水平下检验通过。

表 3 面板数据估计结果  $\log(expimp)$  被解释

变量	说明	固定效应 1 公式 1	固定效应 2 公式 2
$C$	常数项	-4.233** (-2.165)	2.428 (0.703)
$\log(olcsr)$	发展潜力	-0.111** (-2.070)	-0.115** (-2.175)
$\log(rdt)$	时间	-1.334*** (-3.137)	-1.451*** (-3.450)
$\log(rdf)$	创新数量	-0.182 (-0.321)	-0.941 (-1.455)
$\log(rdp)$	项目数	1.453*** (4.360)	1.295*** (3.877)
$\log(npe)$	支出	0.482 (1.069)	0.506 (1.144)
$\log(nps)$	创新质量	0.555** (2.229)	0.389 (1.528)
$\log^2(rdf)$	创新数量的 2 次项		0.044** (2.321)
Hauseman	Hauseman 检验值	54.556	53.885
P 值	相伴概率	0.000	0.000
R <sup>2</sup>	拟合优度	0.923	0.922

注: \* 表示在 10% 的水平下检验通过; \*\* 表示在 5% 的水平下检验通过; \*\*\* 表示在 1% 的水平下检验通过。

市场建设项目数的回归系数通过了统计检验,说明企业研发规模投入对数字贸易具有显著贡献。数字贸易增长率的回归系数为负,并且通过了统计检验,这说明随着数字贸易的发展,其蓝海市场逐渐减少。市场投入时间的回归系数为负,并且通过了统计检验,这说明随着数字贸易市场的成熟,对现有

技术的升级时间将缩短。

无论公式(1)还是公式(2),创新数量均没有通过统计检验,也就是说假设二没有得到验证。但创新数量的 2 次项通过了统计检验,综合说明中国数字贸易发展过程中创新数量需要达到一定阈值产生质变才有效果。

### (三)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的互动关系

为了分析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 BVAR 模型进行估计。具体过程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

#### 1.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第一,数字贸易发展潜力的脉冲函数见图 2。创新质量对其的影响第 2 期达到极大值。这说明创新质量短期对数字贸易发展潜力有显著效果,且长期效果稳定。第二,创新数量的脉冲函数见图 3。创新质量对其的影响第 2 期就达到极大值,后期在高水平位置逐渐衰减。这说明创新质量短期有助于提高创新数量,但长期效果有限。第三,创新质量的脉冲函数见图 4。创新数量对其的影响第 3 期就达到极大值,后期在高水平位置逐渐衰减。这说明创新数量短期有助于提高创新质量,但无法长期持续。第四,数字贸易的脉冲函数见图 5。创新数量自第 2 期开始对其作用效果一直处于提升状态。这说明创新数量的提升能够有效地提高数字贸易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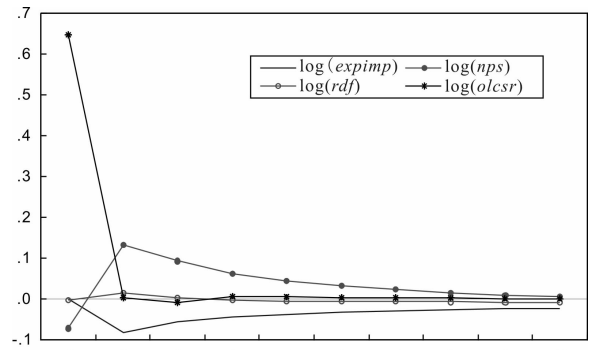


图 2 数字贸易发展潜力的脉冲响应函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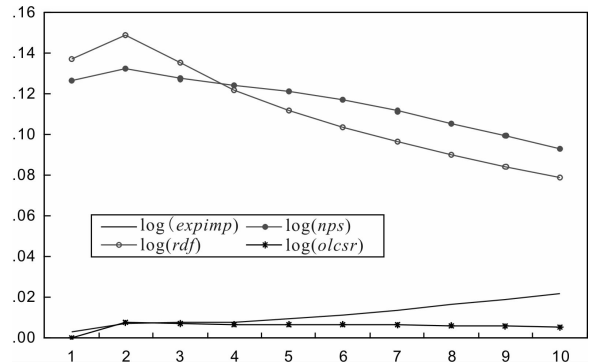


图 3 创新数量的脉冲响应函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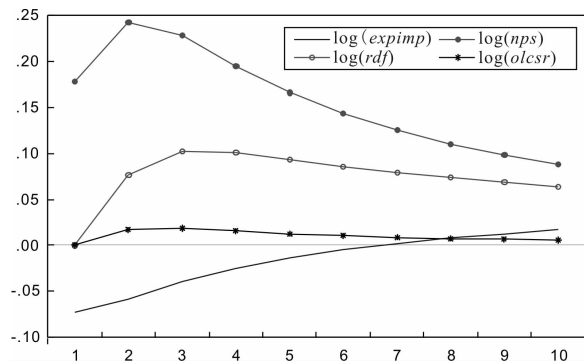


图4 创新质量的脉冲响应函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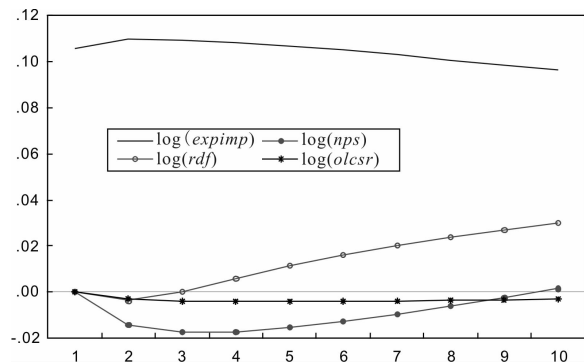


图5 数字贸易的脉冲响应函数

## 2. 方差分解

各变量第10期的方差分解如表4所示。数字贸易的方差分解中,其自身所占份额为96.057%,创新数量的贡献仅占2.666%,创新质量贡献仅占1.168%,说明创新数量、创新质量对数字贸易贡献的份额总体不高。创新质量的方差分解中,其自身占78.293%,其他作用较大的就是创新数量,其贡献占17.991%,剩余变量贡献很小,说明创新质量的提升主要依靠创新数量作为基础。创新数量的方差分解中,其自身所占份额为48.150%,创新质量的贡献占51.064%,剩余变量贡献很小,说明创新质量能够有效地促进创新数量提高。数字贸易发展潜力的方差分解中,其自身占88.165%,其他作用较大的是创新质量,占8.227%,说明创新质量对数字贸易发展作用效果较好。

表4 各变量第10期方差分解

	$\log(\text{expimp})$	$\log(\text{nps})$	$\log(\text{rdf})$	$\log(\text{olcsr})$
<i>expimp</i>	96.057	1.168	2.666	0.107
<i>nps</i>	3.323	78.293	17.991	0.390
<i>rdf</i>	0.641	51.064	48.150	0.144
<i>olcsr</i>	3.515	8.227	0.092	88.165

## 六、研究结论

### (一) 创新数量与数字贸易之间呈现良性互动

创新数量对数字贸易的作用机制包括提高产品竞争优势、降低制造成本、培养创新人才、培育创新文化,数字贸易对创新数量的作用机制包括技术提升效应、市场反馈效应、政府政策效应。面板数据的

研究表明,创新数量对数字贸易的弹性系数为负,并且创新数量对数字贸易的贡献呈现U形曲线。脉冲响应函数的研究表明,创新数量与数字贸易之间呈现良性互动。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对创新数量的反馈作用要大于创新数量对数字贸易的贡献。

总的来看,中国的政府、企业比较重视创新。创新数量总体上具有一定的规模,研发投入数量也很大,通过本文构建的模型可知这有效地促进了数字贸易的发展。而数字贸易的良性反馈效应也进一步促使政府、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形成了数字贸易的收益循环。

### (二) 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相互间作用较低

创新质量对数字贸易的预期作用机制包括形成提升产品价值链与良性市场反馈效应。但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创新质量对数字贸易的贡献不显著。

数字贸易的方差分解中,创新质量贡献份额总体较低。创新质量的方差分解中,数字贸易贡献占比也很小。这说明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相互间作用较低。

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是,中国创新质量总体水平较低,原创性成果少,创新质量对数字贸易的贡献小,数字贸易产品技术含量、品牌服务有待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供应链中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为此,需要不断提高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才能逐渐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 (三) 创新质量能有效地促进数字贸易发展潜力的提升

近年来数字贸易是一个新兴的概念,在各地蓬勃发展。脉冲响应函数的研究表明,创新质量对数字贸易发展作用效果较好。数字贸易发展潜力来源于各类新兴的技术、先进的管理在互联网市场的应用。一般来说,越倾向于培育、采纳、部署新兴的技术、先进的管理制度的地区,数字贸易发展得越好。因此,鼓励政府、社会在扩大研发投入数量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创新的内涵。利用各类有效措施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水平和突出创新重点,全面提升创新质量。

### (四) 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之间具有一定的良性互动

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可知,创新数量对创新质量的冲击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而创新质量对创新数量的冲击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两者初步形成了一定的良性互动关系,这对于协调创新质量、创新数量与数字贸易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参考文献:

[1] 张新,胡鞍钢,陈怀锦,等.“十四五”创新发展基本思路:



- 加快建设世界创新强国[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5(1): 155-165.
- [2] 丁志帆. 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 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 现代经济探讨, 2020(1): 85-92.
- [3] 蔡绍洪, 俞立平. 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企业效益: 来自高技术产业的实证[J]. 中国软科学, 2017(5): 30-37.
- [4] 高林, 贺京同, 那艺. 创新数量、质量及其激励的异质影响[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6(4): 92-98.
- [5] 贺亚楠, 袁春生, 冯晓宇. 真实盈余管理动机下 R&D 削减行为与创新产出: 数量、质量与效率[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0, 37(7): 95-104.
- [6] 金培振, 殷德生, 金桩. 城市异质性、制度供给与创新质量[J]. 世界经济, 2019, 42(11): 99-123.
- [7] 王黎明, 俞立平. 创新数量与质量视角下研发人员绩效研究[J]. 现代经济探讨, 2018(9): 97-104.
- [8] 俞立平, 戴化勇, 蔡绍洪. 创新数量、创新质量对外贸出口影响效应研究[J]. 科研管理, 2019, 40(10): 116-125.
- [9] 俞立平, 龙汉, 彭长生. 创新数量与质量下自主研发与协同创新绩效研究[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7(3): 81-95.
- [10] 张震. 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企业规模[J]. 经济问题, 2018(12): 56-60, 87.
- [11] 赵胜超, 曾德明, 罗侦. 产学研科学与技术合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数量与质量视角[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20, 41(1): 33-48.
- [12] 郑文范, 刘明伟. 围绕创新链完善 R&D 投入资金链的研究[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1(6): 559-566.
- [13] 郭爱芳, 史可欣, 阳银娟, 等. 企业主导创新社区用户参与和新产品创意产出的动态关联研究[J]. 技术经济, 2020, 39(9): 189-195.
- [14] Koopman R J, Hancock J, Piermartini R, et al. The Value of the WTO[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20, 42(4): 829-849.
- [15] Cucculelli M, Ermini B.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 and Product Tenure: What Effects on Firm Growth[J]. Research Policy, 2012, 41(5): 808-821.
- [16] 贾怀勤. 数字贸易的概念、营商环境评估与规则[J]. 国际贸易, 2019(9): 90-96.
- [17] 陈珉. 基于网络准备指数的数字贸易对我国产业服务化推动机制研究[J]. 生产力研究, 2020(5): 15-18, 53.
- [18] 荆林波, 袁平红. 全球价值链变化新趋势及中国对策[J]. 管理世界, 2019, 35(11): 72-79.
- [19] 李怀政. 互联网渗透、物流效率与中国网络零售发展: 基于 VAR 模型的脉冲分析与方差分解[J]. 中国流通经济, 2018, 32(8): 23-33.
- [20] 马名杰, 戴建军, 熊鸿儒. 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方式和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与应对[J]. 中国科技论坛, 2019(1): 12-16.
- [21] 马述忠, 房超, 梁银锋. 数字贸易及其时代价值与研究展望[J]. 国际贸易问题, 2018(10): 16-30.
- [22] 王拓. 软件贸易发展新趋势、影响及我国的应对[J]. 湖北社会科学, 2019(3): 67-72.
- [23] 岳云嵩, 李柔. 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及对我国启示[J]. 中国流通经济, 2020, 34(4): 12-20.
- [24] 张夏恒, 李豆豆. 数字经济、跨境电商与数字贸易耦合发展研究: 兼论区块链技术在三者中的应用[J]. 理论探讨, 2020(1): 115-121.
- [25] Mundlak Y. Empirical Production Free of Management Bias[J].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1961, 43(1): 44-56.
- [26] Blundell R, Bond S. 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8, 87(1): 115-143.

(责任编辑 刘成贺)

## Innovation Quantity, Innovation Quality and Digital Trade Development

ZHOU Guanglan<sup>a</sup>, YU Liping<sup>b</sup>

(a. School of Modern Business Centre, China; b. School of Statistic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with a large number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entering into the digital trade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inclusive trade. It is necessary to shift China's development mode towards the innovation and high value chain.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quantity, innovation quality and digital trade. This paper uses panel data model and Bayesian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quantity, innovation quality and digital trade. The outcome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innovation quantity and digital trade. Although the short-term effect of innovation quality on digital trade is low, it has a greater role in promoting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digital trade. Furthermore, there is a certain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innovation quantity and innovation quality.

**Key words:** innovation quantity; innovation quality; digital trade; industry chain; panel data

#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 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耦合态势研究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马立呼, 潘玉君, 华红莲, 马佳伸, 牛福长

(云南师范大学 地理学部,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基于2000—2019年建成区面积和城区人口,运用总体耦合态势模型、空间耦合特征模型等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城市的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的总体耦合态势和空间耦合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时间维度上,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扩张速度远高于人口增长速度,但在空间维度上二者的增速呈显著的空间吻合特征;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耦合态势呈现出“扩大—缩小”演变特征,两者的耦合关系不断增强,但是现阶段以人口快速增长型为主,人地耦合协调度低。最后提出发展对策:控制城市土地快速扩张,引导人口有序流动,促进人地协调配置;促进“三角形”空间格局均衡发展,推进区域协调统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城镇化发展。

**关键词:**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扩张;人口增长;耦合协调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5.005

**中图分类号:**F299.21;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5-0026-07

城镇化是在世界各个国家、地区都存在的社会经济发展现象,其中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是其核心要素内容。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城镇化高速推进的发展阶段,导致城市建设用地急剧扩张,与此同时城镇人口规模不断壮大和人口大规模转移<sup>[1]</sup>。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历史性地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由此导致了“驱赶式”“冒进式”的城镇化<sup>[2]</sup>,造成城市空间无序扩张甚至失控、人地关系失调、城镇化质量低下、土地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因此,国内外学者就城镇化过程中人—地关系协调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sup>[3-7]</sup>,以此为推进健康、可持续的城镇化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分析。

城市群是高度发达的空间一体化的城市形态,是国家或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入高级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长江中游城市群是国家级大型城市群,由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以及环鄱阳湖城市群

构成,简称“中三角”,它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sup>[8]</sup>。截至2019年底,长江中游地区28个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和城区人口分别达到了3656.99平方公里和2310.31万人。探讨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地关系、空间格局特征等,有助于提升“中三角”地区城镇化发展质量和水平、优化城镇空间布局、促进人地配置协调发展、推进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在此背景下,不同学者从区域整体、省域尺度、重点城市等不同视角对长江中游地区进行了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有:(1)人口分布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sup>[9-13]</sup>。运用人口分布结构指数模型,廖传清对1990—2010年长江中游地区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的时空变化进行了研究<sup>[9]</sup>;邓楚雄运用反距离权重插值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等,对1982—2010年湖南省人口分布格局的时空变化特点和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研

收稿日期:2021-06-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义务教育时空结构、预警与均衡发展对策系统研究”(41671148);中国地理学年表研编资助项目(41971169)

作者简介:马立呼(1993—),男,云南红河人,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资源开发。

究<sup>[13]</sup>。(2)城市土地利用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sup>[14-19]</sup>。许均运用 CLUE-S 模型,模拟研究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动态变化<sup>[14]</sup>;陈万旭运用最小二乘法、空间滞后模型等方法,测度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利用转型和城镇化之间的空间和非空间关系<sup>[15]</sup>;杨小芳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等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 2005—2014 年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耦合关系进行了研究<sup>[16]</sup>。(3)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空间相互作用、空间格局演变、合作机制、城镇化发展质量和水平等的研究<sup>[20-23]</sup>。但上述研究更多的是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城市土地利用、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城市空间结构等方面,缺乏对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土地扩张和人口增长之间的耦合态势方面的研究,不能充分揭示“中三角”地区城镇化进程中人地配置协调问题。因此,本研究基于总体耦合态势模型和空间耦合特征模型等,对长江中游地区 28 个城市的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协调性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区域人地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空间耦合格局,以期对长江中游地区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科学协调人地关系、合理配置和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等方面提供参考意见。

##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长江中游地区 28 个城市 2000—2019 年的建成区面积和城区人口数量作为研究指标。所需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0—2019 年)》。

### (二)总体耦合态势模型

以重心模型及重心的空间耦合态势构建总体耦合态势模型<sup>[1]</sup>,以此来探讨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的整体耦合态势。重心模型如下:

$$G_L(x, y) = \frac{\sum_i^n L_i Q(x_i, y_i)}{\sum_i^n L_i} \quad (1)$$

$$G_p(x, y) = \frac{\sum_i^n P_i Q(x_i, y_i)}{\sum_i^n P_i} \quad (2)$$

式中, $G_L$  表示土地重心、 $G_p$  表示人口重心; $L_i$  表示第  $i$  个城市的建成区面积、 $P_i$  表示第  $i$  个城市的城区人口数量; $x_i$  表示第  $i$  个城市的经度、 $y_i$  表示第  $i$  个城市的纬度。

利用土地重心和人口重心的空间距离和运动轨迹来反映土地与人口的空间耦合态势。重心空间距离的大小表示土地与人口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距离越大协调性越低,反之则高。 $S$  的计算公式:

$$S = d(G_L, G_p) = \sqrt{(x_L - x_p)^2 + (y_L - y_p)^2} \quad (3)$$

### (三)空间耦合特征模型

本研究引入弹性系数以构建空间耦合态势模型,并以此来测度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的空间耦合关系,当系数为 1.12 时被认为人口与土地之间的耦合态势是处于理想状态<sup>[24-25]</sup>。但是传统的弹性系数模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对城市人均用地态势及土地利用集约状况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因此有些学者对其做了修正<sup>[3]</sup>,用人均城市用地约束参数构建协调性系数(CPI)。本研究采用经修改的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CPI = CR_i / PR_i \times R \quad (4)$$

$$R = \frac{LP_i / LPI_i}{LP_0 / LPI_0} \quad (5)$$

式中,CPI 表示协调性系数; $CR_i$  和  $PR_i$  分别表示建成区面积和城区人口的年均增长率; $LP_i$  和  $LP_0$  分别为期末年(2019 年)和期初年(2000 年)人均建成区面积; $LPI_i$  和  $LPI_0$  分别为期末年(2019 年)和期初年(2000 年)理想人均建成区面积。对于 LPI 的取值范围,参考相关研究结果<sup>[1,3,24]</sup>,并根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指标》(GB50137—2011)的规定,给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依次取值 95m<sup>2</sup>/人、100m<sup>2</sup>/人、105m<sup>2</sup>/人、110m<sup>2</sup>/人,以此作为某个城市理想的人均建成区面积。

参考相关研究结果<sup>[2,23-24]</sup>,并结合研究对象的城市土地扩张和人口增长发展的变化,以  $CPI > 1.3$ 、 $0.75 < CPI \leq 1.3$ 、 $0 < CPI \leq 0.75$ 、 $CPI < 0$  或  $CPI > 0$  作为区间值,将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耦合协调类型划分为四种主要类型,分类标准如表 1 所示。

表 1 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协调性分级标准

类型	标准	特征
土地快速扩张型	$CPI > 1.3$	建成区土地扩张速度高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人均用地显著增加。
人地基本协调型	$0.75 < CPI \leq 1.3$	建成区土地扩张与城市人口增长基本同速,人地关系基本协调,人均用地变化幅度较小。
人口快速增长型	$0 < CPI \leq 0.75$	建成区土地扩张速度低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人均用地明显减少。
人地有所收缩型	a. $CPI < 0$ ( $CR_i < 0$ 或 $PR_i < 0$ ) b. $CPI > 0$ ( $CR_i < 0$ 且 $PR_i < 0$ )	建成区土地面积和城市人口同时减少或者其中一个要素减少,建成区迁入人口少于迁出人口,建成区用地规模或者人口规模有所减少。

## 二、结果分析

### (一) 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的时空特征分析

#### 1. 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的时序特征

长江中游城市群 2000—2019 年的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均呈现出极速波动增长的态势,其演变历程大致可分为平稳增长、反向变化、波动增长和交叉增长四个阶段(图 1)。2000—2005 年,这一阶段城市土地与人口均呈现出增长趋势,其中土地扩张更为显著,远大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建成区面积快速扩大,但是这一阶段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速率总体下降。2005—2007 年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反向变化轨迹,其中城市土地大幅度扩张,形成了倒“V”字形结构,在 2006 年土地扩张速率达到了 16.10%;而城市人口则出现了下降趋势,同时形成了显著的“V”字形结构。2006 年初步提出“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目标,因此推动了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2007—2015 年是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速率波动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土地扩张的速度远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人口增长较为缓慢,只有 2011 年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持平。2015 年以后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速率呈现交叉增长的态势,这一阶段是人口增长较为快速的时期,并在 2018 年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达到了最高值。总

体而言,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土地扩张和人口增长均在高速推进,而且其推进过程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出同步共进的特征;土地扩张速度一直都保持着极高的水平,并且总体上比人口增长速度高,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建设用地扩张速度很快,土地城镇化显著,同时体现出人地配置不协调的建设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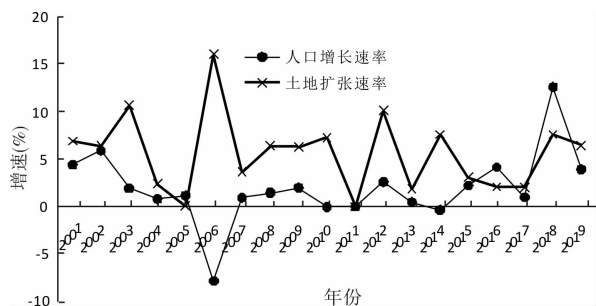


图 1 2000—2019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速率变化图

#### 2. 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的空间格局

通过分析人口增长速率和土地扩张速率空间格局图(图 2),再结合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增长与土地扩张速率标准差椭圆图<sup>[26]</sup>(图 2),可以直观地看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吻合性,两者的增长重心位于九江市西部地区,在空间上趋于重叠,同时增长格局均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西北—东南走向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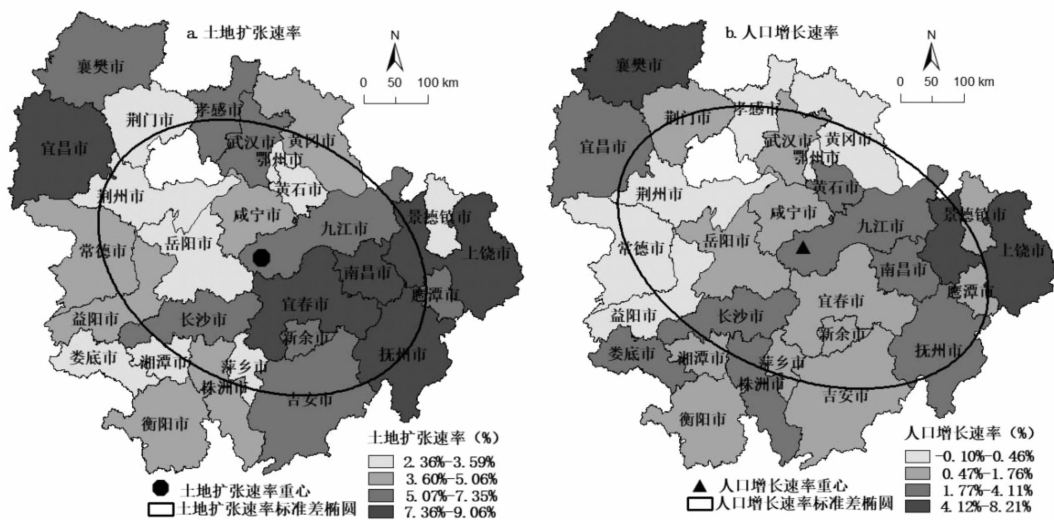


图 2 2000—2019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速率空间格局图

注:地图来源于国家标准地图服务官网,无修改底图,审图号:GS(2016)1605 号。

人口高速增长城市在空间上主要分布于城市群西北地区 and 东南地区。2000—2019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增长速率最高的为襄樊和上饶,第二梯队的城市由中心城市长沙和南昌牵头,包括宜昌、抚州、九江、娄底等 8 个城市,其增长速率在 1.77%—4.11% 之间;武汉、新余、吉安、宜春、鹰潭等 12 个城

市人口增长较慢,其速率在 0.47%—1.76% 之间。其中武汉作为“中三角”地区的中心城市,其人口增长速率相对较低,主要是武汉发展较为成熟,人口增长受到了各方面的制约;黄冈、常德、益阳、孝感和鄂州 5 个城市人口增长最为低缓,其增速在 0.46% 以下,主要是这些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较低,经济发展较

为落后,人口吸引力不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土地扩张速率最高的是宜昌、上饶、抚州、南昌和宜春5个城市,处于高速扩张态势,其增速在7.36%—9.06%之间,其中上饶是人口增长和土地扩张速率都处于最高水平的唯一一个城市,说明上饶的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均在同步推进,其城镇化进展速度极快。武汉、长沙、九江等7个城市的土地扩张速率在5.07%—7.35%之间,处于高速扩张的态势,其中长沙和武汉作为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兼省会城市,其经济发展较快,综合实力强劲,带动自身及其周边地区的城市土地快速扩张。常德、益阳、黄冈等城市的土地扩张速度较为缓慢,增长速率在3.60%—5.06%之间;荆门、荆州、娄底、湘潭等8个城市土地扩张水平最低,其速率低于3.59%,这些城市受自身人口较少、经济发展较为滞后以及区域大城市如武汉、长沙和南昌等的极化效应等方面的影响,导致城镇化发展缓慢,土地需求量小。

## (二)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耦合态势分析

### 1. 总体耦合态势分析

利用重心模型计算出土地重心、人口重心、两者的移动轨迹及两者间的空间距离(图3、图4),从而揭示人口重心和土地重心的演变特征及空间耦合态势。根据图4,可将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的耦合态势分为四个阶段:(1)2000—2005年耦合性逐渐减弱阶段。土地重心先由东北向西南移动,再由西往东移动,人口重心移动总体上由东南向西北移动。这时期土地重心和人口重心的移动方向处于反向状态,因此两者的空间距离逐步扩大,由2000年17.32km扩大到2005年的33.93km,扩大幅度达到了16.61km,表明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性极速减弱。(2)2005—2008年耦合性极速增强阶段。这一时期土地重心总体上由西南向东北移动,人口重心移动总体方向为由北向南。土地重心与人口重心之间的距离由33.93km缩小到11.55km,缩小幅度高达22.38km,出现了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耦合协调性极速增强的时期。(3)2008—2012年耦合性逐渐减弱阶段。这一阶段土地重心由西向东移动且移动幅度较小,人口重心移动方向是由北向南,同时人口重心移动幅度也很小。这一阶段,人口重心与土地重心之间的空间距离出现了小幅度扩大的趋势,由11.55km扩大到19.70km,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性逐渐减弱。(4)2012—2019年协调性逐步增强阶段。这一阶段,土地重心由南向北移动且移动幅度小,人口重心由西向东移动且移动幅度极大,但这个阶段人口重心与土地重心在空间上逐渐靠拢,

说明两者的协调性逐步增强。

2000—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重心移动轨迹总体上呈现出西南—东北向,而人口重心的移动轨迹较为凌乱,但其整体方向也是由西向东演变。由此可以看出,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转移和土地扩张重心位于东部地区。同时,土地重心和人口重心之间的空间距离不断缩小,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地协调性不断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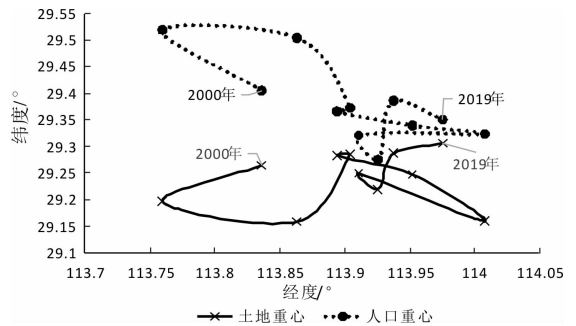


图3 2000—2019年长江中游地区土地重心和人口重心移动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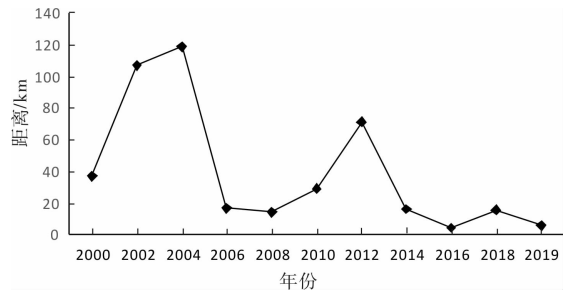


图4 2000—2019年长江中游地区土地重心与人口重心的距离

### 2. 空间耦合特征分析

通过模型计算出测度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耦合态势的协调性系数(CPI),并根据CPI将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城市的耦合协调类型划分为三大类(表2):人口快速增长型、人地基本协调型和土地快速扩张型。此外分成两个时间截面(2000—2010年和2010—2019年)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对比分析。从图5可以得出,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耦合协调类型主要以人口快速增长型为主,两者空间耦合关系较差,土地与人口之间的协调性不高。

2000—201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耦合类型以人口快速增长型为主,除了襄樊、岳阳和湘潭属于土地快速扩张型,其余25个城市均为人口快速增长型,不存在人地基本协调类型城市。这个阶段,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步解构,加上交通运输条件的不断完善、人口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开、城市就业机会更多及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等促进了大量农业人口迁入城市或就地转变为城

市人口,因此长江中游地区各城市以人口快速增长型为主。但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等方面原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跟上城市人口增长的步伐,因此城市土地扩张滞后于人口增长,土地与人口之间的耦合协调性较差。

2010—2019年,长江中游地区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耦合态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人口快速增长型城市减少,土地快速扩张型城市增加到6个:株洲、黄冈、黄石、九江、上饶和景德镇。人地基本协调类型城市从第一阶段的0个增加到了8个,分别是武汉、咸宁、南昌、鹰潭、长沙、娄底、湘潭和衡阳。在空间格局上,土地快速扩张型城市从第一阶段的西部地区转移到东部地区,其中武汉、南昌、长沙3

个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是土地扩张最为快速的区域,呈现出明显的三角形空间格局,说明3个城市作为长江中游地区的中心城市,综合实力突出,对区域产生了显著的引力,吸引城市群内的资源、产业、政策等要素向三大城市集中。

从第一阶段的以人口快速增长型为主到第二阶段人地基本协调型和土地快速扩张型城市大幅度增加这个转变可以看出,长江中游地区城市人口的大量增长对建设建设用地提出了更大的需求量,反过来促进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快速扩张。加上2006年初步提出“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目标之后,更是推动长江中游地区城镇化快速发展,其中土地扩张的速度总体上逐步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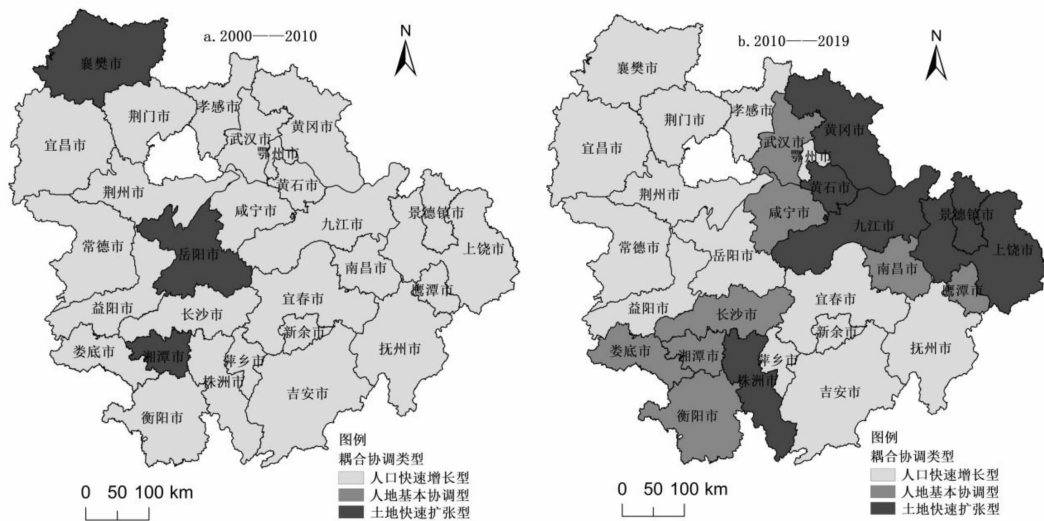


图5 2000—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耦合协调类型空间分布格局图

注:地图来源于国家标准地图服务官网,无修改底图,审图号:GS(2016)1605号。

表2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协调性分析结果

2000—2010			2010—2019		
CPI	耦合类型	数量(个)	CPI	耦合协调类型	数量(个)
$CPI < 0.75$	人口快速增长型	25	$CPI < 0.75$	人口快速增长型	14
$0.75 \leq CPI \leq 1.3$	人地基本协调型	0	$0.75 \leq CPI \leq 1.3$	人地基本协调型	8
$CPI > 1.3$	土地快速扩张型	3	$CPI > 1.3$	土地快速扩张型	6

### 三、对策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目前区域人地配置不协调问题突出,因此今后应该从产业优化升级、政策制定、制度完善等方面改善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控制土地快速扩张,引导人口有序流动,促进人地协调配置,以及区域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新型城镇化道路。

(一)控制土地快速扩张,引导人口有序流动,促进人地协调配置

人地关系的和谐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城市总体上处于城市土地快速扩张的阶段,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增长速率存

在着较大的差距,人地关系不协调问题突出。尤其是武汉、南昌、宜昌等地区土地扩张十分显著,形成了建设用地高密度区域,给区域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应控制这些地区土地高速扩张的态势,促进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提高土地效益。长江中游东部地区是人口增长相对缓慢、人地耦合协调性低的聚集区,因此应合理、有序引导城市人口向东部地区流动,优化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促进人口分布相对均衡,降低人口高密度地区的发展压力。通过调整人口增长和土地扩张,逐渐形成人地协调的区域发展格局,促进人地和谐发展。

## (二)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实现绿色城镇化发展

长江中游地区河网密布、湖泊众多, 地势低平, 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载着巨大的城镇数量及人口规模。长江中游地区土地空间的蔓延扩张, 会加剧土地资源的紧缺性, 造成粮食安全隐忧, 同时也会导致生态环境系统失衡, 引发更为频繁的自然灾害, 给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带来十分重大的损失。因此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从基于“生态文明建设”定位, 突出环境保护工作, 努力实现环境保护与城镇化建设协调推进, 走生态城镇化道路, 树立生态宜居、绿色城市的发展理念, 从行政手段等方面严格控制土地扩张的无序、失控行为, 引导走有序、健康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推进实施生态宜居、人地和谐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 (三) 促进“三角形”空间格局平衡演变, 推进区域协调统一

武汉是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城市和区域核心城市, 其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都十分巨大, 但是武汉作为增长极, 其空间拉力和辐射作用并不协调, 呈现出引力远大于辐射作用的趋势, 未能充分发挥其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从而进一步拉大了与周边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 形成了明显的空间梯度和“核心—边缘”结构。因此, 应进一步提升武汉的辐射带动能力, 加强武汉城市圈及其与周边地区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同为区域中心城市, 南昌、长沙与武汉相比, 存在较大的差距, “三角形”的城市空间格局呈现出协调发展的趋势。因此, 在新型城镇化理念下, 应加强统筹区域协调, 推进南昌和长沙的城镇化建设, 促进引导两者城市人口有序增长, 逐步缩小与武汉之间的发展差距, 形成长江中游城市群“三角形”空间格局协调发展的局面。

##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 28 个城市作为研究尺度, 以建成区面积与城区人口为研究视角, 利用重心模型、空间距离、耦合协调性等方法研究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地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和人地配置空间格局, 结果表明:

(1) 2000—2019 年,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并可分为平稳增长、反向变化、波动增长和交叉增长四个阶段。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都在高速推进, 两者推进过程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出同步共进的特征, 但是总体上土地扩张速度一直高于人口增长速度, 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但与此同时, “中

三角”地区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在空间格局上吻合性较强。

(2) 长江中游城市群 28 个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耦合协调类型可分为 3 类, 其中以人口快速增长型为主, 人地配置耦合协调度较低。但与此同时, 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重心与人口重心之间的空间距离处于逐渐缩小的趋势, 人地关系协调度不断增强。

本研究从时空两个维度分析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地协调问题,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但是本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指标样本数量与类型不够丰富。因此, 在未来研究中需要构建多样本的指标体系, 从多方面多维度去研究在城镇化过程中人地配置问题, 以推进新型城镇化科学合理的发展。

## 参考文献:

- [1] 周艳, 黄贤金, 徐国良, 等. 长三角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耦合态势及其驱动机制[J]. 地理研究, 2016, 35(2): 313 - 324.
- [2] 陆大道.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与空间扩张[J]. 城市规划学刊, 2007(10): 14 - 17.
- [3] 杨艳昭, 封志明, 赵廷德, 等. 中国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协调性研究[J]. 地理研究, 2013, 32(9): 1668 - 1678.
- [4] 陈凤桂, 张虹鸣, 吴旗韬, 等. 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J]. 人文地理, 2010, 25(5): 53 - 58.
- [5] Jan K B. Urban Sprawl: Diagnosis and Remedies[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000(2): 160 - 171.
- [6] Kuang Wenhui, Chi Wenfeng, Lu Dengsheng, et al.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egacity Expansions in China and the U. S.: Patterns, Tates and Driving Forces[J]. Landscape and Urban lanning, 2014, 132.
- [7] Julian D M. Urban Land Area and Population Growth: A New Scaling Relationship for Metropolitan Expansion[J]. Urban Studies, 2007, 44(10): 1889 - 1904.
- [8] 国务院批复同意《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J]. 城市问题, 2015(4): 100.
- [9] 廖传清, 郑林. 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及其演化特征[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7(7): 11 - 20.
- [10] 廖传清. 多尺度下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的时空演化特征分析[D]. 南昌: 江西师范大学, 2017.
- [11] 沈彦. 长株潭人口与城镇化区域格局变化趋势[J]. 国土资源导刊, 2013(2): 52 - 53.
- [12] 李细归, 吴清, 廖天. 武汉城市圈人口分布与区域空间耦合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15(12): 136 - 140.
- [13] 邓楚雄, 李氏, 宾津佑. 湖南省人口分布格局时空变化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分析[J]. 经济地理, 2017, 37(12):

- [14] 许均. 基于 CLUE - S 模型的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动态变化模拟研究 [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 [15] 陈万旭, 李江风, 冉端. 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利用转型和城镇化之间的空间关系 [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9, 28(5): 1036 - 1048.
- [16] 杨小芳, 代侦勇, 田士如. 城市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耦合关系: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J]. 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 2017, 40(10): 102 - 104.
- [17] 卢新海, 唐一峰, 匡兵.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8, 27(2): 252 - 261.
- [18] 张志, 龚健, 王利华.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社会经济时空耦合协调发展评价: 以湖北省 12 个地级市为例 [J]. 水土保持研究, 2017, 24(4): 296 - 303, 310.
- [19] 危小建, 谢亚娟, 孙显星. 城市土地扩张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识别: 以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例 [J]. 测绘科学, 2020, 45(1): 138 - 148, 156.
- [20] 钱顺岳.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 [D]. 南昌: 江西财经大学, 2014.
- [21] 钟洋, 林爱文.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格局演变及优化研究: 基于 DMSP/OLS 夜间灯光数据的方法 [J]. 水土保持研究, 2018, 25(6): 298 - 305.
- [22] 刘兆英.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 [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23] 马静, 李小帆, 张红.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发展质量系统协调性研究 [J]. 经济地理, 2016, 36(7): 53 - 61.
- [24] 沈映春, 张之蔚. 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耦合测度与政策研究: 以京津冀为例 [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33(1): 99 - 105, 115.
- [25] 王海军, 张彬, 刘耀林, 等. 基于重心 - GTWR 模型的京津冀城市群城镇扩展格局与驱动力多维解析 [J]. 地理学报, 2018, 73(6): 1076 - 1092.
- [26] 刘雨婧, 唐健雄, 麻学锋. 连片特困区旅游城镇化时空格局演化及模式研究: 以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为例 [J]. 经济地理, 2019, 39(10): 214 - 222, 230.

(责任编辑 刘成贺)

## 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Situation of Urban Land Expansion and Population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MA Lihu, PAN Yujun, HUA Honglian, MA Jiashen, NIU Fuchang

(Ministry of Geography,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built - up area and urban population from 2000 to 2019,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verall coupling situation and spatial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land expansion and population growth of 28 citie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urban agglomeration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overall coupling situation model and spatial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in the time dimension, the land expansion speed of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urban agglomeration is much faster than that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Secondly, the coupling situation of land expansion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urban agglomeration presents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and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increasing, but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rapid growth of population is the main type,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people and land is low.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cluding controlling the rapid expansion of land, guiding the orderly flow of population,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allocation of people and land; improv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riangle” spatial pattern, accelerating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unity;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material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urbanization.

**Key words:**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land expansion; population growth;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 金融商品转让的增值税法规制研究

刘继虎,殷 煌

(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2016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财税36号文,将金融服务由原来缴纳营业税变更为增值税。2019年出台《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将销售金融商品单列,足以证明对其课征增值税的重要性。然而法律却仅规定了要对其征税,对于各项基本税收要素未做过多解释。法律的不完善最终导致法律与政策之间关系失衡,增值税法与其他法律不能产生良好互动以及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增加。结合增值税的特点和理论基础,提出完善金融商品转让增值税体系需要提高立法层级、合理界定金融商品、确立所有权转移标准、完善抵扣规则以及选择合适的纳税人。

**关键词:**增值税;金融商品转让;征税范围;抵扣规则;纳税人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5.006

**中图分类号:**D922.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5-0033-05

金融业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产业,也越来越成为代表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产业。从征营业税到征增值税,金融服务如何征税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最初的几次“营改增”试点均未涵盖金融业,直至2016年“营改增”全面展开之际,金融业才被列入其中。然而,金融企业和其他企业有所不同,其业务非常繁杂,并且具有非常快的更新迭代速度,在对这类企业的增值税课征制度的设计方面,存在很大的困难。通过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这类企业增值税课征的立法和实践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增值额的计算方面,依然面临不少困难。

过去几年,我国对金融商品转让增值税的课征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并且在征收过程中不断完善相关的规定。随着征收面不断扩张,我国针对金融商品转让增值税征收制定的相关制度和政策开始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因此不得不借助于部委规章等来进行修正,但是这些规章的效力层级不高,有些甚至和现行的税法规定相违背。不仅如此,这些规章只是就问题整改问题,缺乏整体的宏观把握,未能从整体上对征税规则进行更为完善的架构设计。鉴于此,有必要对金融商品转让的增值税法规制进行研

究,在增值税法立法之际重构更具合理性的金融商品转让增值税课征规则。

## 一、课征增值税的理论基础

### (一)国家干预论——国家财政需求

税收是一种分配方式,对国家来说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还可以起到调整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税收对经济的调整是通过影响纳税人的经济利益,指导纳税主体的市场行为实现的。在经济平稳时,其作用不会体现出来,只有在经济处于低迷或者过热的时候,税收的作用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体现,能够确保市场供需关系平衡以及市场资源配置更为合理。在当前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大量的个人和机构开始将投资重点放在了证券市场,相关的交易量急剧增加,交易规模也远超预期。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不理性的投资行为,过度投机现象越来越严重,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资本浪费。这时,单纯依靠市场这一只手已无法对资本进行合理的配置,难以达到对投机行为的抑制,不仅如此,如果不采取其他手段,甚至还会导致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金融商品的交易市场相较于其他市场而言,流动性大,风险性大,进入门槛低,单个投资者只要接

收稿日期:2021-09-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信托所得课税法律问题研究”(12BFX099)

作者简介:刘继虎(1962—),男,湖北荆门人,博士,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经济法、财税法、信托法。

受市场价格就能买入或者卖出他所期望的数量。投资者数量越多,市场中的财富就积累得越多。如果对这些巨额资产的持续累积不加以控制,不通过税收来进行必要的调整,就会进一步拉大财富差距,导致社会的不公进一步加剧,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响。因此,在市场机制没有办法继续发挥它的调节作用时,政府有必要对金融商品的交易进行管控。征税对证券市场产生的影响是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共同带来的,对金融商品转让课征增值税可以增加投资者的税收负担,从而减少其收益,削弱投资动机,让资本不再大批涌入证券市场中,避免资本泡沫的产生。

## (二) 优化税制理论——税收公平与效率

最优税制理论由拉姆齐等经济学家创立,作为一种权衡公平与效率的税制安排,该理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社会的扭曲性和不公平性。在这种理论下,判断税制是否优化的标准是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税收公平包括两种类型:纵向公平与横向公平。这两种类型都要求按照纳税人的经济能力或者说纳税能力对其进行课税。而税收效率要求政府在征税时应尽量减少给纳税人带来额外负担或者说将给纳税人带来的超额负担降到最低程度。一个优化税制,不仅仅要能够同时兼顾公平和效率,而且还要让纳税人的额外负担问题加以解决。

然而,最优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能存在于理想状态中,无论在现实中如何去完善税制,绝对公平有效都是难以实现的。基于此,经济学家们进一步提出了次优税制理论,该理论主张设计税制时应尽可能地减少效率损失,最大化地实现公平,优化税种结构。参与金融商品转让的主体不仅包括企业投资者、机构投资者还有许多的个人投资者,环节多且形式复杂,再加上信息不对称,在通过征税调整市场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效率损失。因此,需要鼓励行为主体主动披露相关信息,在设计税制时应遵循实质课税原则,要让高收入人群和机构多纳税,低收入群体和机构少纳税;要有效降低效率损失,确保社会公平。

## (三) 托宾税理论——金融服务实体

托宾税是由经济学家托宾提出,目的是为了减少纯粹的投机行为。它最早体现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凯恩斯认为投资者在短期交易所依赖的并不是一些理论分析,而是对群体平均判断的预测。如果某种短期交易只需要付出廉价的交易成本,大众就会更钟情于这种短期交易,而交易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消耗资源,并且让某些人获益。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样的做法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因此,需要采取合理的措施加以限制。从本质上来说,托宾税是政府所采取的一

种管制手段,市场中交易的频率越高,其影响也就越大。托宾税通过提高短期交易的成本来抑制短期内资本迅速、大量流通,进而使投资者减少投机性交易,降低金融市场投资风险,从而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金融商品的转让具有流通性和投机性强等特点,必须要借助于国家强制征收增值税手段来进行调节。就金融商品的交易本质而言,与其他任何实体商品交易没有任何区别,都在商品流通中有所增值。实体商品交易要征收增值税,那么理应对金融商品转让一视同仁,将其视为一般的商品交易征收增值税。而且近年来,我国一直强调要加强对金融领域的监管,积极防范金融风险,守住风险底线。引导社会资本有序地向实体经济流动,帮助实体经济强筋健骨,才能提升整体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 二、增值税课征规则的缺陷

### (一) 法律与政策之间关系失衡

自2016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财税36号文确定对金融服务征收增值税至今,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对于金融服务业的增值税征收工作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并且出台了一系列的部委规章。其中,金融商品转让就包含在内。税收法定原则作为税法最为核心的基本原则,要求用法律对每个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规定,同时也应用法律对各类税收要素进行明确。截至目前,金融商品转让增值税的诸多课税依据还没有上升为法律,大部分属于部委规章。

早期我国立法技术不够成熟,而金融税法又是专业性技术性比较强的领域,可以理解由政策先行。从目前来看,我国的立法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大部分领域的法律规定非常精细,而在税收领域方面,相关的立法仍然以原则性为主,属实不妥。虽然税法最终起到的是一种宏观调控的作用,本质上决定了无法对所有事情都进行规定,但这并不表明就要和税收法定原则相冲突。不仅如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授权行政部门制定税收要素规则过程中,必须要做到慎重行事,之所以要做这样的要求,主要是因为这种做法和税收法定原则的“人大主导”不一致。总而言之,依赖行政机关制定的部委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对金融商品转让课征增值税进行规制实质上违反了税收法定原则。

### (二) 征税范围界定不明

目前,我国对金融商品的界定采取正向列举的方式。然而在实践中税法的滞后性可能会导致对其他法律交易回应的不足<sup>[1]</sup>。以民法中的保理行为为例,税法将金融保理服务归类为金融服务,其中争议最大的无追索权保理中债权人取得的相关债权转

让收入该如何定性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如果认为金融商品仅仅是财税 36 号文列举的几项,那么该收入应该定性为不征税收入。归根结底,是税法的规定不明导致无法与其他法律产生良性互动。再者,在互联网时代下金融业迅猛发展,各类创新金融产品不断出现。列举法已经不再适合现在高速发展的金融市场,新型金融产品的出现必将要求税法对金融商品定性,并进行针对性的课税。尤其是新型金融产品的出现伴随着较高的利润水平,若放之任之,不加以管制,既无法满足国家的财政需求,也无法满足税收公平的要求,实现公平分配,甚至有可能会增加投资者盲目的投机行为,掀起一轮金融风险。

### (三)重复征税导致抵扣链条断裂

在我国进行“营改增”之后,在金融服务增值税制度的设计方面,最终明确了以征税为原则,以不征税、免税为例外的规定。对于金融商品转让,现行规定继续沿用差额征税,在征收营业税时对销售额的确定就一直有争议,改征增值税之后不对其进行改进反而直接沿用,考虑有所欠缺。现行规则规定,转让金融商品的销售额应按照销售价格减去购买价格计算,没有考虑买卖价差不完全就是增值额,其中还包括了一些对企业可能承担的风险的补偿,而这些风险补偿不应该成为增值税的征税对象。同时还规定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这就意味着企业购买金融商品这部分的进项税无法抵扣,无形之中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金融业有其特殊性,难以准确计算税基。在现行的税制下,金融商品转让的进项税无法核算,所以选择对其采用差额征税。而不开专票不仅造成了重复征税,还导致企业成为增值税的实际承担者。事实上,一条好的增值税抵扣链条应该环环相扣,处于中间环节的企业只是代扣代缴,消费者才是最终的实际承担者。

### (四)纳税主体设计不合理

将资管产品管理人设计为纳税人,这种方式理论上降低了征管难度,提高了征管效率,解决了纳税人缺失的问题。然而在税务实践中仍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管理人的责任范围,如果管理人选择汇总核算,就意味着其受委托管理的多项产品和业务在课征增值税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某个项目的资产不足以缴纳税款时,该税款就会成为管理人的债务。而这种债务一旦形成,对于管理人而言,就需要以其自有的全部资产来担保债务的履行。这明显扩大了管理人的责任范围,使其对纳税义务承担无限责任。其次是不利于资管产品持续有效的经营。资管产品业务经营具有连续

性,一旦管理人变更,纳税义务人也会变更,那么还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应该由谁承担,没有文件对此作出规定。不仅规定不明,还有可能造成新管理人的税负加重。对于旧管理人而言,如果选择汇总核算,那么由该产品产生的增值税可以与其他的产品进行抵销。而对于新管理人而言,一旦没有能抵销的项目,由该产品产生的纳税义务就无法进行汇总核算,增加了新管理人的纳税负担。因此,在发生管理人变更时,可能会发生新旧管理人互相推诿纳税义务的情况,不利于实现税收征管效率。

## 三、增值税制度的完善对策

### (一)提高立法层级

税收法定原则是帝王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应由法律对各项税收的基本要素作出规定。然而从目前来看,我国关于金融商品转让增值税的课征多以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立法层级比较低,违背了税收法定的要求。究其原因,或许是传统观念认为有关税收的内容技术性比较强,尤其还涉及金融领域,而立法机关的人员构成方面,在金融税收领域的专业知识人才较少,对这一领域的立法技术还存在缺陷,难以真正确立法定的合理性。但是,专业性不够并不能成为违背税收法定原则的理由。现代社会是个高速发展的社会,在这个大背景下,各个领域对综合性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法学也应当如此。作为立法者不仅应懂法,还应具有领域法的思维,结合法律与专业进行立法。因此,应由全国人大协调各部门各行业的专业人士参与,并且要广泛征求意见,在严格遵守税收法定原则的同时,确保法律的专业性。

2019 年 11 月,《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出台,将销售金融商品从金融服务中单列出来,足以证明对其课征增值税的重要性,然而仅规定了要对其征税,对于各项基本税收要素未做过多解释,还是依赖政策来解决。尽管相对于法律规定来说政策具有灵活性,可以进行试错和调整来帮助法律规定的发展与完善,但由于违背了税收法定这一基本原则,本质上仍旧是违法行为。如果一直依靠政策来推动税制改革,长此以往将会导致税收政策被滥用,导致法律的信服力和权威性降低,长远来看,不利于构建合理有效的税收法律制度。

### (二)合理界定金融商品

虽然金融商品转让已被《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纳入征税范围,但对于金融商品的界定,仅有文件对其进行了正向列举,增值税法规体系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税收中立原则要求增值税的适用范围应尽可能多地涵盖所有的商品和服务,简单的列

举、过多的例外、不当的税收优惠措施都会有损税收中立的要求。列举是有限的,而目前金融行业处于不断的创新发展过程中,且速度极快,各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一旦出现不包含在列举范围内的金融商品,但其类型又与范围内的产品类似的话,是否应当对其征税将引起各方争议。为解决这种争议,应明确金融商品的概念,以明确的内涵和周延的外延来回应。

在理论层面,立法时可借鉴金融领域对金融商品的定义。金融学对金融商品的定义有四种观点:目的说、工具说、合同说、资金融通形式说。目的说从购买金融商品目的角度对金融商品进行界定,认为金融商品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商品,是人们为了实现对自己已经拥有财产的保有和价值的增加而创造出来的<sup>[2]</sup>。工具说从功能的角度对金融商品进行界定,认为金融商品是一种资金融通工具,其价值由将来可能的收益决定,这种工具只有在将金融市场作为交易对象时才能被称为金融资产或者金融产品<sup>[3]</sup>。合同说从产品的本质和逻辑入手,认为金融商品的本质就是权利义务在当事人之间的分配<sup>[4]</sup>。资金融通形式说也是从功能角度出发,但相较于工具说,该学说认为金融商品只是人们利用融资工具的一种载体或者说形式,其本身并不是工具,人们在金融市场上的交易对象也不是工具而是该载体本身<sup>[5]</sup>。

从法学视角来看,我们最为熟悉的的就是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与此最为接近的就是合同说。决定一项权利是否能成为商品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流通性。《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中所列举的外汇、有价证券、非货物期货,如果以流通性为标准,那么都属于金融商品。从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和流通性出发,能帮助我们较好地界定金融商品转让行为。金融创新日新月异,交易形式变化多端,通过流通性入手界定金融商品,更具有合理性,能解决目前争议较大的如限售股、“新三板”股权是否属于金融商品的问题,也能增强法律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

### (三) 确立所有权转移标准

《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规定,销售金融商品是指有偿转让金融商品的所有权。然而对于如何判定所有权的归属还存在很多争议。众所周知,所有权具有很多权能,在所有权的诸多权能中,哪一项权能的转移能成为认定所有权在税法意义上的转移的标准呢?

一是交付。交付是民法上确定动产物权发生转移的标准。所有权作为绝对权,具有排他性。对于动产而言,必须以占有状态的改变来宣告所有权的转移,使所有人知悉原所有权人处分动产的事实。对于税法而言,税法只关注和评价财产经济价值的

增减,财产的交付仅意味着财产空间状态的改变,无法表明财产的价值是否发生改变,不足以成为纳税义务发生的基础。对于金融商品而言,财产本身没有形态,纸面形式只是所有权的证明,而非财产本身,任何人占有都没有特定的决定性。

二是经济收益和损失。既然税法关注和评价财产经济价值的增减,财产经济价值的改变在认定所有权转移标准时通常也被考量。然而,经济收益也有可能与所有权相分离,在特定的情况下以独立的合同形式予以转移,或者逐步完成转移,具体的转移时点难以确认,甚至可能出现买卖双方共担收益和损失的情况。所有权是个整体性的权利,要遵循全有或者全无的要求,部分具有经济价值属性权利的转移不能被视为买卖行为,只有完全处分才会导致纳税人所有权利益的终结。

三是经济风险。经济风险是将来财产经济价值增加或减损的不确定性状态。对于税法而言,相较于财产的现有价值,税法更关注将来财产经济价值的变动,经济风险有时还能成为纳税人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前提条件。因此,承担经济风险的主体可以成为纳税人,经济风险的转移可以成为判断所有权转移的标准。对于金融商品而言,金融商品是无形的,不存在因为折旧、折损而导致发生经济风险,其特有的风险是可以与所有权相分离的。即使金融商品的经济风险与所有权分离,所有权人仍可能因处分财产获得收益或者遭受损失。因此,经济风险转移不能成为判断金融商品所有权转移的标准。

四是控制权与处分权。对于金融商品而言,其价值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只有拥有控制权与处分权的人才能决定是否将现有金融商品变现或转变为其他金融商品。控制金融商品的当事人可以基于此种替代所有权的权利决定随时行使处分权,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权人也无法行使金融商品固有的权利实现收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控制权与处分权的转移将决定所有权的转移。

由上可知,只有受让人取得金融商品的控制权与处分权,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随时处分金融商品,该受人才取得该金融商品的所有权。具体而言,当受让人能自由变现资产、改变资产存在形式时,才足以认定其取得了金融商品的所有权。

### (四) 完善抵扣规则

增值税的实际承担者是最终消费者。为了避免对整个交易链上的经营者造成不必要的税收负担,在设计课征规则时都设计了相应的抵扣机制。在设计金融商品转让增值税规则时,也应该如此,不仅要

考虑增值额的计算,还要考虑抵扣链条的完整性。

首先,科学界定增值额。现行规则规定的销售额是个复杂的价格,其中所包含的不仅是增值额,还有风险补偿部分。在计算增值额时,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处理,根据金融商品的特性和行业标准确定一个固定比例,这个比例就作为风险补偿部分,在增值额中予以扣除。纵观世界各国金融业增值税课征经验,尚不存在一个能实现环环相扣、环环抵扣的完美的课征规则,而我国金融服务“营改增”还处于起步阶段,要想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不可能做到一蹴而就,采取固定比例扣除的模式只能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存在的问题。具体的比例,需要由立法机关组织该方面专家进行研讨,并向社会征求意见,以实现该比例的合理性和公平性。

其次,创新发票管理方式。考虑到抵扣和效率问题,可以采取对金融商品转让增值税开具专用发票,同时构建区块链发票制度。2015年我国已在全国全行业推行电子发票,对于金融服务这种具有巨大开票需求的行业来说,这种制度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但是依旧存在一些人为风险。对于此,近几年快速发展的区块链技术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新思路。区块链具有可追溯性,所有入链数据都可追溯。同时,还具有不可篡改性,可以减少税收争议,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应用区块链这种管理方式,一方面可以保证交易记录的真实有效性,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因人为操作失误导致的安全风险,提高税收征管成效。

## (五) 选择合适的纳税人

既然将管理人作为纳税人存在诸多不合理,那么可以将资管产品本身作为纳税人。首先,税法并没有明确纳税人必须具有民事主体资格,资管产品作为纳税人不会有悖于法律。而且资管产品作为独立的财产集合体可以自负盈亏,能独立支出增值税,就可以在持续经营期间内被认定为增值税纳税人。其次,运营资管产品以获利为目的,作为金融商品,资管产品可以在市场中被交易,以此产生增值,成为征收增值税的基础。最后,资管产品本身具有持续性,增值税的缴纳不会受管理人变更的影响。虽然管理人离任,但有关资管产品的纳税周期没有断裂,纳税义务不在管理人身上,自然也不会发生新旧管理人相互推诿义务的情况。以资管产品本身作为纳税人,在到期时作为财产集合体缴纳增值税,程序不会比以管理人作为纳税人复杂,具有可操作性。

### 参考文献:

- [1] 刘剑文,丁健鹤.《民法典》保理新规纳入增值税立法的思考[J]. 税务研究,2021(1):5-12.
- [2] 张宁. 试论金融产品的质量[J]. 中国质量,1999(6):33-34,46.
- [3] 黄达. 金融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82.
- [4] 王宗润. 金融产品创新的路径分析[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34.
- [5] 蒋丽君. 金融产品营销[M].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2.

(责任编辑 刘成贺)

## Research on the Value-added Tax Regulations for the Transfer of Financial Commodities

LIU Jihu, YIN Huang

(Law Schoo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 China)

**Abstract:** In 2016, Caishui [2016] No. 36 was pu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in China, converting business tax to value added tax in financial services. The “VAT Law (Draft)”, which lists the sales of financial products separately, was enacted in 2019, the practice demonstrating the importance of imposing VAT to them. However, the law stipulates the imposing tax but without basic taxation elements.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law ultimately leads to an imbalance between legislation and policy. At the same time, the VAT law fails to interact well with other laws, which leads to the increase of the burden of taxpayers. Based on the study of characteristics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VAT,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VAT system of financial transfer, it is high time to raise the level of legislation, put forward a reasonable definition of financial commodities, set standards for the transfer of ownership, improve deduction rules, and select eligible taxpayers.

**Key words:** financial commodity transfer; value-added tax; deduction rules; taxation scope; taxpayer

# 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的经济法规制路径

吴小燕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上海 201306)

**摘要:**网络信用评价的实质是消费者言论自由在互联网空间的延伸。网络信用评价有利于商家获取消费者的正外部性反馈,并在了解用户需求的基础上改进商品和服务。这一积极效应能够平衡商品和服务与消费者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进而扩大市场经济效益。然而,网络信用评价的负外部性,诸如虚假好评、恶意差评的现象频发,反映出了当前法律规制上的失灵。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当前的立法体系,强化网络平台经营者责任,改进网络信用评价纠纷化解路径,从多个维度打击滥用消费者评价权的行为,进而促进网络信用评价制度的完善,创造和谐的营商环境。

**关键词:**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经济法;规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5.007

**中图分类号:**D922.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5-0038-05

## 一、问题的提出

电子商务的兴起,让网络线上购物方式成为满足人们生活消费需求的主要方式之一。然而,伴随着互联网信用评价功能的不断完善,消费者的评价权得到了保障,但是除去消费者真实、客观的评价之外,网络信用评价中的“恶意差评”“虚假好评”等滥用评价权的现象也层出不穷,甚至衍生出专门的职业,如职业差评师。不法分子利用商家息事宁人的态度,行敲诈、勒索之犯罪行为,虽然它可以通过刑法相关规定来规制,但是大部分遭到“恶意差评”的商户基于维权成本的考虑,基本上是妥协态度,而这一态度又导致这一现象无法根本遏制,最终影响到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那些依赖用户评价的行业,如网购行业、外卖餐饮行业、汽车行业、旅游行业等。除此之外,虚假评价也在一定程度上会诱导其他消费者做出错误的判断,进而导致消费类侵权案件纠纷增多,如宋志坤、石峰名誉权纠纷等以恶意差评为诉讼理由的案件。从长远来看,这不仅不利于营商环境的构建,也会导致市场经济发展成本增加,造成资源的浪费。事实上,我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除了传统的规制市场

经济的法律,也相应地推出了针对网络平台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消费者保护法》等一系列专门性的立法。但是针对网络信用评价的立法条款多属原则性的规定,如《电子商务法》第17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都在原则上规定禁止编造虚假评价诱导消费的行为,但是这种原则上的规定真正落实到实践中其效用却有所折扣。随着网络信用评价类纠纷变多,立法机构也推出了一些新的规制措施,如2021年5月25日实施的《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21条规定“不得以删除、屏蔽相关不利评价等方式欺骗、误导用户”,这一条款是针对网络评价作出的限制直播间运营者以及直播营销人员行为的规定。这一规定的确立虽然可以有效保障消费者的差评权,维护消费者言论自由的权利,却无法有效遏制恶意差评行为。由于直播具有面向群体的不特定性特点,不是每一个给予不利评价的消费者都在直播间购买了商品或者服务,并基于真实的买卖交易关系做出真实评价。而不真实的评价却会影响直播间的销量甚至品牌影响力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恶意差评虽然对一些传统的知名品牌影响

收稿日期:2021-08-03

作者简介:吴小燕(1992—),女,安徽合肥人,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不大,但对大部分新兴企业来说却很可能是致命一击,不仅影响单个企业的生存经营,也不利于构造和谐的营商环境。另外,与“恶意差评”相对应的概念是“虚假好评”。“虚假好评”属于不真实评价的一种,它实质上反映了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关系。因为平台经济的迅速发展,受到移动 APP 端、电脑端首页界面的限制,平台内经营者之间为了争夺首页推送的流量,也会雇佣一些“水军”刷单、刷好评,以获取较高的信用评分并由此盈利。这同样是消费者的评价权被滥用的一种形式。权利的滥用不仅会导致平台内部经营者之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愈演愈烈,不利于平台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消费者选择权和知情权的保护,更甚者会造成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的发生。因此,如何通过经济法规制相关人员滥用消费评价权的行为,成为保障良好营商环境的关键。

## 二、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的影响及制度因素分析

### (一) 网络信用评价及其负外部性的界定

#### 1. 网络信用评价的概念

网络信用评价,又称为网络信用评估,是指消费者对互联网销售平台中的商户进行消费评价的行为,这种消费评价是基于所购商品或服务进行的评分及评价。它与通常意义上的专业机构提供的项目信用评价、证券信用评价、企业信用评价等存在一定差异。这些专门机构提供的信用评价往往是在一套完整的评价指标基础上所做的客观、专业表达,而网络信用评价却是与消费者的评价权相关,是消费者言论自由的权利外在表达形式。当然这种权利表达是立足于实际购买了商品或服务,并实际感知其效用后的情感表达,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的情感倾向性。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感性的倾向,才使得网络信用评价行为的界定变得更加困难。

#### 2. 网络信用评价的负外部性

负外部性是与正外部性相对应的概念,其含义在不同的领域内,可能有着不同的理解。如在经济学范畴里,负外部性是成本上的一种外部不经济,即“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所产生的一些低效率现象;换言之,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成本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sup>[1]</sup>;而在法学范畴内,这种负外部性可能表现为权利和义务关系上的不对等。网络信用评价的负外部性最明显的表现形式就是“恶意差评”与“虚假好评”,它是伴随着平台经济发展的过程而出现的。在理想的状态下,网络信用评价是消费者与平台经

营者以及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相互沟通的一个渠道。然而现实生活中,基于商业竞争的刺激,网络信用评价被异化成追逐经济利益的工具,例如,平台内经营者通过虚假好评获得竞争优势,并通过恶意差评来打压同行竞争者以固化这种优势;而不法消费者会利用手中的“差评权”敲诈、勒索平台相关经营者以牟利。这些行为都会使得消费者、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失衡。而经济法研究的核心命题就是尊重市场发挥决定性资源配置的前提下,国家通过行政立法、经济政策的手段适当地干预市场失灵的状况,使得不同主体的负外部性得到矫正和控制,达到权利义务均衡的状态<sup>[2]</sup>。因此,必须要建立健全经济法律法规、应用技术手段识别出虚假评论,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 (二) 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的影响

#### 1. 扰乱现有法律秩序

网络信用评价的负外部性对现行法律秩序的稳定提出了挑战。在统计中国裁判文书网相关恶意差评、虚假评论类案件的结果中,可以发现近几年随着“互联网+传统行业”方式的迅速发展,网络评价功能影响力在商业竞争中占有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由此导致的网络信用评价纠纷类案件的数量也呈现了增长趋势。纵观这类案件的裁判案由,除了包括刑事、行政和民事案由外,这些案件的裁判依据也不一,有的依据原《侵权责任法》第 36 条第 1 款、第 2 款规定裁判,有的依据《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规定裁判,有的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14 条规定裁判,但更多是按照商誉侵权来裁判。这些现象表明,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裁判规则,而是利用散见于各个法律法规中的单一条款来处理,这样的处理方式会造成法律制度不确定风险,在实质上破坏了各个法律调整对象的稳定性、主体资格的确定性,会造成不同法律之间的重叠规制或者无效规制的情形出现,不利于司法裁判的公平价值体现,最终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权利。

#### 2. 弱化法律的调整功能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机会的随机性、风险的不确定性影响,基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次分配往往是不公平的,这才需要国家法律规制力量的介入,通过税法、反垄断法以及其他经济法律法规来实现更加公平的再分配。但是,网络信用评价的负外部性却会弱化法律的调整功能,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首先,弱化了法律对初次分配的调整功能。在市场经济的各个领域里,都包括了初次分配。平台经济之间、平台内经营主体之间,都是市场经济初次分配

的调整范围。但是由于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平台和内部经营者很可能会受到同行之间的虚假评论攻击。这种虚假评论的商业诋毁虽然并不会直接造成经济损失,但在无形中减损了对方竞争力,若不加以规制,一种可能是形成平台内的垄断,促成超级平台内经营者的诞生;一种可能是使得历史悠久的知名品牌在竞争中淘汰出局。

其次,弱化了法律对权利主体的规制。网络信用评价是一个新兴的功能,它虽不能够直接决定一个企业实质的经济实力,却能够影响企业的未来发展能力。由于当前我国对于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的重视不够,相关法律条文的规制范围内首先偏向的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但是因为网络空间的特有的动态经济交易模式,经营者和消费者身份会随着场景变化而变化,这使得法律对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的规制主体无法明确,导致相关法律的适用效果受到限制。

### 3. 增加社会治理的立法成本

社会治理是特定的治理主体对社会现象进行的管理,是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展开的,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社会的自我服务,其中社会的自主性具有优先价值,而社会的自发性又需要国家手段的干预。当前我国对社会经济领域内的治理方式,主要依靠法律手段来规制,包括税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然而这种治理方式天然地具有滞后性。这种滞后性与迅速发展的平台经济之间形成了矛盾冲突,使得法律规制不能及时地满足现实生活中的需要。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增加社会治理的立法成本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增加了信息成本。在互联网这一虚拟的空间里,几乎随时随地可以通过网络制造出数据与信息,而进行社会治理的前提是能够及时地对这些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及时地识别虚假评价,才能制定统一的标准予以规制。但是,由于网络信用评价属于数据信息的范畴,而我国对于数据产权的归属还未明确予以界定,导致市场上普遍形成了“谁收集,谁利用”的模式<sup>[3]</sup>,这就使得立法机构在信息收集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阻力。另外,由于当前我国关于信息、数据利用的法律边界不明确,从而会增加社会治理主体侵犯隐私权、数据权及商业秘密的风险。

其次,增加了技术成本。在大数据时代,毋庸置疑的是人力的速度完全跟不上技术的速度。在进行数据收集、整理的过程中,为了减少信息错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足带来的“信息失灵”风险,社会治理主体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专门的数据技术手段来处理,然而这些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又需要消耗巨大

的开发成本和维护成本,进而增加社会治理的成本。

### (三) 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成因的经济法检视

网络信用评价实质上是消费者言论自由在互联网经济中的延伸,而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是消费者评价权的滥用,这种权利的滥用不仅包括消费者自己滥用,还包括第三人操控消费者滥用权利,如“好评返现”“刷单返现”“恶意差评”等。权利的滥用只是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溢出的一方面,真正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是法律法规制度的不健全。所以,有必要从经济法视域分析产生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的具体成因。

第一,经济立法的滞后性。网络信用评价是伴随着互联网经济发展的过程而出现的,但是由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它与传统的经济法规制之间存在着立法与实践的接洽问题,所以国内大多数的研究是关注互联网经济领域内的关键问题,而网络信用评价的负外部性相对而言显得没有那么紧迫,这就会导致立法者在制定相关法律的时候容易忽视这一问题,最多给予原则性的规定,而没有更细化、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例如,《电子商务法》第39条第2款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删除消费者对其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的评价”。这是一项禁止性规定,其立法意图是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评价权。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折叠”“屏蔽”是否属于“删除”的方式,仍是存在疑惑的。另外,这里规定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指平台经营者,还是指平台内经营者,存在指向不明的情形。除此之外,当前的一些立法直接参照了一些大型的电子商务经营平台的管理规则而制定,然而电子商务经营平台毕竟只是一个企业,其规则制定的出发点大多是基于法人单位的营利行为,所以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第二,网络信用评价制度存在缺陷。《电子商务法》第39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有健全网络信用评价制度、公示信用评价规则的职责。但是在当前的众多购物平台中,对于什么是“恶意评价”,什么是“虚假评价”有着不同的定义。如《京东开放平台管理规则》认为,恶意差评是指消费者使用侮辱性、诽谤性语言或者明显违背事实的内容进行的评价或者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评价。而《淘宝网用户行为管理规则》认为,恶意评价是指评价人以本人或他人之名,以损害被评价人利益或谋求个人不正当利益为目的,通过夸大或捏造事实,对被评价人做出有违公序良俗或淘宝认为不当的评价;或以差评、中评对被评价人进行侮辱、诽谤、胁迫的行



为。因为定义界定没有标准,会导致不同的行为出现不同的适用规则,进而出现标准不统一的司法裁判。另外,现行的平台管理规则一般会将网络信用评分与流量推荐相挂钩,而流量推荐又与销量直接相关,这就会导致一些商家通过不正当手段极力地减少差评、增加好评来获得综合评分优势。在这一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网络信用评价规则导致了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的溢出。

### 三、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经济法规制的具体路径

法律是基本的底线,在维护社会正常发展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网络信用评价目前发展的现状来说,应该坚持激励与控制并存的理念,既要保护好消费者正当的评价权、选择权,又要通过法律手段规制消费者评价权的滥用。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事前立法规制,事中平台监管,事后司法裁判的程序来抑制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对经济秩序的影响。

#### (一)完善网络信用评价制度相关立法

##### 1. 明确虚假信用评价的类型

虚假信用评价治理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定义界定的不清晰。因此,在完善网络信用评价立法体系的过程中,首先需要界定清楚虚假信用评价的定义及其类型,比如,按照广告评价、无关评价、重复评价、真实评价、虚假评价等划分类型。通过类型化处理,并制定相配套的规制策略,才能够减少虚假信用评价行为的危害影响力,尽可能地保护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 2. 扩大责任承担主体范围

无论是《电子商务法》,还是《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其规制的对象都是平台、平台经营者以及平台内经营者的行为,对其他互联网交易的参与者,诸如第三方刷单组织、职业差评师等,基本上没有规制条款<sup>[4]</sup>。因此,在制定适用法律的时候,有必要对相关条款做扩大解释,将这些参与了网络信用评价活动的主体都纳入规制的范围之内。

##### 3. 赋予相关利益主体有限删除权

虽然相关经济类法律法规明确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删除消费者对其平台内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评价”的规定,但是当前一些电子商务平台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一规定进行管理规则设计。它们大多数采取的是折叠、屏蔽评价的方式来规避这一法律条款。虽然通过折叠、屏蔽可以减少一些不真实差评的影响,却无法规避一些“高评分、差评”的评论,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会影响商家的销量和商誉。因此,

在能够明确举证的情形下,应该赋予利益主体有限制的删除权,让一些属于不正当竞争的商业诋毁评价内容能够被删除,恢复商户的信用积分,消除影响。

#### (二)强化平台经营者的信用评价治理责任

##### 1. 完善商户入驻资质审核制度

作为网络信用评价相关主体之一的平台经营者有义务进一步完善商户入驻平台经营的资质审核。当前大部分平台经营者在商户入驻的时候,设置了资质审核要求,但是这些资质审核大多是通过在线渠道办理的,平台方对相关的许可文件、营业执照等证明类资质文件并不做实质审查,这实际上会导致很多不具有商业信用资质的经营者入驻平台,非常不利于网络信用制度的建立健全。因此,有必要参照实体企业注册的模式,让平台经营者扮演好“守门人”的角色,提高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审核要求,建立黑名单制度,防止不法分子利用网络从事不法行为。

##### 2. 改进网络信用评分机制

网络信用评价的负外部性溢出与网络信用评分机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优化当前的网络信用评分机制。首先,可以降低消费者评价的权重,增加评分要素的种类,比如增加活跃粉丝数量、退货率、产品更新率以及 ODR 等指标综合考量平台内经营者的信用评分,让平台内经营者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产品与服务 quality 上,而不是放在流量推荐的争夺上。其次,可以将消费者评价进行类型化,赋予不同类型评价以不同的权重系数,减少恶意评价、虚假评价对综合信用评分的影响。这样有利于减少同行之间的恶意攻击与打压。

##### 3. 优化平台内部的算法推荐机制

在互联网平台空间里,平台经营者不仅是提供交易场所的服务者,也是平台内部虚拟市场的监管者。如果把互联网平台看作是产品,平台经营者便具有相应的产品责任,对由其产品造成的不公平现象负责。另外,从消费者合同视角出发,平台经营者同时是平台内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合同相对方,因此,受到合同拘束力的影响,平台经营者有义务按照各自的协议约定,促成消费者和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交易。为此,平台经营者需要具备更高的注意义务,及时地更新不合理的算法推荐机制,保证公平推荐,防止平台内经营者为了流量推荐去制造虚假评价,利用网络信用制度的规则漏洞牟利的行为发生。

#### (三)改进网络信用评价纠纷化解路径

##### 1. 扩大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及权限

网络信用评价纠纷发生在网络空间里,因此可以通过互联网法院受理相关维权纠纷,但是基于网络信

用评价牵涉利益主体的广泛性,不应该仅限于消费者维权,而要将平台内经营者的维权纠纷也纳入互联网法院的管辖范围与权限之内。互联网法院管辖能够有效解决消费者维权成本过高,证据收集困难的问题,在程序上也更加便捷,省时省力,有助于增强消费者的权利意识,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

## 2. 完善 ODR 在线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机制

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的规制可以借助在线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来进行事后救济。所谓 ODR 在线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机制是指网络上由非法庭但公正的第三人,解决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因网络电子商务契约发生争执的所有方式。它一般包括:在线协商、在线仲裁、在线调解等纠纷化解模式,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选择来适用某种模式。它能够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有效促成纠纷的解决,对网络信用评价纠纷案件有适用的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当前的 ODR 在线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机制还不够完善,它需要依托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法律制度的完善,否则会出现调解结果的可信任度低,执行效率不高的问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 ODR 在线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机制与司法的衔接,畅通国家、社会、企业相互作用的多元主体调解路径,达到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义务的平衡,构建和谐、友善的互联网交易空间。

## 四、结语

网络信用评价制度在大数据时代有其特殊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这种价值功能在未来互联网经

济发展的过程中仍旧具有极大的作用。网络信用评价是诚实信用的具体表现,总体上对社会发展是有益的,不能因为其负外部性的影响就取消这一制度。就目前来说,网络信用评价的负外部性虽然冲击当前的经济法律秩序,弱化了法律调整功能,增加了社会治理的成本,但是从长远来看,网络信用评价负外部性还是在可控的范畴内的。我们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及时推出规制的法律路径,从多个角度出发,多元协作,不断提高消费者以及其他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素质和权利意识,防止网络信用评价异化。当然,法律规制方式仅仅是众多规制手段的一种,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解决所有的现实问题,因此,有必要结合道德规制、伦理规制等其他手段一起齐同协力。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激励与控制的平衡,在谦抑与精准的经济法规制理念之下,完善网络信用评价制度,实现效益最大化。

## 参考文献:

- [1] 张宏军. 西方外部性理论研究述评[J]. 经济问题, 2011(2): 14-15.
- [2] 胡元聪, 廖娟. 人工智能的负外部性及其经济法规制[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3): 71-79.
- [3] 包晓丽. 数据产权保护的 legal 路径[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21(3): 117-127.
- [4] 胡瑞恺. 浅论电子商务交易中虚假信用评价的法律规制:以淘宝信用评价机制为例[J]. 中国商论, 2021(4): 29-32.

(责任编辑 刘成贺)

# The Regulation Path of the Negative Externality of Network Credit Evaluation by Economic Law

WU Xiaoyan

(School of Law,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network credit evaluation is the extension of consumers' freedom of speech in the Internet space. Online credit evaluation is beneficial for merchants to obtain positive external feedback from consumers and improve their products and services on the basis of users' needs. This positive effect can less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contradiction between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consumer demands, and then enlarge the market economic benefits. However, the frequent negative externality of network credit evaluation, such as false positive comments and malicious negative comments, reflects the failure of current legal regul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urrent legislative system, strengthen the responsibility of network platform operators, improve the path of resolving disputes over network credit evaluation, crack down on the abuse of consumers' evaluation right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and then optimize the network credit evaluation system and create a harmonious business environment.

**Key words:** network credit evaluation; negative externality; regulation; economic law

# 河南省农村留守女童的积极发展、学校适应与成长困境调查分析

程绍珍<sup>1,2</sup>, 张小丽<sup>3</sup>

(1. 郑州大学教育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2. 黄河科技学院 社会性别/儿童研究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63; 3.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为探讨河南省农村留守女童积极发展、学校适应与成长困境,采用一般情况调查问卷、中国积极青少年发展品格量表、中国积极青少年发展能力量表,对河南省4个乡镇7所学校3—7年级630位儿童进行问卷调查。以381名留守儿童(男生209人,女生172人)为分析对象。调查结果显示:1.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友爱善良、有志进取、诚信自律、乐观坚毅等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品格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2. 留守女童品格(有志进取、诚信自律、乐观坚毅)得分高于留守男童;学校适应能力(社会情绪与生活适应能力)得分高于留守男童;女生的整体积极发展水平相比男生要好;3. 假期女童比男童承担的家务和农田劳动高出10.8个百分点。关注培养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和学校适应能力,在教育和培养过程中,要突破传统性别角色界限,倡导家庭性别平等并惠及女童,关注留守男童的积极发展,不断提升他们的积极发展能力。

**关键词:**农村留守女童;青少年积极发展;学校适应;成长困境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5.008

**中图分类号:**G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5-0043-05

史无前例的城乡人口流动催生出规模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据中国社科院调查报告统计显示,2017年16岁以下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达5000多万。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虽然共同面临父母缺席和支持性资源的缺失等不利的留守环境,但其积极发展和社会适应状况存在多元性、差异性的特点,以及留守阶段与未来发展状况相关性,以上问题已经引起学者的关注<sup>[1]</sup>。

农村留守儿童指父母双方或单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由代理监护人管理或自我照顾的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sup>[2]</sup>,目前学界对留守儿童发展研究正在从重视“留守问题”调查向促进积极发展、良好社会适应转型。积极青少年发展观(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PYD)是利特(Little)于

1993年首次提出。2002年之后又经埃克勒(Eccles, 2002)、罗斯(Roth, 2003)与勒纳(Lerner, 2004)对其完善。积极青少年发展观强调青少年自身蕴含的发展潜力和良好环境在个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主张“培育”而非“管理”,是个体和组织促进青少年能力提高的原理、方法和推动青少年积极发展的实践活动。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开始关注积极青少年发展的品质研究<sup>[3-5]</sup>,提出了“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概念。目前我国学者在吸取国内外积极心理学营养的基础上,尝试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元素,紧扣积极青少年发展时代精神,提出中国文化背景下积极青少年发展的结构、内涵<sup>[6]</sup>、理论、干预实践<sup>[7-8]</sup>。初步构建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青少年发展促进体系。

**收稿日期:**2021-08-25

**基金项目:**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农村留守儿童学校适应的异质性与干预研究”(20YJA840002);2020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时代流动儿童社会文化适应与心理素质培养的整合研究”(2020-ZZJJ-269)

**作者简介:**程绍珍(1950—),女,山东济南人,硕士,郑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青少年心理健康。

对于青少年,良好的学校适应对身心健康、积极发展至关重要,学校是青少年除家庭之外的主要活动场所,学校适应是其成长的一项重要发展任务<sup>[9]</sup>。部分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在学校适应和心理适应上均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问题,倾向于发现留守儿童的“问题”,得到了有关留守儿童这一群体的诸多“消极”结果<sup>[10]</sup>。但另一部分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即使在诸多风险因素环境下也能得到较好的发展,表现出生活自理、助人行为<sup>[11]</sup>、自强不息、茁壮成长的积极态势<sup>[12]</sup>。

此外,课题组从性别的维度尤其是女童的视角考察农村留守女童生存环境、发展状况和学校适应,发现相对于男童,农村女童更容易被父母留在家中,她们比留守男童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照料责任和农活负担;留守男童和留守女童在学校适应和心理适应上均存差异性,一项探讨青少年在学校适应方面表现的差异性和青少年积极发展不同类型的研究发现,女生的积极品格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女生的整体发展水平相比男生更高;一项初中生学校适应相关研究发现,男生的外显问题、学习问题和内隐问题水平高于女生,而适应能力水平明显低于女生<sup>[13]</sup>。这些研究提示,留守儿童群体内存在积极发展及其适应状况的异质性,哪些因素引起差异性及不同的学校适应,这也是本研究试图考察的问题。为此,课题组于2019年4月到2020年10月,对洛阳、周口、潢川留守儿童进行调查,探讨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特点及其与学校适应的关系。

## 一、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和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在河南省洛阳、周口、潢川4个乡镇随机抽取7所学校15个班级663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删除废卷33份,最终有效问卷份630名儿童,其中留守儿童381名(男生209人,女生172人);平均年龄(M):12.63岁,留守儿童均差(SD):1.83岁。

## 二、研究工具

### (一)一般情况调查问卷

问卷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子女、留守与非留守、父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监护人情况、假期承担家务劳动状况等。

### (二)中国积极青少年发展量表(C-PYD)

采用郭海英、蔺秀云、林丹华等编制共118题,包括品格、能力、联结和自我价值4个分量表。本文采用积极青少年发展——品格分量表,包括“爱、志、信、毅”四个量表,总计42个项目。“爱”分量表

共20个项目(如“如果同学有困难,我会主动帮助他”),“志”分量表共9个项目(如“我在学习上很刻苦”),“信”分量表共7个项目(如“我是个言行一致的人”),“毅”分量表共6个项目(如“目标已确定,即使遇到障碍我也不轻言放弃”)。在总样本中,品格量表总体及四个分量表的信度指标范围为0.83~0.96,以往的研究显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量表的结构与内涵融入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

### (三)学校适应状况采用中国积极青少年发展量表(C-PYD)——能力量表

包括“学业能力、社会情绪能力和生活能力”三个量表,共26个项目。学业能力分量表共12个项目(如“我总是喜欢尝试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学习上的问题”),社会情绪能力分量表共9个项目(如“我知道如何交到更多的朋友”),生活能力分量表共5个项目(如“对我而言,做好个人卫生,如洗漱、洗衣服等,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总样本中,能力量表总体及三个分量表的信度指标范围为0.72~0.95,以往的研究显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 (四)数据统计分析

全部资料收集后,采用SPSS17.0数据库集中录入,使用一般描述性统计、t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 三、调查结果

### (一)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优秀品格发展状况

首先,以积极青少年发展传统优秀品格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为自变量,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友爱善良、有志进取、诚信自律、乐观坚毅等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品格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结果见表1。

表1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优秀品格发展的差异性分析

	爱(M±SD)	志(M±SD)	信(M±SD)	毅(M±SD)
非留守儿童	82.62±13.56	32.75±6.66	26.45±6.12	23.50±5.54
留守儿童	81.83±13.54	32.67±6.37	26.14±6.19	23.40±5.71
T值	0.71	0.14	0.61	0.21
P值	0.35	0.76	0.51	0.80

### (二)留守女童与留守男童在积极发展水平、学校适应能力状况

以积极青少年发展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社会性别为自变量,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积极发展水平总分和5个维度得分上均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表现为:

留守女童的品格和适应能力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在有志进取、诚信自律、乐观坚毅、社会情绪与生活适

应能力得分高于留守男童。女生的整体积极发展水平相比男生要好。结果见表2。

表2 留守女童与留守男童积极发展水平、学校适应能力的差异性分析

	志(M ± SD)	信(M ± SD)	毅(M ± SD)	社会情绪能力(M ± SD)	生活能力(M ± SD)	发展水平(M ± SD)
留守男童	31.90 + 6.57	25.42 + 6.36	22.71 + 5.84	31.98 + 8.09	18.61 + 4.56	359.48 + 60.55
留守女童	33.49 + 6.01	26.94 + 5.94	24.24 + 5.46	34.16 + 7.89	20.29 + 4.56	373.66 + 55.88
T	-2.46**	-2.40*	-2.62*	-2.64**	-3.58***	-2.34*
P	0.006	0.019	0.011	0.009	0.000	0.012

注: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 (三) 留守男、女童承担家务劳动状况

假期女童比男童承担了较多的家务和田地劳动。研究对381名留守儿童(男女留守儿童分别为209人、172人)假期承担农活家务劳动情况显示,男生帮父母干农活做家务、做自己事情分别为110人、99人;女生帮父母干农活做家务、做自己事情分别为109人、63人,留守男童帮父母干农活做家务人数占留守男童人数的52.6%,做自己事情人数占47.3%;留守女童帮父母干农活做家务人数占留守女童人数63.4%,做自己事情占36.6%;留守女童帮父母干农活做家务比留守男童高出10.8个百分点。

## 四、相关讨论和启示

### (一) 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积极发展的基本现状

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同样具有友爱善良、勤奋刻苦、诚信自律、乐观坚毅等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品质,这一结果与国内叶枝、赵国祥等学者来自北京、辽宁、河南研究发现青少年积极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的发展趋势结果相一致。显示大部分留守儿童虽然面临父母缺席、城乡分离等不利的留守环境,但是依然有积极、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显示不利的诸多风险生态环境,同样可以进一步激发潜能和自身积极的品质,他们具有积极成长和发展的愿望和固有力量,可以成为自我发展的主导者。依据此类研究结果可以认为,过分夸大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给他们贴上“问题儿童”的标签是不恰当的。要建立“减少问题”与“促进积极发展”双管齐下的留守儿童关爱新思路。

### (二) 留守女童与留守男童积极发展品格水平、学校适应状况

叶枝、赵国祥等研究发现,青少年的积极发展水平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和年纪差异。具体表现为女生的品格得分显著高于男生。本次调查验证了以往学者的研究结论,留守儿童积极发展水平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表现为:留守女童的品格、学校适应能力得分高于留守男童;女生的整体积极发展水平

比男生好。可能的原因一是社会宏观环境的改变,形成促进留守女童积极发展的外界环境。近年来,中国在深入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破除传统观念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11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在妇女与教育领域逐步落实“教育性别平等原则”。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小学教育和接受中等教育女孩的在校率提高,乡村女童生存和发展环境有所改善,提高了农村女童教育、发展的机会和能力<sup>[14]</sup>。其次,农村家庭对女孩子教育投资趋于增长的态势,相关调查发现,“养儿防老”的传统理念趋于瓦解;家庭中的女儿成年后在照顾父母、亲情支持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客观上影响了父母,舍得为女儿的教育投资,使其在积极健康发展中发挥作用并从中平等获益。

此外,已有研究显示个体可能也在自身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行动者角色<sup>[15]</sup>。获得积极发展的留守女童能更珍惜和有效地调控身边多重社会资源和情境资源,发挥自身优势、克服环境制约,促进自身积极发展,为进一步获得适应性成长奠定基础,从而建构自身的生命历程,也是很有意义的研究议题。

本研究显示,留守女童学校适应能力得分高于留守男童。与以往研究认为男生比女生表现出更多行为问题的结果一致<sup>[16]</sup>,可能与性别的生物学因素相关,男孩子更容易调皮、冲动、多动,特别是中小学阶段的男生成熟相对较晚,对自我行为的约束和控制能力较低,缺失坚毅专注、勤奋进取精神,父母外出打工使他们更容易出现问题行为、适应问题,一些调查已指出,父母外出打工对留守男孩的学习成绩造成的不利影响更大<sup>[17]</sup>。此外,可能的原因是来自传统男女角色的刻板印象,遵从“男儿有泪不轻弹”等传统的男孩则倾向于对压力闭口不言,可能导致其缺乏同他人甚至家人的交流分享,不容易建立社会支持网络。

### (三) 留守女童承担家务劳动状况及成长困境

全国范围内对农民工输出多样本调查发现,父

母外出打工以后,留守女孩、特别是贫困地区女童,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农业和看护弟妹劳动,更少时间参加体育或其他娱乐活动,对留守男孩却几乎没有影响<sup>[18]</sup>。放学以后,男孩更倾向于出去玩,一些留守男孩在校外游荡、迷恋网络游戏,甚至涉足“帮派”<sup>[19]</sup>。还有研究发现,外出打工的父母担心留守男孩的种种“不利处境”,倾向于将儿子带到打工城市,以便更好地管教和照顾<sup>[20]</sup>。在对留守儿童团体活动分享交流中,更多的女孩坦言,爸爸妈妈外出打工,地里农活、弟妹的看护和大部分家务劳动是在爷爷奶奶的支配下由女孩承担,祖辈监护对留守男孩形成“管护”空档,对留守女童也难以提供社会支持,留守女童依然面临突出的成长困境。上述情况本身也透视出家务劳动依旧被视为女性的责任,而非两性共同承担。在传统性别角色分工模式和父权制色彩浓厚的中国农村,尽管传统性别规制一度面临“解传统化”的挑战,但留守妇女,包括留守女童承担更多家务劳动的格局在短时间内很难发生彻底改变,仍会在人口流动、家庭拆分模式中得到延续。

有研究对义务教育阶段后留守儿童的职业发展、生活状况的追踪研究,觉察到在儿童留守阶段中留守儿童性别劳动分化,即留守女孩必须承担一系列再生产劳动,留守男孩则很少参与劳动经历,会提前形塑了性别化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表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习惯、劳动纪律等方面巨大的性别分化,现有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已不具备其父辈在艰辛年代里铸就的勤劳敬业、坚韧隐忍的劳动品质,以频繁地更换工作和逆反行为表达对单调劳动、严苛管理、劳资矛盾、利益纠纷的强烈愤懑和利益诉求<sup>[21]</sup>。并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有留守经历。相关研究成果和本文的实证发现也许可以为探讨留守经历对儿童成长发展的影响提供一个合理解释。如埃尔德的生命历程理论所述,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了其所经历的事件之中,同时也被这些事件塑造着。再如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认为,个体在成长的不同阶段,如果不能成功地解决周围环境所提出的特定社会要求,将会给其未来的社会化过程留下隐患。从生命动态历程观察会发现,相当一部分留守儿童的留守阶段,可能影响他们未来社会化适应的能力,主体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裂或背离。如果他们对曾经的经历不能建立起合理的认知,可能导致其成年后面临融入社会的困难。因此探讨不同经历、不同因素对儿童成长发展的影响是很有意义的研究议题。

#### 四、结论

留守男童、留守女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友爱善良、勤奋刻苦、诚信自律、乐观坚毅等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品格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留守女童的品格、学校适应、整体积极发展水平相比男生要好;假期女童比男童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和农田劳动。在教育和培养过程中,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要突破传统性别角色界限,倡导家庭性别平等并惠及女童。关注留守男童的积极发展,不断提升他们的积极发展能力。

#### 参考文献:

- [1]胡义秋,方晓义,刘双金.农村留守儿童焦虑情绪的异质性:基于潜在剖面分析[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8(3):346-352.
- [2]胡月琴,甘怡群.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的编制和效度验证[J].心理学报,2008(8):902-912.
- [3]盖笑松.青少年积极品质的发展规律与培养途径[J].人民教育,2013(2):9-12.
- [4]常淑敏,张文新.人类积极发展的资源模型:积极青少年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和领域[J].心理科学进展,2013(1):86-95.
- [5]孟万金,张冲,Richard Wagner.中国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测评量表研发报告[J].中国特殊教育,2014(10):62-66.
- [6]林丹华,柴晓运,李晓燕,等.中国文化下积极青少年发展的结构与内涵:基于访谈的质性研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14-22.
- [7]郭海英,刘方,蔺秀云,等.积极青少年发展:理论与展望[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5-13.
- [8]叶枝,赵国祥,务凯,等.积极青少年发展类型特点及其与学校适应的关系[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7):23-31.
- [9]林崇德.发展心理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 [10]罗静,王薇,高文斌.中国留守儿童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9(5):990-995.
- [11]申继亮,刘霞,赵景欣,等.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子女心理发展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5(1):108-116.
- [12]范兴华,方晓义,陈锋菊,等.农村留守儿童心理资本问卷的编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5(1):1-6.
- [13]王娟娟.初中生生活事件、心理弹性和学校适应的关系[D].南京:东南大学,2017:31.
- [14]卜卫.性别平等从童年开始:北京+25“女童”评估报告[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0(5):13-26.
- [15]张文新,常淑敏.积极青少年发展及其启示[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1(6):131-133.

- [16]刘霞,范兴华,申继亮.初中留守儿童社会支持与问题行为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7(3):98-10.
- [17]李庆海,孙瑞博,李锐.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模式与留守儿童:基于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4(10):4-20.
- [18]李桂燕.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现状:以山东省农村为例[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1(2):113-118.
- [19]李涛.乡村留守儿童:成立“帮派”抱团取暖[N].中国青年报,2015-08-11([http://edu.ifeng.com/a/20150811/41415805\\_0.shtml](http://edu.ifeng.com/a/20150811/41415805_0.shtml)).
- [20]段成荣,吕利丹,郭静,等.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和发展基本状况: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学刊,2013(3):37-49.
- [21]蔡禾.从“底线型”利益到“增长型”利益:农民工利益诉求的转变与劳资关系秩序[J].开放时代,2010(9):37-45.
- (责任编辑 谢春红)

## 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School Adaptation and Growth Predicament of the Left – behind Girls in Rural Areas of Henan Province

CHENG Shaozhen<sup>1,2</sup>, ZHANG Xiaoli<sup>3</sup>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2. Social Gender Research Center/Children Research Center, Huang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Zhengzhou, Henan 450063, China; 3. Zhengzhou Vocational College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school adaptation and growth predicament of left – behind girls in rural Henan Province, it adopts the Methods A general survey questionnaire, China Active Adolescent Development – Character Scale, and China Active Adolescent Development – Ability Scale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630 children in grades 3 – 7 from 7 schools in 4 townships in Henan Province. It takes 381 left – behind children (209 boys and 172 girls) as the analysis object. The survey shows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Comparing with non – left – behind children, the left – behind children demonstrates no difference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including friendship, kindness, enterprising, honesty, self – discipline, optimism and perseverance; 2. Left – behind girls scored higher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school adaptability (i. e. social mood and life adaptability) than those left – behind boys. The overall level of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girl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boys; 3. The housework and farmland work Girls taken by girls is higher than that taken by boys during holidays by 10.8 percentage points. Conclusion Focus on cultivating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and school adaptability of left – 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t is necessary to break through the boundaries of traditional gender roles, advocate gender equality in the family and benefit girls, pay attention to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left – behind boys,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ir positive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Key words:** left – behind girls in rural areas;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youth; school adjustment

#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对女性解放的推动

曹晓辉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共党史教研部,北京 100091)

**摘要:**《新青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刊物之一。它不仅猛烈批判封建礼教对个体尤其是女性的束缚,倡导“新女性”的独立人格,更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主要阵地。女性在《新青年》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下,因反抗婚姻制度等原因而离家出走乃至自杀等个体反抗形式,逐渐成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行为模式,对女性产生了强烈的示范和导向作用。但是《新青年》以男性启蒙者为主体的自上而下的启蒙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女性自我觉醒的困难。

**关键词:**《新青年》;女性解放;新女性;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5.009

**中图分类号:**D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5-0048-06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阵,《新青年》对女子问题予以持久的关注,它在猛烈抨击婚姻家庭观、贞操观、节烈观对女性摧残的同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号召女性冲破封建罗网,恢复独立人格,追求成为“娜拉”式的“新女性”。在《新青年》个性解放思想的倡导下,女性这一群体以新的姿态登上历史的舞台,自发投入到组织理想社会的实践中。

## 一、现象描述:《新青年》对妇女问题的持久关注

《新青年》自创刊之日起就将妇女问题列为重要议题。陈独秀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将“女子参政运动”定义为“求男权之解放”<sup>[1]</sup>,女子解放是为女子摆脱奴隶地位,成为自主、自由之人。由其译介的《妇人观》,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此后,《新青年》每卷都刊发与妇女问题相关的文章,标志着“女子问题”再度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其对妇女问题的讨论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之一。

特设“女子问题”专栏,讨论妇女解放问题。从第2卷第6号至第3卷第5号,《新青年》特设“女子问题”专栏,以“集中刊发女性作者撰写的妇女解放论文”<sup>[2]</sup>,这些文章既包括宏观上的妇女解放议题,又包括婚姻、家庭、教育等具体问题,文章对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大加鞭挞,显示出《新青

年》明确的女子启蒙意识。

推出“易卜生专号”,介绍国外“新女性”。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译介了挪威现实主义作家易卜生及其代表作《娜拉》,并配发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旨在突出易卜生革命思想家和现实主义戏剧家的身份,宣传由其倡导的妇女解放思想。易卜生的《娜拉》成为女性走出家门的代表,“娜拉”的“我是一个人”的语言冲击了中国女性的传统思想观念。

采用“通信”“讨论”“读者论坛”等编辑策略,使“读者诸君自由发表意见”<sup>[3]</sup>,征询妇女问题意见,发起广泛讨论,其中对贞操问题的讨论尤其值得关注。《新青年》在“通信”栏曾专门讨论贞操对女子的迫害,“贞洁之操行,若专为女子设也”,对女子“为害尤烈”<sup>[4]</sup>。由周作人翻译的日本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鲁迅的《我之节烈观》、胡适的《贞操问题》、华林的《社会与妇女解放问题》等文章,引发了社会对贞操问题的持久关注。“讨论”栏目曾刊出了胡适、周作人与蓝志先关于贞操问题的辩论。这场对封建贞操观的讨论,提升了妇女问题在社会上的关注度,并成为声讨传统礼教的突破口。

此外,《新青年》辅以小说、戏剧、游记、演讲稿

收稿日期:2021-09-15

作者简介:曹晓辉(1994—),女,山东临朐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2019级中共党史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等形式关注女子问题。在《新青年》对女子问题的关注下,社会各界关于女子问题的讨论渐趋活跃。

## 二、破字当头:《新青年》对封建礼教的批判

《新青年》猛烈批判中国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和摧残,从而掀起了妇女解放的新浪潮。《新青年》批判封建礼教,呼吁女子个性解放,主要从批判婚姻家庭观和贞节观展开。

### (一) 批判婚姻家庭观

《新青年》对婚姻家庭观的批判始于颂扬爱情。《新青年》第3卷第5号刊登了震瀛翻译的《结婚与恋爱》一文。作者认为爱情是“极自由之模范,希望娱乐之所由创作,人类命运之所由铸造”<sup>[5]</sup>。文章中用“自由”“娱乐”等辞藻来形容爱情,突出了爱情在人生中的重要地位。此后,胡适翻译了《关不住了》,创作了《应该》等文章,这些关于爱情的篇章在《新青年》上出现,使“爱情的话题登上了新文化运动的大雅之堂,并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一种时髦话语”<sup>[6]</sup>。

在讨论爱情的基础上,《新青年》对婚姻制度开始了激烈批判。一是批判早婚制度。《新青年》第2卷第3号刊出了由莫夫卿写给陈独秀的《通信》,莫夫卿认为青年不成功的原因之一为“早婚之害”,认为“不能自立之人强之结婚,则种种之害相因而生”<sup>[7]</sup>。此后,《新青年》在第3卷、第4卷相继刊载抨击早婚制度的文章,批判早婚是“急以自杀其身,并杀其国家,灭其种族”<sup>[8]</sup>。青年学生才智的丧失,“未有若结婚之酷者也”<sup>[9]</sup>。二是批判包办婚姻。《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登载了由鲁迅摘抄的一首少年控诉包办婚姻的诗,诗中内容极力反对包办婚姻,控诉早婚。鲁迅将少年的呐喊称赞为“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发出“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sup>[10]</sup>的呐喊。

《新青年》还对传统家庭伦理观展开批判。陈独秀指出,“三纲五常”是“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sup>[11]</sup>,他极力推崇“现代立宪国家……子不必同于父,妻不必同于夫”<sup>[12]</sup>的家庭伦理。这种新型的家庭伦理关系,能够使得父子、夫妻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鲁迅也控诉“家”是“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sup>[13]</sup>,其《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呼吁父亲“义务思想需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sup>[14]</sup>。《新青年》对父权与夫权的批判,对颠覆传统家庭伦理观念中的父子、夫妻中的等级尊卑关系,重建平等、新型的家庭伦理观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 (二) 批判贞节观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思想界与文化界对

贞节观展开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深刻、最尖锐的批判,《新青年》在这场批判运动中的作用尤为突出。

中国历史上的贞节观念是“烈女不更二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贞烈可风”<sup>[15]</sup>,这些话牢牢禁锢着女子。“女子操行端正,未嫁而能自守,已嫁从一而终,谓之贞;夫死守寡而不再嫁,谓之节;无论已嫁未嫁,夫死以身相殉,或遇强暴凌辱而以死相抗,谓之烈。”<sup>[16]</sup>《新青年》对贞节观的批判源自周作人翻译的日本诗人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一文。周作人认为道德应该随着人类生活的进步而不断改善,一旦道德对人类生活产生阻碍,则应该废除。贞操对男子没有约束力,却要求女子必须遵守,这种特性与道德服务社会的目的相违背,因而贞操不具备道德的功能,把贞操当作道德不合理,贞操道德说不合理。此外,贞操的界定标准直接关系到贞操道德观的合理性。“假定作贞操只是结婚的男女间应守的道德,这样说,那结婚以前的失行,不是应该一切宽假了么?”<sup>[17]</sup>

此文刊出后,胡适撰文《贞操问题》,他认为贞操问题体现了男女之间道德评判上的不公平。他明确提出:“贞操不是个人的事,乃是人对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双方面的事。”<sup>[18]</sup>《贞操问题》刊出后,《新青年》在第6卷第4号“讨论”栏目中,刊发了胡适、周作人和蓝志先关于“贞操是不是道德”的讨论。<sup>[19]</sup>

此外,鲁迅撰文批判节烈观,他认为节烈观导致女子“难”“苦”“死”的境地。他在《我之节烈观》中对传统道德家的节烈观提出了五个问题,一是不节烈的女子是怎样害了国家的?二是救世的责任,为何会是女子的责任?三是表彰女子节烈,有何效果?四是节烈是否道德?五是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鲁迅认为,贞操作为道德,须得夫妻之间共同遵守,节烈单对于女子而言,绝不能当作道德。男子自己不守节烈,也绝不能向女子特别要求。鲁迅在分析“节烈”形成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基础上,接着又提出新的疑问,“节烈难吗?”“苦吗”?他认为,烈妇自古必死,节妇活着,不仅遭受精神的痛苦,且遭受生活的痛苦,节烈对女子来说,很难、很苦。<sup>[20]</sup>

《新青年》从女性的自由与幸福出发,以贞操观是否是道德为主线,以批判贞节观为重点,它不仅明确表明了中国妇女生活的荒谬,而且成为近代中国女性主义思潮的起点,揭开了中国女性解放史上的重要一篇。

## 三、立字其中:“新女性”独立人格的彰显

提倡个性解放,树立国民独立人格是《新青年》秉持的宗旨。《新青年》以“易卜生主义为核心的资

产阶级个性主义”<sup>[21]</sup>为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批判封建礼教,倡导女性树立新的人格。

### (一)《新青年》对“新女性”的塑造

《新青年》对“新女性”的塑造始于揭露封建礼教束缚下女子的悲惨遭遇,主张破除旧礼教对女性的束缚。封建礼教下,“男子视女子如物质,不认其人格;视女子为附属品,不认其完全资格”<sup>[22]</sup>,女子居家以“三步不出闺门为女德”<sup>[23]</sup>,女子被“道德、经济所压制,而不能保障天赋之人权”<sup>[24]</sup>,毫无人格自由可言。在揭露女子悲惨遭遇的基础上,吴虞、刘延陵、郑佩昂等人开始了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中,吴虞极力批判传统家族制度,他指出,家族制度“与专制政治胶固而不可分析”,家族制度之流毒“不减于洪水猛兽”<sup>[25]</sup>。郑佩昂的《说青年早婚之害》<sup>[8]</sup>、刘延陵的《婚制之过去、现在、未来》<sup>[26]</sup>等文则彻底否定了封建婚制的合理性。

在揭露旧礼教束缚下女子的悲惨境遇,主张破除旧礼教对女子束缚的同时,《新青年》不失时机地主张男女教育平等、社交公开、婚姻自主,以恢复女子独立人格。梁华兰的《女子教育》一文指出,“女子教育应与男子教育平等也”,女子教育平等,并非教育种类的平等,而是“教育人格之平等”<sup>[27]</sup>。陈华珍同样持此观点,在《论中国女子婚姻与育儿问题》一文中,她认为女子应尽早入学校读书,“力求道德学问”<sup>[28]</sup>,以开阔其思想。高素素主张男女社交公开,她认为,“男女之交际既无,恋爱两字可自字典铲除”<sup>[22]</sup>。对此,陈华珍主张应革除早婚之陋习,崇尚自由婚姻<sup>[28]</sup>,以达“尊重各个之人格,发展各个之自由”<sup>[24]</sup>的目的。

《新青年》在“易卜生专号”上登载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文,呼吁“新女性”追求独立自由的人格。胡适指出易卜生戏剧的最大特点是表现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互相损害,社会最大的罪恶就在于“摧折个性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要打破家庭和社会对个人的束缚必须发展人的个性,这需要“个人有自由意志”并且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胡适借易卜生的话指出:“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sup>[29]</sup>

### (二)批判的武器:娜拉

为使“新女性”人格的重塑更加具体化、形象化,胡适与罗家伦合译了易卜生在1879年创作的剧本《娜拉》(又译作《玩偶之家》),并在“易卜生专号”上全剧刊出。在戏剧中,海茂尔对她人格的侮

辱,使娜拉幡然醒悟,明白了自己在家中的处境:“家庭实在不过是一座戏台,我是你的‘玩意儿的妻子’,正如我在家时,是我爸爸的‘玩意儿的儿子’。”<sup>[30]</sup>娜拉的台词表明了其出走的真实原因:父权制家庭中,子女对于父亲处于绝对服从的地位,而女子与男子缔结夫妻关系后,仍旧处于两性家庭中的不平等地位,由其标榜的女性身份因父权制及社会习俗所不容,娜拉要个性的自由意志,只有离家出走。她向海茂尔宣布:“我相信第一要紧的我是一个人,一个同你一样的人。无论如何我总得努力做一个人”<sup>[30]</sup>,成为其出走的宣言书。

娜拉为争取个性自由而离家出走的故事,揭露了旧式家庭的罪恶。娜拉的离家,暴露了摧残女性的社会环境,控诉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处的附庸地位。封建社会中,妇女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束缚下,毫无自由意志、独立人格可言,未嫁从父,已嫁从夫,夫死从子,终身屈服于男性的压迫之中。女性要想获得解放,首要必须学会做人的自尊与权利。为此,《新青年》极力呼吁女性应该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以脱离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sup>[11]</sup>。

“娜拉”毕竟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为了将现实中的“娜拉”介绍给中国女性,1918年9月,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胡适作了题为《美国的妇人》的演讲,系统阐述了其新型妇女观。他指出中国的女子应该摒弃“良妻贤母”的人生观,学习美国妇人“超于妻良母贤的人生观”<sup>[31]</sup>,拥有自立的心,追求自立的生活。胡适认为一旦男女具备自立精神,就会觉得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一个人,有应该做的义务和可做的事业,这样就可以产生良善的社会。至此,新文化运动中的“新女性”形象被塑造起来。

《新青年》所倡导的“娜拉”这一形象,唤醒了沉睡于封建婚姻包办制度下的中国青年男女,无论是对于努力挣脱传统家庭束缚的男性,还是对于试图摆脱家庭附庸地位的女子来说,“娜拉”都是一个解放的象征。娜拉对“新女性”人格塑造的最大意义在于号召女子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正如女作家庐隐所言:“今后妇女的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有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sup>[32]</sup>“妇女到社会去,脱离‘傀儡家庭’和男子的奴隶”<sup>[33]</sup>。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娜拉”成为“新女性”的典范,其“出走”的意向引导了众多女性冲破旧家庭,走向臆想中的自由生活。

### (三)“新女性”的觉醒

《新青年》以“娜拉”为女性人格的典范,强调女

性人格的重塑,这标志着中国女性个人主体意识觉醒的真正开始。正如女作家张爱玲所说:“中国人从《娜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无疑的,这潇洒苍凉的手势给予一般中国青年极深的印象。”<sup>[34]</sup>据新文化运动亲历者陈素回忆,《娜拉》一剧传入中国后,在妇女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中国到处都上演着《娜拉》,女界高喊着“不做玩物、要人格、要自由的呼声”,女性主动从事宣传与鼓动活动,勇于冲破旧有的藩篱,个性解放的风气所及,“使那些士大夫、道德家也只能向隅叹息”<sup>[35]1020</sup>。

在《新青年》女性解放思潮的倡导下,女性因反抗包办婚姻、追求恋爱自由而抗婚、出走乃至自杀的事例层出不穷。1919年11月14日,长沙发生了赵五贞自杀案。新娘赵五贞因不满包办婚姻,又无法抵抗,绝望之中只能自刎于花轿中。赵五贞自杀事件的发生,引发了社会各界关于婚姻制度、封建伦理道德、社会黑暗现实的大讨论。赵五贞事件发生后不久,长沙又发生了李欣淑出走事件。李欣淑本就不满于其父亲为其所定的包办婚姻,在她未婚夫死后,父母又把她改嫁到一位有钱的彭性人家,李对其父母的做法更加不满。1920年2月,李欣淑遂发出了“我于今决计尊重我个人的人格,积极地和环境奋斗,向光明的人生大路前进”<sup>[36]</sup>的启事,愤然离家出走,反抗包办婚姻。李欣淑的出走,被青年人大加赞扬,因为她不像赵五贞自杀以反抗包办婚姻那样消极,而是积极地与封建婚姻制度作斗争。

青年女学生的主体意识也在不断觉醒。王一知曾描述其所在学校女学生在女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主体意识不断觉醒。她指出,女学生主动联合起来向教师、校长请愿,撰文抨击“烈女传”等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要求废除不合理的课程设置。此外,学生还以“抗婚”“逃婚”的实际行动反抗旧礼教,争取婚姻自由<sup>[35]517-518</sup>。

与之相比,早期妇女运动活动家反抗封建婚制,追求女性解放的声音则更加理智与坚决。可以说,“我国早期的妇女运动,就是由这班‘娜拉型’的觉悟妇女在主持推进的”<sup>[37]</sup>,或者认为“妇女运动的主义,就是所谓‘妇人亦人’的‘娜拉主义’”<sup>[38]</sup>。天津觉悟社的郭隆真不满于父母的包办婚姻,在男方多次威胁成亲下,于迎亲之日,穿上学生装,一路坐“亮轿”(卷起轿帘)到男方家门口,她进屋后向参加婚礼的来宾发表演讲,批判包办婚姻的罪恶,随后理直气壮地离开男方家,重新回到天津女师上学。早期妇女运动活动家向警予也用“以身许国,终身不婚”的态度拒绝了湘西军阀周则范的求婚<sup>[39]</sup>。妇女

运动的著名领袖蔡畅反对包办婚姻,在母亲的支持下,逃婚到长沙并考入周南女校,结识了陶毅、向警予等进步女性青年。

在《新青年》女性解放思潮的倡导下,女性因反抗婚姻制度等原因而离家出走等个体反抗的形式,逐渐成为一种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行为模式,对于广大女性产生了强烈的示范和导向作用。在女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新民学会、觉悟社、工读互助团等社团中都可以看到女性的身影,也有许多女性参加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寻求救国的真理。越来越多的女性出走家庭,追求进步,对广大女性重塑人格造成了强烈的思想震撼。中国女性生活史的研究者陈东原曾指出,中国女性“有独立人格的生活,实在是《新青年》倡导之后”<sup>[40]</sup>。足以见得,在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进程中,《新青年》对女性人格重塑的重要推动作用。

#### 四、《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

十月革命的成功,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中国的思想界带来极大的震动。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关注,为《新青年》研究妇女问题注入了新的生机,《新青年》的面貌也因此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自第6卷第2号,《新青年》开始刊登介绍苏维埃俄国妇女状况及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文章,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探求中国妇女解放道路,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

第一,刊登有关苏俄妇女情况的报道,译介有关妇女解放的著作。由李达所译的《劳农俄国的妇女解放》一文,将俄国妇女的生活描述为:“现实俄国妇人,经济的精神的完全得以独立,……凡在政治教育社会一切方面,妇人与男子受同等的权利,有平等的发达的机会。”<sup>[41]</sup>此外,《俄国与女子》《劳农俄国的结婚制度》等文章,详细地介绍了苏维埃俄国妇女的生活状况。此后,李汉俊、李达分别翻译了倍倍尔、列宁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列宁的妇女解放论》等有关妇女解放的著作。通过译介上述著作,李汉俊、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逐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并将其运用到中国妇女问题中,探求中国妇女解放道路。

第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妇女问题。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指出,经济变动必然会引起思想的变动,随着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的解体,女子贞操问题、教育问题、参政问题都要发生变化。“不但妇女向男子要求解放,便是男子也要解放妇女了。”<sup>[42]</sup>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妇女地位的变化,指出中国妇女受压迫的地位是人

类社会发展有一定阶段的社会现象。

第三,用阶级观点分析妇女问题,指明妇女运动的阶级性。李大钊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中对资产阶级女权运动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关注的只是“中产阶级妇女的利益,不可能解决无产阶级妇女的问题”。妇女问题的彻底解决,“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sup>[43]</sup>。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来批判资产阶级人权学说,并将其作为解决中国妇女问题的理论武器。

第四,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社会制度问题关系到妇女问题的解决,而社会制度的基础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一旦解决,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要解决经济问题,阶级斗争必不可少。陈独秀明确指出:“照现在的经济制度,妇人的地位,一面脱离了家庭的奴隶,一面便做了东家的奴隶;即于自由恋爱一层,在财产制度压迫和诱惑之下哪里会有纯粹的自由!”<sup>[44]</sup>因此,要解决妇女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摧毁私有制制度。

从介绍苏俄妇女生活状况,译介列宁、倍倍尔等人关于妇女解放的著作,到撰写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早期知识分子逐渐掌握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早期《新青年》用资产阶级人权平等学说倡导妇女解放的观点逐渐被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所代替。《新青年》成为进步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主要阵地。受其影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渐次被国人所接受,成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潮的主流,并在此后的实践中被确立为中国妇女运动的指导思想,影响着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方向。

## 五、结语

以“娜拉”为契机号召女子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倡导女子个性解放,是《新青年》妇女解放思想的一大进步。“新文化人在艰难的政治环境中提出了‘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两大主题”<sup>[45]</sup>,考察《新青年》中倡导的女子解放思想,不难发现,从提出国民人格独立到呼吁女性摆脱封建婚姻的束缚,到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做“新女性”的“娜拉”,再到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分析妇女问题,《新青年》始终将妇女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不断拓展和加深对其研究和探索的广度与深度。

《新青年》的启蒙者们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极力倡导女子解放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女

性的“失音”。当时产生较大影响的启蒙文本绝大部分出自男性之手,“新女性”的塑造从一开始也是由男性倡导和推动的,不纯粹是出于女性的自觉。正如鲁迅所言:“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灰,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sup>[46]</sup>鲁迅对女性启蒙的忧虑来源于“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悲哀。《伤逝》中的子君曾勇敢地表明:“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sup>[47]</sup>而这位中国的“娜拉”在失去了涓生的爱情之后,只得重返家庭,最终抑郁而死。子君在男性启蒙者们的引领下,走出封建家庭,最终却又走进了两性家庭的泥淖中。女性在自上而下式的启蒙方式中,特别是一直以来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女性,能否在这种启蒙方式中真正觉醒,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也从侧面揭示了中国妇女解放的艰难与漫长。

## 参考文献:

- [1] 陈独秀. 敬告青年[J]. 青年杂志, 1915(9), 第1卷第1号: 11-16.
- [2] 陈文联. 关于《新青年》对妇女问题探索的历史考察[J]. 安徽史学, 2007(6): 90-94.
- [3] 《新青年》编辑部. 通告(二)[J]. 新青年, 1916(9), 第2卷第1号: 1-1.
- [4] 李平. 通信[J]. 新青年, 1916(11), 第2卷第3号: 5-7.
- [5] 高曼著. 结婚与恋爱[J]. 新青年, 震瀛, 译, 1917(7), 第3卷第5号: 52-60.
- [6] 尹旦萍. 《新青年》对女性主义的倡导[J]. 社会科学战线, 2015(9): 19-27.
- [7] 莫夫卿. 通信[J]. 新青年, 1916(11), 第2卷第3号: 3-5.
- [8] 郑佩昂. 说青年早婚之害[J]. 新青年, 1917(7), 第3卷第5号: 63-64.
- [9] 罗加伦. 青年学生[J]. 新青年, 1918(1), 第4卷第1号: 81-85.
- [10] 鲁迅. 随感录四十[J]. 新青年, 1919(1), 第6卷第1号: 66-68.
- [11] 陈独秀. 一九一六年[J]. 青年杂志, 1916(1), 第1卷第5号: 1-14.
- [12] 陈独秀.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J]. 新青年, 1916(12), 第2卷第4号: 6-12.
- [13] 鲁迅. 狂人日记[J]. 新青年, 1918(5), 第4卷第5号: 52-62.
- [14] 鲁迅.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J]. 新青年, 1919(6), 第6卷第6号: 6-13.
- [15] 钱愨莘. 女子的圈套: 贞烈[N]. 觉悟, 1920-1-22.

- [16]梁景和.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31.
- [17]与谢野晶子.贞操论[J].周作人,译.新青年,1918(5),第4卷第5号:22-30.
- [18]胡适.贞操问题[J].新青年,1918(7),第5卷第1号:10-19.
- [19]胡适,周作人,蓝志先.讨论[J].新青年,1919(4),第6卷第4号:66-83.
- [20]鲁迅.我之节烈观[J].新青年,1918(8),第5卷第2号:8-17.
- [21]吴效马.娜拉自远方来:新文化运动前期女性人格的重塑[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43-46.
- [22]高素素.女子问题之大解决[J].新青年,1917(5),第3卷第3号:104-108.
- [23]陈钱爱琛.贤母氏与中国前途之关系[J].新青年,1917(2),第2卷第6号:97-97.
- [24]华林.社会与妇女解放问题[J].新青年,1918(8),第5卷第2号:80-81.
- [25]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J].新青年,1917(2),第2卷第6号:10-13.
- [26]刘延陵.婚制之过去、现在、未来[J].新青年,1917(8),第3卷第6号:16-29.
- [27]梁华兰.女子教育[J].新青年,1917(3),第3卷第1号:101-102.
- [28]陈华珍.论中国女子婚姻与育儿问题[J].新青年,1917(5),第3卷第3号:108-110.
- [29]胡适.易卜生主义[J].新青年,1918(6),第4卷第6号:7-25.
- [30]易卜生.娜拉[J].胡适,罗家伦,译.新青年,1918(6),第4卷第6号:27-91.
- [31]胡适.美国的妇人[J].新青年,1918(9),第5卷第3号:30-41.
- [32]钱虹.庐隐选集(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31.
- [33]旅冈.漫话“娜拉年”与“戏剧年”[N].申报,1935-12-27.
- [34]张爱玲.张爱玲散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88.
-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运动回忆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 [36]香苏.李欣淑女士出走后所发生的影响[N].长沙大公报,1920-2-28.
- [37]孟如.中国的娜拉[J].东方杂志,1934(8),第31卷第15号:1-4.
- [38]曾琪.妇女问题的由来[J].妇女杂志,1922(7),第8卷第7号:6-9.
- [39]戴绪恭.向警予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6.
- [40]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365.
- [41]山川菊荣.劳农俄国的妇女解放[J].李达,译.新青年,1921(7),第9卷第3号:105-123.
- [42]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J].新青年,1920(7),第7卷第2号:54-60.
- [43]李大钊.战后之妇人问题[J].新青年,1919(2),第6卷第2号:58-64.
- [44]陈独秀.答费哲民(妇女·青年·劳动三个问题)[J].新青年,1920(9),第8卷第1号:161-163.
- [45]刘小林.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126-130.
- [46]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14:155.
- [47]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14:148.

(责任编辑 谢春红)

## On the Promotion of Women's Liberation by *New Youth* During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CAO Xiaohui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CPC History,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The *New Youth*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magazines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It strongly criticized the bondage of feudal ethics imposing to individuals, especially women, advocated the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of “new women”, and was the main front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t views on wome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Youth*, women run away from home and even commit suicide to resist the marriage system, which gradually became a behavior pattern with certain social influence and had a strong demonstration and guidance role for women. However, the male – dominant top – down enlightening mode in the *New Youth* also caused the difficulty of female self – awakening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New Youth*; women's liberation; new women; Marxist view on women

# 红军西征宁夏革命标语形成及其价值体现

张玉梅

(宁夏社会科学院,宁夏银川 750021)

**摘要:**革命标语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央红军西征期间在宁夏留下的大量革命标语,具有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的特征。革命标语作为特殊时代的产物,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与民族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严明的组织纪律性和多元的宣传工作制度。

**关键词:**红军西征;宁夏;革命标语;价值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5.010

**中图分类号:**K2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5-0054-04

标语是一种世界历史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形态。运用标语进行宣传动员,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便认识到标语作为宣传载体之一的重要性,在革命的各个阶段,标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红军西征时期,形成了大量内容丰富的标语,这些标语在促成红军西征战略目标的实现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于红军西征时期的标语研究,有张心智的《红色标语——介绍固原县黑城镇祁家堡子的几条革命标语》<sup>[1]</sup>和王银彩的《写在墙上的记忆——墨书草泥墙皮革命宣传标语》<sup>[2]</sup>两篇文章都是对馆藏宁夏博物馆“红旗漫卷——宁夏革命文物陈列”展厅的红军西征标语进行简要叙述,理论研究程度不深。李牧可《光荣的古城——介绍红军在预旺城的革命活动》<sup>[3]</sup>一文也提及红军在预旺城(今称豫旺县城)进行革命活动时留下的标语。本文在红军革命标语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历史内涵进行理论阐释,进而分析其时代价值,旨在透过标语再现红军西征的革命历程。

## 一、红军西征与宁夏革命标语的产生

红军西征,是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北后,与陕北红军共同发动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战役。1936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在延川大相寺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以发展

求巩固”的战略方针,总结东征,决定西征。<sup>[4]</sup>西征的主要任务有三:一是打破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围攻,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二是红一方面军南下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会师;三是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停止内战,形成抗日统一战线。西征红军非常重视发挥强大的政治宣传优势,通过张贴标语等形式,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

宁夏作为红军西征的主战场、大本营和总指挥部所在地,在历时半年的作战中,先后解放了宁夏的盐池、豫旺、同心等地,建立了盐池、豫旺等苏维埃政府,成立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留下了珍贵的革命标语。

经调研可知,红军西征标语实物存放在宁夏博物馆9件,为国家一级文物。标语照片分别存放在宁夏吴忠市盐池县博物馆2件,为一般文物;馆藏在吴忠市海原县金福博物馆的标语照片是李牧可和郑介初在1963年7月所拍摄。拍摄地点分别位于同心县马家高庄公社沟滩大队杨家堡子上房和同心县马家高庄公社沟滩大队杨家堡子上房。另据当地人口述,20世纪80年代,在位于同心县下马关镇红城水上垣村和下垣村交界的土堡内的红城水娘娘庙大殿内,还存留着红军西征时期的大量标语,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标语现已不复存在。

收稿日期:2021-09-10

基金项目:2021年度第四批宁夏新型智库课题“传承红色文化 助推宁夏乡村振兴研究”

作者简介:张玉梅(1982—),女,宁夏银川人,硕士,宁夏社会科学院图书资料中心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宁夏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红色文化研究。

## 二、红军西征宁夏革命标语的丰富内涵

红军西征期间的标语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有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红军西征战略目的;有的揭露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豪绅阶级的反动本质;还有的宣传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等等。

### (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

1936年6月1日毛主席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中明确提出:红军是人民军队,是抗日先锋。<sup>[5]79</sup>红军西征时期,宣传员在祁家堡子的墙上写下了“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红军是抗日的先锋”“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等革命标语。向老百姓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是一切为人民的队伍,打消了老百姓对军队惧怕的心理、拉近了军队与群众的距离,有利于开展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工作。中国共产党注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西征期间,通过张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是指: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指: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等标语宣传中国共产党严明的政治纪律。中国共产党铁的纪律因而也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1936年7月31日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在“前方来电”中肯定了通过对党严明纪律的宣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红军的纪律,取得回族群众的热烈拥护”。为了进一步扩大红军队伍,形成强大的对敌势力。中央红军通过张贴“动员一切力量支援前线争取胜利!”“父送子,妻送郎,大家参军消灭敌人保家乡!”“一人为大家,参军杀敌人!”等标语,号召群众参与到红军队伍中来。《西征的意义与任务讨论大纲》中明确提出:“猛烈扩大抗日红军。必须把扩大红军时时刻刻都要成为我们中心任务,要采取各种有效方式把扩红运动造成广大的群众运动,成为经常的工作,使我们抗日红军猛烈地扩大起来。”<sup>[6]9</sup>通过宣传,宁夏各族群众积极投身到革命运动中。1936年7月9日《红色中华报》第286期曾刊登了西征以来至7月初,人民抗日红军一个月即扩大抗日红军800余人。

### (二)完成红军西征的战略目标

完成西征战略任务,将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展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必须通过分化瓦解敌人力量,从而实现三军会师,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 1. 分化瓦解敌军

红军西征是在多重历史背景下开展的一项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

战略行动。红军西征时期形成的革命标语,充分体现出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罪恶行径。在同心县下马关合作食堂上房,内有“反对日本鬼子在东北强奸妇女”“打到宁夏去”“反对国民党开发西北”“反对日本强占中国的东北四省”“反对蒋介石阻碍两广北上抗日”及苏区张贴着“打蒋贼救西北”“打日本救中国”“活捉马洪魁(鸿逵)”等革命标语,体现了人民群众一致对敌的革命态度。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然陕北地域狭小、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物资极其匮乏。这对于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对于红军队伍的进一步扩大,对于党中央实施下一步战略与策略,在经济上、兵源上、地理位置上都显得严重的不足和困难。<sup>[7]</sup>而当时红军迫切希望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这就需要尽快打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联系的通道。红军西征期间,通过“巩固老苏区”“发展新苏区”等标语阐明了红军的战略目的和战略主张,先后开辟了盐池、豫旺等纵横800余里的新苏区,建立了各级苏维埃革命政权。也实现了将陕北、陕甘边苏区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顺利完成扩大旧苏区、巩固陕甘宁根据地的西征战略任务,巩固了新生的“更大的西北根据地”,为“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sup>[8]79</sup>。

#### 2. 三军会师

红军西征的重要任务之一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为红军三大主力实现会师创造条件。中央红军经过艰难长征后,队伍数量锐减,必须通过汇集红军三大主力的力量才能大幅度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为实施宁夏战役、打通国际通道等战略计划创造有力的作战条件。同心县马家高庄公社沟滩大队杨家堡子上房革命遗迹的单行材料中记载的大字标题“迎接全国红军大会合”“二、四方面军浩浩荡荡回来了”等标语。这些珍贵的革命标语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真实反映,重现了红军西征时期红一方面军策应第二、四方面军北上的壮丽场面。

#### 3. 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红军西征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同东北军和西北军建立巩固的统战关系,争取形成抗日统一战线。因此,党和红军认真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民族战线政策。<sup>[9]</sup>西征红军非常重视发挥我军强大的政治宣传工作优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书写标语、散发传单等形式,在红军中掀起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热潮。<sup>[10]92</sup>红一军团政治部1936年7月5日在《西征中抗日战线部的工作》中提出:“规定争取白军的标

语口号。在沿途及宿营地书写在火线上进行对白军的喊话,主要内容以抗日救国不打抗日红军,联合红军打日本及汉奸卖国贼为中心。”<sup>[6]25</sup>红军所到之处,张贴“枪口一致对外”“打回东北去,打回老家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本”“联红抗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欢迎胡马官兵们组织起义,率部来归,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欢迎胡马军中的爱国分子,接受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等标语,为形成抗日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宁夏的东北军和西征红军中逐步建立起了抗战统一联盟。

红军西征经过的甘肃和宁夏是少数民族较为集中地区,尤其海原、固原、西吉和同心地区。国民党利用民族宗教问题,无中生有,造谣诬蔑,蛊惑群众,制造民族矛盾,导致回族群众对汉民,特别是对汉族军队积怨很深。<sup>[7]</sup>严重的思想隔阂和障碍,给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为了尽快打消群众心中疑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西征红军高度重视民族工作,“红军每到一地,召开阿訇会、积极分子会和群众会,向他们宣传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sup>[11]</sup>通过张贴“枪口一致对外”“联合起来打日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欢迎回民参加回民独立师”“回汉人民是一家”等标语,为唤起人民形成统一战线营造了浓厚的氛围。回民独立师政委欧阳武,更是利用自己的回族身份,亲自给同心县王家团各清真寺赠送锦幛,刷写标语。

### (三)注重苏区全方面发展

国民党统治时期残酷的压迫与榨取使得宁夏农村经济状况恶劣。为了更广泛地宣传党和红军分土地和财产、打击反动派的政策,红军到处张贴“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不交租,不交粮,打土豪,分田地,牛马衣服分给农民”“打土豪救穷人”等革命标语。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的《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记载的“尊重回文,发展回民教育”“尊重回民风俗习惯”等标语,更是诠释了党和红军对途经地区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重视。在红军积极贯彻落实各项惠民政策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发布文告中所说的:“现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与租息”。《红色中华报》1936年11月16日第311期详细报道了红军西征胜利后同心城商业繁盛的景象:红军西征胜利,占领了同心城,当我们部队开始进入同心城时,群众部分逃跑了,商店也关上了门,停止营业,表现很冷落,经过我们部队四五天的刻苦工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

解释工作,号召与欢迎商人自由营业,同时取消了群众对苛捐杂税的负担,广大群众与商人都回来了,商店也开门正式在营业,每逢集市,人山人海,商业一天一天地繁盛起来,比过去还要热闹数倍,远近商人,酌情将大批货物运来该地贩卖,这是苏维埃新政策的伟大胜利啊!<sup>[6]32</sup>

### 三、红军西征宁夏革命标语的价值体现

红军西征期间的标语宣传,启发了革命根据地广大人民的思想,提高了阶级觉悟,展示和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鼓舞了斗志,瓦解了敌人,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与民族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严明的组织纪律性与多元的宣传制度。

(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观

红军西征时期的革命标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为理论依据,始终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红军是抗日的先锋”等标语是特殊环境下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与使命的特殊载体。中国共产党这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始终是一脉相承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出发点是人民、落脚点是人民,始终把人民作为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这是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在新时代的发展与集中体现。

(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观

我国各民族在历史演进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1921年中国共产党颁布了第一个党的纲领,明确规定:“不分性别、不分民族,均可接收为党员。”<sup>[12]3</sup>纲领首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观,允许各族民众入党,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革命的开始。1922年7月,中共二大宣言指出,“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平等和自决”<sup>[12]15</sup>,主张“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sup>[12]18</sup>。红军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民族政策的落实。1936年10月,在宁夏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红军进入回民区域,必须严格遵守所颁布的对回民之三大禁条、四大注意,并在部队中广泛地解释。此外,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促进了抗日统一



战线的形成。该时期形成的革命标语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华民族的系列重要论述,以及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十九大报告和党章,将“中华民族”载入宪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创新,标志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形成。<sup>[13]</sup>

### (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多元化宣传工作制度

政治宣传是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中央苏区时期,党因陋就简,创新宣传方式方法,主要有文字宣传、标语宣传、口头宣传、活动宣传等,这些宣传方式有时单独使用、有时综合使用<sup>[14]</sup>,呈现出多样性、鲜活性、通俗性、大众性等多元特征。通过宣传,加大了党的政治理论、政治理念、政治形象、政治形势、政治行为等方面的深入人心,极大影响和改变了苏区军民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开创了战争背景下政治动员的新局面。<sup>[14]</sup>红军西征期间,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在整个工作计划里具体规定了宣传教育工作计划,宣传部根据总计划制定宣传工作计划,军团与师宣传科负责检查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的宣传工作,其中张贴革命标语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宣传思想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先后主持召开两次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等。<sup>[15]</sup>2019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我们党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工作形成的宝贵经验和有效做法,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宣传工作的重视。

### (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严明的组织纪律性

党的组织纪律建设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首次将党的纪律建设写进党章并单列一个章节,并在《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指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sup>[16]</sup><sup>162</sup>这就强调了党的组织纪律建设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以铁的纪律来指导工作,教育和约束干部战士。长征西征时期,张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标语,体现了我党严明的政治纪律。不仅维护了党的

权威,同时也保证了党的坚强的战斗力。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纪律约束的作用下,西征红军严格遵守民族团结政策、俘虏政策,为促成红军西征战略目的及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律建设更被纳入党的建设总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纪律建设挺在前,为加强纪律建设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通过实施一系列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举措,党的纪律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形成了党的纪律建设的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2021年,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用好红色资源。”红军西征期间形成的革命标语作为红色资源的重要基因库,肩负着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使命。对红军西征标语的系统研究与阐释,更是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讲好红色故事的生动诠释。

### 参考文献:

- [1] 张心智. 红色标语:介绍固原县黑城镇祁家堡子的几条革命标语[J]. 宁夏文艺,1978(5):77-78.
- [2] 王银彩. 写在墙上的记忆:墨书草泥墙皮革命宣传标语[J]. 宁夏画报,2020(6):84-85.
- [3] 李牧可. 光荣的古城:介绍红军在预旺城的革命活动[J]. 宁夏文艺,1978(6):48-52.
- [4] 刘伟. 红军西征期间民族政策的探索与实践[J]. 回族研究,2020(3):50-54.
- [5] 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编. 中共宁夏党史档案资料选编(1926—1949)[M],内部资料,1986.
- [6] 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局编. 中共宁夏档案文献选编(1927—1949)[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8.
- [7] 李喆. 关于红军西征几个问题的再认识[J].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6(6):102-107.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9] 饶彦久,卢钰涛. 论红军西征的历史意义[N]. 甘肃日报,2015-10-10(010).
- [10]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 宁夏党史故事[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4.
- [11] 郭全忠. 论红军西征在宁夏回民聚居区开展民族统战工作的历史经验及其深远影响[J].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0(1):66-72.
- [12]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3] 裴圣愚,余扬.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基本内涵[J]. 广西民族研究,2019(6):16-17.

(下转第62页)

# 中国传统美学视角下的漏窗艺术探析

袁新华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系,河南 郑州 450064)

**摘要:**漏窗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孕育出的写意式自然山水园林中的点睛创造,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分析漏窗在形式、内涵、空间、意境方面的艺术特色,从“虚实之美”“含蓄之美”“中和之美”等传统美学角度解析漏窗艺术之美,探讨漏窗艺术在现代空间设计发展中的价值。

**关键词:**漏窗艺术;艺术特色;传统美学;现实价值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5.011

**中图分类号:**TU23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5-0058-05

## 一、引言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虚实相生”“中庸”等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对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情趣影响深远,孕育出极具特色的传统美学思想。“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写意式自然山水园林深浸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內蕴和传统美学的精髓,漏窗作为中国传统园林中不可或缺的造园要素,其形式、内涵、空间、意境诸方面无一不蕴藏着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审美情趣。

漏窗俗称花窗,明代造园家计成在《园冶》中把它称为“漏砖墙”或“漏明墙”。<sup>[1]</sup>漏窗形式多样,图案丰富,意蕴隽永;不仅具有采光通风的功能,还能障景、泄景、框景、借景以分隔空间、丰富空间层次、营造园林意境;小小漏窗已由一个建筑构件升华为具有美学价值的审美意象。

## 二、园林漏窗的艺术特色

### (一)小构件,大题材

漏窗通常由窗框和窗芯组成,没有窗芯的漏窗称为洞窗或空窗,窗芯周边有纹样但芯屉中空的漏窗称为景窗。

漏窗的窗框形式丰富多变,有各种方形、横长、直长、圆、六角、扇形等几何形状以及石榴形、花瓶形、葫芦形、贝叶形等各种不规则形状,还有两个及以上形

状任意组合而成的形状,复杂多变,不拘一格。<sup>[2]</sup>

窗芯图案的取材十分广泛,内容极为丰富,常见的图案内容有几何图案、花草树木、祥禽瑞兽、生活器物、小说与戏曲故事、佛道神话传说、象形文字等。按形式大致可分为几何形体、自然形体、混合形体。几何形体图案大多都是以直线、弧线、圆形等组成,如万字、菱花、冰裂纹等直线图案,鱼鳞、海棠、波纹等弧线图案,寿字、万字海棠、六角穿梅花等复杂线条构成的图案。自然形体图案一般有蝙蝠、喜鹊、鹤、松、竹、梅、兰、菊等吉祥的动植物图案,花瓶、聚宝盆、文房四宝等生活器物图案,戏剧人物、神话传说、佛教故事等人物故事图案以及文字图案等;混合形体图案往往是以上两者结合起来构成组合图案。

几何形体图案常常按照一定的线性排列秩序,比如重复、近似、特异等骨骼形式,重复某一形状或要素;自然形体图案通常运用夸张、变形、概括、简化、凝练等手法,将客观物象抽象化、理想化、装饰化,形成写意的符号或抽象的纹样等。这些多变的直线或曲线、写意的符号、抽象的图案,以对称、平衡、穿插、向心、放射、旋转等形式来组织构图,呈现出纷繁多变的形体姿态和气韵力量,有的挺拔刚毅,有的柔和秀美,有的宽阔舒展,有的曲折缠绕,与形式多样的窗框组合起来,构成一幅幅主次分明、疏密

收稿日期:2021-09-20

作者简介:袁新华(1971—),女,江苏南通人,硕士,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建筑系副教授,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建筑工程教学与研究。

有致、动静相宜、虚实结合的图画,局部丰富多变,整体又协调统一,体现了对称与平衡、条理与反复、节奏与韵律、变化与统一的形式美法则。

漏窗作为一个小小的建筑构件,却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千姿百态,别出心裁。据称清代时仅苏州一地的漏窗形式就有千余种,沧浪亭的漏窗就有108种式样,无一重复,可谓“小构件,大题材”。

## (二)小图案,大内涵

中国自古就有“君子比德”的观念,《荀子》中就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的记载。比德即是以自然物象具有的某种品格,用来象征、比喻君子的美德。漏窗图案以此借物言志,表达园主人的高尚品格、情趣志向、文化修养等。比如植物图案中梅、兰、竹、菊、松、荷花等,梅高洁傲岸,兰幽雅空灵,竹虚心有节,菊冷艳清贞,被誉为花中四君子,象征傲、幽、坚、淡的君子品格;“松竹梅”,傲雪挺立、凌寒开放,称为岁寒三友,寓意坚毅忠贞;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寓意清白高洁。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高尚品格的象征,表达了文人对美好品格的向往与追求。如苏州狮子林中最具特色的“琴、棋、书、画”四个漏窗,分别以古琴、围棋棋盘、函装线书、画卷为主题,表达了园主人的高雅情趣和文化修养。

漏窗图案还包含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中吉祥的动物、植物、文字以及数字等,通过谐音、象征、暗喻等手法,赋予图案吉祥美好的寓意,以含蓄委婉的方式来表达人们祈福纳祥,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如石榴图案,因石榴多籽象征多子多孙,表达了子孙满堂、子嗣绵延的期盼;蝙蝠图案,“蝠”谐音“福”,象征“福从天降”,表达了人们对吉祥幸福生活的憧憬;鱼图案,谐音“余”,隐喻富裕、结余,“年年有余”;松、鹤图案有长青、长寿之意,象征福寿绵长;瓶形漏窗,谐音“平安”,表达了人们对平安的期盼等。卍字纹是来自佛教的图案,有吉祥、万福和万寿之意;运用吉祥文字的变体形式也是常见手法,如福禄寿喜等。<sup>[1]</sup>

这些吉祥图案相互组合,不仅图案效果更加丰富多变,而且文化蕴意更加耐人寻味,如花瓶内插一枝牡丹花,寓意富贵平安,花瓶内插一枝月季花,寓意四季平安;桃与蝙蝠组合,寓意“多福多寿”;松鹤组合称为松鹤延年,寓意长寿;喜鹊立于梅枝称为喜鹊登梅,寓意“喜报早春”等。奇思妙想,不胜枚举。小小漏窗图案,底蕴深厚,意蕴隽永,是为“小图案,大内涵”。

## (三)小空间,大意境

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在园

林营造中讲究“隔则深,畅则浅”,漏窗如《园冶》中所述“凡有观眺处筑斯,似避外隐内之义”,在有限的小空间中通过障景、泄景、框景、借景,达到以小见大、园小景深的效果,激发出咫尺万里、幽远绵长的园林意境。正是漏窗“小空间,大意境”的体现。

由于园林空间有限,为了丰富园林景观,增加园林的空间层次感和视觉上的纵深感,造园时通常会因地制宜地将园林划分成若干个小景区及景园,景区之间通常以粉墙或廊庑分隔,镶嵌在实墙面上的漏窗自然也有分隔空间及障景的作用,但透过或方或圆、或大或小、或疏或密的漏窗,另一侧的景物又若隐若现,在“阻挡”与“透泄”之间获得似隔非隔、隔而不塞的独特效果,丰富了空间层次,增加空灵幽深之感,产生出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朦胧美感,可以激发人的期待和遐想,更加引人入胜。

千姿百态的漏窗,犹如一幅幅画框,“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将园林中不同主题、不同视角的风景展现其中,正所谓“尺幅窗”“无心画”。清代美学家李渔在《闲情偶记》说:“同一物也,同一享也,此窗未设以前,仅作事物观,一有此物窗,则不烦指点,人人俱作画图观矣。”<sup>[4]</sup>框景为人们提供一个最佳观赏点,框内景色春去秋来,阴晴雨雪,朝阳冷月,景随人动,形成层次丰富而又意境幽远的画意。漏窗造型和图案又在朦胧虚化的景物映衬下转化为观赏的对象,颇具情趣。

借景是中国园林艺术中独特的造园手法,计成在《园冶》中说:“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漏窗的借景手法主要有近借和远借两种形式,近借为园内相邻景物的互借,以丰富景观内容,增加景物深度;远借是借园外的风景,如远处的山峦湖泊、楼阁佛塔乃至晓月星辰等,园内园外连成一片,从视觉上突破封闭的有限空间的局限,把人为的有限空间与自然的无限意境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如苏州拙政园东园界墙上的漏窗,将园林北侧的北寺塔借入园中,增加了空间层次,营造出绵远悠长的园林意境。<sup>[3]</sup>

## 三、漏窗艺术的传统美学分析

### (一)漏窗之美,美在虚实

“虚实之美”源于中国道家哲学思想中的“虚实相生”,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第四十章)，“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道德经·第十一章),精辟地论述了“有”与“无”、“虚”与“实”的辩证关系。“以虚涵实,实中见虚”的虚实之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

美学的核心思想之一。

由于漏窗自身“漏空”的特点,漏窗图案在构图上主要是虚与实的对比与调和,有虚有实,虚实结合,既有对比变化,又整体和谐统一,形成了虚实相生的构图效果,获得构图上的虚实之美。

姿态万千的漏窗嵌在连续不变的实墙面上,漏窗的“虚”与墙体的“实”形成鲜明的对比,打破了墙面的呆板,获得视觉上的韵律美,使墙面既有虚实变化又协调统一,既是园林中的一道风景又起到似隔非隔、隔而不断的空间分隔效果。

在园林空间中,通过漏窗的“遮”与“泄”,自然山水景物朦朦胧胧,似隐若现,寄实于虚、依虚托实,带来虚实之美;“尺幅窗”“无心画”中,景随人动,山水人物风景时时变幻,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给人虚实之美感;借景更是突破人为的有限空间,把园外山峦高塔、渔歌晚钟、清风明月纳入景中,使园林空间得以无限扩展,园内外构成了一个虚实相生的艺术整体。

漏窗图案内涵丰富,园林意境更是情景交融,充满诗情画意,漏窗的形式与内涵,园林意境的“境”与“意”、“情”与“景”也是一种虚实相生的统一体。

## (二) 漏窗之美,美在含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含蓄有含而不露、隐晦曲折之意,含蓄是一种深沉、一种婉约,是一种修养、一种礼貌,是一种情趣、一种韵味。

含蓄之美有着儒家美学思想的渊源,孔子的“春秋笔法”,所谓“《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指委婉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笔,成为含蓄理论最古老的儒家思想深源。含蓄之美也有道家哲学思想的基础。老子曰“智者不言”(《道德经》),庄子在《庄子知北游》中说“道不可言”,在《庄子外物》中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无论是“春秋笔法”还是“得意忘言”,都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曹魏哲学家王弼在注释《周易》时提出“得意忘象”,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提出“文已尽而意有余”;唐代诗论家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南宋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提出“言有尽而意无穷”,都受到普遍的推崇,含蓄之美成为中国艺术创作和审美的主流思想,是儒、道、禅各家美学共同推崇的审美理想。“得意忘象”也被延伸为艺术意蕴和艺术形式的关系,“象”是“意”的载体,“意”是“象”的灵魂。

在园林漏窗艺术中,漏窗图案通过谐音、象征、暗喻、比德等手法,使小小的图案蕴涵了丰富的文化

内涵,表达人们对吉祥平安、生活美满的向往,对高尚情操、理想品格的追求等,表达方式隐晦委婉,言有尽而意无穷,展现出含蓄之美。

遵循园林“隔则深,畅则浅”的设计理念,漏窗的障景、泄景、框景和借景等艺术处理,使园林空间藏而不露,欲扬先抑,曲折萦回,步移景异,透过漏窗可以看到另一侧的景物若隐若现,在“隔”与“透”之间获得“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含蓄之美。尤其是借景,打破了有限的封闭局促的空间格局,丰富了园林的空间层次,给人咫尺而万里、园小而景深之感,园林意境幽远深邃,表现出“立象以尽意”“得意而忘象”的含蓄之美。

## (三) 漏窗之美,美在中和

“中和之美”深受儒家中庸之道的影响,中庸之道旨在“中和”。《中庸》谓:“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广雅》曰:“和,谐也。”《中庸》中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和之美作为儒家美学的核心思想,还表现为文质彬彬、尽善尽美、乐而不淫。《论语雍也》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彬彬”意指内涵和外在的协调,后引申为艺术作品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是为中和之美。《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强调了美和善的统一,即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以善为美,追求“尽善尽美”,为中和之美。《论语·八佾》“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表明了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和之美。

中和之美同时也深受道家哲学思想的影响,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表达了天人合一、阴阳调和、矛盾双方对立中和和谐统一的思想。

中和表达了儒道诸家对人与天地、人与自然乃至万物和谐的追求,中和之美成为中国传统美学的最高审美理想,表现为人与自然、形式与内涵、感性与理性以及各种形式美因素的和谐统一。

在漏窗艺术中,漏窗图案的构图,将曲直、虚实、动静、聚散等要素进行对比与调和,局部变化,对比适度,最终形成均衡、和谐、统一的整体效果,即为中和之美。

众多漏窗镶嵌在单一墙面上,同则乏味,因而园林漏窗力求多变,如沧浪亭内一百余个漏窗千姿百态,图案无一雷同;但杂则混乱,因此,漏窗的造型与大小、窗芯图案形式及疏密、嵌入的位置与频率等因

素对比得体的有度,获得连续的动态视觉下富有节奏与韵律感的均衡美感,是中和之美的表现。

漏窗的造型优美,图案精致,文化蕴意丰富,这种形式与内涵的协调统一,是谓“文质彬彬”;漏窗形式精美,是为美,内涵蕴意吉祥美好,是为善,二者达成美与善的统一,表现出中和之美。

透过漏窗,在有限的小空间内变换出目不暇接的自然景物,或远或近,或隐或现,或动或静,或虚或实,构成百千万幅优美的山水图画,体现了园林空间构图上的得体之美;漏窗采用砖砌、瓦拼、灰塑而成,朴素淡雅,漏窗图案形式也随环境而变化,因“境”而生,与“虽为人做,宛自天开”的园林自然景观、“自然恬淡、静雅含蓄”的园林意境相协调,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园林意境寄情于自然境域,触景生情,激发出人的主观情意,产生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意”与“境”、“情”与“景”是形式与内涵的统一,是美与善的统一,诠释了园林艺术的中和之美。

#### 四、漏窗艺术的现实价值

园林漏窗浓缩了中国园林艺术的精髓,蕴涵悠久浓厚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完美阐释了虚实之美、含蓄之美、中和之美等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研究、传承和发展漏窗艺术在现代空间设计和当代美学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 (一)漏窗艺术在现代空间设计中的价值

漏窗的审美意义不仅在于漏窗物化成为一种审美符号,更在于它在园林空间中营造出深邃幽深的意境美。在现代设计中借鉴、应用漏窗艺术,有助于将传统文化艺术精髓融入现代艺术之中。

漏窗图案丰富多变,形式优美,为现代设计提供了宝贵的装饰图案素材,可以直接应用于各种创作活动中,也可以结合现代材料技术,进一步提炼、变化后应用;漏窗图案的取材内容和形式美的规律,对现代装饰图案设计也具有参考价值。

漏窗艺术中隐喻、象征等设计手法,不仅使漏窗图案内涵丰富,也使园林“景有尽而意无穷”,形成诗情画意的园林意境。在现代空间设计中可以借鉴隐喻、象征等设计手法,以更好地表达设计主题,烘托环境氛围,也可以托物言情,激发含蓄的意境美。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其外观犹如用树枝般的钢网编织成一个“鸟巢”,寓意孕育与呵护生命的“巢”,寄托着人类对未来的希望;镂空的冰裂纹图案与现代钢结构结合起来,使古韵与现代完美融合。

漏窗既是一个建筑构件,也是一个中国传统审美符号,直接应用于现代空间中,可以增加现代空间

的古典韵味,也可以在室内外空间、室内各空间的分隔与渗透方面发挥似隔非隔、隔而不断的作用,引导空间过渡,丰富空间层次。如图1,漏窗与小池、小树组合起来,在现代简约空间中产生江南园林恬静含蓄的意境美。尤其学习和借鉴漏窗障景、泄景、框景、借景设计手法,在简洁明朗的现代空间中实现欲扬先抑、以小见大的空间效果和理想的环境氛围。如苏州博物馆中多处设置了各种形式的漏窗(图2),或框景,或借景,移步换景,层次丰富,使简约明朗的现代空间极富江南园林意蕴。



图1 现代空间中的漏窗



图2 苏州博物馆的漏窗

##### (二)促进中国传统美学的传承与发展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来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化体系和儒家、道家的哲学思想,孕育了特色鲜明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千百年来深刻地影响着中华儿女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在当今多元开放的信息化时代,外来文化艺术对本土文化形成前所未有的激烈冲击和碰撞,只有树立文化自信,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才能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始终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

通过园林漏窗艺术的传统美学分析,挖掘其中蕴含的传统美学思想,提炼优秀的传统美学思想精髓,如和谐之美、含蓄之美等,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赋予时代内涵,使其融入当代美学思想中,成为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人们审美需求相契合的当代美学不可分割的内容;进而在多元文化中展现中华文化艺术的独特魅力,正确引导和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为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计成,陈植. 园冶注释[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11.

[2] 庄裕光. 中国门窗·窗卷[M].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9. 6.

[3] 楼庆西. 装饰之道[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4.

[4] 李渔. 闲情偶寄[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5.

[5] 李勇. 小中见大:苏州园林漏窗艺术研究[J]. 美术大观, 2017(8):88-89.

(责任编辑 许峻)

## Analysis of Decorative Openwork Window 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s

YUAN Xinhua

(Henan Technical College of Construction, Zhengzhou, Henan 450000, China)

**Abstract:** Decorative openwork window is the highlight creation of freehand natural landscape garden bred by 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 thought, which has high aesthetic valu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corative openwork window in terms of form, connotation, space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analyzes the beauty of the decorative openwork window art from the traditional aesthetic perspectives such as “the beauty of reality and imagination”, “the beauty of implicitness”, “the beauty of neutralization”, and discusses the realistic value of the decorative openwork window art in modern space design and i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aesthetics.

**Key words:** decorative openwork window art,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traditional aesthetics, realistic value

(上接第 57 页)

[14] 肖小华. 中央苏区政治宣传工作探析[J]. 探求,2020 (6):32-39.

[15] 张广昭. 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内在逻辑[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11-26(005).

[16] 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谢春红)

## The Formation and Value Embodi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Slogan of the Red Army's Western Expedition to Ningxia

ZHANG Yumei

(Ningxi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ingxia, Yinchuan 750021, China)

**Abstract:** Revolutionary sloga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 large number of revolutionary slogans left by the Central Red Army in Ningxia during the western expedition were rich in content and distinctive in theme. As a relic of the special era, revolutionary slogans deeply interpret CPC's view of people and nation and reflect its discipline and diversified publicity system.

**Key words:** The Red Army's western expedition; Ningxia; revolutionary slogan; value

# 《广韵》《集韵》中“戠”的字形与词义考

金欣欣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北京 100081;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广韵》和《集韵》是我国中古时期的两部重要韵书,在字音、字形、字义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广韵》去声收入了“戠”字。《集韵》的编纂时间晚于《广韵》,它在编纂过程中参考了《广韵》。对于《广韵》的“戠”字条,《集韵》沿用了释义,参考了注音,但是字形与《广韵》的“戠”字明显不同。从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的相关释义看,《广韵》“戠”字的字形是错误的,《集韵》则是正确的。自《广韵》以来,除了《集韵》之外的各种韵书、字书、语文辞书,不仅沿用了《广韵》“戠”字的错误字形,同时在释义上也不够明晰、完善。这一考证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戠”字做了字形的分析和辨误。同时,还参考著名语言学家金有景先生《方言古语词》未刊稿的相关内容,就“戠”的释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讨论。这些对今后语文辞书相关条目的编纂可以起到借鉴作用。

**关键词:**“戠”字;《广韵》;《集韵》;《说文解字》;《方言古语词》;汉字字形;词义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5.012

**中图分类号:**H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5-0063-04

《广韵》由宋代陈彭年等编纂,成书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集韵》由宋代丁度等编纂,成书于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广韵》和《集韵》是我国中古时期的两部重要韵书,在字音、字形、字义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拟对《广韵》《集韵》中的去声绛韵“戠”字的字形和释义问题做一些讨论,不妥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教。

## 一、《广韵》《集韵》关于“戠”字字形的分歧

“戠”字,就现存字书和韵书看,最早或见于《广韵》。

《广韵》(清代泽存堂本)去声绛韵:“戠:捍船木也。色绛切。”<sup>[1]346</sup>

《集韵》(宋代潭州本)去声绛韵:“戠:捍船木。朔降切。”<sup>[2]133①</sup>

以上所引《广韵》《集韵》,可以看出,这两部韵书对“戠”的字形处理是不一致的。具体地说,《广韵》去声绛韵的“戠”字,《集韵》写作“戠”。即这个字《广韵》从“戈”,《集韵》从“弋”。

从《集韵》一书的体例即“韵例”看,关于“戠”

字这一条的释文,《集韵》是沿用《广韵》的。《集韵·韵例》在介绍该书的收字来源时说:“凡字悉本许慎《说文》,慎所不载,则引他书为解。”<sup>[2]1</sup>《集韵》所收“戠”字,《说文解字》未收,那么显然是来源于其他文献;再比较注释和反切,释义显然一致,《广韵》的“色绛切”和《集韵》的“朔降切”读音相同;由此可以认为《集韵》这一条的读音和释义来源于《广韵》。但是,《集韵》却没有照搬《广韵》的字形。这是值得重视的。

## 二、有关学者对这一字形分歧的意见

从现有文献看,这个问题有三位学者注意到:

第一位是清代著名学者陈鱣。他曾经与清代著名学者李貽德合校《集韵》。这个合校本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等图书馆。<sup>[3]199</sup>关于《集韵》去声绛韵“戠”字,赵振铎教授《集韵校本》引述了他的意见:“‘戠’,《广韵》从戈,误。”<sup>[4]604</sup>

第二位是著名语言学家、《集韵》研究专家赵振铎教授。他的《集韵校本》采纳了以上所引述的清代著名学者陈鱣的校勘意见。<sup>[4]604</sup>

收稿日期:2021-05-20

作者简介:金欣欣(1965—),男,北京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学、辞书学研究。

第三位是著名音韵学家、《广韵》研究专家余迺永教授。他在校注《广韵》时,在《广韵》“戛”字条旁批注:“戛,《集韵》从戈。”<sup>[1]346</sup>书内虽无更进一步的意见,但他在《新校互注宋本广韵》(定稿本)上册书末的“《广韵》检字表”中,有这样的说明:“(三)凡俗字、错字或讹音,外加方框口表示。”<sup>[1]</sup>在这个检字表中,“戛”<sup>[1]14</sup>“戛”<sup>[1]12</sup>并收,其中“戛”字是外加方框的,可以表明余迺永教授的意见。

笔者赞同以上三位学者的意见。由于以上学者仅对“戛”与“戛”的字形做了辨误工作,未做具体说明,现拟就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考述。

### 三、宋代以后编纂的辞书对“戛”字字形的观点

笔者翻检了《广韵》《集韵》以后的一些辞书,发现所有辞书都是以《广韵》的字形(从“戈”)为准的。以下略举数例:

1.《龙龕手鏡》戈部:“戛:楚绛反。捍船木也。”<sup>[5]173</sup>关于“戛”字,《中华字海》戈部注:“同‘戛’。字见《龙龕》。”<sup>[6]810</sup>

2.《改并五音集韵》去声绛韵审母:“戛:捍船木也。色绛切。”<sup>[7]139</sup>

3.《洪武正韵》去声漾韵:“戛:捍船木也。色降切。”<sup>[8]13卷12</sup>

4.《康熙字典》(同文书局版)戈部:“戛:《广韵》色绛切。《正韵》色降切。并淙去声。《广韵》:‘捍船木也。’”<sup>[9]414</sup>

5.《新字典》十一画:“戛:色降切,绛韵。捍船木。防船之损伤者也。”<sup>[10]128</sup>

6.《中华大字典》戈部“戛:色绛切,音淙,绛韵。捍船木也。见《广韵》。”<sup>[11]908</sup>

7.《中文大辞典》戈部:“戛[广韵]色绛切,[韵会<sup>②</sup>]色降切,绛(去声)。捍船木也。[广韵]戛,捍船木也。”<sup>[12]13册360</sup>

8.《中华字海》戈部:“戛”shuàng:“使船固定的木桩。”(下引《广韵》,略)<sup>[6]810</sup>

9.《古代汉语词典》“戛”shuàng:“一种固定船只的木制用具。翟灏《通俗编·杂字》:‘~……今江船所用以代缆,住则下、行则起者是也。’”<sup>[13]1468</sup>

10.《汉语大字典》戈部“戛”shuàng:“使船固定的木桩。《广韵·绛韵》:‘戛,捍船木也。’《通俗编·杂字》:‘戛……今江船所用以代缆,住则下,行则起者是也。’《隋史遗文》第十一回:‘取鱼不在前滩,下戛何劳急水。’”<sup>[14]3卷1514</sup>

由此看来,关于“戛”字的字形,《广韵》以来的辞书可以分为两派观点:

第一,以《广韵》为代表,认为“戛”字当从

“戈”。这一观点影响很大,除《集韵》以外,就笔者所见,《广韵》之后收入“戛”字的辞书(包括古代的韵书、字书),比如古代的《龙龕手鏡》《改并五音集韵》《洪武正韵》《康熙字典》,现代的《中华大字典》《中文大辞典》《中华字海》《汉语大字典》(第2版)等,均沿用了《广韵》的观点。

第二,《集韵》的观点,认为“戛”字不应从“戈”,当从“弋”。就笔者所见,这一观点只有《集韵》一书,再无其他赞同者。

### 四、关于“戛”字的注释探讨

《广韵》所谓“捍船木”其实有些费解,特别是对于不熟悉水乡生活的现代读者更是如此。以上所引述的辞书中,有几种没有沿用或没有仅仅沿用《广韵》的注释,另外做了注释:

(一)在《广韵》释义之外的几种辞书的注释

#### 1. 关于“戛”的定义

主要是在《广韵》释文“捍船木”的基础上,用现代汉语的翻译。

(1)《中华字海》和《汉语大字典》(第2版)均注为:“使船固定的木桩。”

(2)《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版):“一种固定船只的木制用具。”

#### 2. 关于“戛”的功用

(1)清·翟灏《通俗编》:“戛……今江船所用以代缆,住则下,行则起者是也。”(转引自《汉语大字典》第2版)

(2)《新字典》(出版时间早于《辞源》,大致相当于《辞源》的字头部分)说:“防船之损伤者也。”

#### 3. 金有景先生的注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金有景先生,在他的未刊稿《方言古语词》去声绛韵中,论及“戛”的字音、词义和用法<sup>③</sup>。他指出:“浙江义乌方言称一根用来固定木船不使被水漂走或冲走的大木棍(起锚的作用)为‘船戛’。‘戛’也可以当动词用。例如:‘船戛牢些’(把船固定得牢一些);‘船戛牢罢’(船已经固定牢了)。”

由于金有景先生自幼生活在南国水乡浙江省义乌市,熟悉水乡生活,所以他关于“戛”的词义和用法的观点是可以采信。为此,以金有景先生的释义为基础,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对上述几种辞书的注释的不足之处略做讨论。

(二)《广韵》以外的几种辞书注释的不足之处

#### 1. 关于“戛”的定义

(1)把“戛”释为“一种固定船只的木制用具”(《古代汉语词典》),注释准确,但还不够具体。



(2)把“戣”释为“使船固定的木桩”(《中华字海》和《汉语大字典》第2版),则不够妥当。

先看《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相关注释:

“桩:①(名)桩子:木~|桥~|打~|拴马~。”<sup>[15]1712</sup>

“桩子:(名)一端或全部埋在土中的柱形物,多用于建筑或做分界的标志。”<sup>[15]1712-1713</sup>

由于“戣”是活动的,是行船的用具的一部分,不是固定在江边、江中的某个位置,所以释为“木桩”是不准确的。

## 2. 关于“戣”的功用

(1)认为“戣”是“江船所用以代缆,住则下,行则起”(《通俗编》)大致是准确、清楚的,惟“缆”字不够准确。

先看《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相关注释<sup>④</sup>:

“缆:①拴船用的铁索或许多股拧成的粗绳:~绳|解~(开船)。”<sup>[15]772</sup>

如果认为“戣”是起代替船缆的作用,那么,在固定船的时候,还是离不开岸边的桩、树等物。事实上,如金有景先生所说,“戣”是起到锚的作用的,本身已可以固定船的位置,不需要再借助于桩、树等物。所以《通俗编》的释文所提到的“缆”,不如改为“锚”更准确、恰当。

(2)认为“戣”是起到“防船之损伤”的作用(《新字典》),这一注释是准确的,但是不够全面。笔者认为,金有景先生所说“不使被水漂走或冲走”的说法是比较全面的,“船之损伤”只是船被水“漂走”或“冲走”的后果之一。

## (三)对“戣”的新的注释

由于金有景先生《方言古语词》对“戣”的注释只立足于浙江省义乌市的方言,所以需略做修改:

“戣”:“shuàng①(名)我国部分地区称一根用来固定木船不使被水漂走或冲走的、起锚的作用的大木棍为‘船戣’。②(动)用‘戣’固定船只:船戣牢些(把船固定得牢一些)|船戣牢罢(船已经固定牢了)。”

## 五、关于“戣”字的字形探讨

上文第四部分讨论了“戣”字的注释;第三部分介绍了自《广韵》以来的辞书中关于“戣”字字形的两种观点;第二部分介绍了前辈学者关于《广韵》“戣”字字形是错误的,《集韵》相关字形是正确的这一观点。以下做一些具体分析和讨论。

上文谈到,《广韵》的“戣”和《集韵》的“戣”,字形不相同。前者从“戈”,后者从“弋”。前辈学者为什么认为这个字的字形,《广韵》是错误的,《集韵》是正确的呢?先看看《说文解字》的释义及清代学

者的相关注释。

## (一)《说文解字》关于“弋”和“戈”的注释

东汉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成书于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是我国最早的字典。众所周知,这部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许慎对汉字本义的研究以及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分析,对于本文讨论《广韵》《集韵》的“戣”字字形问题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 1. “弋”

《说文解字注》厂部:“弋:橛也。象折木袞锐者形。(段玉裁注:‘者’,各本作‘著’,不可通。今正。古‘箸’<sup>⑤</sup>与‘者’无二字。‘箸’即‘者’字。折木之袞锐者为‘橛’,故上体象其袞锐。)’厂’,象物挂之也。與职切。”<sup>[16]627</sup>

《说文通训定声》厂部:“弋:橛也。象折木袞锐者形。从‘厂’,象物挂之也。……知凡袞锐之木皆得谓之弋矣。”<sup>[17]215</sup>

### 2. “戈”

《说文解字注》戈部:“戈:平头戟也。从弋,(段玉裁注:谓秘长六尺六寸)一衡之。象形。(段玉裁注:‘衡’,各本作‘横’,依许全书例正。弋之首一横之而已矣。……古禾切。)凡戈之属皆从戈。”<sup>[16]628-629</sup>

### 3. 结语

从以上《说文解字》的释文及清代段玉裁、朱骏声两位学者的注释可以看到,从“弋”的字是与木棍有关的,从“戈”的字是与“戈”有关的。结合上文提及“戣”是“一根起锚的作用的大木棍”,可以看出,《广韵》确认的字形“戣”(从“戈”)是不正确的,《集韵》确认的字形“戣”(从“弋”)是正确的。

## (二)从《集韵》的字书性质谈“戣”字形的准确性

众所周知,《集韵》收字很多,《集韵·韵例》谓此书收字53525个<sup>[2]16</sup>。这与《集韵》在收字方面的编写宗旨是有直接关系的。《集韵·韵例》说:“今所撰集,务求赅广。经史诸子及小学书更相参定。……凡古文见经史诸书可辨识者取之,不然则否。”<sup>[2]1</sup>可见,《集韵》对于所收汉字的字形是做了甄别和研究的。所以,《集韵》不仅是一部韵书,也是一部字书。前辈学者对于《集韵》编者在字形方面的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重视和高度评价。黄侃先生在《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声韵学笔记·集韵”条说:“《广韵》一书,本为言音韵者之总汇。《集韵》则有异于是。盖《集韵》者,乃用音韵以贯穿文字、训诂之书也。”<sup>[18]174</sup>著名语言学家、《集韵》研究专家赵振铎教授的《集韵研究》说:“《集韵》对于研究古音,探索词义,考察字形结构还是很有作用的。”<sup>[3]1</sup>

从《集韵》沿用《广韵》对“戠”字的释义和注音(反切上下字有改动),但是不照搬此字的字形,坚持用“戠”字字形的做法看,前辈学者对《集韵》编者在字形研究方面的成就的称赞是很有道理的。

#### 注释:

- ①北京中国书店1983年出版的《集韵》(扬州使院重刻本,即清代顾广圻校本,底本是以汲古阁影钞宋代明州本刊刻的曹棟亭本)与此同。(中册,第9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集韵》(述古堂影钞宋代明州本),去声绛韵:“戠:捧船水。朔降切。”(上册,第466页)“捧”“水”两字分别与“捍”“木”形近讹误,以潭州本为是。
- ②《古今韵会举要》未收“戠”字,当为《正韵》(《洪武正韵》)之误。
- ③由于本文不讨论“戠”字的字音问题,所以金有景先生关于“戠”字的注音方面的观点略。
- ④需说明的是,虽然《通俗编》是清代著作,但就“纜”的词义来说,用《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做比较,仍然是可以的。
- ⑤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说文解字》“弋”的释文,各本均作“象折木衰锐著形”;其中的“著”字当为“者”字。但他在随后的进一步说明中,没有涉及“著”字,却涉及“箸”字。这是因为《说文解字》没有收“著”字。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箸”字条说:“箸,《曲礼》谓之杖。假借为箸落,为箸明。古无去入之别,字亦不从艸也。”(第193页)
- ⑥按照近年来有关学者的研究,《集韵》述古堂影宋钞本(底本为明州本)收字头54633个,除去重复出现的(指字形相同,读音不同的情况),共计31436个。(柳建钰,史晓丹《〈集韵〉〈类篇〉实收字数今考》,《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 参考文献:

[1]余迺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定稿本,上册)[M].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 [2][宋]丁度,等编.宋刻集韵[Z].北京:中华书局,1989.
- [3]赵振铎.集韵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6.
- [4]赵振铎,校.集韵校本(下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 [5][辽]释行均,编.龙龕手鏡[Z].北京:中华书局,1985.
- [6]冷玉龙,等主编.中华字海[Z].北京:中华书局,1994.
- [7][金]韩道昭.校订五音集韵[Z].宁忌浮,校订.北京:中华书局,1992.
- [8][明]乐韶凤,等编撰.洪武正韵(衡王府厚德堂本)[Z].1567.
- [9][清]张玉书,等编纂.康熙字典[Z].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0]陆尔奎,等编纂.新字典(珍藏本)[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11]欧阳溥存,等编纂.中华大字典[Z].北京:中华书局,1978.
- [12]林尹,等主编.中文大辞典[Z].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68.
- [13]《古代汉语词典》编写组.古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 [14]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Z].2版.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Z].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16][汉]许慎.说文解字注[M].[清]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7][清]朱骏声,编著.说文通训定声[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18]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 刘海燕)

## A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Form and Meaning of “Shuang” in *Guangyun* and *Jiyun*

JIN Xinxin

(Institute of Curriculum and Textbooks,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100081, China;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related interpretation of Shuowen Jiezi, the earliest dictionary in China, we can see that the shape of “shuang” in *Guangyun* is wrong, while it is correct in *Jiyun*. Since *Guangyun*, in addition to *Jiyun*, all kinds of rhyme books, character books and Chinese dictionaries have not only adopted the wrong form of “shuang” in *Guangyun*, but also not clear and perfect in interpretation.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 “shuang” and distinguishes its errors. At the same time, referring to th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f the famous linguist Jin Youjing's *Ancient Chinese Vocabulary in Chinese Dialects*, this paper makes a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huang”.

**Key words:** the word “shuang”; *Guangyun*; *Jiyun*; *Shuowen Jiezi*; *Ancient Chinese vocabulary in Chinese Dialects*; Chinese character pattern; word meaning

# 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研究系统的构建

陈双双

(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300)

**摘要:**中国政治文献外译,在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讲好中国治国理政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政治文献外译是一种目的性行为,通过梳理外译目的的内涵,为构建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研究系统奠定基础。该系统涵盖两个主要方面:外译目的对于外译活动的影响以及外译活动各环节对于外译目的实现的影响或制约。在两大分支之下,还包含具体的研究方向。对外译目的研究进行系统性的规划,有助于推动该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系统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5.013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5-0067-05

## 一、引言

“目的”是指“想要达到的地点或境地,想要得到的结果。”<sup>[1]</sup>人类任何有意义的行为都有其目的,而翻译行为是一种有意义的行为,因此翻译本质上是一种目的性的活动。译者翻译出译作之后,总是希望它被阅读,中国政治文献外译行为有着特定的目的:或是为经济服务,或是为文化服务,或是为政治服务。翻译目的是翻译行为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它对翻译行为的方方面面都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如翻译的选材、译者的立场、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的确定、译作的传播与接受等。“考察中西翻译史,我们可以看到,翻译往往是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的,与某种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或社会的需要紧密相连。”<sup>[2]</sup>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犹如整个外译行为的“指挥棒”,其重要性不可不察。

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系统,可以分为外译的文本目的子系统和外译的非文本目的子系统。非文本目的子系统又包含政治目的、交流目的、认知目的、研究目的,下文将详细论述。曹明伦认为翻译的目的分为文本目的和非文本目的:“文本目的是指

译者的文本目的(让不懂原文的读者通过其译文指导、了解、甚至欣赏原文的思想内容及其文体风格),而译者则是具体翻译过程中的施事者;非文本目的是发起人(涉及委托人、赞助人等)的目的。”<sup>[3]</sup><sup>128</sup>当然在文学翻译领域,很多时候译者就是发起人,而在中国政治文献外译活动中,两者是完全分离开来的、两个不同的群体,中国政治文献发起人代表着国家,是党或政府及其下属的组织或部分,而中国政治文献译者则主要是受雇于发起人,隶属于政府翻译机构的专业翻译人员。文本目的,主要是针对译者的具体翻译活动而言的,为了让目标语读者尽可能看到犹如“原作”一样的译作,译者“必须追求目标语文本与源语文本之间的意义之相当、语义之相近、文体之相仿、风格之相称”<sup>[4]</sup>。但本文认为,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的文本目的,最终是要为其非文本目的而服务的,因此,本文所言的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主要是指非文本目的,是发起人的目的,一种代表着“国家意志”的目的。中国政治文献译者在翻译的时候,有必要了解发起人的外译目的,并且应当与之趋同,竭力保持一致,在这个前提下,译者可以

**收稿日期:**2021-08-18

**基金项目:**2021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中国民航大学专项资助项目“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的群体译者行为研究”(3122021013)

**作者简介:**陈双双(1986—),男,山东菏泽人,博士,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对外翻译研究。

适当地兼顾目标受众的阅读目的。总而言之,中国政治文献外译活动应当围绕外译目的展开。首先要弄清楚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可以通过阅读已有中国政治文献的内容,其中会涉及一些中国的对外政策,实际上也暗含着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的目的。其次,可以对中国政治文献译者进行访谈,他们会直接收到或间接地了解到发起人的外译目的,例如发起人在翻译纲要中明示,或者译者通过其他方式推测发起人的大致目的。

## 二、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的四大内涵

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的目的,即主要指中国政治文献外译发起人所希望达到的非文本目的,包含以下四个方面,它们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政治文献外译活动的重要意义。

### (一) 政治目的

中国政治文献外译,代表着国家意志,传递的内容包含中国的大政方针等,也代表着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的根本目的,是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与稳定的国际政治环境,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促进中国的发展,这实际上综合了中国的政治利益、社会与文化利益以及经济利益。中国政治文献外译可以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增强中国的国家软实力等,这些都是外译根本目的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全球观的政党,将全人类的福祉也纳入自己的决策视野,并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治文献外译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各个国家各种语言。此外,由于它是中国共产党推动之下的一项伟大倡议,更是需要各国政府在政治层面展开合作,相关决策或决议需要以政治文献作为载体去传播乃至落实执行。

### (二) 交流目的

它主要是指政治和文化层面的交流以及相关的合作。国际受众对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依然缺乏了解。“在政治体制方面,2013年近50%海外受众整体上对中国政治缺乏了解,尤其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理念与主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政治的认知存在较大分歧。2014年海外受众对中国执政党的印象是权力集中、有超强的组织动员能力、组织严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道路和模

式的理解仍有所不同。”<sup>[5]</sup>由原语国家主动开展的中国政治文献外译活动,体现出原语国家与世界积极沟通的意愿,有助于打破西方主流话语的霸权地位,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朋友圈”,达到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沟通交流的目的。一方面有利于中国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纠正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的部分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误解或偏见,减少误读,增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让国际受众了解客观、真实的中国,而不是某些国际主流媒体戴着有色眼镜透视所看到的中国;另一方面有利于塑造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翻译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在译入语文化环境中塑造原作所处社会的国家形象或文化形象。”<sup>[6]</sup>中国政治文献外译传递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传播中华民族的政治理念,展现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塑造的是正面而积极的国家形象,有助于中国获得更多国际人士的认可。

### (三) 认知目的

中国政治文献外译,旨在让国际受众了解和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文化、政治理念等。中国已经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与社会发展速度快,在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发展缓慢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说一枝独秀,因此国际社会渴望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理论、发展制度等。中国国家经济与社会的腾飞,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精心治理,而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理念主要蕴含在中国政治文献之中,因此中国政治文献外译,能够便捷地让国际受众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理念。“中国重大会议决议决定文件、中国领导人的对内和对外讲话就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新理念、发展新目标、改革新举措的窗口,成为国外政要、媒体、智库研究中国执政理念的一手资料。”<sup>[7]</sup>

### (四) 研究目的

中国政治文献外译还具有相应的研究目的,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中国政治文献译作可以供国际受众(例如国外的政治家、政府官员、学者等)参考和研究,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让他们借助译作来了解中国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中国政治文献译作(当然还可以涉及原作等其他因素)可以成为翻译研究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从而深化对翻译研究的认识,推动翻译研究的发展。

## 三、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对外译的影响

中国政治文献译者应当首先考虑发起人的目的,因为发起人在整个外译活动中处于核心的、主导

的位置。正如 Nord 所言：“发起人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而需要翻译。发起人对译作的接受或其他接受该译作的人，都取决于这个目的。恰恰是这个目的，决定了翻译需要满足的要求。”<sup>[8]</sup> 中国政治文献外译发起人的目的，是整个外译活动中的一根“指挥棒”，它几乎可以影响到外译行为的各个方面。

因此，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对于外译活动的影响研究，至少包含以下方面的具体研究内容：(1) 外译目的对于外译主体的影响，例如对于中国政治文献译者立场的影响；中国政治文献译者对于外译目的有着怎样的认识，赞同、中立、反对等；中国政治文献译者是如何知道外译的目的，是通过发起人的口头告知，还是翻译纲要、还是译者的推测。(2) 外译目的对于外译客体的影响，尤其是对外译客体的创作和对中国政治文献外译选材的影响。(3) 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的目的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例如对于具体的外译策略和外译方法的影响。“‘要怎么译’是一开始就被明确规定的，翻译要遵循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与翻译所意欲达到的目的紧密相连。实际上，确定正确的翻译目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采取何种相应的翻译手段或方法的一个前提。”<sup>[9]</sup> 外译策略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的影响。对于原文内容(或信息)的最大忠实，是中国政治文献译者首先要考虑的一点。(4) 外译目的对于结果的影响，例如对于中国政治文献译作最终面貌的影响，涉及定稿、排版和印刷、出版与发行等。(5) 外译目的对于中国政治文献译作的传播与接受的影响，其中涉及对于受众和效果的影响。

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之相关的研究方法包括：(1) 由于外译目的对于中国政治文献翻译行为的所有影响，都最终反映到中国政治文献译作之中，因此通过考察译作，可以反向地来揭示外译目的所产生的具体影响有哪些，这需要借助于文本细读法、文本比较法(尤其是指译作与原作的比较)。(2) 译者访谈法。(3) 副文本途径的研究方法。

下面仅举一个译者访谈的个案来说明外译目的对于具体外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影响。在谈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的情况时，黄友义指出“译文要特别注意归化。……我们翻译的第一个目的是要让别人看得明白”<sup>[10]</sup>。可见在让目标语读者易懂的这个目的之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者更倾向于采用归化策略。此外，译者所秉持的这种翻译目的，也影响到了具体章节标题的翻译，其中每一部分的大标题，都进行了简化处理，比如“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被译为“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被译为“The Chinese Dream”，“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被译为“National Defense”等<sup>[11-12]</sup>。研究者如果仅仅从语言转换层面进行考量或评估这些译法，或许只能得出翻译“不充分”的结论，但是通过译者访谈法，可以知晓其翻译目的所带来的影响，从而明确这些译法有其合理性。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外译目的可以影响到具体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择，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外译活动的多种因素经常交织在一起，互相作用与影响，比如目标语受众的需求等，既可以影响外译目的，也可以影响到具体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因而研究者在谈及外译目的对外译实践的影响之时，可能还会涉及其他因素所带来的影响，这有助于更加系统深入地揭示复杂的外译活动。

#### 四、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实现的制约因素

曹明伦指出辨别翻译的文本目的和其他目的可以依据目的的实现途径：“因为发起人的目的(无论是政治目的、文化目的、经济目的或其他个人目的)都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去实现。……而实现文本目的的途径却只有一条：把一套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所负载的信息用另一套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表达出来。”<sup>[3]128-129</sup> 本文所言的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是发起人的目的，是一种非文本目的，那也就意味着“对外翻译”只是其中的一条途径，还存在其他多种途径来达到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比如重视发挥海外华人和来华留学生的作用，给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让他们以目标语受众能够读懂的语言、易懂的表达方式来介绍中国政治文献的内容、中国政治制度和体制等；也可邀请一批国外专家(尤其是政治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到中国来深入交流，学习中国的政治文献以及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然后鼓励他们归国之后，直接用他们的母语来创作，介绍中国的治国理念、大政方针等；还可以是中国的著名学者，直接以英文撰写，以易懂的方式介绍中国的政治理念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学者没有依据某一个原作进行翻译，而是依据自己所搜集的诸多材料和加上自己的理解或阐释，进行直接英文撰写，但是很多中国政治概念或术语，依然是要用外语来表达，那么“翻译”也是其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重要成分，因此研究这些直接用外文撰写的著作，与某些相关的中国政治文献译作进行对比研究，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尤其是重要的中国政治术语或政治概念。只是这种直接用目标语来

撰写,介绍中国政治理念、政治制度等的著作,不属于“翻译”的范畴。我们还可以借助音频、视频等多模态的方式,以非语言符号直接向受众传递中国的政治理念等,这中间可以不涉及翻译、或者说涉及少量的语言翻译。可见这种“对外翻译”之外的途径还有很多。陈明明认为:“理想状态下,最好避免直接翻译概念性的文件。要吃透原文的精神,用英文思维、写作,用英语直接与受众沟通。”<sup>[13]</sup>但这是理想的状态,实施起来有很大难度,国内外都缺乏这类的人才,那么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前还是“对外宣介中国政治体制、理念、制度、方针等”一条不可或缺的、不可替代的、至关重要的途径。

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实现途径及其制约因素研究,包含的相关具体内容涉及:(1)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实现的途径、方式、方法等,尤其是聚焦在“对外翻译”这条途径上,怎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外译目的。(2)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的各个主体,在实现外译目的的过程中,各自发挥怎样的作用。(3)中国政治文献译者是产出译作的一个关键主体,那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考虑外译目的以及如何最佳实现外译目的。(4)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之实现,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或影响。可以划分出翻译之内的因素和翻译之外的因素,翻译之外的因素非常广泛,比如目标语读者、目标语社会、文化、历史因素等,这些都是中国政治文献译者乃至发起人等外译主体所无法掌控的因素,是一种类似于客观的存在,因而属于翻译之外的因素。作为翻译研究者需要适量考察翻译外因素,但是本文认为重点可以放在翻译内的因素研究,例如外译主体的因素(译者的翻译能力、发起人的支持力度和外译意图、原作者的创作等)、外译客体的选材(在符合外译选材标准的前提之下,要兼顾目标语受众和社会的需求。比如针对发展中国家来翻译中国的一些“扶贫”方面的政治文献,针对发达国家来翻译聚焦中国当前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方面的政治文献等)、外译过程的因素(在忠实于原作、准确达意、坚持原作者立场的前提之下,兼顾目标语的表达规范等),翻译之内的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外译目的的实现。之所以重视对翻译之内因素的研究,是因为这些因素是外译主体可以控制的变量,可以积极改善和提升。(5)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是否实现的衡量标准或评价机制。(6)中国政治文献外译之目的与中国政治文献外译效果之间的关系。外译目的与外译效果有着密切的联系,犹如硬币的两面,如果能够很好地实现目的,那么也就意味着效果非常好;反过来,如果效

果好,那么也就自然意味着目的实现了,甚至超越预期的目的。外译效果以及译作在目标语国家的社会作用是通过受众来评判、衡量和实现的,而受众对外译作品的评判,主要是依据译作是否达到或满足了受众的某些具体目的。

相关的研究视角包括:(1)德国功能主义目的论。Reiss & Vermeer 借鉴行为理论的概念,将其引入翻译研究之中,指出“翻译目的”是决定翻译过程的主要因素<sup>[14]</sup>。目的论主张,译本的预期目的决定翻译的方法和策略,在翻译过程中应遵循三个总体原则,即目的原则(skopos rule)、连贯原则(coherence rule)和忠实原则(fidelity rule)。因此,目的论的理论视角,对于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实现途径及其制约因素的研究具有较强的适用性。(2)认知视角的译者研究。可以通过调查问卷或译者访谈的形式,了解中国政治文献译者对于外译目的的认知以及所采用的具体措施。(3)鉴于目的与效果之间的密切关系,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还涉及目标语国家的诸多因素,很多都是翻译的外部因素,那么还可以采用文化研究视角,通过考察目标语国家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因素等,分析它们对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实现的潜在影响或制约。(4)传播学视角的外译目的实现路径与制约因素研究。翻译学与传播学存在很大的相似性,甚至有学者提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活动,其本质是传播,是传播学中一个有特殊性质的领域。”<sup>[15]</sup>当然,目前翻译研究者们普遍认为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成为事实,因此不宜将它再归类到传播学之下。还有学者提出了翻译学与传播学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门新的学科“翻译传播学”。因此,可以看出传播学与翻译学关系密切,传播学之下的很多研究方法、工具等,可以迁移到翻译学之中,对外翻译的目的,既是发起人的目的,也是指经由译作这个载体而希望达到的传播目的,因而传播学的视角也有助于揭示目的实现途径及相关制约因素。(5)多元系统理论致力于研究那些影响和制约翻译过程的外部社会文化因素,因而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综上所述,本文所构建的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研究系统,其框架图如图1。

## 五、结语

在中国政治文献外译活动中,外译目的占据重要地位,它对外译活动的其他各个环节都有着影响;反过来,外译各个环节也对于外译目的的实现有着一定的影响或制约。因此,有必要开展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研究。本文梳理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

研究系统的内容,希望能够对该分支研究领域的未来发展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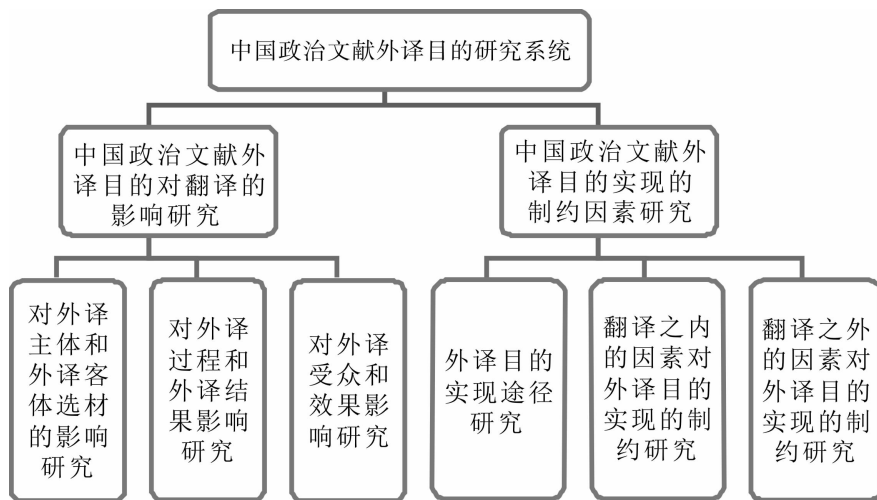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政治文献外译目的的研究系统

####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D].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904.  
[2] 许钧. 翻译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8.  
[3] 曹明伦. 翻译之道: 理论与实践(修订本)[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3.  
[4] 曹明伦. 文本目的: 译者的翻译目的: 兼评德国功能派的目的论和意大利谚语“翻译即叛逆”[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7(4): 2.  
[5] 梁林歆. 中国“走出去”背景下外译的传播学路径研究: 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例[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132.  
[6] 张晓芸. 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视角: 以凯鲁亚克《在路上》汉译为个案[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230.  
[7] 黄友义, 黄长奇, 丁洁. 重视党政文献对外翻译, 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J]. 中国翻译, 2014(3): 7.  
[8] Nord C.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 – oriented text analysis* [M]. 2e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9.  
[9] 许钧. 论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8(3): 51.  
[10] 尹佳. 从读者接受理论看外宣翻译中的读者关照: 黄友义、徐明强访谈录[J]. 中国翻译, 2016(5): 78.  
[1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12]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14.  
[13] 陈明明. 中文政治词语的英译问题[J]. 语言战略研究, 2019(1): 5.  
[14] Reiss K, Hans J V.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al Action: Skopos Theory Explained* [M]. Trans. by Christiane Nord; London, Routledge, 2014.  
[15] 吕俊. 翻译学: 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J]. 外国语, 1997(2): 39 – 44.

(责任编辑 谢春红)

##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search System regarding the Skopos of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Documents

CHEN Shuangshu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Tianjin 300300,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documents (CPD), as a purposeful ac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elling the 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skopos of the CPD translation is analyzed, which paves the wa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search system regarding the skopos of CPD translation. This system consists of two major branches, namely the influence of skopos on the CPD transl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elements in translation activity up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kopos. Detailed research aspects are presented below each of the branches.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the research on the skopos of CPD translation is expected to contribute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Chinese political documents;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into foreign languages; skopos; system

# 高校对外汉语教师跨文化交际障碍研究

梁海,李畅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辽宁大连116024)

**摘要:**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有着文化的差异,跨文化交际障碍是不可避免的。正视跨文化交际障碍,并深入挖掘不同文化的隐秘部分,才有可能找到解决措施。克服跨文化交际障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语言、文化和交际能力都需不断提升。在此过程中,我们首先应具有中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同时还应尊重、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摒弃思维定势、刻板印象和民族中心主义的束缚。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师;跨文化;交际障碍;思维定式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5.014

**中图分类号:**H0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5-0072-04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贸易的全球化合作,教育的国际化视野,在全球范围内兴起“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和汉语感兴趣。行走在异国街头常常能听到不同肤色的人说几句汉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表示好奇与热爱。李安电影、刘慈欣科幻小说,以及国际赛事的成功举办、“一带一路”政策等文化输出,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到中国留学,对他们来说,首先需要过汉语关。这些留学生几乎都已成年,必然带着本民族的文化基因,基于这种现实,高校对外汉语教师在教学中难免会遇到跨文化交际的困境。那么,我们该如何克服这种困境?

## 一、跨文化交际障碍

跨文化交际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伴随着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引发的摩擦、碰撞和交流而产生。随后这种研究的热情传播到了欧洲和亚洲,乃至世界各地。《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辞典》对跨文化交际进行了解释:“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思想、信息等的交流。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问题一般要比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际中出现的问题多。每个参与者都根据自己的文化习

俗和预见理解别人的话语。如果说话者的文化习俗迥异,就很容易引起误解,甚至导致交际的完全失败。”<sup>[1]80</sup>胡文仲给跨文化交际下的定义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际的过程就是跨文化交际。”<sup>[2]1</sup>由于文化差异,以及建立在文化差异基础上的交际需求,跨文化交际障碍是不可避免的。“跨文化的关键是跨越文化障碍,而跨越文化障碍的根本途径在于揭示各民族文化中的隐蔽部分,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适合各民族文化特征的交际策略。”<sup>[3]104</sup>正视跨文化交际障碍,并深入挖掘不同文化的隐秘部分,才有可能找到解决措施。胡文仲具体指出:“出现跨文化交际障碍的原因有三种:第一是认识上的误区。人们在与不同文化背景及风俗习惯的人进行交际的过程中,常常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对方与自己的想法相同,当对方所做出的行为与自己的思想所违背或超出自己的预期时,就会感到迷茫、失望,从而导致跨文化交际过程出现障碍,甚至导致交际失败。第二是刻板的印象。尽管我们并没有过去某些国家,没有与某种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接触,但我们往往已经通过各方渠道对其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这就是所谓的刻板印象。第三是民族中心主义。就是按照本民族的思想方式、宗教礼仪、社

**收稿日期:**2021-08-20

**基金项目:**大连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科研培育基金“对外汉语教师跨文化交际素养研究”(SIE18RZD5)

**作者简介:**梁海(1968—),女,江苏南京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李畅(1992—),女,吉林四平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博士研究生。



会风俗、行为举止和价值标准等去衡量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sup>[4]29</sup>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往往具有不同的思维模式,而思维模式的固化容易形成思维定式。思维定式难免会导致胡文仲所说的认识上的误区,从而引发跨文化交际障碍。为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顺利交流,就要努力克服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但这并不是说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要无底线地退让,持守核心价值观是我们跨文化交际的底线。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以此标准要求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甚至强制他人接受。认清价值上的差异,尊重不同的价值取向,是高校对外汉语教师避免跨文化交际障碍应有的心态。

跨文化交际中另一个主要障碍是刻板印象。“刻板印象(stereotype)是一个重要的跨文化传播概念,这个术语是由  $\sigma\tau\epsilon\rho\epsilon\acute{o}\varsigma$  (stereos) 和  $\tau\acute{\upsilon}\pi\omicron\varsigma$  (types) 两个希腊单词构成,最初翻译为‘牢固的印象’或‘固定的成见’。……在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的著作《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出版后正式进入大众视野。”<sup>[5]128</sup> 刻板印象被界定为在人脑中的心理表征或认知结构,通常是无意识的行为,因此我们常常意识不到。刻板印象通常被认为具有负面属性,但现代研究表明,刻板印象实际上有正面效应,它通过简化信息,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这个层面的刻板印象被视为一种分类形式,这种分类形式可以帮助我们简化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进行系统化梳理;借助这种简化和系统化,我们针对某些信息可以进行更容易的识别、回忆、预测和回应。”<sup>[5]130</sup> 刻板印象显然简化了跨文化交际过程,但也难免带来偏见、歧视和冲突。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意识到刻板印象的存在,并采取措施规避它的负面效应。既然它是一种无意识行为,那么有意识的认知和学习则是必要的。刻板印象的负面影响显然与偏见、歧视有关,这种歧视可以表现在语言上,也可能通过行为显现。对于高校对外汉语教师来说,无论在语言还是行为上的偏见,都会引起留学生的不适,甚至会产生文化间的冲突,因此对不同文化的包容性同样必不可少。

民族中心主义显然也会导致跨文化交际障碍。“民族中心主义由两个希腊词根 *ethos* (民族) 和 *ketron* (中心) 组成,意指以某人的文化为中心,以此作为评判其他文化的价值标准。或者指个人认为本文化优于其他文化的程度。萨勒(Summer)曾把民族中心主义分为两部分:相信本群体的优越,随后相信其他群体的低劣。”<sup>[6]85</sup> 中国文化具有兼容并包的特

点,但也曾有过高临下、唯我独尊的历史。在清朝,外来使节被要求向皇帝跪拜;清政府一度闭关锁国,对西方世界的发展置若罔闻,这种民族中心主义的交际态度最终让中国成了井底之蛙,踏入了近代的屈辱史。在现代,民族中心主义主要以隐性的面貌出现,在高校的语境中,往往表现在抬高某一民族或种族文化而无意识地忽视其他弱势文化。很多高校对外汉语教师都或多或少遇到过由此引发的跨文化交际障碍,比如片面抬高发达国家文化,忽视发展中国的文化,这个问题的确应该引起重视。

## 二、问题与建议

为了深刻感受高校对外汉语教师面临的跨文化交际障碍,笔者用访谈的方式采访了大连理工大学的三名对外汉语教师。笔者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作为一名高校对外汉语教师,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跨文化交际,请问您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遇到过什么问题吗?”受访教师回答该问题时提供了一些问题场景,概述如下。

场景 1: 老师 A 接到学院通知,要求收取留学生护照。老师并没有明确说明原因。留学生表示不能理解,因为护照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中国的身份证一样非常重要,而且具有隐私性,如果只提出要上交而不说明理由,他们表示没办法随便交。班长把同学的担忧告诉老师后,老师才恍然大悟,告诉留学生是为了给大家集体办理签证。留学生明白后才安心上交护照。

从这个场景来看,老师 A 在认识上出现了误区,他忽视了文化的差异,并没有考虑到留学生和中国学生的区别。在中国的文化中,学生可以根据语境明白老师的意图,很容易服从老师的命令;但对留学生而言,他们没有长期在中国学校的语境下成长,对很多直接性下达的命令不理解,这时需要老师详细解释才行。而且,老师从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护照对留学生的重要性。对留学生来说,护照的意义和中国人的身份证一样。所以,老师在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后,就明白了如何表达才能让留学生安心地交出护照。从这个场景中,不难看出跨文化交际素养的重要性,学会换位思考、站在留学生立场思考的重要性。

老师 B 的案例可以说明刻板印象的消极影响。

场景 2: 一次老师讲课讲到了中国的大熊猫,老师说:“中国现在城市化水平很高,野生动物非常稀少,大熊猫作为国家级保护动物,更是要放在保护区保护起来。

非洲就不一样,非洲的动物都是自由自在地在草地上奔跑。”班里正好有几个非洲留学生,其中一个非洲留学生反驳说:“老师,非洲现在很多地方城市化水平也很高,草原越来越少,很多地方已经看不到野生动物了。很多动物也只能在动物园中看到。我们也不是生活在原始时代。”这位老师记得那位留学生显得有些激动,显然想极力纠正老师的认识。

在老师B的刻板印象中,非洲到处贫穷,人们吃不饱饭,城市化、现代化水平极低,这给野生动物们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空间,他想到了在纪录片中看到的非洲动物大迁徙的场景,于是在课堂上进行如上讲解。这位老师被当堂反驳,感到非常没有面子,甚至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做一名对外汉语教师。但是,他最终还是决定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他在课下进行了调查,发现非洲很多国家的确发展得特别好,而且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也极大地促进了中非合作等。他还了解到,非洲留学生毕业后的志向绝大部分是回到非洲,振兴祖国。在他的刻板印象中,他认为非洲留学生一定想努力留在中国。当他了解到非洲留学生的真实想法后,他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刻板印象,反而对那些留学生由衷地表示敬佩。因为他一直觉得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更具有优越性,他们的话语更容易被聆听,他们的行为更容易被效仿,他们的文化输出更容易被接受。他还通过了解他国文化,逐渐知道了如何做一名优秀的对外汉语教师,增强了做一名对外汉语教师的自信心。

老师C同样面临跨文化交际困境。

场景3:有一次一个留学生站起来背诵前一天的学习内容,为了表示对他背诵熟练程度的肯定,老师C面带微笑地看着他,结果这个学生突然停止背诵。于是老师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而那位学生用更疑惑的眼神看着老师。老师不明白为什么这位学生突然停下来了?学生回答道:“老师,我以为我背错了,所以停下来了。”

这个例子也许只是一次课堂中的小插曲,但却能说明一些问题。在留学生眼里,对外汉语教师的一举一动都是标杆,老师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会被无限放大。所以,老师在上课前一定要了解班级的学员构成,在课堂中不要轻易把本民族的文化作为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来表现。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过程中,要三思而后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要完全抛弃本国的文化基因。因为留学生在中国留

学的目的之一一定要学习汉语,了解中华文化。关键是老师如何能够循序渐进地把我们的文化,以及很多不言而喻的日常习惯穿插到课堂教学中。老师一定要在这方面有意识地备课,而不能期待这些目的自然而然地被学生了解,因为很多细节不经提醒是不会被在意的,有时要刻意安排、规划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 三、克服跨文化交际障碍的对策

克服跨文化交际引发的困境,对高校对外汉语教师来说尤为迫切。“语言交际、非语言交际、交际手段、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认知行为等方面”<sup>[6]194</sup>都是促进交际成功的要素,高校教师应该有意识、持续性地提升各项能力。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可以从教师个体、国际汉语学院和对外合作机构三个维度考虑这个问题。

对教师而言,克服跨文化交际障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语言、文化和交际能力都需不断提升。对外汉语教师首先要对汉文化和汉语加强学习,并处理好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之间的关系。让留学生学会汉语,了解、喜爱汉文化是教学的主要目的。在语言中教文化,在文化中教语言。比如中国的辈分文化,可以通过汉语表达直观感受,叔叔、大伯、姑父、姨夫在英文中都叫作uncle,但在汉语中却有不同表达,体现出中国复杂的亲缘关系。对教学深浅的把握也需要因材施教。留学生的水平良莠不齐,对本班学生的汉语水平有个初步的把握是每学期第一节课需要做的事。每节课课前备课、课中授课、课后反思,都要把跨文化交际考虑在内。另外,处理好语言能力培养和交际能力培养的关系同样非常重要。学习语言是为了交际,高校对外汉语教师还需要帮助留学生克服文化休克问题,让留学生提升自主克服跨文化交际障碍的主动性。“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由Oberg在1960年第一次使用。“通俗地说,一个人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原来自己熟悉的一套符号、习俗、行为模式、社会关系、价值观念等被另一套新的自己不熟悉的符号、习俗、行为模式、社会关系、价值观念所替代,因而在心理上产生焦虑,在情绪上不安定,甚至沮丧。在严重的情况下,会产生各种心理和生理方面的疾病。最严重的甚至会患精神病或者自杀。这就是文化休克。”<sup>[2]188</sup>文化休克可以通过跨文化训练的方式缓解,具体方法有增加对异文化的知识,与异文化的人多进行交流,进行角色互换表演等。

高校教师不仅在国内教授留学生,还有很多老师到他国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这就需要老师对

当地文化做更深入的了解,为了防止文化休克,也需要通过跨文化训练的方式缓解。如去埃及,就入乡随俗学习埃及的文化,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如去俄罗斯,就了解俄罗斯文化等。这里的文化不仅包含当地的人文地理等,还包括当地的语言。虽然对外汉语教师是从事汉语教学的,但对当地语言的一定了解,对汉语教学也会有很大帮助,因为这会帮助老师了解当地学生学习的难点,更有利于老师顺利开展教学,更容易产生好的教学效果。比如大多数国家没有声调的区分,那么对声调的讲授就非常重要;有的国家的语法结构是谓语在最前面,而汉语是主语在开头,这些差异也都需要提前考察。对差异加强重视,可以有效去除思维定式,摆脱认识上的误区。高校对外汉语教师还可以通过加强理论学习,掌握克服跨文化交际障碍的方法。值得我们研读的相关著作很多,如跨文化交际学之父爱德华·霍尔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 1959)、《隐秘的维度》(*The Hidden Dimension*, 1966)、《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 1967),胡文仲的《跨文化交际学概论》,等等。另外,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可以间接找到克服跨文化交际障碍的方法。

但克服跨文化交际障碍绝对不是教师可以独自完成的,国际汉语学院和相关职能部门同样需要促进中外跨文化交际。对高校对外汉语教师定期培训,为留学生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对克服跨文化交际障碍的举措提供政策支持等,都极为重要。

对外合作机构也应该为高校对外汉语教师提供相应帮助。海外“孔子学院”可以提供培训课程,让出国的高校教师更快地适应当地文化,了解当地学

生的情况。另外,相关部门应该帮助外派教师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让外派教师能够找到自我认同,避免出现文化休克现象。去海外教授汉语的教师肩负的不仅是语言传播的使命,更具有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包容他国文化是为了更好的教学、为了更好的让世界了解中国,但如果一味地趋同于他国文化,则失去了“跨文化交际”的宗旨和立足点。只有在坚守中华文化基础上的交际,才是“跨文化”的。而保障这些的不只是对外合作机构,教师和国际教育学院同样承担着相应责任。

总之,为了更好地输出中华文化,更好地进行汉语教学,需要克服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出现的障碍,这不仅需要对本民族文化语言熟悉、能教,更需要具有中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同时还应尊重、理解他国文化,摒弃思维定式、刻板印象和民族中心主义的束缚。

#### 参考文献:

- [1]汪火焰. 基于跨文化交际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研究[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2012.
- [2]胡文仲. 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 [3]顾嘉祖. 今日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向何处去? [J]. 中国外语, 2008(1).
- [4]王希竹, 彭爽. 试论国际汉语教师应具备的跨文化交际素养[J]. 当代教育与文化, 2016(11).
- [5]刘杨. 刻板印象[J]. 跨文化研究论丛, 2019(1).
- [6]程翠英. 论跨文化交际深层障碍[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1).

(责任编辑 刘海燕)

## A Study on Cross –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arriers of Chinese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ANG Hai, CHEN Chang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116024, China)

**Abstract:** Due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nations, cross –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arriers are inevitable. To fin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it’s necessary to face those barriers and dig deeply into the hidden parts of different cultures. Overcoming cross –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arriers is a continuous process, through which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would be constantly improved. In this process, the first thing we should do is to build the consciousness and confid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respect and understand the cultures of others, and abandon the shackles of mindset, stereotype and ethnocentrism.

**Key words:** TCSL teachers; cross – culture; communication barriers; mindset

# 论线上展览与新媒体艺术的共生性

王玉君,程原\*

(集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在可预见的后疫情时代,线上展览正成为一种持续性的文化表达方式和常态化的社会需求。新媒体艺术也正在逐步线上化,同时线上展览则通过新媒体艺术的积极作用而获得了更高更纯的艺术性。新媒体艺术与线上展览共同作为与数字技术相融合的产物,两者之间的连接、互动,使之获得了更多更新的优势和特征。技术与艺术在线上化的过程中,不断融合发展,以致线展本身既是艺术创作,也是艺术作品。这预示了新时代艺术发展的一种趋势,也构成了两者现实互动与未来发展共生的必要条件和可能。

**关键词:**线上展览;新媒体艺术;共生性;大众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5.015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5-0076-05

## 一、线上展览的存在方式与社会诉求

看展览是否一定要到现场,线上展览有怎样的功能和前景,本就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一个话题。受新冠疫情与防疫需要的客观影响,这一话题,更成了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行业,以及画廊、会展等市场展览业当下的亟务和热点。显然,线上展览不仅可免于人群扎堆聚集,而且不受时空限制,可以灵活运用跨媒介、多媒体方式,全面展示、记录和存档艺术家的作品或艺术文创产品,从而成为功能多维的数据库。当然,一个优秀的线上展览,不仅同样需要扎实的研究、策划和图像文本整理等基础性的工作,而且也离不开强大的数字化应用技术的支持。

### (一)线上展览的存在条件

线上展览简称“线展”。线展的发生和存在不是偶然的,而是需要必要的条件,简要讲,有以下四点:

1. 可视化、感性化数字科技的发展成熟,奠定了线展的基础。在硬件方面,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以视屏电脑为基础,包括数字电视机、视频音乐播放器、手机媒体、数字杂志、数字报纸、移动电视等多样

化电子终端设备和媒体形式的普及;二是与之相应的应用网络传输技术,5G技术、大数据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高新信息技术体系的支撑。

2. 与线展适配的应用软件与交互技术的繁荣和丰富。不断发展成熟的硬件技术,为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可视化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从各个方面促进了日趋还原现实的线上展示、传播乃至交易活动的维度和广度。目前,市场上已有大量专业的线展应用程序。例如,手机端的各类艺术展览类App,艺术头条,VART雅昌艺术,观箴云简,在艺,开眼,以及IMUSEUM,DAILYART等等,同时还有可供人们分享交流的社交类App,抖音,微信,微博,Facebook,Instagram等等。此外,还有类如平行展线,苦瓜科技,知了云展,波谱,百度VR等等专业的线展策划与制作团队提供服务。

3. 有关新媒体艺术人才的产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我国高校开始不断开设和普及有关新媒体的课程和专业,培养了越来越多的专业技术人才。作为最具发展前景的专业之一,目前被无数考生选择,这为线展设计乃至展览本身的艺术

收稿日期:2021-07-10

作者简介:王玉君(1997—),女,内蒙古包头人,集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综合材料与跨媒体。

通信作者:程原(1961—),男,河南郑州人,集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艺术学,E-mail:ye-fu618@126.com。

化,以及展览艺术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可能。

4. 从更广的视野看,以计算机为媒介、作为一种特定创作形式存在的新媒体艺术,也为线展提供了支持。我们知道,20世纪6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使电脑计算机成为艺术家们日益广泛使用的一种创作表现形式。至80年代始,数字技术发展出的计算机图形学,不仅为现代艺术设计提供了尖端的视觉表现形式,而且使得数字技术快速融入视觉艺术各领域的同时,既令新媒体艺术颇具设计性,也令现代设计颇具艺术性,以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且和而不同的新格局。

综合看,这四个条件,同时也是线展从硬件到软件、从技术到人文的相因相生的四个要素。因为社会、人文需要,在人性化和易用性上,反过来始终作用着软硬件技术发展目标和价值取向。这四个要素,也在更高的和发展的艺术学概念上,进一步构成了展览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形式存在的“展览艺术”的线上发展的可能。

## (二)线上展览的存在方式

目前线展的存在方式有三类:大众化、市场化的形式;比较高端的专业化形式;更加前沿、更加艺术的3D化形式。

大众化的形式主要都是存贮于移动终端,受众通过所使用的移动通信设备进行观看。虽然在此当中,受众可以在软件商店中获得很多专业的线展类App,从而链接艺术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微博、抖音账号的线展观看,也可以通过具有消息传播、信息发布、商品售卖等多种功能的微信公众平台观看。但是,对受众个体而言,前者孤立、零散和对终端内存空间的消耗,以及后者呈现形式的单一的缺陷,是这类展览形式的不足之处。因为线展既不应是资料的堆砌,也不应仅仅是二维化的文本形式。

比较高端的专业化形式,这里特指依托技术团队创办的虚拟数字展厅。作为目前线展的一种主要存在方式或表现形式,主要被具有一定资金能力的各大博物馆或美术馆所采用。如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网上展厅模块当中,通过“云展览”形式,能够将文字讲解与AI语音结合,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身临其境地认识和体验世界艺术珍藏。显然,高新技术的使用,不仅使得时空得以缩放,令人们不出国门即可享受世界各大博物馆的名展,而且也让博物馆能够无时限地向社会提供艺术大餐。当然,伴随这种形式出现的流速卡顿带来的体验不畅现象,使得对展览设计制作的创意能力投入极大,而且也对受众所使用的电子设备、网络环境有着极高的要求。

所谓更加前沿、更加艺术的3D化线展形式,实际就是正在不断融合新媒体艺术的3D虚拟技术艺术化的线展。例如ARTech的《永生》系列,即为最具发展前景的“裸眼3D”数字艺术展。该艺术家工作室通过采用二维码推介的方式,将艺术作品的文字简介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等传播媒介进行推广放送。其中,在公众号页面特别设计相关热键,以匹配“数字展览”页面;进而,在展陈设计中使用计算机影像数字技术,以形成沉浸式体验和交互热点。从而在全面的技术提升中对“云展览”宣传的同时,首次成功地将《永生》系列裸眼3D数字艺术展,分别带入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和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以近乎教科书的典范性,展现了其“艺术×科技×空间×品牌”的“策展型空间+数字品牌营销”的全新概念。

## (三)线上展览的社会诉求

对于线展,社会诉求是多方面的。现实看,存在两大类:一类是正在发展的常态性的,一类是非常态应时性的。两者又具有统一性。

所谓常态性需要,是指在社会成本、生活方式等方面,更加切合快节奏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消费一般诉求和取向的类型。这方面是历史趋势的、基本的和稳定的需要,也是日趋主流的要求。快节奏的生活现实,使人们一方面更需要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又没有更多时间或是极少可能跨地区去博物馆、展览会。作为社会文化生活的新途径、新方式,线展的出现,有效节约了人们参观展览的路途时间,节省了大部分的门票费用,同时能够让更多人有机会走进博物馆、美术馆去接触艺术作品。线展的发展是艺术平民化、大众化过程中的重要体现。

所谓非常态应时性需要,比如当今现实就是面对新冠病毒,在做到防疫的同时,还要满足正常的社会文化生活需要。毫无疑问,人们足不出户观看线展,对防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疫情暴发以来,各类线展呈现爆炸式的增长不是偶然的。但同时,这在客观上又进一步促进了满足人们日常和长远需要的线展建设和发展。事实上,疫情防控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常态化趋势。

综合看,目前人们的消费心理与选择已经日趋网络化,这使得线上消费的优势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过程中逐步显现,这既要保证消费环境的安全性,也要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其中包括线展延伸出的在线艺术教育活动的热点,也反映出了线展的社会诉求,在应时性中,更多的培养、融合激发了常态化的社会需要和发展

要求。

## 二、新媒体艺术对线上展览的支持和作用

新媒体艺术不仅可以实现线展内容的视觉优化、传播效率的提升,同时,其强大的链接作用,还能够更好地促进线上线下的融合,提升和发展线展的品质。

### (一)新媒体艺术对线展内容呈现的创新作用

新媒体艺术对于线展的创新作用很多。简单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受众群体的感官与交互体验方面的创新;二是针对艺术家的新媒体创作手法而言。

首先,新媒体艺术所运用的数字新媒体技术,能够提升受众的整体观感与交互体验感。一般而言,所谓线展,通常是将线下的实物转移至线上的虚拟空间加以展示。这需要通过一系列交互设计来达到与受众的沟通与交流,也需要数字化的、更讲究以各种物质肌理、实体质感等逼真效果为能事的新媒体艺术技能和作品的支持。例如,在各大艺术展上,App 都借助 VR 推动了看展的热潮,而 VR 最大的特点就是交互性。这一特点,让这种新的艺术媒介形式更具亲和力,这种亲和力令作品与观众的距离消除了很多,从而也让线展的整体设计更为清晰直观,能够让观众从多角度了解作品的内容,丰富并深入感受作品的艺术语言。<sup>[1]</sup>

其次,新媒体艺术当中所涉及的虚拟技术,能够全面调动观者的多方面感官,从而从背景到空间,让观者产生身临其境的语境感、在场感。同时,创作者们的各种媒体形式的技术运用和艺术手法,让作品展陈乃至整个展览形态,变得更加多样化和艺术化,从而能够给欣赏者带来更加丰富的感官刺激,并且也让科技与艺术实现不同领域间的多元融合与发展。

综合看,作为科技与艺术互动互化、从而更具创新活力的新媒体艺术,具有一种积极的消解性。这种消解性,通过“消解着传统媒体之间的边界,也消解着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的边界,消解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边界”<sup>[2]</sup>等方式,体现为自身的创造性和建构性,由此推动信息环境、社会环境的逐渐演进和递升。

### (二)新媒体艺术对线展传播和用户扩展的影响

1. 新媒体艺术使得线展的传播方式更加数字化。在新媒体时代,艺术传播活动以媒介的迅猛发展为基础,令艺术交往活动不仅更加具有互动性,而且呈现出大众化、多元化和交叉性的传播特点。线

展的传播与用户扩展,同样依赖并同步于网络互动技术的发展。在数字技术和新媒体技术不断推进下,目前人们已经打破了传统的时空局限,通过物联网无限制地提供艺术咨询。

2. 新媒体艺术提高了线展内容传播的普及程度。目前线展主要是以“云演”“云直播”等新兴传播模式进行。这种艺术传播方式的网络化,提升了艺术的普惠性,让大众通过网络化形式更好地了解艺术、感受艺术。这种对艺术的门槛消减,启发带动整个社会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同时,这种以人机协作为载体的艺术生产,使得美术、音乐、影视、文学等艺术不再深藏象牙塔内,普通大众都可以借助网络平台进行展播,由此建构起艺术传播的新形势、新氛围。

3. 新媒体艺术正在激发新的线展交易方式。美术馆的数字化、新媒体化,使之仅通过一个系统,即可展现美术馆全部的信息和美术作品,令作品信息查询更为简易。人们可以足不出户随时了解美术馆的最新信息。人们只需通过微博、微信订阅号等日常信息渠道,随时随地进行艺术消费活动。

4. 新媒体艺术能够提高线展的经济价值与商业变现能力。新媒体艺术通过艺术形式的不断转换,拓展受众群体,进而有效提升艺术的覆盖率,使得艺术在网络媒体的催化下形成一种语言符号,并通过人际交往对于这种艺术化的语言符号不断更新与进化,更好地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传统的艺术符号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形成了新的结构形态与意义,这种符号在网络环境下具有更好的即时性、形象性与可视性,商业价值的附加也促进其经济价值的增长。

### (二)新媒体艺术对线展叙事语境的重构

就国际语境而言,展览作为一种广义的综合艺术创作和作品,令新媒体艺术对线展的叙事语境的重构,一方面作用于线展的策划、设计思维的重塑过程当中,另一方面对于线展的逻辑关系转化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可谓是艺术设计与艺术创作的融合。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一是在新的网络语境当中,要注意发挥新媒体艺术对线展各项功能的促进与整合的作用,打破策展的旧有思维,创新传播形式。这也有助于突破展览叙事的时序性思维,进而转化为共时性思维。随着在互联网技术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推动,艺术的大众化已经成为目前社会文化的主流趋势,因此,我们应有共时性的策展思维。就好比蓬皮杜艺术中心对于之前法国文化艺术体系的冲击,其采用了综

合性的组织架构,选择更为开放、可塑的空间,并鼓励跨学科、主题性等新颖的策展方式,力图打破不同学科的分界和社会等级的区隔与对立,以吸引不同背景的大众。

二是发挥新媒体艺术对线展本身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转位的助推作用。事实上,这也是从传统的以展品为中心,向以观者为中心的展览理念的转变。在线展的这种新特的逻辑关系中,依据从线上创意形式到观众的一切体验和感受,都依附于可选择、可互动的新媒体技术这一特点,不仅让观众成为观看的主体,而且还要让这种主体通过其兴趣点和体验等首要因素的考量,兑现为对大众提供切实的服务,从而促使艺术接受与消费的策展目的得以落实。

综合讲,新媒体艺术既是线展的艺术策划与设计要素,也是线展的艺术化的整体面貌。这种相辅相成与互动互化,不仅能够满足人们对“感官叙事”的渴求之心,同时也能够在沉默的作品背后和二维关系中,发掘出隐匿更深的内涵,创造出更多更高维度的精神享受。

### 三、线上展览与新媒体艺术之间关系的共生可持续性

就艺术媒介论而言,新媒体不只是一种新的设计媒介与效果的实现途径,同时,新媒体也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创作语媒而广受大众的喜爱。每年大量的新媒体艺术展览也备受追捧,在疫情影响下,新媒体艺术作品的展示也自然转移到线上,以至于与线展一道,形成了“新上加新”的交集合流与共生发展模式。

#### (一)线展本身作为一种新媒体艺术表现方式

苏珊·阿里特(Susan Acret)指出:“新媒介艺术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词,其主要特征是先进的技术语言在艺术作品中的使用,这些技术包括电脑、互联网及视频技术创造出的网上虚拟艺术、视像艺术以及多媒体互动装置和行为。”<sup>[2]</sup>所以,新媒体艺术既是线展实现的途径和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综合了现代媒介技术的跨学科的新艺术集成形式。例如,清华大学100周年校庆的新媒体灯光秀《大先生》,该作品在网络上有同步的线上展出,发挥了更大的价值,也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不妨这样说,新媒体艺术的艺术表达,需要借助线展的技术形式进行呈现和传播,而线展则通过新媒体艺术的积极作用而获得了更高更纯的艺术性。新媒体艺术与线展共同作为与数字技术相融合的产物,两者之间的连接、互动,使之获得了更多更新的

优势和特征。其中,新媒体艺术创作的技术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张力关系,及其在线上化的过程中,令技术难度的攻克与技术支持的重要性更为凸显,一些真实的感官体验的传达与实现,迫使线展艺术与技术的不断融合和提高,以致线展本身,既是艺术创作,也是艺术作品。

#### (二)线展中新媒体艺术的大众化发展

相对于传统艺术,新媒体艺术,特别是伴生于面向大众的网络线展的新媒体艺术,从其诞生起,就具有大众性。不仅线上展示的新媒体艺术以其互动性、便捷性、平民化等特点,大大促进了艺术大众化的过程,同时规模化、专业化的线展形式,则更是加速了这一趋势的发展。正因如此,线展中的新媒体艺术,其社会性功能也日益彰显。具体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新媒体艺术是艺术大众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全球化文化语境之下的产物。线展的互联网形式,极大地促进了其大众化的发展趋势。“随着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不知不觉中人们已进入了这样一个沟通环境:视觉形象、声音与文字、广播与传播、个人沟通与公共沟通,所有这些都融合成一个以数字媒体为基础的整体,从而形成一个以用户为中心的媒体环境。”<sup>[2]</sup>线展正是依赖这样的沟通环境而建立发展,因此线展本身具有牢固的大众基础,以此来促进新媒体艺术的大众化发展。

其二,新媒体艺术的发展,早已与数字化网络化的社会大众生活紧密相连。换句话说,新媒体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数字化、线上化的存在。就此现实形态和历史趋势看,它似乎已不仅仅是一门艺术,而是逐渐成为一种联系人与信息世界的最为基本而普遍的中介。作为当代文化与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界面,人们通过它来交流、学习和把握世界。而作为这一界面的专业化与优质化,线展的建立,同时也建立起一个虚拟的线上交流平台,所有的受众都可以在此相互探讨。可以说,新媒体艺术与线展的同构性,以及所共有的社会交互性,不仅改变了文化艺术的生态环境与传播形式,同时也构成了不同文化间相互交流的渠道和机制,从而促进社会大众与历史文明的碰撞、融会和提升,以致对人们的审美意识和艺术理想带来更加积极的深刻影响。

#### (三)线展中新媒体艺术的多样化发展与共生

新媒体艺术与线展的共生性,主要体现在:新媒体艺术的线上化发展、新媒体技术对个性化线展的支持,以及对艺术家的创作媒介的改变等方面的相互作用。

首先,在当今疫情防控的常态化趋势下,新媒体艺术的传播与发展极其需要依赖线展的方式与传播模式。事实上,目前比较受大众喜欢和追捧的,是一种沉浸式的新媒体艺术表达方式,这种方式能够很好地体现新媒体的感官性与互动性。但是,将这种沉浸式的新媒体艺术转移到线上后,则会因技术局限而对这两种优质特性带来一定程度的损失。这也是目前科学技术亟需解决的问题。例如,一些有关嗅觉、触觉的作品,无法在线展中完全呈现出作品本身的特性。

其次,线展的形式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保持自身的个性。当然,展示空间由实体空间延展至数字化虚拟空间,同时也客观延伸出了线上线下各有特性且共生发展的问题。对于多感官沉浸式的艺术展现方式问题,一方面寄望于网络人工智能设备与技术的发展来不断解决,另一方面,在数字化新媒体跨界融合的趋势下,需要线展连接创作者与观众的心,通过艺术心理学支持的艺术与技术调动人的联觉与通感,努力弥补现实之不足。这对线展策划与设计,以及新媒体艺术创作者而言,就是要不断探索当代艺术形式的全新表达,给观众创造全新的观展体验。为此,线展还肩负着更多的艺术展示方式与资源开发的重任,而新媒体艺术,则无论是在功能层面还是在创作表达层面,也都面临着新的探索空间和可能。艺术最让人心动的魅力正在于此:它促进人类心灵的不断提升和精神的不断解放,并伴随人类的发展而发展。<sup>[3]</sup>

#### 四、结语

新媒体的艺术介入,新媒体艺术的线上化,以及

线上展览与新媒体艺术的艺术化融合与共生,引导着艺术从物质化到数字化、精神化、体验化的转变历程,向人们展示了更加丰富的艺术世界,也带给人们很多前所未有的新体验。在艺术走向大众化的道路上,新媒体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而线展在与新媒体艺术融合的同时,也在展览艺术化的进步发展过程中,不断促进新媒体艺术的进步和发展。这预示了新时代艺术发展的一种趋势,展现了现代大众对于鲜活生命力的价值取向。不止如此,在线上线下融合统一的趋势中,新媒体艺术更是其实现连接的关键因素。这样的实践机制和发展模式,对于艺术家、策展人,提出了要切实从观众的角度出发,做好线上线下融合、互化工作的新要求,并基于用户反馈信息和数据分析,整合多方渠道、融合多种媒介,通过新媒体艺术创作和线展设计,延长展览生命周期,以及超越性的视觉效果,令线上新媒体艺术与展览的互动与共生,合力推进线上线下艺术实现的新发展、新潮流。

#### 参考文献:

- [1] 刘蓓庆. 展事:现代艺术展览的潮流和策展的叙事逻辑[J]. 花城,2020(1).
- [2] 段似膺. 国内新媒体艺术研究综述[J]. 云梦学刊,2015(1).
- [3] 程原. 精神实践:一种相向文明的当代艺术观[N]. 中国美术报·学术月刊,2020-08-24(13).

(责任编辑 刘海燕)

## Analysis on the Symbiosis between Online Exhibition and New Media Art

WANG Yujun, CHENG Yuan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China)

**Abstract:** In the foreseeable post-epidemic era, online exhibitions are becoming a normalized cultural expression and social demand. The new media needs to be presented and disseminated by means of the technical form the line exhibitions, While new media art and online exhibition are jointly the product of the digital technology. Among them,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technicality and artistry of new media art creation, and in its online process, overcoming of technical difficulty and getting technical support is more prominent. Even online exhibition itself is not only an artistic creation, but also a work of art. This foretells a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rt in the new era, and also constitute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nd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symbiosis between the actual interac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Key words:** Online exhibition; new media art; symbiosis; popularization



# 《台湾民报》与鲁迅思想的传播

孙拥军,何亭龙

(河南理工大学 中文系,河南 焦作 454000)

**摘要:**《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受到日本的殖民统治,具有民族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不甘为奴,到祖国大陆求真知,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成就引介到台湾,尤其是将中国新文学奠基人鲁迅及其思想、精神传播到台湾后,对民众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鲁迅思想与精神的传播历程中,作为台湾新文学初创时期重要期刊《台湾民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大量刊载鲁迅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弘扬鲁迅“抗拒为奴”的反抗意识,对台湾民众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台湾新文学作家也继承起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融汇于文学创作中,启蒙大众,唤醒民众的自立精神,也推动了台湾新文学的诞生与发展,与祖国大陆新文学同根同源。

**关键词:**《台湾民报》;鲁迅思想;影响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5.016

**中图分类号:**G219.29;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5-0081-05

《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受到日本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1895—1945年,史称日据时期),殖民者在政治上强力镇压台湾民众的反抗运动与经济上疯狂掠夺的同时,在文化上更是极力推行同化政策,实施“殖民教育”“奴化教育”“愚民教育”,强制台湾人民接受日本文化,企图割断台湾民众与祖国大陆在精神上、情感上的联系,全力消除中华文化的一切影响,但这完全阻止不了台湾民众对于中华民族在思想深处的归属与认同。台湾具有民族良知的知识青年,渡过海峡,到祖国大陆求真知,将五四精神引介到台湾,与大陆学者一道发起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在台湾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开展进程中,《台湾民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媒介,将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髓传播到台湾,对台湾民众产生极大影响,尤其是鲁迅思想与鲁迅精神在台湾的传播,更赋予了台湾民众抵制侵略、不甘为奴的抗争精神。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提出“民主”“科学”的口号,汇集了众多的五四精英知识分子,发起新文化运动。1917年,这些五四激进的现代知识分子,又发起文学革命,反对文言,倡导白话,积极推动中国新文学的诞生与发展。1920年代初,具有民族良知与使命意识的台湾青年知识分子张我军、张深切、张秀哲、黄呈聪、黄朝琴、洪炎秋等人,相继渡过海峡,来到祖国大陆寻求新思想。受祖国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影响,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回台后,也仿效《青年杂志》创办了《台湾青年》(1923年改版为《台湾民报》),发起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让有民族使命感,敢于抗争的台湾文化精英聚集在刊物的周围,积极引介大陆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辉煌成就,将五四精神传播到台湾,对台湾新文学的诞生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而言,台湾的新文化运动是在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而发生的,二者之间

**收稿日期:**2021-07-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台湾新文学作家对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承接研究”(17YJC751034)

**作者简介:**孙拥军(1978—),男,河南夏邑人,文学博士,河南理工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鲁迅研究、港台文学研究。

有着内在的渊源关系。正如台湾新文学学者黄得时所说：“台湾……新文学运动，可说受到祖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很大。我们从当时所发行的许多杂志可以证明，同时在那个阶段，本地有好多人在北平念书，如洪炎秋、苏芎雨、苏绍文以及张我军、许乃昌等。他们写了很多文章在《台湾民报》发表，如张我军、苏芎雨等多位。可见台湾新文学运动，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很大。”<sup>[1]</sup>另一位台湾新文学的亲历者廖汉臣也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新的思想澎湃汹涌，台湾就是在这影响下展开了新文化运动。此外，促进这个运动的因素就是：祖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展开。”<sup>[2]</sup>学者刘洪林也在研究中呈现，“台湾的新文学运动，……本质上，它始终追求着‘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的倾向，也可以说：它是发源于中国新文学运动主流中的一个光荣的传统与灿烂的历史的支流”<sup>[3]</sup>。

在《台湾青年》的创办过程中，台湾诗人、民族运动的先驱林献堂（1881—1956）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毕生致力于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坚守民族本位意识，终生不穿和服，信守中华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坚持与日本殖民者进行不屈抗争。1914年12月，林献堂与台湾爱国人士先后成立同化会、台湾青年会等民族解放运动团体。1919年，又与蔡惠如等人成立启发会；1920年，又改为新民会，并担任会长；7月，新民会与台湾青年会仿效《新青年》杂志创办《台湾青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对《台湾青年》的创刊寄予较大的厚望，希冀它成为台湾新文学建设征程上的《新青年》，并题字“温故知新”。1921年10月，由林献堂发起，在台北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进行台湾社会改良，启蒙民众的思想，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与抗争意识，争取民族独立，抵制日本的殖民统治。翌年4月，为增强杂志的民族意识，将《台湾青年》更名为《台湾》。1923年4月15日，在对《台湾》杂志改版的基础上，创版《台湾民报》，由原来的半月刊改为旬刊。创办两年后，应民众的要求，又改为周刊，以扩大发行量与影响力。在《台湾民报》的创办过程中，台湾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张我军、台湾新文学的“奶母”赖和、台湾新文学先驱杨云萍等人，都参与到期刊的编辑工作，并以此为平台，撰写文章，弘扬民族意识，唤起台湾民众的爱国精神。正如《台湾民报》在“创刊词”中的声明：“我们处在今日的台湾社会，渴望平等，要求生存，实在非赶紧创设民众的言论机关，以助社会教育，并唤醒民生不可了。……所以这回新刊本报，专用平易的汉文，满载民众的知识，宗旨不外欲启发我

岛文化，振起同胞的元气，以谋台湾的幸福。”又在《增刊预告》中阐明办刊宗旨，“用平易的汉文，或是通俗白话，介绍世界的事情，批评时事，报道学界的动静，内外的经济，提倡文艺，指导社会，联络学校与家庭等”。

《台湾民报》，作为台湾新文学初创时期的重要期刊，创刊后积极倡导白话文，呼应大陆的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成为推动现代白话创作与传播大陆五四文学成就的重要期刊，对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同时，对台湾民众的思想与文化启蒙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始终坚持民族主义立场，用汉文出版，传播中华文化，抵制日本文化“同化”，并揭示殖民者的残暴统治，斥责总督府的种种苛政，反对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民众的歧视与不公待遇。<sup>[4][6]2</sup>

## 二

《台湾民报》创办之始，祖国大陆的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正在蓬勃开展，并已取得较大的成就。张我军、赖和、杨云萍等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也是通过《台湾民报》将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火种洒播在台湾，将五四新文学的发展经验借鉴于台湾新文坛，把海峡两岸的文学融合在一起，赋予台湾新文学与祖国大陆文学的同根同源。为推动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台湾民报》还积极介绍大陆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发展状况与辉煌成就，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在《台湾民报》创刊号和1卷2期上，就连载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提出者胡适的第一部现代戏剧《终身大事》；1卷3期又刊载了他所翻译的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1卷4期发表了时在上海读书的台湾青年许乃昌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文，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大陆新文学的理论与作家作品。2卷10期发表了另一台湾青年苏维霖的《廿年来的中国古文学及文学革命的略述》一文，该文章源于胡适的《中国50年来之文学》而写成的。后又连续六期刊载了蔡孝乾的长文《中国新文学概观》，以及刘梦玮、郭沫若、郑振铎等五四新文学作家的作品。由此而言，在大陆新文学的引介与传播上，起到至为重要的作用。

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文学革命的先行者，他对于中国新文化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上，也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无论他的理论倡导还是文学创作，都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以国民性批判为核心的“立人”思想，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毫无疑问,台湾学界对大陆五四新文学成就的引介与传播上,鲁迅及其创作是必不可少的,也必然会对台湾新文学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从现有的文献史料来看,最早在台湾介绍鲁迅作品的文章是台湾青年许乃昌在《台湾民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文(刊于1923年7月15日第1卷第4号,署名秀湖生),分别介绍了五四文学革命发起者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两篇针对旧文学的战斗檄文,以及鲁迅、王统照、冰心等作家的概况与文学创作。随后,其他台湾进步报刊,也相继刊载鲁迅的作品,传播鲁迅思想与精神。

《台湾民报》对于鲁迅及其作品的引介尤为重视,突出鲁迅在五四文坛的重要地位,扩大鲁迅在台湾的影响。从1925年起,相继刊载了的鲁迅作品有:

《鸭的喜剧》(第41期,1925年1月1日);

《故乡》(连载于第51、52期,1925年4月1日、4月2日);

《牺牲》(第53期,1925年5月1日);

《狂人日记》(连载于第55、56期,1925年5月21日、6月1日);

《鱼的悲哀》(爱罗先珂的作品与说明)(第57期,1925年6月11日);

《狭的笼》(商务印书馆《爱罗先珂童话集》)(连载于第69、73期,1925年9月6日、10月4日);

《阿Q正传》(连载于第81、85、87、88、91期,1925年11月29日、1925年12月6日、1925年12月13日、1925年12月21日、1926年2月7日);

《杂感》(第292期,1929年12月22日);

《高老夫子》(第307、309期,1930年4月5日、4月19日)。

从《台湾民报》刊载的有关鲁迅的作品情况来看,可谓深思熟虑,匠心独具,不仅作品数量多,而且涉及鲁迅创作的多个层面,既有其创作的新文学白话文作品,又有他翻译的外国文学家的作品;既有他的小说作品,也有杂文作品。同时,也可以看出《台湾民报》对于鲁迅作品的选择非常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这些作品最大的特征就是集中体现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在《台湾民报》上连载的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故乡》《阿Q正传》《高老夫子》

等,前三篇出自小说集《呐喊》,后一篇选自小说集《彷徨》。《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新青年》(4卷5号),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这篇小说之于中国新文学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故乡》是鲁迅1921年创作的小说,最初发表于《新青年》(9卷1号),不仅是他创作的第一篇现代乡土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乡土文学作品,鲁迅由此也成为现代乡土小说这一文学流派的肇始者。《阿Q正传》是鲁迅创作的唯一中篇小说,创作于1921年12月,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这部小说最集中地体现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对于愚弱民众备受封建制度的毒害而不觉醒的麻木思想与精神状态,充满愤懑之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也正是鲁迅“抗拒为奴”“不甘为奴”思想的体现。

另外,张我军在编辑《台湾民报》时,发表《台湾新文学应该读什么书》一文,向台湾民众较为细致地推介大陆新文学作品,将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列为必读书目的首位,以扩大鲁迅在台湾的影响。

鲁迅及其作品在台湾的传播,受到民众的全面关注与接受。台湾新文学作家刘大任曾回忆过当年所受到的鲁迅影响,他偶然间读到鲁迅的一部作品,反复品味,以致兴奋了一个月。<sup>[5]</sup>另一位新文学作家郑鸿生在就读于台南第一高级中学时,在老师那里借到手抄本《阿Q正传》,如获至宝,废寝忘食地阅读。<sup>[6]</sup>台湾新文学的先驱作家杨云萍也谈到,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等作品,都被当时的青年所喜爱,对青年人的影响也最大。<sup>[7]</sup>由此可见,鲁迅及其作品,由《台湾民报》刊载、传播后,对台湾新民众的影响至为深远。

受《台湾民报》的影响,《南音》等期刊在对大陆新文学以及鲁迅作品的引介与传播上,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931年秋,由台湾新文学作家赖和、郭秋生、叶荣钟、吴春霖、许文达、黄城等12人发起并成立南音社。翌年,创办文艺半月期刊《南音》,发表具有台湾乡土意识以及现实性、批判性较强的文学作品,对台湾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南音》也积极传播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尤其是鲁迅等其他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如鲁迅翻译的爱罗先珂的作品《池边》(第1卷第5号)以及《鲁迅自叙传略》、《俄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等作品,与《台湾民报》互为呼应,共同推动台湾新文学的发展。除《南音》外,随着其他一些进步的文学期刊的相继创办,如《台湾文学》《台湾战线》《洪水报》《晓钟》《明日》《赤道》等,这

些期刊都以爱国主义为基调,激发台湾民众的爱国热情,重铸民族的自信心,以推动台湾新文学的快速发展,紧紧与大陆新文学接轨与融合,强化对祖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 三

在日本殖民时代下,台湾民众面临着比大陆更为艰巨的民族使命,反封建的任务依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如何用现代理念去启蒙与拯救民众,唤醒被封建礼教纲常桎梏与束缚的麻木灵魂,必将是台湾现代知识分子难以回避的课题,而更为重要的是反抗日本殖民者政治统治、经济侵略与文化“同化”,凝聚民族意识,弘扬民族精神,承续中华文化传统,重铸民众不屈的抗争精神,这也是台湾民众共同的心声。台湾的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既要反对封建旧文学、旧思想、旧道德的影响,又要面临着反封、反帝、反殖的多重历史使命,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具有民族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不甘为奴,致力建构台湾新文学的中华民族立场,认同民族文化与民族历史,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克除民众思想与精神上的陋习与陋病,成为精神与肉体均健全的国民,去反抗殖民统治,驱除殖民者,尽早取得民族解放,回归祖国。

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台湾迫切需要的是强化民族意识,凝聚反抗侵略、抵制压迫的民族精神。因而,同为炎黄子孙的台湾新文学现代知识分子们,与鲁迅有着一种天然的内在契合,他们从五四新文化传统的视境中选择接受鲁迅思想与鲁迅精神,也自始至终地与鲁迅创作所表现出的同情弱者反抗强权的人道主义精神,完全同步。

鲁迅,毕其一生致力于国民性批判,与封建纲常礼教进行着毫不妥协的不懈斗争,以人道主义为武器,去拯救愚弱国民的灵魂。鲁迅的创作在思想内涵、艺术形式上都具有新的开创性,而且他更为关注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宗法制社会下乡土中国的社会现实,以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敏锐视角对底层民众的生命状态,进行理性思索和审美批判,唤醒麻木民众的觉醒,激发他们的抗争精神。而在日据时期的台湾,鲁迅的思想、创作理念及其国民性批判思想所融合的“抗拒为奴”精神,被台湾新文学作家所继承与延续,将这一精神与时代主题、民族责任、历史使命以及自我的忧患意识、文人情怀相结合,以唤醒愚昧麻木的台湾民众自觉与自省,激起民众的反抗意识,抗拒殖民,抵制侵略,寻求民族解放,认同民族文化与民族历史,增强历史使命感与归属感。

同时,《台湾民报》对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成就的引介,尤其是对于鲁迅及其国民性批判思想的传播,也获得台湾知识界的普遍接受与认可,给台湾民众的反殖民化、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以最大的精神鼓舞。正如台湾新文学作家杨逵所说,在鲁迅的影响下,用文学作品去讲述台湾民众的血泪生活,揭露殖民者的残暴统治,必然是台湾新文学作家最关注的主题,也必然是台湾新文学作家共同的心声。<sup>[8]</sup>由此而言,台湾新文学作家对于鲁迅思想与精神的承续,倚重的是鲁迅的反抗意识、民族正义感与反帝反殖反封建的精神以及“抗拒为奴”的思想精髓,他们要借鲁迅资源获得精神力量,这正是台湾民众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最迫切需要的这种“抗拒为奴”的斗争精神,“他们是带着被殖民化的记忆,以一种反抗奴隶的自由的心,自觉地呼应了鲁迅的传统”<sup>[9]</sup>。台湾新文学作家在反封建礼教、反抗殖民统治的层面接受鲁迅,其“抗拒为奴”的思想给予赖和、杨逵、吴浊流等新文学作家以内在力量和精神支持。从这一层面来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已经被台湾新文学作家作为精神武器,揭示与疗救数千年的封建思想给民众精神与肉体带来的创伤,更重要的是暴露日本殖民者的残暴统治,以唤醒民族的自立意识与反抗意识,即站在五四精神的立场上,对封建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展现国民的麻木心态与苦难历程;站在反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对殖民者的虚伪与残暴进行无情揭示,以凝聚民族精神,展现中华民族“抗拒为奴”的不屈灵魂。

在鲁迅的影响下,台湾新文学作家的创作“走的也是一条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继承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汲取外国文学的有益营养,以客观写实的笔调,将日据时期台湾下层人们的不幸和上流社会的堕落生动地描写了出来,显示出其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在台湾新文学的发展途中拓开了一条现实主义的大道”<sup>[10]</sup>。台湾的新文学创作诚然如此,在台湾的新文学发展史上,赖和、杨逵、吴浊流、吕赫若、杨云萍、杨守愚、龙瑛宗、张文环等新文学作家,都主动承续起鲁迅思想及其创作理念,将“抗拒为奴”的精神融会在作品的字里行间,让台湾民众在阅读作品时,潜移默化间延续了这一精神。如被誉为“台湾的鲁迅”的新文学作家赖和,曾在大陆行医,虽然从未与鲁迅谋面,但在文学创作上就深受鲁迅的影响,他发表于《台湾民报》上的小说《斗闹热》(第86号,1926年1月1日)、《一杆秤仔》(第92、93号,1926年2月14日)、《不如意的过年》(第189号,1928年1月1日)、《蛇先生》(第294、

295、296号,1930年1月1日、11日、18日)等小说作品,无时不闪现着鲁迅的思想与精神,既体现反封建的课题,又凸显出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抗侵略的新内涵,将日本殖民者的凶残、贪婪、狡诈、虚伪的丑恶行径展示得淋漓尽致,为台湾新文学竖起了一面反封、反帝、反殖的旗帜,奠定了台湾新文学小说创作的社会写实方向。<sup>[11]</sup>

从上述探究可知,鲁迅及其思想、精神在台湾的传播,《台湾民报》确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台湾新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创作的开展,并构架起海峡两岸新文学间的桥梁,二者一脉相承,同根同源。《台湾民报》在日据时期的台湾具有不可替代的使命价值与特殊意义,它的存在为其他报刊树立了典范,虽然处于日本殖民者的高压统治下,但仍坚持民族主义的立场,为台湾民众争取民族独立、反抗殖民侵略,鼓舞呼喊。同时,它聚集了具有民族良知、敢为民族自由解放代言的作家群体,为他们的文学活动提供了文艺载体。台湾新文学作家叶荣钟曾给予《台湾民报》较为客观的评价:一是在大陆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下,将现代白话文引介到台湾,推动了台湾新文学的诞生与发展;二是让台湾现代知识分子认同与接受五四传统,在思想、情感上摒弃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主动回归中华文化,弘扬民族意识,在台湾民族运动上的意义非常重大。<sup>[4]612</sup>其实,《台湾民报》最为重要的价值,就是让鲁迅的思想、

精神在日据时期的台湾得以传播与弘扬,并赋予了新的内涵,鼓舞了台湾民众反封、反帝、反殖的决心和信心,也深化了鲁迅在台湾新文学史上的影响力。

#### 参考文献:

- [1] 黄得时. 传下这把香火:“光复前台湾文学”座谈会[N]. 联合报副刊,1978-10-22.
- [2] 廖汉臣. 北部新文学、新剧运动座谈会[J]. 台北文物, 1954(2).
- [3] 刘洪林. 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风貌[M]. 北京:台海出版社,2005:34.
- [4] 叶荣钟. 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M]. 台中:台湾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612.
- [5] 刘大任. 普庆戏院[N]. 联合报,2000-04-13.
- [6] 郑鸿生. 青春之歌[M].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80.
- [7] 杨云萍. 纪念鲁迅[J]. 台湾文化,1946(2).
- [8] 杨逵. 台湾文学对抗日运动的影响:十一年前一项文艺座谈会上的书面意见[J]. 文季,1996(5).
- [9] 鲁迅博物馆编. 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C].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202.
- [10] 杨剑龙. 文学奶母与台湾鲁迅:论鲁迅对赖和小说的影响[J]. 上海鲁迅研究,2013(2).
- [11] 钟肇政. 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第1卷)[M]. 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121.

(责任编辑 吕志远)

## *The Taiwan Minpao and the Spread of Lu Xun's Thoughts*

SUN Yongjun, HE Tinglo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Law,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Henan 454000,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 Taiwan was under the colonial rule of Japan. Modern intellectuals with national conscience, unwilling to be slaves, crossed the strait to seek real knowledg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and introduce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to Taiwan, which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literature in Taiwan. Especially as the founder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Lu Xun and his thoughts, spirit spread to Taiwan,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people.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spread of the Lu Xun thought and spirit, as an important journal start-up period of *The Taiwan Minpao* play a crucial role, not only a large number of published works of Lu Xun, more important is to carry forward “resist for slave” by Lu Xun rebellion consciousness, people against colonial rule in Taiwan, has important influence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at the same time, Taiwan's new literary writers also inherited Lu Xun's critical thought of national character and integrated it into literary creation to enlighten the masses and awaken their spirit of self-reliance, which also promoted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s new literature and the new literature in Chinese Mainland.

**Key words:** *The Taiwan Minpao*; Lu Xun; impact

# 电视媒体信息无障碍传播供给研究

白瑞霞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特殊教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当前电视无障碍信息供给主要呈现出荧屏字幕信息日渐丰富、手语栏目如雨后春笋的良好发展趋势,但仍存在字幕信息缺乏完整性、手语节目看得费神费力等不尽如人意现象。提出加强电视媒体的信息无障碍建设顶层设计应精准施策、运营商应研发新技术、制作方应选用合格手语译员和打造听障者专属栏目等建议。

**关键词:**电视媒体;听障者;字幕;手语;信息无障碍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5.017

**中图分类号:**D669.69;G2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5-0086-04

## 一、问题的提出

“无障碍”理念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意为发展中没有阻碍,活动顺利进行,旨在倡导残障者拥有平等、便捷的生活权益。信息无障碍的含义是“无论是健全人还是残疾人,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能够从信息技术中获益,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平等地、方便地获取信息、使用信息”<sup>[1]</sup>。自2012年国务院颁布《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以来,信息无障碍建设已经成为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重要评估指标。伴随着我国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听障者在平等参与社会生活中,获取信息和利用信息已经成为谋求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电视作为当今社会重要的信息传播载体,集声、光、电、图、文于一体,易受依赖视觉获取信息的听障者的青睐。我国现有残疾人总数8502万,其中听力残疾人数2054万<sup>[2]</sup>,是世界上听障人数最多的国家。伴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老年人听力下降人数在逐年递增,因此,关注听障群体获取电视信息的需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电视字幕和手语新闻为切入点,探究听障者获取电视媒体信息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

## 二、电视信息无障碍传播日渐丰富

### (一)荧屏字幕信息日渐丰富

电视传播的信息包括文字信息、图像信息和声音信息,其中,文字信息主要以字幕形式体现。字幕作为电视屏幕的表现符号之一,迄今已走过60年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来,电视事业蓬勃发展,电视语言日渐丰富,字幕不仅成为电视画面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已经成为电视节目不可或缺的信息源之一。电视字幕具有使受众获得完整信息和理解电视节目内容的作用。从中央电视台,到省市县各级电视台,所播栏目均呈现出多种字幕形式,如标题字幕、片头片尾字幕、角标字幕、解说字幕、滚动字幕、介绍性字幕等,这些已被电视受众了解和熟悉。而且,电视字幕的位置越来越规范,有些字幕已经成为电视屏幕中固定的组成部分。这些不同类型的可视字幕有利于听障者获取信息。值得一提的是,听障者喜欢收看的电视新闻节目中,字幕呈现的形式也是形式多样,主要有新闻主题、概述要点以及新闻背景介绍等等,有时还会在屏幕下方滚动播出最新发生的事件、节目预告等字幕信息。可以说,电视字幕在形式多元化的同时,信息量也在日渐丰富,较好地

收稿日期:2021-08-20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听障者信息无障碍需求的媒介生态研究”(2020BJY036);河南省教师教育课程改革重点项目“融合教育背景下特教专业本科生教学能力培养研究”(2021-JSJYZD-060);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改重点课题“高等学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以《手语基础:跟着聋人学手语》为例”(ZGJG2019013A)

**作者简介:**白瑞霞(1968—),女,河南新郑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特殊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聋人特殊教育、手语翻译。

满足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听障群体的信息需要。

## (二) 手语栏目如雨后春笋

手语是大多数听障者的第一语言,是听障者平等参与社会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架起听障者获取主流社会信息的语言桥梁。1984年,广东电视台在国内率先开办了手语节目<sup>[3]</sup>。2010年,省级、地市级电视手语栏目分别为29个、161个;至2020年,省级、地市级电视台手语栏目分别增加了5个、106个<sup>[2]</sup>,也就是说十年间,省级、地市级电视手语栏目共增加了36.9%,算是迈出了一大步。

在这些电视手语栏目中,有的是日播,每天固定时间播出,如中央电视台于2011年在CCTV13开办的《共同关注》栏目,每天播出手语新闻1小时;北京卫视播出《新闻手语》,每天10分钟;河南电视台《手语新闻》分上午版和下午版,时长各15分钟;青海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1时间生活》,是中国第一档生活服务类手语电视节目,每天30分钟。多数电视台是周播,如南京市栖霞区残疾人联合会与栖霞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手语新闻节目《小芮说新闻》,每周六30分钟;佛山电视台纪实类栏目《经历》(手语版)每周六播出,时长25分钟;郑州电视台手语新闻栏目《新闻360》,每周二播出,时长20分钟。除了为听障群体设置专门的手语栏目外,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开幕式以及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2020年全国两会开幕式均配有手语译员。2020年2月4日,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率先配备手语译员,2月8日,天津市新闻发布会直播,2月10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均首次配备手语译员。可以说,电视屏幕中出现手语译员,为听障群体及时了解各种资讯提供了便利,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听障群体的关怀。

## 三、电视无障碍信息传播主要存在的问题

### (一) 字幕信息缺少完整性

长期以来,字幕工程一直是信息无障碍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电视字幕信息仍然是信息无障碍建设的短板与不足。以公信力强和受众面广的CCTV1综合频道2021年7月13日全天节目为例,笔者统计当天各个时段节目的实时字幕(实时字幕即节目中的所有语音转换为文字信息),统计方法以“分钟”为单位,时长30秒~60秒计1分钟,不足30秒则忽略不计,广告除外。统计结果显示,这一天实时字幕占比最高的是电视剧和纪录片(如航拍中国第三季、美术经典中的党史),实时字幕接近100%;《今日说法》和《经典咏流传第四季》实时字

幕占比分别是96.6%和92.3%;新闻类节目(如新闻联播、晚间新闻、朝闻天下、新闻30分)实时字幕为12.3%,动画片《猪猪侠之恐龙日记第二季》《人与自然》《天气预报》等节目基本无实时字幕。这一天所有语音实时字幕占比为64.1%。

当前,电视节目字幕信息的不完整性,导致听障者看电视困难重重。电视制作方偏爱处于强势地位的健听受众,忽视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听障受众。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应全方位地满足所有社会大众的信息需求,而实际情况是“表面的自由选择掩盖了隐含的不自由,造成公共信息平台的倾斜”<sup>[4]</sup>。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就出现了专为听障者打造的电视听障者字幕,不仅将口头语言转录为字幕,还包括将电话铃声、睡觉鼾声、高跟鞋声音等特殊声音信息转录为文字符号的描述<sup>[5]</sup>。我国电视业发展提升的空间还很大。

### (二) 手语节目形式和内容有待完善

#### 1. 手语译员画面偏小

关于信息无障碍建设,早在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五章“文化生活”部分就专门提出“开办电视手语节目”。2012年颁布实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进一步指出“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电视台应当创造条件”“每周播放至少一次配播手语的新闻节目”。当前,手语栏目已覆盖到中央、省、地市、县四级电视台。电视台在制作手语节目时,习惯于从健听人的视角主导手语节目制作的话语权,由于健听人大多不了解聋人文化,在制作节目时,单方面认为听障者听不到声音信息,只要在电视节目中加上手语即可,但是却忽视了听障受众的收视体验和心理满足。实际情况是播音员占了大半个屏幕,手语译员仅占了屏幕的十二分之一,屈居在电视屏幕的一隅。囿于新闻节目播音员过快的语速,手语译员打手势的频率加快以及遗漏部分信息,让听障者看得费时、费眼、费力<sup>[6]</sup>。致使手语栏目收视率较低,似有“形象工程”之嫌。这一现象也引起了人大代表的关注,建议“多增加手语翻译类节目和提高手语视频画面的占比,便于有听障的人准确收看新闻,掌握信息”<sup>[7]</sup>。

#### 2. 手语准确率不高

大多数听障者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就是手语。手语包括手形、位置、朝向、动作和非手控特征(面部表情、姿态)等要素。中央电视台和省、市、区、县级电视台设置的手语栏目主要以手语新闻为主。冉美华早在1998年的一项调查中显示,被调查的听障者中,78.89%只能理解手语新闻中不足60%的手语,

并且很多听障者反映对手语新闻中的手语一知半解,甚至什么都看懂,主要存在语速过快、译员使用手势汉语、译员屏幕偏小以及上衣颜色浅等问题<sup>[8]</sup>。时隔20年,肖晓燕等对电视手语的收视调查数据显示,有84.8%的听障者表示仅能看懂一半甚至更少的节目内容。问题表现在:译员缺少表情、屏幕太小、译员采用手语与汉语词一一对应的手势汉语、速度太快、内容太难等。<sup>[9]</sup>

笔者任选 CCTV1《共同关注》栏目的20个新闻短视频,让84位听障大学生现场观看手语新闻(观看时遮挡所有字幕信息,保留新闻画面和手语画面),依据视频内容回答问题,以百分制计算。从现场测试发现,很多听障生的答案与原新闻内容大相径庭,有的甚至无言以对。得分最低5分,最高62分,平均26.98分。分析主要原因,一是漏译,播音员的语速过快(250字/分钟左右),手语译员为了与播音员的语速同步,使用了省略策略,但省略了不应该省略的内容。二是误译,译员打出的手语不准确。如“一辆满载着货物的大卡车撞破了防护栏”这句话,遗漏了“一辆满载着货物”,另把“大卡车”翻译成了“汽车”的手势(图1),结果导致80%的听障学生看不懂译员的手语,这就意味着译员传递的信息受众无法理解,无法满足听障个体对媒介的需要。三是使用了较多的手势汉语(即源语言汉语与目的语手语一一对应),没有遵循视觉语言手语的表达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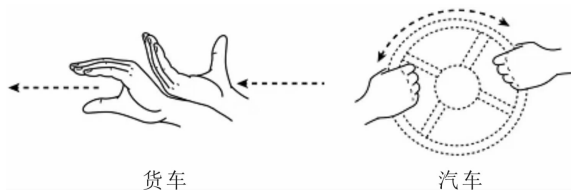


图1

#### 四、电视信息无障碍建设供给路径

##### (一)顶层设计应精准施策

制度保障是推进电视信息无障碍建设的源动力。近年来,国家出台的多项法律法规均提到了信息无障碍建设,但细推敲却不难发现,均是宏观指导。如2016年,国务院颁布的《“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中提出“鼓励省(区、市)、市(地)电视台开设手语栏目,逐步推进影视剧和电视节目加配字幕”;2018年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提出“推进电视栏目、影视作品加配字幕、解说”。很多重要的文件中提到的多是“鼓励”“逐步”“推进”等字眼。这些用语较为宽泛,没有目标和责任,没有完成的时间期限,没有监管部门。这种模糊用语,直接导致电视制作方执行

效率降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国和美国等国家做法可资借鉴。1996年美国《电讯法》明确规定成立字幕管理局,并要求必须在该法案通过18个月,美国所有电视节目都要打上或补上闭路字幕。2003年,英国颁布的《通讯法》中明文规定,到2010年,BBC所有频道播出的节目字幕覆盖率必须达到100%,同时还规定BBC播出的手语节目必须达到所有节目总量的5%,如果电视台没有达到要求,将受到严厉处罚<sup>[10]</sup>。电视无障碍信息建设是一项公益事业,结合我国国情和实际,除了政府的主导、监督和组织之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的环境下,还应承担起资金投入的责任。在确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同时,在政策条文中应明确电视信息无障碍方面的各项指标,如手语节目的制作频率、范围、时长和字幕的覆盖率以及字幕的量、出现位置、色彩和停留的时间等,便于有关部门在执行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社会的信息政策和信息法律应该‘符合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的最大利益’”<sup>[11]</sup>。

##### (二)运营商应研发新技术

当前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为电视媒体技术研发带来机遇与挑战。美国于1990年颁布的《电视译码电路法》要求3年内所有凡是美国出售的13英寸以上的电视机必须安装有内置闭路字幕译码器<sup>[10]</sup>。这一设置方便听障者收看电视节目。近几年,工信部在《移动通信无障碍技术要求》中,率先优化手机产品的无障碍设置,为听障者接受移动信息提供了便利。如一些电信运营商已把语音实时转换字幕功能运用到移动互联网,深受听障群体的欢迎。伴随着听障群体对电视信息无障碍的迫切需要,电视机的内置功能还需要进一步增加,如电视屏幕的手语译员框可根据受众偏好任意移动位置、译员形象可拉大与缩小,这些功能设置依靠电视制作方研发技术支持。内置新技术的电视机,使他们愿意买,买得起和用得好才是最终目的。在信息无障碍方面遵循信息转化、信息强化、操作便利的基本原则,逐步实现无障碍设施与无障碍信息服务的融合,缩小听障人与健听人的信息鸿沟,为他们获取电视信息方面赋能。

##### (三)严格选用合格手语译员

从当前电视台配备的手语译员来看,多数是聋校教师兼做电视手语译员,另有少数听障手语译员或专职听人手语译员。整体来看,多数听人手语译员的职业素养还没有达到“信、达、雅”的翻译能力,导致听障者不愿意看,不喜欢看。我国手语翻译职业起步较晚,至今已有十余年的时间,加强对手语译



员的培养、选拔和考核是当前和今后的主要任务和目标。电视台在选用手语译员时,应着重考核翻译员对手语的使用以及对手语翻译的认知等,而不仅仅认为会手语,面容姣好,就能完全胜任电视手语翻译工作。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手语翻译的遴选,优秀的听障者也应参与其中,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任用的手语译员需要进行及时的监督与考核,切实使选用的电视手语译员让听障群体满意。

#### (四) 打造听障者专属栏目

心理学上有一个“自己人效应”的概念,这一概念是指对“自己人”所说的话更信赖、更容易接受。聋人群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号“没有我们的决定不要做关于我们的事情”。有研究表明,聋人偏好于由聋人承担的手语翻译电视节目以及由聋人参与节目制作或聋人主导完成的电视节目<sup>[5]</sup>。如台湾公共电视台于2002年专门为听障者精心打造了一档“公视手语新闻”节目。每周一至周五播出半个小时,由三位听障者担任主持,主持人屏幕比例、视频字幕、手语使用均顾及听障者的心理需求,使听障人群产生亲切感和归属感<sup>[12]</sup>。南京栖霞电视台的《小芮说新闻》,大胆使用听障者做手语译员,并且手语译员占据屏幕约四分之一。电视是众多听障者喜欢的信息传播媒介,为了使更多的听障者能够收看到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内容,建议电视制作方积极创造条件,开发针对听障群体的公益性栏目,选用优秀的听障者和健听者共同组成制作团队。听障者参与到节目制作、编剧和主持当中,让他们发自内心地“讲好自己的故事”,让更多的听障者愿意收看“自己人”制作的节目。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收看电视节目,是听障者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

成部分,缩小和消除听障者获取信息的鸿沟,强化信息平权,营造和谐共生的美好环境,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媒体人、听障人士和研究者的协同配合,戮力前行。

#### 参考文献:

- [1] CAICT 中国信通院. 2019 中国信息无障碍发展白皮书 [EB/OL]. [https://max. book118. com/html/2019/0805/8014065136002040. shtml](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9/0805/8014065136002040.shtml).
- [2]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网. 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EB/OL]. [http://www. cdpf. org. cn/sjzx/tjgb/202004/t20200402\\_674393. shtml](http://www. cdpf. org. cn/sjzx/tjgb/202004/t20200402_674393.shtml).
- [3] 穆小林. 荧幕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记广东电视台聋人手语节目[J]. 中国残疾人,2000(4):4-6.
- [4] 樊葵. 当代信息传播中的传媒歧视[J]. 当代传媒,2003(5):51-53.
- [5] 李东晓. 听见看见:影视媒体的无障碍传播研究[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35-67.
- [6] 白瑞霞. 关注手语电视新闻 共促社会和谐发展[J]. 中州大学学报,2013(3):65-68.
- [7] 中新网. 两会声音全国人大代表石慧芬 [EB/OL]. <http://www. chinanews. com/edu/shipin/cns - d/2020/05 - 17/news856539. shtml>.
- [8] 冉美华. 手语新闻收视的调查与思考[J]. 中国残疾人,1998(1):11-13.
- [9] 肖晓燕. 高昕,赵肖. 中国大陆手语传译调查:现状、问题与前景[J]. 中国翻译,2018(6):66-71.
- [10] 邓彧. 手语翻译职业化:中美澳对比研究[C]. 福建省外国语文学学会年会论文,2011:1-18.
- [11] 邵培仁. 媒介生态学[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165.
- [12] 沈玉林. 台湾与大陆电视手语新闻的比较[J]. 现代特殊教育,2015:69-71.

(责任编辑 许峻)

## Research on the Barrier-free Dissemination Supply of TV Media Information

BAI Ruixia

(College of Special Edu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current TV accessibility information supply mainly presents a good development trend of increasingly rich screen caption information and sign language columns springing up.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unsatisfactory phenomena such as the lack of completeness of caption information and the laborious and laborious viewing of sign language program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top-level design of strengthening the 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 of television media should be accurately implemented, operators should develop new technologies, producers should select qualified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s and create exclusive columns for the hearing impaired.

**Key words:** TV media; hearing impaired; subtitles; sign language; 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

# 媒介视阈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传播的路径探究

窦飞月,李芳云

(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宁 272000)

**摘要:**话语媒介对话语传播实效性有着重要的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要依靠话语媒介来实现话语主客体之间的交流。在新时代背景下,话语媒介存在利用率不高、传统媒介的影响力度有待提升、互联网媒体的管控难度加大等问题,可以坚持丰富多样的原则,充分利用多元媒介;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创新使用传统媒介;坚持激浊扬清的原则,正确运用新兴媒体来有效传播群众工作话语这三个方面着手,打造密切联系群众的话语媒介,提高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传播实效。

**关键词:**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工作话语体系;话语媒介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5.018

**中图分类号:**D267;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5-0090-0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都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sup>[1]</sup>农村基层党组织属于行政的终端组织,建构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对强化党群沟通、做好农村群众工作有着重要意义。而话语媒介作为话语体系传播的重要工具,明确其内涵以及话语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究话语媒介的提升路径,对推进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传播实效具有重要意义。

## 一、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话语媒介界定

话语媒介是话语体系传播的重要载体,要想切实推进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传播,首先就要对话语媒介进行界定,明确其内涵及特征。

### (一)话语媒介的内涵分析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话语媒介是指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在传播群众工作话语

体系时所采用各种载体。话语媒介是影响话语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同样的话语选择不同的话语载体,获得的话语效果也会不同。

早在革命年代,党的群众话语主要依靠声音形态得以彰显。边远落后的乡村,语言成为维系家庭伦理、乡村规范、邻里秩序的主导性载体。<sup>[2]</sup>受农村群众知识水平的限制,书面文字作为传播载体收效甚微,语言凭借其灵活、便利的特点在传播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伴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改进以及农村扫盲运动的开展,党开展群众工作的话语载体也由口语表达扩展到了文字层面,党报党刊以及各种刊物纷纷发展起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收音机、电视的出现为党的群众语言带来新的载体形式。迈入新时代,新兴高科技技术发展迅猛,载体形式丰富多样,为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建构创造了有利条件。

### (二)话语媒介的特征分析

#### 1. 话语媒介具有多样性

进入新时代,农村的大众传媒呈现出多元化的

收稿日期:2021-04-21

基金项目:2017年度山东省社科规划专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选人用人思想研究”(17CZLJ18)

作者简介:窦飞月(1996—),女,山东德州人,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发展趋势,既包含广播、报纸等传统的载体形式,还拥有以网络为载体的新兴话语形式。全国行政村4G覆盖率超过98%,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明显提升。<sup>[3]</sup>随着县级融媒体建设的不断发展,农村的传统话语媒介不断转型升级,“两微一端”为代表的新兴话语媒介继续向前推进,农村的话语媒介形式更加多样、方式更加灵活多变。

## 2. 话语媒介具有中介性

话语媒介是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向农村群众传递相关方针、政策的话语桥梁。在新时代出现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语言是党和群众直接沟通的工具,还是各级党员干部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重要突破口。农村基层党组织可以利用话语媒介做好群众工作话语的传播工作,进一步推进农村群众工作的落实。

## 3. 话语媒介具有导向性

话语媒介作为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传播载体,对话语内容解释决定着话语体系的传播效果。新时代是农村群众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刻,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作为宣传动员群众的重要工具,更需要强化话语媒介的导向作用。

## 二、媒介视阈下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传播存在的问题

话语媒介是话语体系传播的主要工具,随着科技的进步,话语传播的形式越发多样。多元化的话语媒介虽然为话语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也使得话语媒介存在利用率不高、传统话语传播媒介影响力度有待提高、互联网媒体管控难度加大的问题。

### (一) 话语媒介利用率不高

第一,话语媒介的综合利用率不高,多种话语传播媒介缺乏整合。当前农村存在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多种媒介形式,但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对各种话语传播媒介并未充分利用。据鲁西南一村庄的调查显示:37.8%的村民群众依靠电视获取公共政策相关信息,34.4%是通过人际传播,11.7%是通过会议文件。<sup>[4]</sup>公共政策的传播还以电视为主要载体,话语传播媒介的更新速度不高。

第二,话语媒介运用不到位,存在娱乐化倾向。话语主体和话语客体通过话语载体来实现话语的转化,使得话语信息得以传递,话语载体运用是否得当关系到话语的传播效果。面对农村群众对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提升,对话语载体的管理力度不够,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等话语载体存在娱乐化的倾向,导

致群众工作话语在传播过程中实际效果不高,农村群众往往受到话语媒介所承载的其他娱乐性信息的影响。

第三,话语媒介存在一定的偏向性。“媒介话语体系中占强势地位的社会群体或集团间接地利用媒介而导致的媒介话语资源分布不均衡、媒介话语内容不平等的现象”<sup>[5]</sup>。其一,地域上的偏向性。在话语传播过程中,话语传播媒介多关注经济发达的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关注度不高,对个别地区存在偏见。例如,在话语传播过程中对河南就存在“多骗子”的固有印象。其二,性别上的偏向性。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话语载体存在着“重男轻女”等性别歧视,将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的对象多定义为男性农村群众,往往忽视农村中女性对话语的需求,女性群众处于弱势地位。其三,对农村群众存在刻板印象。农村群众在话语传播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对农村群众往往存在“无知”“浅薄”的印象,导致话语传播媒介对农村群众呈现出冷漠的态度,两者关系疏离化发展。

### (二) 传统媒介的影响力度有待提高

传统媒介是指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为代表的传播载体。传统媒介大多受到党的管制,是传达农村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主战场。在新时代面对互联网等新型话语传播媒介的冲击,传统话语媒介显现出传播的互动性不足、话语重复性高、发声具有滞后性等亟待整改的问题。

第一,传统话语传播媒介互动性不足,趣味性有待提高。像报纸、广播等传统话语媒介建构起单向的话语传播模式,往往采用“机关枪”的话语形式,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利用传统媒介来进行话语传播,实质上是话语主体对话语客体实行单方面的信息传递,话语客体成为话语的被动接受者,很少借助传统话语传播媒介来为自己发声,缺乏与话语主体的互动。同时,传统载体所运用的“灌输式”话语传递方式,也使得农村群众对农村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缺乏兴趣。

第二,传统话语媒介内容的重复性高,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多种传统话语媒介往往都会对同一方针或者文件政策进行宣传,但很少有话语媒介根据自己面向受众的特点,对宣传的内容进行二次加工,反而是对话语客体不做任何的区分,采取一套“官方话语”的固定模式。话语的重复性传播虽然能够使得宣传内容引发话语客体的重视,但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传统话语媒介资源的浪费。而且相同话语的反复性出现还会导致话语受众的视觉疲劳,降低话

语学习的积极性。

第三,话语传播在时间与空间受到限制,关键性事件的发声具有滞后性。传统话语载体一直以来是对重大新闻事件进行宣传的关键性媒介,例如报纸建立在视觉基础上,采用文字的形式来进行话语传播;广播主要利用听觉来进行话语传播;电视则将视觉与听觉结合起来,建构了动态的话语传播体系。但是随着新兴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传统话语载体的优势地位,传统话语载体往往按照一定的周期进行话语宣传,时效性有所不足。例如报纸、电视等话语媒介要等到下一个出版期或是播放期才能进行跟进式的播报,相对于互联网等新兴媒介发声的及时性,传统话语媒介的话语内容很容易“过时”。同时,相较于新兴媒体在话语传播空间上的广泛性,传统话语载体的话语传播场域主要是国内,在传播空间上受限。

### (三) 互联网媒体管控难度加大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那样,互联网快速发展,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深刻变化,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一系列新机遇新挑战。<sup>[6]</sup>新兴媒体是以互联网为依托的话语载体,为话语体系的建构带来一定便利条件,是话语主体和话语客体之间交流的“重要桥梁”。但进入新时代,互联网等新兴话语载体还存在覆盖率有待提升、话语传播随意化、非理性话语增多等问题。

第一,农村新兴传播媒体的覆盖率有待提升。根据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76.4%,农村地区则是52.3%,较2020年3月增长6.1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地区互联网的覆盖面扩展速度较快,但是与城镇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新兴话语载体的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

第二,话语权的泛化,话语传播随意化、碎片化。其一,在网络环境中虚假话语大量存在,话语的辨别难度增加。进入新时代,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石,党的新兴话语传播媒介形式不断增多,形成了以“三微一端”为代表的媒介体系,打破原先传统话语传播媒介所造成的“话语垄断”的局面,为广大农村群众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声平台。但是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由于自身的知识素养有所欠缺,对互联网等新兴话语媒介的掌控能力不足,对互联网媒介的运用还停留在简单环节。导致部分党员干部或者群众对话语媒介传播的内容不加辨别,容易受到虚假话语的引导。其二,新兴媒体导致话语信息碎片化。互联网等新兴媒介在话语传播过程中速度不断提升,导致话语内容呈现出碎片化的形式,观点呈现出分散化、

零散化的特点,话语的体系性有待增强。为了提高话语内容的吸引力,个别非主流媒介无视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完整性,断章取义地对话语内容展开宣传。

第三,非理性话语增多,群体性舆论增多。其一,情感话语增多,以互联网等媒体作为话语载体,肆意宣泄情感。“处在一种没有社会约束力的匿名状态,即便是失去了社会责任感与自我控制能力,也可以在‘法不责众’的心理支配下把自然的情绪宣泄变成本能的选择。”<sup>[7]</sup>其二,受从众心理的影响,引发的群体性“话语偏见”。话语客体受从众心理的影响在话语传播中存在“随大流”的话语表现。例如,部分群众在网络媒体上就农村自来水改造政策做出“花冤枉钱”的话语表达,也对其他农村群众产生影响,纷纷抵制自来水改造政策。

## 三、媒介视阈下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传播的路径

话语媒介对话语的实效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完善还要依靠各种媒介来实现话语主客体之间的交流,通过坚持丰富多样的原则,充分利用多元媒介;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创新使用传统媒介;坚持激浊扬清的原则,正确运用新兴媒体来有效传播群众工作话语。

### (一) 坚持丰富多样的原则,充分利用多元媒介

第一,促进新旧媒体的竞争融合,打好传统话语载体与新兴话语载体的“配合战”。促进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的融合式发展。其一,转变传统话语载体与新兴话语载体两者对立观念。要明确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两者在话语传播过程中绝不是“二选一”的单项选择题,可以通过两者配合为话语传播提供更大的发展平台。其二,激发传统话语媒介与新兴话语媒介良性互动。最原始的媒介是从口语、文字形式为依托,随着印刷技术、电力技术的发明,传统话语媒介形式扩大,为话语传播提供了便利的载体。传统传播媒介是以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存在的,例如报纸、广播、电视在话语传播形式上各有优劣,彼此互相补充。而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兴传播媒介则是听觉、视觉等方式的整合,弥补了传统话语媒介的缺点,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共生”局面,使传统传播媒介受到冲击。要在传统传播媒介与新兴传播媒介中营造良性竞争氛围,促使话语传播媒介实现融合发展。其三,加强媒体人才的培育,增强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对新兴媒介知识的学习,了解传统媒介的相关知识,为传播媒介的融合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第二,制定话语媒介的传播原则,规范话语传

播。其一,增强话语传播媒介的社会责任感,避免话语的娱乐化发展。避免传播媒介在话语传播过程中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一味迎合当前群众娱乐化的话语需求。其二,话语传播媒介要坚持真实性原则。防止传播媒介为博取关注而肆意修改事实情况,在话语表述中夸大情况甚至进行凭空捏造。话语传播媒介应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农村的发展情况以及农民的生活状况展开实际调查,提高话语的真实度。其三,传播媒介要坚持话语规范性原则。在传播过程中,媒介话语的运用直接影响到话语的实效性,话语传播媒介就要提高话语规范,在词汇以及语法上进行规范。

第三,消除媒介存在的歧视,提高官方媒体的话语影响力。进入新时代,传统话语媒介与新兴话语媒介相互交织,形成一个“众声喧哗”的话语环境,话语主体更要消除媒介歧视。其一,消除媒介的地域性歧视。利用党媒官报等传播媒介来对主流意识形态展开宣传,提高各地农村党员干部的形象,做好“发言人”工作,打消话语传播媒介的地域歧视。其二,增加农村女性的话语权,消除话语传播媒介的性别歧视。传播媒介要消除“女性商品化”的陈旧观念,增加农村女性传播媒介的话语权,给予农村女性更多的发言机会,将农村女性视为话语传媒的重要受众。其三,建立健全完善对话语传播媒介的监督机制。通过对话语传播媒介各个环节的监督,主动接受话语受众的反馈,利用话语受众的评论来监督传播媒介的“合理发声”。

## (二)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创新使用传统媒介

第一,建立双向交流的话语平台。在话语传播过程中,推进传统话语媒介由封闭式的话语平台向开放式的话语平台转型,增强传播媒介的互动性。其一,推进传统媒介的创新性发展。依托新时代网络等技术的发展,传统话语传播媒介要不断进化升级,例如现在传统媒介纷纷开通微博、微信,利用虚拟空间来为话语受众提供更广阔的话语平台。其二,传统话语媒介要始终维护农村群众的话语权,增强话语传播媒介的服务意识,树立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媒介责任感。其三,推进农村群众与传统媒介互动形式的创新。在原有的写信、打热线电话等基础上,利用新兴技术来为传统话语媒介增添新的交流形式,增设“一对一”式的话语平台,使每位农村群众都得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例如在官方微信、微博上开设“留言板”“市长电话”等形式来拓展话语渠道。

第二,做好话语受众的分类,提高话语传播的实效性。其一,传统话语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应加强话

语对象的指向性,实现话语受众由“泛化”到“精细化”的转变。将农村群众按照年龄、性别、知识水平等指标进行分类,了解相关信息并明确准确的需求,确保传统话语媒介向不同类别的农村群众能够精准推送话语信息。其二,加大传统媒介对话语内容的深度拓展。传统媒介要转变“千篇一律”式的话语输送形式,在互联网等媒介提供的信息基础上,针对话语客体感兴趣的方面及时跟进,结合农村实际情况进行话语“深加工”,引发农村群众的深入思考。其三,建构传统媒介话语传播的新模式,开辟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模式。例如,湖北的垄上频道就开辟了“垄上模式”,采用“线上+渠道”的新形式。利用线上媒介进行相应的“三农政策”等话语宣传工作,同时在“线上宣传”的基础上,打通现实路径,进行话语的相关落实工作。

第三,提高话语传播的速度,增强媒介话语的质量。其一,加大信息的收集与传播工作的力度,增强话语的时效性。进入新时代,互联网的发展为传统话语媒介造成巨大的挑战,微博、微视频等传播媒介的速度快,成为新的信息来源。传统话语媒介在传播速度上处于劣势,就要加快推进传统话语媒介的转型,拓展话语传播的渠道,例如纸媒就要加快与微信等平台的合作,提升话语传播的效率。其二,坚持“内容为王”的话语准则。传统话语媒介大多受政府管理,如人民日报、央视以及各地方卫视等属于官方媒介,具有较强的话语公信力。在新时代的话语传播过程中,传统媒介就要扬长避短,进一步强化对话语内容的审核,打造高质量、高标准的媒介话语。

## (三)坚持激浊扬清的原则,正确运用新兴媒体

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兴话语媒介对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有着重要影响。针对新兴媒体存在的问题始终坚持激浊扬清的原则,从增强农村新兴话语媒介的建构、提升话语主客体的媒介素养、强化舆论导向三方面着手,进一步增强对新兴话语载体的管控工作。

第一,增强农村新兴话语媒介的建构,增强农村群众的触媒性。农村话语媒介的建构,是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与农村群众使用新兴话语媒介进行话语沟通的重要前提,要提高话语主客体的触媒性,不断完善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硬件条件。要加大资金支持,提高互联网等话语载体的普及率。在新时代,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话语传播工作,还要进一步加大农村的资金投入,推进农村的“村村通”“户户通”政策的落实,促使互联网的普及率进一步提升,通过专门面向农村群众的网站

门户来进行话语宣传,也为农村群众搭建更为广阔的话语平台。

第二,加强话语主客体话语权的管理,防止话语传播随意化。其一,强化话语主体的媒介素养教育。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话语主体,借助新兴媒介来表达话语是要结合相关的理论概念,利用新兴媒介来传播完整的话语体系,提高话语的理论深度与内涵。其二,加强话语客体的媒介素质教育。既要增强话语辨识能力,能够准确辨别新兴媒介传播的各种话语,避免被“标题党”等吸人眼球的话语所迷惑。还要树立求真的意识,培育求异思维,自觉探寻话语的真相。其三,坚守法律的底线,在新兴媒介的话语传播过程中,话语主客体都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的要求,将话语传播限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运行。

第三,强化舆论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指出:“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sup>[8]</sup>在新时代的话语传播过程中,新兴媒介作为舆论发展的主要阵地,要做好舆论的引导工作。其一,增强新兴话语传播媒介的理性,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工作。始终坚持“一元”与“多元”的话语原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作为话语传播媒介的指导思想,同时建构一个多种社会思潮共生的话语环境,为话语

传播营造宽松的环境。其二,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监管机制。政府要掌握网络舆情管理的主动权,成立专门的部门来加强日常的舆论监测工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降低虚假舆论的负面影响。

#### 参考文献:

- [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352.
- [2]邱仁富,贺争平.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发展的一般规律[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1):56.
- [3]袁新.在融合发展中巩固拓展主流舆论阵地[J].新闻记者,2017(11):4-9.
- [4]刘成文.当前基层农村政治沟通弱化问题研究:以鲁西南H村为个案[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09:19.
- [5]中亚平,郑保章.从媒介话语权角度透析媒介歧视[J].文化学刊,2010(3):111.
- [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 [7]刘正荣.从非理性网络舆论看网民群体心理[J].现代传播,2007(3):167-168.
- [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32.

(责任编辑 吕志远)

## The Predica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Mass Work Discourse of the Rural Grass - 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DOU Feiyue, LI Fangyun

(School of Marxism, Qufu Normal University, Jining, Shandong 272000, China)

**Abstract:** Discourse media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rural areas relies on various discourse media to realiz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discourse.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discourse media, such as low utilization rate, the lack of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media, and the increasing difficulty in the control of the Internet media.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diversity, we can make full use of multiple media;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we can make innovative use of traditional media;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stirring up confusion and promoting clarity, we can correctly use the new media to effectively disseminate the discourse of mass work. Working from the three aspects above, we can build a discourse media that closely connects the masses, and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mass work of the rural grass - 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new era; grass - roots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in rural areas;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mass work; media discourse

# 金融学、货币银行学课程名称思辨

孙书章, 李 华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对“金融”“金融学”的概念及专业基础必修课——金融学的课程内容体系进行了系统梳理。通过对国内外几本被广泛采用教材的内容体系的对比,表明我国目前流行的《金融学》教材的内容体系偏离了金融学课程的核心内容,导致学生对金融概念的误解,对金融学课程的教学工作产生了不利影响,也影响了货币银行学课程的教学。修正部分学者对“金融学”“货币银行学”内涵的误解,说明教育部要求作为经济学和金融专业基础课的课程名称应该是“货币银行学”而不是“金融学”,以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好地把握作为基础课的“货币银行学”课程的内容体系,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概念混乱。

**关键词:**金融学;货币银行学;课程内容体系;内容体系误解;课程思政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5.019

**中图分类号:**F8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5-0095-06

## 一、引言

根据教育部目前的规定,金融学课程是金融学、经济学等专业的学科基础必修课,但是目前讲授金融学这门课程的教师面临金融学这门课程的教材多个名称共存的问题:《金融学》《货币银行学》《货币金融学》等。黄达(2012)在其主编的《金融学》(第三版)<sup>[1]</sup>标题下方以括号标明《货币银行学》(第五版),这意味着在他看来货币银行学和金融学实际上是一门课,其结果是影响了学生对金融概念的理解,导致学生对于货币、金融概念的认知出现混乱。本文试图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澄清“金融”这个概念的内涵;第二,帮助学生和教师清晰理解金融学这门课程的内容体系;第三,为货币银行学课程正名。基于此,本文采用为文献综述和对比分析方法,基于国内外多本具有较大影响且在全球普遍采用的相关教材的内容对“金融”的概念进行阐释,对金融学、金融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和货币银行学这几门课程的内容体系加以梳理,将有助于教师和学生对“金

融”和“金融学”概念的清晰理解,有助于教师、学生明白教育部规定的学科基础必修课实际上是“货币银行学”并非是“金融学”这门课程,以便教师讲授此门课程时能对内容体系做出合理的安排。当然,有一点这里需要重点说明,金融学科是目前我国与国际高等教育学科中接轨最紧密的一个社会科学分支,我们在对与其有关的国际普遍采用的学术概念、学术理论进行深入分析、探讨的过程中要注意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这是我们进行中外学术比较研究的基础,更是国家加强课程思政建设的要求,我们学习西方经济理论的目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我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既要发展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也要认真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知识的精髓,加快培养具有全球化视野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根本目的。

## 二、“金融”的定义分析

对于金融的概念内涵很多讲授金融学相关课程的教师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我曾经向多届已经学过

**收稿日期:**2021-05-10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产教融合+课赛创驱动下的应用型课程教学改革研究”(2019SJGLX306)

**作者简介:**孙书章(1971—),男,河南商丘人,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货币政策、金融市场与机构。

“金融学”课程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提出过这个问题,遗憾的是几乎没有学生给出清晰的答案。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教师没有给学生讲清楚“金融”这个概念,归根结底是因为教师自己对“金融”这个概念的界定不清。既然无法对金融的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自然也就无法对金融学这门课的内容体系做出合理的安排。我自己曾经使用过几本由国内教师编写的具有代表性的教材,但是无论是曹龙骥主编的《金融学》<sup>[2]</sup>(2013、第四版)、蒋先玲(2013)编著的《货币金融学》<sup>[3]</sup>、还是彭兴韵所著的《金融学原理》(2013,第五版)<sup>[4]</sup>都没对“金融”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诧异的事情,如果一本《金融学》教材的作者无法给“金融”下一个清晰的定义,那他显然无法确定以“金融学”命名的课程的内容体系。黄达编著的《金融学》(第三版)(2012)第四章对“金融”范畴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详尽的解释,他把 Finance 这个词分成了宽口径、中口径(对应宽口径“金融”)和窄口径(对应窄口径“金融”),他认可工具书中“金融”与 Finance 这两个词是对应的概念这一事实,但又认为他们的口径不应该一致。他最终给出了金融的定义:“凡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以及以货币与信用为一体的形式生成、运作的所有交易行为的集合。”这种解释我认为对初学经济学的学生来讲,是很难理解的。因此,本文首先明确学术界广为认可的“金融”这个概念的界定。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几位有影响力的学者对“金融”定义的描述。“金融是社会资金的融通”(易纲,1999)<sup>[5]</sup>。“金融是稀缺资源的跨期配置,金融学是一项针对人们怎样跨期配置稀缺资源的研究”(博迪等人,2009)<sup>[6]</sup>。“简单来讲,金融是有关货币的决策,更恰当地讲是关于现金流的决策。金融决策涉及公司、政府和个人如何筹集和使用货币”(Besley and Eugene,2014)<sup>[7]</sup>。“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金融学就是研究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为什么会发生,如何发生,怎样发展,等等”(陈志武,2014)<sup>[8]</sup>。以上几个定义明确地告诉了读者“金融”就是货币资金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跨期流动。如果这样定义“金融”,那么我们经常听到的“金融发展”“金融调控”等概念就意味着应该还有与“金融”相关、内涵更为宽泛的概念。如果我们把大众所熟悉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融监管、货币政策这些词语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理解“金融”到底是什么。根据学术界的习惯,如果我们把上面所提到的易纲等人的教

科书中有关“金融”的定义理解为“金融”的定义,那么与之相对的是包括货币、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的金融体系的概念(Cecchetti,2017;黄达,2012)<sup>[9][11]</sup>。在我们理解了“金融”这个概念的含义之后,下面我们进一步理解,“金融学”这门课程的内容体系。

### 三、“金融学”课程的内容体系

由于不管是“金融学”还是“货币银行学”,这些课程名称都是从西方国家传输过来的,那么本文首先就目前西方大学中所广泛使用的《金融学》《金融经济学》主流教材的内容体系进行梳理,在帮助我们进一步地理解“金融”这个概念的同时,也帮助我们思考目前我们所使用的教材到底以《金融学》《货币金融学》《货币银行学》中哪个名称命名更加准确。

Besley 和 Eugene (2014) 在其《金融学原理》(*Principles of Finance*)<sup>[7]</sup>一书中把整个内容体系分成了五个部分:一般金融的概念;商业组织和税收环境、财务报表分析、财务计划和控制;金融工具估值的基本原理;公司决策的制定;投资者决策的制定。该书的前言清楚地告诉读者这本书讲述金融的三个领域: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投资和管理金融。Benninga (2010)<sup>[10]</sup>所著的 *Principles of Finance with Excel* 一书包括以下几个部分:资本预算;投资组合分析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有效市场的债券及普通股价值估算;资本机构和股利政策;期权及期权估值。两本书的内容体系基本一致,只是各部分标题的命名方式存在差异。综合来看,这基本表明了西方“金融学原理”课程所包含的内容体系。

博迪、默顿等人(2009)所著并由萨缪尔森作序的 *Financial Economics*(金融经济学)在中文版出版时被翻译成《金融学》。该书的内容包括六个组成部分:金融和金融体系;时间和资源配置;价值评估模型;风险管理和资产组合理论;资产定价;公司金融。在序言部分作者明确表述金融学的三个分析支柱是最优配置、资产估值和风险管理,而金融所应包含的全部领域是投资、金融机构和公司金融(in all area of finance – investment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corporate finance)。如果按照作者所言该书是《金融经济学》导论课程所应涵盖的内容体系,那么 Merton(默顿,1992)<sup>[11]</sup>在其金融学的高级教材 *Continuous – time Finance* 一书中对金融学的定义则更加直白“大家普遍认同现代金融领域包括公司及家庭金融、金融中介机构、资本市场和微观投资理论,以及有关不确定性经济学的很多内容”。kettle



(2001)<sup>[12]</sup>关于“金融经济学”的定义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金融经济学”的内容体系。根据 Kettle 的观点,“金融经济学”是关于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寻求建立投资组合的投资者如何构建资产定价模型的课程。因此 Kettle (2001)<sup>[11]</sup>的著作基于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分析了货币价格的确定、利率的风险结构和期限结构;金融工具估值理论;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市场有效性理论;行为金融理论;金融衍生工具市场。Fabozzi 等人(2012)所著的《金融经济学》(*Financial Economics*)<sup>[13]</sup>系统讲述了新古典金融经济学的传统发现,现实世界中金融经济学的背景,度量和应对金融风险的工具,风险资产的选择和定价,衍生工具的本质特点和定价,不完美资本市场和套利限制;不完美资本市场的资本结果决策,风险条件下的资本预算决策。对比博迪、默顿、Kettle 和 Fabozzi 各自所著教材的内容体系,我们发现这些教材的内容主要聚焦于资产定价、风险管理和目标最优化。也清晰地表明了“金融经济学”这门课程的内容体系。最后,我们采用 Haugen (1999)依据不同阶段金融理论研究的内容对金融从学术的角度所进行的划分,完整地展示金融学的核心内容体系(表1)。

表1 金融理论的演进

旧金融(The old finance)
主体 财务报表分析、金融债权的本质
范例 财务报表分析 (Graham & Dod); 金融债权的性质 (Dewing)
基础 会计和法律
现代金融 (Modern finance)
主体 基于理性经济行为的估值
最优组合 (Markowitz); 相关性理论 (Modigliani & Miller);
范例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Sharpe, Lintner & Mossen);
有效市场假说理论 (Fama)
基础 金融经济学
新金融 (The new finance)
主体 无效市场
范例 诱导因子模型:预期回报 (Haugen), 风险 (Chen, Roll & Ross)
行为模型 (Kahneman & Tversky)
基础 统计学, 计量经济学和心理学

依据表1中的内容及西方高校当前广泛采用的《金融学》《金融经济学》教材所涵盖的内容来看,它们的核心内容聚焦于金融工具估值理论,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投资组合,资产定价和风险度量,这与我们国内称之为《金融学》的课程内容体系大相径庭,因为我国的《金融学》或者《货币金融学》教材的内容体系都是以货币和信用开篇最终又回到了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谈到货币,本文在下一节简单考察《货币经济学》这门课程的内容体系,因为黄达(2012)认为“货币银行学”是“金融学”和“货币经

济学”的结合体,“货币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并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宏观金融。为了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货币银行学”这门课的内容体系,下面本文选择几本国外高校中广泛采用的《货币经济学》教材进行分析。

#### 四、“货币经济学”课程的内容体系

目前,本文作者读到的最早以《货币经济学》(*Monetary Economics*)命名的著作可以追溯到1912年 Carlile<sup>[14]</sup>的作品。如果以今天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以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的出版作为“宏观经济学”的诞生时间点,那么显然 Carlile 所著的《货币经济学》在出版时不属于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Handa (2009)<sup>[15]</sup>在他的《货币经济学》一书中明确表述“货币经济学”有微观和宏观两个部分构成 (monetary economics has both a microeconomic component and macroeconomic one)。货币微观经济学的基础问题是有关货币的恰当定义,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而货币宏观经济学部分是指货币政策的制定及其对经济的影响。Bain & Peter (2009)<sup>[16]</sup>认为“货币经济学”是有关经济中货币及货币关系的经济学分支,它包括货币存在的原因,经济交换中货币的角色,财富的转移和一系列经济增长模型。Handa 及 Bain & Peter 对“货币经济学”的定义清楚地告诉读者,“货币经济学”并不只是“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其中有关短期和长期货币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以及货币中性问题(一个经济体货币数量的变动是否对产出和就业的真实值产生影响,还是仅仅对一般价格水平产生影响)才是货币经济学的宏观一面,这一部分正是货币政策所关注的内容。宏观经济学中出现货币经济学宏观方面的内容是因为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工具之一,是讨论货币对经济的影响,而不是如黄达所言要从经济整体的角度考察金融的侧面。因此,尽管“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我们在《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会看到有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内容。为了读者更好地理解“货币经济学”这门课程所应涵盖的内容,我们基于 Belke & Thorsten (2009)及 Handa (2009)的教材列出“货币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内容体系:货币的起源、货币的演变过程,货币在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角色;封闭及开放经济体中的货币供给及控制理论;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等学派的货币需求理论及货币需求的实证检验;货币政策理论(货币政策制定中的不确定性,有关规则与相机抉择的争论,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价格水平

稳定的制定保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不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计量分析;货币政策战略的选择;货币当局与金融市场的关系。很显然,我们所列出的“货币经济学”的内容体系不仅仅包括宏观货币理论也包括微观货币理论,但内容几乎没有涉及我们前面所谈到的“金融学”或“金融经济学”中的核心内容。那么“货币银行学”是不是如黄达所言是“金融学”和“货币经济学”的结合体呢?下面我们具体分析“货币银行学”的内容体系。

### 五、“货币银行学”课程的内容体系

在分析了“金融学”“金融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这三门课程的内容体系后,我们接着分析《货币银行学》的内容体系以确定教育部所规定的作为专业基础必修课的“金融学”所涵盖的内容体系应该是什么,并在此基础上确认课程名称选择“金融学”还是“货币银行学”。此外,黄达(2012)认为“货币银行学”是金融微观层面分析(“金融学”和“金融经济学”课程)和宏观层面分析(“货币经济学”课程)的结合体,那么“货币银行学”这门课的内容体系是否真的如黄达所讲,本文选择几本大家熟知并且被广泛采用的《货币银行学》教材并对其内容体系进行分析。

这几本教材分别是:饶余庆所著的《现代货币银行学》<sup>[17]</sup>,易纲所著的《货币银行学》<sup>[5]</sup>,Mishkin所著的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第11版)<sup>[18]</sup>,Cecchetti & Kermit 所著的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第5版),Ball所著的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第2版)<sup>[19]</sup>。本文选择这几本教材进行分析的原因是这几本教材及其作者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代表性。饶余庆所著教材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有华人学者撰写并以中文出版的第一本与国际教材内容体系接轨的教材。易纲所著的教材是当时国际视野的《货币银行学》教材的主流框架与中国货币、金融体系发展现状相结合的成果,体现了易纲教授对《货币银行学》这门课程内容体系的理解。Mishkin、Cecchetti、Ball是当前全球一流的经济学家,他们所著的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教材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被多国高校的教师们广泛采用,在国内这几本教材以英文影印版和中文译本的形式出版并被高校广泛采用。目前,这几本教材都是经过多次修订,能够较好地反映出国际学术界对“货币银行学”这门课程内容体系的认知。此外,本文所选这五本《货币银行学》教材的作者都有在中央银行或国际金融机构工作的经历,教材内容反映了他们基于实践对货币、银行、金融理论的深入理解。由于中国目前尚未广泛存在西方国家那种从高校、研究机构到政府,再由政府回到高校、研究机构的人才流动机制,导致中国高校教材的内容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与实际脱节。下面我们首先用一个表格列出这几本教材的内容体系,以便读者能够对其有直观的了解。

表2 所选《货币银行学》教材的内容体系

	饶余庆(1983)	易纲(1999)	Ball(2009)	Mishkin(2016)	Cecchetti (2017)
第一部分	货币与信用	基本概念	基础知识	导论	货币与金融体系
第二部分	金融市场	金融机构与市场	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	利率、金融工具与市场
第三部分	商业银行	货币供求与利率决定	银行业	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
第四部分	中央银行与政策	货币与经济	货币与经济	央行与货币政策	央行、货币政策、金融稳定
第五部分	货币理论	金融与经济发展	货币政策	国际金融与货币政策	货币经济学
第六部分	货币与国际金融	货币政策		货币理论	

从表2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五本教材的核心是货币、银行。本文所选的五本教材的第一部分都是导论或者说基础知识,其目的是介绍教材的框架和一些基本概念,为学生学习后续章节的内容做准备。五本教材的第二部分除了易纲的教材采用的标题是“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其余基本教材都采用了“金融市场”作为标题。为什么作者要在货币银行学教材中写金融市场这部分内容?教材的内容告诉我们在此讲述金融市场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在此部分详细地介绍货币的两个价格——利率和汇率,分析利率的决定因素——利率的风险结构和期限结构,以及汇率的决定因素;第二是简单地描述了

股票市场和衍生品市场(期货、期权和互换)的基本构成和市场的基本原理(饶余庆、Mishkin把外外汇市场各自放在了教材的第六和第五部分,独立成章),也就是说在金融市场这个部分作者们的目的不是分析金融市场运作程序、金融资产定价和金融资产配置,其目的是给读者简单介绍货币流通的一种方式——直接融资,以及货币价格的决定。如Mishkin(2016)所言:对经济活动来讲,债券市场尤其重要,因为政府和公司可以在此为其活动进行融资,利率水平在此市场上决定下来。第三部分(易纲把金融机构放在了第二部分)或直接用银行作为标题,或用金融机构作为标题,但从书中的内容看,

即便是用金融机构作为标题,作者仍是集中分析了商业银行存在的原因、基本业务和监管,因为银行是货币融通的另外一种方式——间接融资的直接参与者,是货币的主要创造者。剩余的几个部分不需要进行分析读者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全部是讲述有关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内容。至此,我们可以确定这几本教材都是围绕货币、银行进行讲述。

因为“金融市场”这个章节的出现,导致了我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对教材的命名出现了一些偏差:蒋先玲、殷梦波、戴国强等学者以“货币金融学”命名教材。我们可以从蒋先玲(2013)<sup>[3]</sup>对其教材名称的解释发现原因:1990年以后,我国金融业,尤其是金融市场迅速发展,金融市场已经成为货币银行学的重要内容,因此,在这一背景下,货币银行学的名称已经与现实存在差距了。而西方国家的这门课程的名称是“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经济学”,这是对当今金融业发展的全面介绍……因此,作者认为,“货币金融学”这一课程名称能较好地反应该门课程的内容。也就是说,“货币银行学”改名“货币金融学”是对当代金融学专业课程建设的一种肯定”,针对蒋先玲的这种解释,本文首先要澄清,目前所能见到的西方高校的教材以“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经济学”命名的极少,众多教材都是以“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命名。其次,在本文作者看来,这种解释表明了一些学者们没有能够正确理解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这几个概念在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教材中的含义。下面我们用 Ritter 等人(2009)<sup>[20]</sup>对其 *Principle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教材名称的解释来帮助读者理解“货币银行学”这门课程:在《货币、银行、金融市场》一书中货币不仅是指我们花费的现钞,更是指广义的货币经济,货币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更是代表着中央银行影响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货膨胀整体经济活动的主要机制;银行是指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之所以要把银行挑选出来,是因为银行在经济活动中扮演尤其关键的角色,它是一个经济体的主要的货币供给者;金融市场在该书中是指金融资产交易的场所,为资金在剩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直接流动提供了机制,并提供了股票和债券的价格,决定了利率水平。这种解释告诉了读者在学习货币银行学时之所以要涉及金融市场,是因为金融市场上的直接融资是资金融通的方式之一,这个市场上交易的金融工具是资金的剩余者在其投资组合中可以选择的金融产品,该市场上金融工具的供求决定了货币的价格——利率。了解

货币、银行基础知识的读者应该知道利率的变动与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和商业银行存款货币的供给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货币供给的变动影响着一国的总产出、就业和一般物价水平。此外,在货币银行教材中讲述金融市场的基础知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要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及委托代理理论指出金融市场上直接融资渠道固有的缺陷导致银行的必然存在,通过银行进行的间接融资也必然成为资金融通的主渠道。如果银行业出现问题对货币的供给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现在我们回到前面我们提到的国内以《金融学》或《货币金融学》命名的几本教材。读过这几本教材的读者应该知道,蒋先玲编著的《货币金融学》的教材体系与 Mishkin 所著的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一书的内容体系基本一致。黄达、曹龙骢各自主编的《金融学》以及彭兴韵所著《金融学原理》在内容安排的顺序上有所差异,但核心仍是货币、银行,尽管黄达、曹龙骢、彭兴韵各自在其教材中都安排了有关金融市场的章节,但整本教材的内容并不是以资产定价、风险管理和目标最优化为核心。

## 六、结论

通过对不同课程的内容体系的分析,我们知道了目前国内学者们编写的《金融学》或者《货币金融学》教材实质是《货币银行学》。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回归到名副其实的課程名称上去,减少人为造成的概念混乱。实际上,易纲(1999)的解释也清晰地说明了作为专业基础必修课,这门课程为什么要以货币银行为核心内容。

最后,我们还要在此处再次重申以下两点:

第一,“货币金融学”这个概念是不确切的。“金融学”的内容是聚焦于资产定价、风险管理和目标最优化,而这些内容在国内的《货币金融学》教材中不是核心内容。如果是指金融体系,把货币与金融这两个概念并列起来是不合乎逻辑的,因为货币是金融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便 Mishkin、Ball、Cecchetti 等人的教材以“*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命名,但作者在各自教材的前言部分都清晰地表明了这是为“货币银行”课程所写的教材。

第二,黄达认为中文“金融”与英文 finance 是不能强行恒等的,但是以英文注释中文的金融还得用 finance,用中文注英文的 finance,也还得用金融。那么如何解决我们与国外学者进行学术探讨时所面临的概念上的差异,他认为只需要在讨论问题前交代一下自己所使用的口径,并冷静地分析对方所使用的口径。在任何一篇我们用英文写出的论文、报告

中,首先去解释我们与对方对 finance 一词理解不一致。对于这种观点,本文认为是不合适的。作为严格的学术研究,必须有一个统一的语言体系,如果认为中文“金融”与英文的 finance 一词无法对应,我们完全可以确定一个可以与 finance 含义对等的中文词。实际上并不是中英文的两个词不对等,而是我们自己理解出现了偏差,我们把国际学术界普遍接受的“金融”与“金融体系(或者金融系统)”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了,也因此把金融理论与货币理论混为一谈了。

#### 参考文献:

- [1] 黄达. 金融学[M]. 3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110-117.
- [2] 曹龙骢. 金融学[M]. 4 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1-6.
- [3] 蒋先玲. 货币金融学[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 [4] 彭兴韵. 金融学原理[M]. 5 版. 上海:格致出版社,2013: 3-32.
- [5] 易纲. 货币银行学[M]. 上海:格致出版社,1999:1-7.
- [6] 博迪,默顿,克利顿. 金融学[M]. 2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6.
- [7] Besley S, Brigham E F. Principles of Finance[M]. 6ed. South-Western College Pub, 2014.
- [8] 陈志武. 金融的逻辑 1 [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4:3.

- [9] Cecchetti S, Schoenholtz K L.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M]. 5ed. New York:Mc Graw Hill, 2017:XX-VI-Xli.
- [10] Benning S. Principles of Finance with Excel[M]. 2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Vii-iX.
- [11] Merton R C. Continuous-Time Finance [M]. New Jersey:Wiley-Blackwell, 1992:1.
- [12] Kettell B. Financial Economics [M]. New Jersey:Prentice Hall, 2001:1-17.
- [13] Fabozzi F, Edwin H N, Zhou G F. Financial Economics [M]. New Jersey:Wiley, 2012:V-Vii.
- [14] Carlile W W. Monetary Economics [M]. New York:Longmans, Green & Co, 1912:Vii-Xii.
- [15] Handa J. Monetary Economics[M]. 2ed. Routledge, 2009: 3.
- [16] Bain K H. Monetary Economics [M]. London:Palgrave, 2009:2.
- [17] 饶余庆. 货币银行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1-3.
- [18] Mishkin F S.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M]. 11ed. New York:Pearson, 2016:9-32.
- [19] Ball L.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M]. 2ed. New York:Worth Publishers, 2011:vii.
- [20] Ritter L S, Silber W L, Udell G F. Principle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M]. 12ed. Beijing: China Machine Press, 2009:3.

(责任编辑 许峻)

## Critical Thinking on Course Name Finance or Money and Banking

SUN Shuzhang, LI Hua

(School of Finance,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first discuss the definition of finance and the meaning of Finance as a subject, then we review the contents in Finance textbook written by university professors in China. By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the contents of Finance textbook written in Chinese with Finance textbook widely used around world, we present that the contents of Finance textbook written by a few authors in China have diverted from the core contents of Finance. To some extent, this reality lead students to a misunderstanding of Finance, and has adverse influence on Finance course education, and Money and Banking course education. Correct some scholars' misunderstanding of Finance, and Money and banking, to help them better grasp the core contents in teaching and studying of Money and banking, in order to avert the concepts confusion.

**Key words:** finance;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course contents; misunderstanding on core contents;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 “产出导向法”理念下英语专业课程线上线下思政育人的有效衔接研究

——以《英汉/汉英笔译》课程为例

谷峰

(巢湖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巢湖 238000)

**摘要:**课程思政建设是高校开展“三全育人”工作的重要抓手。英语专业课程兼具人文性,在传授英语专业知识的同时还承担着新时期思政育人的使命。在当今全面实施课程思政的背景下,基于“产出导向法”理念,以《英汉/汉英笔译》课程为例,从线上“输出驱动”、线下“输入促成”、线上“以评为学”三个教学环节探究线上线下思政育人的有效衔接模式及其实现路径,将线上线下知识传授和思政育人融为一体,以期为其他课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产出导向法;课程思政;英语专业;线上线下;有效衔接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5.020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5-0101-05

我国高校大力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为新时期所有课程的教育教学改革指引了方向,英语专业课程也不例外。英语专业课程所占课时和学分比例较大,既是沟通中外语言文化的重要桥梁,又是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主战场”。鉴于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面临“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sup>[1]</sup>的一系列人才培养问题,在对英语专业课程进行教学改革的同时需要深入思考如何发挥课程思政的隐形作用,将思政育人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融入课程教学设计和教学活动来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人文情怀和多元文化包容精神<sup>[2]</sup>。为此,本文在介绍“产出导向法”及其应用到英语专业课程思政的理据的基础上,以《英汉/汉英笔译》课程为例,探析线上线下思政育人的有效衔接模式及其实现路径,以期为其他课程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 一、“产出导向法”及其研究概述

在外语教学“方法热”的“后方法时代”(post-method era)背景下,为了解决外语教学中的“学用

分离”问题,中国学者文秋芳教授基于二语习得理论研究成果和“输出驱动假设”学说,创建了彰显本土特色的“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sup>[3]</sup>。文秋芳教授提出的“产出导向法”倡导“将产出活动作为驱动手段(output-driven)和教学目标,将输入活动作为促成手段(input-enabled)”<sup>[4]</sup>,提倡“边学边用”“学以致用”“以用促学”的教学理念,注重“学”与“用”的联动和紧密衔接。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产出导向法”打破了传统教学中以“输入-输出”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倡导“驱动-促成-评价”循环的教学范式。就教学目标而言,“产出导向法”以实现成果输出和“知行合一”为旨趣,不但以语言材料的输出为起点,而且还利用输出驱动、循环输入和递进式操练来驱动学生的学习和思考。

为了管窥国内“产出导向法”的研究现状,进行热点捕捉,笔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输入检索条件”中的“主题”栏输入“POA”“产出导向法”等

**收稿日期:**2021-08-20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重点教研项目“后疫情时代英语专业课程思政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研究——以《英汉/汉英笔译》课程为例”(2020jyxm1261);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重大教研项目“以OBE为导向的外语类课程测试与教学评价研究”(2020jyxm1251)

**作者简介:**谷峰(1979—),男,安徽巢湖人,硕士,巢湖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迄今为止(2015—2020年)发表相关研究论文805篇。随后又以“POA”或“产出导向法”和“课程思政”为关键词进行交叉检索,基于“产出导向法”的课程思政研究论文只有21篇。2015—2020年间与“产出导向法”有关的研究论文年度分布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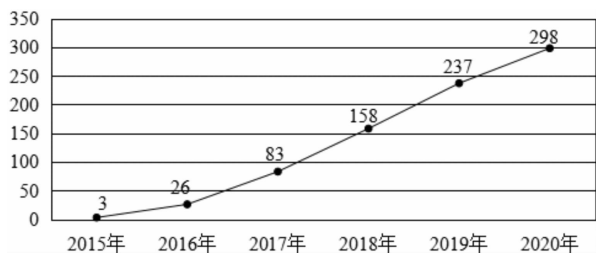


图1 2015—2020年间与“产出导向法”有关的研究论文年度分布

由图1可知,近年来国内有关“产出导向法”的研究总体呈直线式上升趋势,经历了萌芽期和繁荣发展期。在2015年萌芽期,发文量较少,只发表相关研究论文3篇,这说明国内学者对“产出导向法”的参与度不够高,相关研究处于初期研究水平。“萌芽”往往蕴含着生机和活力。从2016年开始,

“产出导向法”取得了颇丰的研究成果,其理论与实践体系日益完善。但是目前“产出导向法”在课程思政育人领域中的应用十分匮乏,相关研究论文只有21篇。笔者认为,虽然“产出导向法”应用到课程思政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鉴于我国大力倡导课程思政理念,相关研究会受到国内教育科研工作者的普遍关注,同时也会为高校英语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新的路径。

## 二、“产出导向法”应用到英语专业课程线上线下思政育人的理据

“产出导向法”理论框架主要包括“教学理念”“教学假设”“教师主导+师生共建的教学流程”<sup>[5]</sup>,见图2<sup>[5]</sup>。图2中的“教学理念”是行动指南,为“教学假设”和“教学流程”指引方向;“教学假设”是“教学流程”检验的对象,受制于“教学理念”,同时也为“教学流程”提供理论框架和理论支撑;“教学流程”既要体现“教学理念”和“教学假设”,又要为检验“教学假设”的成效提供现实依据。另外“教学流程”中的核心环节是“驱动—促成—评价”,其中“输出驱动是提高输入吸收效率的有效手段”,“输入促成为输出提供高质量的语言保障”<sup>[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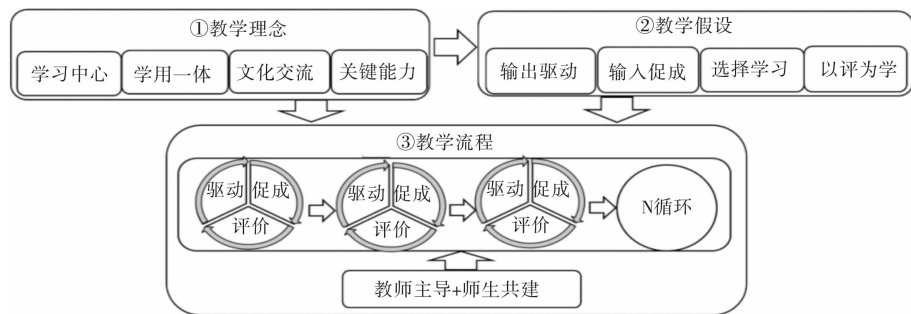


图2 “产出导向法”理论框架

英语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是实现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践行“产出导向法”理念下英语专业课程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抓手。将“产出导向法”应用到英语专业课程线上线下思政育人,有利于构建课程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机制,同时也是对国家有关课程思政建设政策的有效回应,例如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就明确指出,“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形成协同效应,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sup>[7]</sup>。将“产出导向法”中的教学流程“驱动—促成—评价”应用到英语专业课程思政育人,可以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对输入隐含思政元素的材料进行学习,促成思政育人目标的完成。具体而言,“输出驱动”环节在明确学习目标的基础上线上引发学生学习思政素材的“饥

饿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输入促成”环节通过线下适时适量、循序渐进地输入思政素材和产出导向练习,引导学生促成产出任务,进而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实现育人目标;“评价环节”为教学的产出情况提供及时的反馈和建议,在提升产出效果的同时拓展思政育人。其中“输入促成”环节承上启下,是能否实现知识产出目标和思政育人效果的关键<sup>[8]</sup>。“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尝试将“产出导向法”引入英语专业课程线上线下思政育人的有效衔接研究,可以促成课程的思政育人效果。

## 三、“产出导向法”视角下英语专业课程线上线下思政育人的有效衔接模式构建——以《英汉/汉英笔译》课程为例

以“产出导向法”为教学理念的英语专业课程线上线下思政育人强调“构建以学习为中心、以产

出为目标、以育人为宗旨的具有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金课”<sup>[9]</sup>。在线上线下思政育人的过程中,可以将“产出导向法”中的“驱动—促成—评价”三个重要的教学阶段分别对应线上“输出驱动”、线

下“输入促成”、线上“以评为学”三个重要环节。下文以《英汉/汉英笔译》课程为例,尝试从“产出导向法”视角构建英语专业课程线上线下思政育人模式,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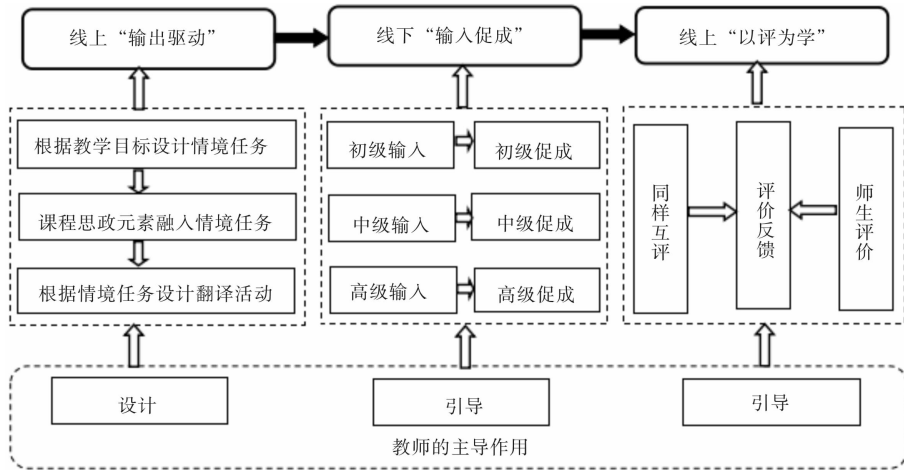


图3 “产出导向法”视角下英语专业课程线上线下思政育人的有效衔接模式构建  
——以《英汉/汉英笔译》课程为例

根据图3中的教学流程,在线上“输出驱动”环节,教师主要扮演“设计师”的角色。首先依据教学目标设计情境任务;然后将思政元素适时适量地融入情境任务,并规定情境任务的要求,包括教学目标、产出任务等方面的要求;最后设计翻译训练活动。在线下“输入促成”环节,教师主要起引导作用。教师引导学生对输入的蕴含思政元素的翻译材料进行研习和讨论,并“提供促成产出的恰当输入以帮助学生完成产出任务”<sup>[10]</sup>,即通过“初级输入—初级促成—中级输入—中级促成—高级输入—高级促成”和“由简到难、任务相依、前后呼应的输入和促成产出”<sup>[11]</sup>,学生以螺旋式上升的方式进行翻译技能的深度学习,与此同时这也有助于提高学生运用英文进行中国文化表达的能力,进而增强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线上“以评为学”环节,评价兼有“促学”的作用,不仅有利于学生及时获取产出反馈、改进学习策略<sup>[12]</sup>,而且通过综合采用生生互评、教师评价等方式又能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

#### 四、“产出导向法”视角下英语专业课程线上线下思政育人的有效衔接模式实现路径

以“产出导向法”为教学理念的英语专业课程线上线下思政育人强调线上线下教学时间、教学空间的连贯和无缝衔接。下文以英语专业必修课程《英汉/汉英笔译》为例,从线上“输出驱动”、线下“输入促成”和线上“以评为学”三个环节阐发英语专业课程线上线下思政育人的有效衔接模式实现路

径。

##### (一)线上“输出驱动”环节

根据“产出导向法”,课前线上“输出驱动”环节既为学生提供学习驱动力,又为学生提供“学然后知不足”的学习机会。在此环节,教师可以将思政元素融入线上情境任务,以任务驱动为导向,鼓励组员合作,以小组线上研讨为中心,实现阶段性的思政渗透。为了顺利实现线上思政渗透,教师课前要挖掘教材所蕴含的思政元素,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以《英汉/汉英笔译》课程的思政元素为例,见表1。

表1 《英汉/汉英笔译》课程的思政元素

思政元素	思政要点
时代精神	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悟“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勇于创新的时代精神等。
历史传承	注重培根铸魂,培养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能力,增强文化自信,感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
人文素养	培养译者素养,学习有原则地讲好“中国故事”,培养家国情怀、人文情怀、多元文化包容精神等。
国际视野	通过双语转换,提高全球理解力、全球表达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职业道德	培养译匠精神,培养责任感和荣誉感,提升语言服务意识,提高终身学习、团队合作、语言服务等方面的能力。

以《英汉/汉英笔译》课程中讲授的内容“汉英翻译与文化”为例。首先根据教学目标创设情境任务,让学生小组合作(三人一组),通过网络查找中央电视台连播的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了解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的背景资料,感悟其中名言名句所体现的文化内涵。然后鼓励小组成员线上就某一用典翻译进行研讨,并在学习通平台以小组为单位发表对汉英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法。通过上述情境任务驱动,一则对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的欣赏、研读和试译有助于学生加深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领悟,也有益于学生接受“弹性的、隐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sup>[13]</sup>,实现“以文化人”的育人功能;二则小组成员合作完成情境任务,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包容精神和求实精神<sup>[14]</sup>,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协作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语言服务能力。

## (二) 线下“输入促成”环节

学生在课前线上“输出驱动”环节会遇到困难,而这些困难也将是课中线下“输入促成”环节需要重点解决的内容,同时也会为进一步促成思政育人提供机遇。基于课前完成的线上“输出驱动”,“适时提供能够促成产出的恰当输入与不提供的相比,前者能够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sup>[5]</sup>。如果教师能够结合英语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通过“初级输入”“中级输入”“高级输入”循序渐进地输入思政元素材料,可以将课程思政育人的产出水平推向新高度。因此课中线下“输入促成”环节是进一步促成学生学习成果和思政育人效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英汉/汉英笔译》课程为例。在小组课前准备的基础上,线下课堂让小组代表展示本组已找到的习近平总书记用典资料,包括视频资料,小组成员汇报对某一用典翻译的思考,简述翻译心得,并接受他组成员的提问,同时开展同伴互评、教师点评。例如某组学生代表展示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用典“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及其小组译文。在探讨用典的出处、体验用典深厚的历史文化光芒的基础上,各组成员就译文展开激烈的研讨。对用典的研究“无疑潜移默化地开启了‘文化自信’的爱国教育,学生对祖国优秀的语言文字的崇敬和骄傲之情,不禁油然而生”<sup>[15]</sup>。在完成“初次输入”的基础上,教师通过课堂任务驱动促成“中级输入”和“高级输入”,例如以习近平总书记用典“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中“不”的翻译为例,讨论用典翻译原则。针对有的学生译文知难而退,忽视原文“不(fou)同(否)”字段的翻译,展开翻译点评和讨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不(fou)同否”可以采用增译来再现用典中的文化元素。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打破了传统课堂“满堂灌”和沉默状态的教学模式,使学生的学习更加贴近于翻译情境教学,而且通过开展个性化学习与合作学习让学生全程参与翻译教学活动,能够有效调动学生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也有利于学生了解翻译职业操守,培养翻译职业素养。

## (三) 线上“以评为学”环节

“产出导向法”提倡的“以评为学”源于“以评促学”的教学理念,“主张在教师专业引领下,学生边评边学、边学边评,打破‘学’与‘评’的界限,将评价作为学习的强化、深入阶段”<sup>[17]</sup>,凸显评与学、评与教的有机统一。作为一种合作评价方式,“以评为学”打破了以往单一的评价形式。师生互评、生生互评和学生自评是“以评为学”的主要实现路径,有利于全面实现“评学融合”<sup>[17]</sup>。线上“以评为学”环节贯穿整个教学活动,是拓展思政育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英语专业教师可以利用这一环节即时开展线上评价,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意识到自己学习的不足,起到“促学”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帮助教师了解思政育人成效,从而为拓展思政育人奠定基础。

以《英汉/汉英笔译》课程为例。线上“以评为学”环节包括指导检查、任务产出、评价反馈三个部分。首先教师在对所授内容进行归纳总结之后,通过优质的线上教学资源配合和辅助,让学生学习相关网络资源,进一步巩固学生的翻译专业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然后教师设计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将思政元素进一步融入基于学习通平台的小组研讨和视频观摩学习。最后让学生以“汉英翻译与文化”为主题写一篇500字左右的学习心得,并用习近平总书记某一用典的翻译加以说明,通过学习通平台提交作业。在任务产出后,采取线上教师评价、生生互评和学生自评的方式对每个学生的产出成果进行探讨<sup>[18]</sup>。线上“以评为学”环节采用“批判性讨论”的方式组织线上教学,改变了“满堂灌、零互动”的传统教学模式,有助于线上和线下教学流程的密切衔接。而且线上“以评为学”中的评价互动既能增强课程学习的趣味性,又能使学生的情感、态度得到提升,进而提高课程思政育人的成效。

## 三、结语

全程全方位推进英语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既要考虑如何将专业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融合起来,又要思考如何实现专业知识学习与人文情怀培养的“同向同行”“协同共进”“共同发展”,同时这也对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思考和新探索<sup>[19]</sup>。“产出导向法”有助于解决英语专业课程线上线下载育人的有效衔接之困惑。教师按照“驱动—促成—评价”的教学流程,充分发挥“产出导向法”对英语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指导作用,遵循线上“输出驱动”、线下“输入促成”、线上“以评为学”的教学流程,不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兴趣,可以促成学习目标和思政育人目标的达成。



## 参考文献:

- [1] 文秋芳. “一体化”思政育人体系构建与实践应用:以培养“英法双语+专业”国际治理人才为例[J]. 外语界, 2021(2):2-9.
- [2] 余睿,朱晓映. 课程思政语境下的外国文学教学新模式探索[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21(1):109-104.
- [3] 文秋芳. 构建“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4):547-558.
- [4] 张文娟.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实践[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2):106-114.
- [5] 文秋芳. “产出导向法”与对外汉语教学[J]. 世界汉语教学,2018(3):387-400.
- [6] 张佩秋. “产出导向法”促成环节的课堂教学实践研究:以学生多模态口头报告设计为例[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20(3):11-18.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2020-05-28.
- [8] 季薇,桂靖,朱勇. “产出导向法”教学中输入促成环节的设计与实施[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20(3):33-40.
- [9] 王丽丽,张晓慧. 基于产出导向的大学英语混合式“一流课程”建设研究[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21(3):146-151.
- [10] 李楠楠.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英语写作思辨能力培养研究[J]. 高教探索,2021(2):70-74.
- [11] 王宇,杜宛宜,周纯岳,等.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工科ESP课程教学设计框架[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19(1):44-52.
- [12] 张艳.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学术英语》泛在学习模式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2019(3):110-115.
- [13] 杨正军,李勇忠. 翻译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研究[J]. 中国外语,2021(2):104-109.
- [14] 李志英. 高校翻译课程思政教学探索:情感学习理论视角[J]. 外语电化教学,2020(4):22-26.
- [15] 司显柱. 翻译教学的课程思政理念与实践[J]. 中国外语,2021(2):97-103.
- [16] 文秋芳. “产出导向法”的中国特色[J]. 现代外语,2017(3):348-358.
- [17] 关成勇,郭万群. 混合式教学环境下基于POA的英语应用文写作多元评价辩证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2021(2):30-36.
- [18] 刘琛琛,冯亚静.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日语口译”课程教学实践[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19(4):63-69.
- [19] 崔国鑫. 高校外语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思考与探索[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10):37-42.

(责任编辑 许峻)

#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Online and Offline Ideological – political Education of English Major Courses Based on Production – oriented Approach

—Taking Transl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as an Example

GU 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ohu University, Chaohu, Anhui 238000, China)

**Abstract:** Ideological –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urricula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carrying out “three –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English major courses are humanistic, and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Englis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ey also undertake the mission of ideological –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urses, this paper, based on Production – oriented Approach (POA), takes Transl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as an example to probe into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online and offline ideological –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output – driven”, “input – enabled” and “assessment for teaching”, aiming at achieving the integ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knowledge teaching and ideological –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ideological – political education of other courses.

**Key words:** production – oriented approach; ideological –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urses; English major; on-line and offline; effective connection

# 振兴本科教育背景下新建本科高校 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思考

——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

杨 健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 要:**作为高校教学建设和管理的基层单位,基层教学组织的建设质量直接关系到高校内涵式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通过对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基层教学组织的调查,剖析当前新建本科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中的问题,总结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在基层教学组织方面的探索,立足于振兴本科教育,提出了新建本科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建本科高校;基层教学组织;人才培养质量;振兴本科教育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5.021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5-0106-05

2018年,我国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全面振兴本科教育的要求。同年,我国普通本科院校1243所,其中新建本科院校702所,占56.47%,<sup>[1]</sup>从数量上和在校生人数上都占据了我国本科教育的半壁江山。因此提高新建本科高校人才培养水平,既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发展,又关乎振兴本科教育和区域教育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基层教学组织是高校落实教学任务、促进教师教学发展、组织开展学术研究、承担群体性教学活动的最基本教学单位,直接影响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sup>[2]</sup>我国基层教学组织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①1950年开始,以教研组(室)的成立为标志进入建立与发展阶段;②20世纪80年代后,高校基层教学组织日渐式微;③新世纪后,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基层教学组织进入恢复和重振阶段。

新建本科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水平,将直接影响学

校日常教学管理、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 一、新建本科院校建设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势在必行

在高等教育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全面振兴本科教育离不开基层教学组织的底部支撑<sup>[3]</sup>。

(一)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内在要求

近几年,教育部、河南省教育厅都高度重视基层教学组织工作,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设要求。《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20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指出:建立完善基层教学组织,研究制定加强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意见,推动高校以院系为单位,恢复设立或完善教研室等基层教学组织,实现基层教学组织全覆盖、教师全员纳入基层教学组织。2016年河南省教育厅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提高教学水平的指导意见》,文件指出:“基层教学组织根据学校学科专业特点,围绕人才培养目标要求,采取有利于教学活动组织与管理的

收稿日期:2021-08-26

基金项目:2019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以高质量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提升新时代本科教学质量的研究”(2019SJGLX171);郑州地方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第九批项目“应用型本科高校基层教学组织构建研究”(ZZJG-B9018)

作者简介:杨健(1982—),男,河南省郑州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研究。

原则组建,鼓励跨学科、跨院系交叉设立。原则上应涵盖专业或课程的所有任课教师。”河南省教育厅还把优秀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纳入省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制定了省级优秀/合格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标准,并给予优秀基层教学组织专项建设经费推动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可见,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是新建本科高校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大会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内在要求。

(二)提升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水平是解决人才供需结构错位困境的基本举措

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1.55%提升至2020年的54.4%,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跨入普及化教育。随着我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人才需求结构调整,企业用人需求和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不一致导致大量岗位空缺的同时大学生就业难;社会人文需求和高校人才培养现状的不匹配使得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工作能力评价越来越低。因此,改进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成为我国高校,特别是新建本科高校的重要任务。作为教学建设和管理的基层单位,提升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水平能够有效促进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解决人才供需结构错位困境的基本举措。

## 二、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基层教学组织建设调查分析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下文简称“郑工”)前身为中州大学,是一所成立于1980年的市属地方高校,2015年通过教育部批准开始进入本科办学阶段并更名。作为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培养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是学校的重要职责。笔者于2021年6月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摸底了该校基层教学组织的基本情况,回收问卷732份,占当学期全体任课教师(759人)的96.44%;其中,男性占比38.8%、女性占比61.2%,与该校男女教师比基本一致。从覆盖面上保证了调研的有效性。为全面掌握基层教学组织的运行、管理,辅之以访谈、查阅文献资料等调查方式。

### (一)基层教学组织设置基本情况

2019年,为了适应升本后学校快速发展的需要,郑工规划、设立了66个基层教学组织。本次调研样本涵盖了郑工全部基层教学组织。

基层教学组织类别方面,专业类(51个,77.2%)和课程类(15个,22.8%)基层教学组织成员人数分别为11.2和10.6,未设置实践类基层教

学组织。

基层教学组织成员规模方面,10人以下的基层教学组织有32个,占比48.5%,20人以上基层教学组织仅有7个,占比10.6%,表现出规模偏小的现状。

### (二)基层教学组织制度制定及落实情况

自2017年开始,郑工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规章制度,保障了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有章可依。

在本次调研中,部分教师(41人,7.72%)提出了“完善规章制度”的建议。在对其进行深度访谈中,表现出不了解校内相关规章制度,且对规章制度建设完善并无清晰思路。在“教学建设经费”调查中,有三成以上教师不知道其所在基层教学组织是否有建设经费。

### (三)基层教学组织功能发挥情况

通过对落实教学任务、组织教学教研活动、促进教师发展等基层教学组织职能调研发现,教师对基层教学组织的履职整体满意度得分在4.63分,说明基层教学组织履职能力初步展现。

集体教学教研活动频率方面,比较集中在1次/周和1次/2周,占比分别是35.11%和45.08%,但行政兼课教师和外聘教师参加教研活动的频率很低甚至从未参加教研活动。

基层教学组织活动主题方面,基层教学组织教研活动的议题非常多样,包括教学、科研、行政工作、各类迎评检查,真正的教学研究活动比重很小。而且这些教研活动仍以传统的听课评课、集体备课、人才培养修订研讨等内容为主,参加人员以基层教学组织专任教师为主,行政人员、外聘教师、企业行业人员参加极少;跨学院、跨学校、跨学科的基层教学组织的研讨几乎没有。

### (四)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情况

2019年,郑工进行了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的选聘工作,共选聘教研室(系)主任65人,空岗1个。

从学历学位结构看,具有博士学位的10人,占比15.3%,硕士学位51人,占比78.5%,学士学位4人,占比6.2%;从职称结构看,教授7人,占比10.8%,副教授39人,占比60%,讲师19人,占比29.2%;从年龄结构看,40岁(含)以下29人,占比44.6%,40—50岁(含50岁)28人,占比43.1%,50岁以上8人,占比12.3%。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和职称结构比较合理。

## 三、新建本科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振兴本科教育背景下,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具有

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较强的内在动力,但是受新建本科高校的管理体系和教师内生动力等因素的影响,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通过对郑工样本分析,并对比2017—2020年河南省教育厅立项建设的832个优秀基层教学组织的相关数据,归类总结新建本科院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中的问题。

### (一)设置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不足

大多数新建本科高校缺少基层教学组织设置程序、制度、标准,仅仅明确了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的行政级别和任职要求,基层教学组织的设置主要由二级学院根据自身发展需要积极申报,学校审批。这就导致了在学校办学条件保持相对不变的情况下,基层教学组织数量增加,使得基层教学组织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办公场地、资料室等难以保证,严重影响了基层教学组织凝聚力和教研活动的高质量开展。

缺乏校级层面的统筹设计,导致基层教学组织存在类型设置不合理、成员规模差别大等问题。如,郑工基层教学组织最多者达28人,最少者仅有4人,且有10个基层教学组织少于5人,对于基层教学组织职责的落实缺乏人员保障。

### (二)规章制度细化落实欠缺

新建本科高校普遍存在规章制度不系统、不全面、缺乏量化标准,无法全面支撑基层教学组织的高质量运行的情况。国家、省、学校层面都有基层教学组织的建设方案和标准,但是这些标准大多属于指导性、描述性的,缺乏操作性,也没有分别针对专业类、课程类、实践类基层教学组织制定简单、量化的建设标准,这就导致很多基层教学组织成员对如何建设基层教学组织的理解不明晰。其次,大多数学校都有校级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方案,但是与之配套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验室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质量建设等文件的缺失使得基层教学组织的建设缺乏系统制度保障。

### (三)教学教研主体功能弱化

对于新建本科院校来说,组织教学工作、开展教学研究应该是基层教学组织的主体功能。然而在实际运行中,存在明显的主体功能弱化情况。一是承担了大量的行政管理事务,比如接受校内外各种检查评估、完成各种统计报表、传达学习各种会议精神,这些工作严重分散了基层教学组织成员的精力;二是重教学数量轻教学质量,由于体制原因,新建本科院校高校教师的津贴收入分配大多与教学工作量挂钩,教师为了现实利益,往往愿意多上课;而教学质量的衡量往往流于形式,且与现实利益联系不大,

因此教师对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热情并不高;三是重科研轻教研,在现行的高校学科排名和教师职称评定与职位晋升过程中,长期存在重视科研成果忽视对教学工作的考核,这种导向往往引导教师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关乎自身发展的科研工作上,而对教学工作、教学研究缺乏热情,很少参加基层教学组织的活动。

### (四)有责无权,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任职意愿低

受到规模较小和运行惯性影响,新建本科高校普遍存在权利集中在学校层面,作为决定高校办学质量的基层教学组织往往赋予了很多职责,但是缺乏相应的权利,仅仅成为学校教学管理基层执行者。例如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对基层教学组织的经费并没有最终的签字权,对成员的职称晋升、年度考核、教学质量评价的权力也相当有限,这使得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在组织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等需要成员全体参与的工作时,组织能力明显不足,严重影响了基层教学组织的高质量建设。承担大量的工作同时,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并没有适当的回报,在物质激励、职称职务晋升的过程中缺乏足够的支持力度,因此很多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任职意愿低,严重影响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效果。

### (五)教研活动的范围局限、形式单一

由于目前基层教学组织自下而上的组建路径,缺乏全面统筹,未形成“跨、合、融”的层面,导致目前“原班子、原人马”还是做着老事情的局面,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对基层教学组织提出的新要求。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途径应该是形成教学共同体,改变教师在教学、教研过程中单打独斗的局面,通过跨学科、跨学院、跨专业、形式多样的集体教研活动有效推动教学质量提高、教师发展、学生成长<sup>[4]</sup>。

## 四、新建本科院校基层教学组织发展建议

针对当前新建本科院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郑工基层教学建设方面的探索,提出新建本科高校基层教学组织的发展思路。

### (一)科学设置,推进基层教学组织分类建设

新建本科院校应该遵循教学规律,按照学校学科专业分布特点,均衡建设专业类、课程类、实践类基层教学组织。成熟一个、设置一个、建设一个,严格控制学校基层教学组织数量,确保基层教学组织有一定规模,对规模小、实习弱、没有存在必要的基层教学组织进行整合删减,确保所有基层教学组织都能发挥基层教学建设者的作用。

郑工在基层教学组织的规划、设置方面做了一

些探索。如以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为抓手,促进专业内涵式发展组建专业类基层教学组织 51 个;以一流课程建设为抓手,组建课程类基层教学组织 15 个,提高学校基础类课程的教学质量,为提高学生基础素质和专业课程学习奠定良好基础。规划工程训练中心和文科综合实训中心建设实践类基层教学组织,组织积极参与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设置实践教学环节,依托实验室开放项目,统筹安排学校实践类课程,全面提升学校实践类课程质量。

## (二) 优化细化,保证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有章可循

基层教学组织的建设离不开完善的制度保障,高校应该要加强基层教学组织的制度建设,确保做到责权明确,有章可循。首先要出台学校层面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做好顶层设计;其次,各二级学院要按照学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方案,结合学科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实际需要,科学合理明确基层教学组织的具体职能,构建基层教学组织常态化运行机制,从而确保基层教学组织的良性运转。

郑工着力优化细化基层教学组织制度建设。一是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顶层设计,2017 年出台了《郑州工程技术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方案》。二是配套出台确保基层教学组织良性运转的规章制度,如听课制度、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教材建设与管理办法、教学质量优秀奖评选办法、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实施办法等规章制度,强化了教学工作例会制度、期中基层教学组织专项检查制度和基层教学组织年终述职制度,为基层教学组织各项活动的开展提供校级制度支撑,有效地保证了基层教学组织的运行。三是对标对表,以点带面推进全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学校按照省教育厅基层教学组织达标创优工作的要求,对标优秀、合格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标准,针对办公场地不足、课程建设水平低、教学研究成果少等突出问题开展对标建设,加强硬件投入,重点资助优秀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积极推进合格备案基层教学组织创优,形成了所有开设本科专业的学院都有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以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为引领在二级学院内部基层教学组织建设。

## (三) 明确责权,夯实基层教学组织主体功能

基层教学组织是教学工作和教学研究的具體组织和实施者,是落实人才培养任务的主体,因此必须明确职责,确保基层教学组织成员有时间、有精力聚焦课堂教学、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育教学改革、教材建设、教学资源建设、实验室建设、课程思政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从而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基层教学组织成员应该把提高教学水平作为第一要务,树立

科研、教研服务于教学工作的学术观,不是为了评职称而做研究,而是为了解决教育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

郑工在落实基层教学组织主体功能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一是明确基层教学组织的核心功能就是组织教学工作,开展教学研究。学校和二级学院通过调整管理模式为基层教学组织减压,为基层教学组织开展核心工作提供宽松的外部环境。二是推动学校教学质量内涵式建设系统工程,对于教学质量优秀的教师在计算教学工作量时给予工作量系数上浮,对于双语课程、混合式课程等课程建设成果运用于课堂教学的给予工作量系数上浮,在职称评审时明确教学效果优秀是晋升职称的必备条件。三是积极开展教学研究项目,学校持续开展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课程思政建设项目、一流课程建设项目、实验室开放建设项目,对所有校级教研项目都给予一定额度的经费支持,并纳入职称评审指标考核体系,极大地调动了教师们开展教研活动的热情。

## (四) 下移管理重心,打造高素质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队伍

目前我国高校大多实行校院两级管理,几乎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二级学院和行政部门,基层教学组织在人、事、财三方面缺乏话语权,导致基层教学管理工作缺乏主动性,影响了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高校应下移管理重心,赋予基层教学组织相应的人、事、财权,激发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活力。

郑工从人事、事务、财务管理三方面积极赋权,调动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积极性。在人事管理方面,赋予基层教学组织在专业人才引进工作、推荐职称评审候选人、提出各类评优评先人选的权力。比如,开展职称评审、各类评优评先活动时,由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对候选人出具相应的教学教研工作鉴定意见,对长期无视基层教学组织活动和教学教研工作者一票否决。在事务管理方面,赋予基层教学组织在专业建设发展方向、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建设、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标准、对外教学科研交流等权力。在财务管理方面,赋予基层教学组织日常建设和专项建设经费支配的权力,比如学校基于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一定奖励性课时,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按照多劳多得、优劳多得的原则进行分配,从而有效调动成员的积极性。

郑工长期开展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能力提升专项培训,有效提高了负责人的履职能力。为了激励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的工作积极性,学校给予教研

系主任每学年减免额定教学工作量的30%的激励措施,并在评优评先、职称评审方面给予重点考虑。通过选聘、培训、激励,郑工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结构优化、能力提升、任职意愿大幅提升。

(五)拓展范围、丰富形式,推动基层教学组织教研活动取得实效

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应积极推动跨校际、跨院际、跨学科的教研活动,以满足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要。

郑工智能科学与技术虚拟教研室与河南理工大学、郑州轻工业大学、洛阳理工学院四校专业教师、企业导师共同探索共享优质教学资源,推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路径,取得了显著成绩,获批河南省首批虚拟教研室。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办,各基层教学组织承办,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交流与研讨活动,比如读书分享会、教学沙龙、名师示范课,提升了教师们持续学习的热情,营造了善学乐教的氛围。旅游专业以“一个引领”“四个自信”为主线,不断创新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把课程思政嵌入专业课程教学的全过程,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在全校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特殊教育专业与播音与主持专业通过深度合作开设了全媒体即兴手语课程,深受学生欢迎。

## 五、结论

振兴本科教育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成效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能否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合格的人才。新建本科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在提升教学质量、促进教学改革与研究、提高师资队伍业务水平,进而提升学校人才培养质量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十分必要、刻不容缓。各高校要着眼自身情况,不可贪多求全,科学设置,推进基层教学组织分类建设;优化细化规章制度,保证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有章可循;学校、二级学院要为基层教学组织减压,让基层教学组织成员有时间、有精力、有热情聚焦教学教研主体功能;学校要敢于赋权,给予基层教学组织相应的权利,多措并举建立稳定高效的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队伍;推动跨校际、跨院际、跨学科的形式多样的教研活动,确保基层教学组织教研活动取得实效。

## 参考文献:

- [1]2018年全国新建本科院校联席会议召开[EB/OL]. 搜狐网,2021-09-20. [https://www.sohu.com/a/277485633\\_243614](https://www.sohu.com/a/277485633_243614).
- [2]陆国栋,孙健,孟琛,吴华.高校最基本的教师教学共同体:基层教学组织[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4(1):58-65,91.
- [3]洪志忠.高校基层教学组织的变革与发展[J].教育发展研究,2020(19):62-68.
- [4]高丹.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发展研究[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9(9):21-23.

(责任编辑 吕志远)

# Study on the Basic Teaching Organization in Newly - establish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vigorating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ak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YANG Jian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basic teaching organization is the bottom support for teaching management within colleges, its quality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and talent cultivation quality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ts basic teaching organizations. In order to invigorat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sic teaching organization in newly - establish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Key words:** newly - establish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y; basic teaching organization; cultivation quality of talents; invigorating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 6-苯基菲啶类有机生色团的合成方法及应用

秦小转, 周烽海, 乔瀚东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菲啶类有机生色团是一类重要的含氮杂环有机生色团,是天然产物和药物合成的重要中间体。本文综述了近年来6-苯基菲啶类有机生色团的合成方法,主要有分子内环化法和 Pictet-Spengler 反应法,这些方法通常需要在高温、过渡金属催化、酸(Lewis 酸、Bronsted 酸等)催化、多步串联条件下进行,而在温和条件下(无酸、室温)合成的报道极少。同时对其在光物理和光化学性质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报道,并对其应用前景作了展望。

**关键词:**6-苯基菲啶类; 有机化合物; 合成方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5.022

**中图分类号:**0626.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5-0111-05

菲啶类有机生色团是一类重要的含氮有机化合物,分子结构中通常含有较复杂的氮杂环,主要由 C, H, O, N 四种元素组成,少数还含有 S, Cl 等元素,是天然产物和药物合成的重要中间体。菲啶类结构单元广泛存在于天然产物<sup>[1]</sup>、药物<sup>[2]</sup>和有机功能材料中<sup>[3]</sup>。例如,两面针碱(Nitidine)和花椒宁碱(Fagaronine)具有重要的抗癌活性,白屈菜赤碱(Chelerythrine)具有抗细胞毒素、抗菌等活性。基于菲啶类有机生色团具有的生物活性和光电性质,找到其高效的合成方法在药物化学领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1 6-苯基菲啶类有机生色团的合成方法

### 1.1 分子内环化法

目前,合成菲啶类有机生色团的各种方法被广泛报道,其中通过邻取代二芳基分子的分子内环化法为主要合成方法。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类:自由基环合法<sup>[4]</sup>、苯炔法<sup>[5]</sup>、多组分一锅串联法<sup>[6]</sup>、光化学法<sup>[7]</sup>、微波促进法<sup>[8]</sup>和过渡金属催化法<sup>[9]</sup>。然而这些合成方法仍存在许多不足,例如:反应原料受限

制、反应条件严格、步骤较多、需要催化剂、产率不高、应用性低等。

近年来,合成6-取代菲啶的方法被陆续报道,主要有:

2006年,SHOU等<sup>[10]</sup>报道了以2-羧基重氮盐、芳胺、芳醛为底物,在80℃无催化剂的条件下串联法合成6-芳基菲啶类有机生色团的方法(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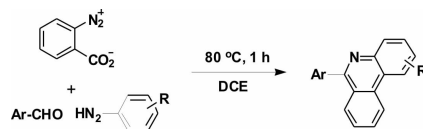


图1 SHOU等报道的6-取代菲啶类有机生色团

2014年,XIA等<sup>[11]</sup>报道了一系列通过芳胺与2-异氰基联苯类衍生物且不需要过渡金属催化一锅法合成菲啶衍生物的方法。这是一种快速的、取得高产率但溶剂要求苛刻的合成菲啶衍生物的方法(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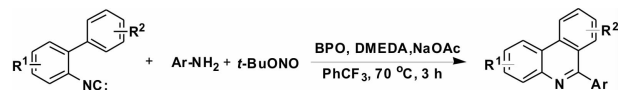


图2 XIA等报道的6-取代菲啶类有机生色团

收稿日期:2021-08-18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212102210463);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基础研究计划(20B150026, 20B150029);2020年度河南省本科高校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S202011068001);2019年度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1911068030)

作者简介:秦小转(1988—),女,河南邓州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有机纳米材料设计、合成与应用。

2014年,马丽芳等<sup>[12]</sup>报道了芳基格氏试剂与5-甲氧基菲啉-6(5H)-酮反应得到菲啉类有机生色团的方法(图3,3a)。该方法的反应条件温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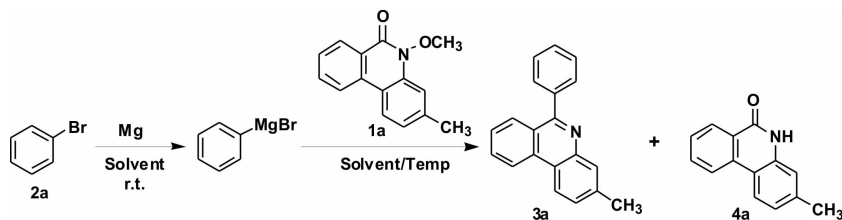


图3 马丽芳等报道的6-取代菲啉类有机生色团

2015年,GUO等<sup>[13]</sup>报道了以2-异硫氰酸酯联苯和二芳基碘鎓盐为底物在铜催化下合成构建菲啉有机生色团的方法(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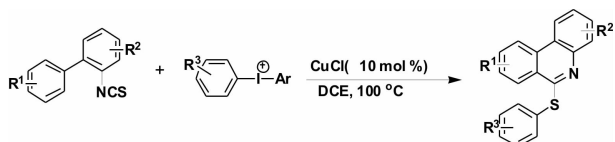


图4 GUO等报道的6-取代菲啉类有机生色团

综上所述,上述合成6-取代菲啉类有机生色团的方法的主要缺点是需要复杂的原料为底物,如邻位官能团化的联苯类有机生色团。因此,寻找高效、简便、条件温和的合成6-取代菲啉类有机生色团的新方法首先需要一种简单易得的底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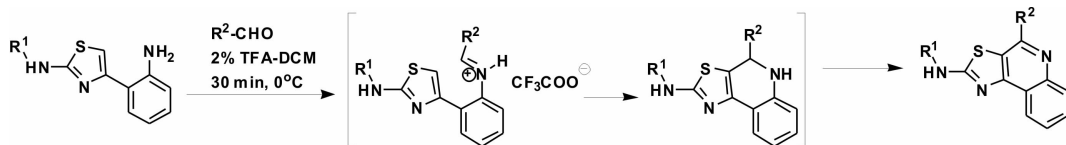


图5 DUGGINENI等报道的合成6-苯基菲啉类有机生色团

2009年,YOUN等<sup>[16]</sup>报道了2-芳胺类分子和芳醛在酸性条件下合成6-苯基菲啉类有机生色团的方法。只有当加入强酸且升温到120 °C,反应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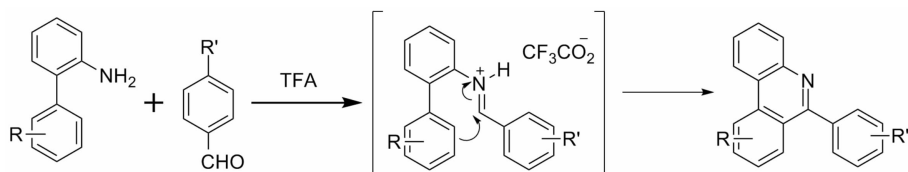


图6 YOUN等报道的合成6-苯基菲啉类有机生色团

2013年,ZHENG等<sup>[17]</sup>报道了以萘基苯硼酸和芳醛为底物,在酸催化条件下一锅法合成6-苯基萘基菲啉类有机生色团的方法。研究表明当反应温度升到140 °C时,产率才能达到70%以上(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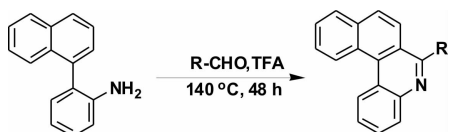


图7 ZHENG等报道的合成6-苯基萘啉类有机生色团

操作简便,产率较高,但是当烷基溴化镁与5-甲氧基菲啉-6(5H)-酮反应时,只得到了菲啉-6(5H)-酮类有机生色团(图3,4a)。

## 1.2 Pictet - Spengler 反应法

近年来,通过 Pictet - Spengler 反应<sup>[14]</sup>来构建6-取代菲啉类有机生色团渐渐成为主要的方法,此反应通常在 Lewis 酸、Bronsted 酸、多步串联条件下进行。

2006年,DUGGINENI等<sup>[15]</sup>报道了一系列以噻唑(吡唑)基芳胺和芳醛为底物,在0 °C,2% TFA条件下或者p-TsOH、回流条件下合成6-苯基菲啉类有机生色团的方法。其反应机理是底物在酸质子催化条件下通过 Pictet - Spengler 分子内环化反应合成得到中间体6-苯基-5,6-二氢菲啉,然后在氧化剂条件下得到6-苯基菲啉类有机生色团(图5)。

h时,产率才得以提高。其反应机理可能是胺醛缩合生成希夫碱,然后通过 Pictet - Spengler 分子内芳构化反应得到6-苯基菲啉类有机生色团(图6)。

2014年,ZHANG等<sup>[18]</sup>报道了以芳香胺和芳醛类在 Bronsted 酸催化条件下合成6-苯基菲啉类有机生色团的方法。其反应机理是:胺醛在 Bronsted 酸催化下缩合生成希夫碱,然后胺基上的孤对电子进攻双键发生分子内重排,进而在氧催化下去质子化后得到6-苯基菲啉类有机生色团(图8)。

2014年,HANDY等<sup>[19]</sup>报道了在无酸条件下通过 Pictet - Spengler 反应合成咪啉,但是反应需要在低共熔溶剂(如氯化胆碱/尿素)中温度为80 °C



的条件下进行(图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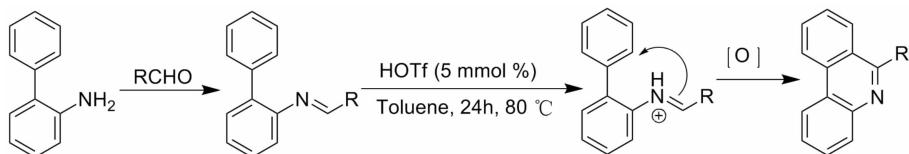


图8 ZHANG 等报道的 Bronsted 酸催化合成 6-苯基菲啶类有机生色团

2017 年, QIN 等<sup>[20]</sup>报道了在 2'-氨基-1,1'-联苯的 3 位上引入了羟基, 并且用一锅法在无酸室温条件下设计合成了一系列含 6-苯基菲啶片段的有机生色团。这是首次成功在温和无酸条件下合成含菲啶片段的有机生色团(图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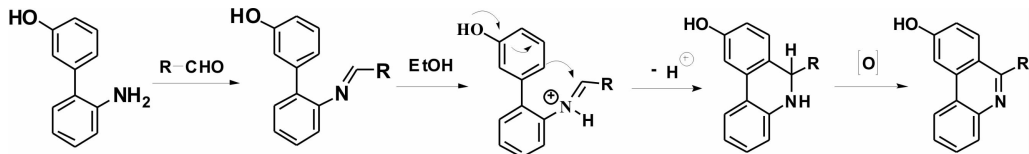


图 10 一锅法合成 6-苯基菲啶类有机生色团的路线及反应机理

## 2 6-苯基菲啶类有机生色团的研究现状

6-取代菲啶类有机生色团因具有很好的生物活性而存在于许多天然产物中, 并且此类有机生色团的合成及应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然而, 对其光物理和光化学性质的研究的报道较少。

2005 年, ZHANG 等<sup>[21]</sup>报道了苯基菲啶类染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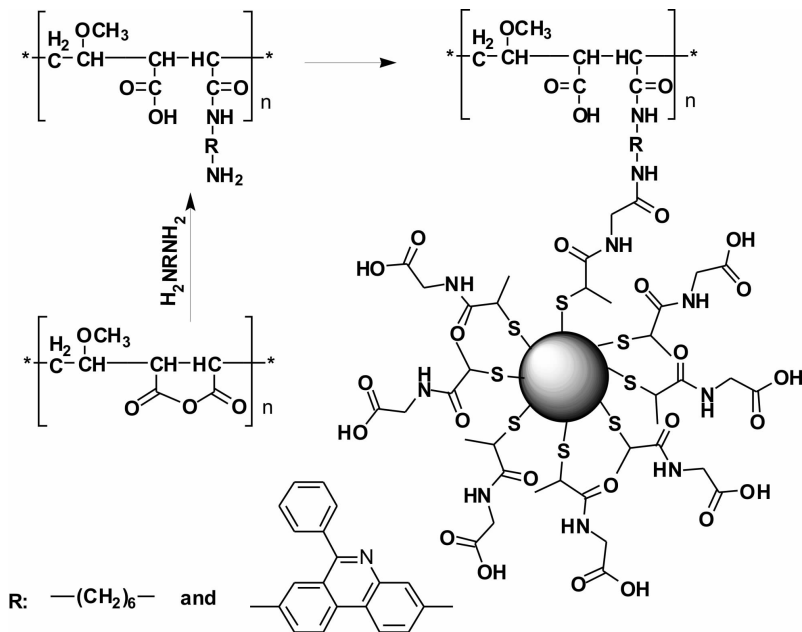


图 11 ZHANG 等报道的苯基菲啶银纳米聚集体

2013 年, SICILIA 等<sup>[22]</sup>报道了以 3,8-二硝基-6-苯基菲啶(HC<sup>^</sup>N)为底物和不同金属钯复合物形成的配体 3-6, 在 CH<sub>2</sub>Cl<sub>2</sub> 中的紫外吸收光谱表明, 相较于 HC<sup>^</sup>N 的吸收峰, 配体 3-6 在 390 nm 左右表现出很强的吸收峰( $\epsilon > 104 \text{ M}^{-1} \text{ cm}^{-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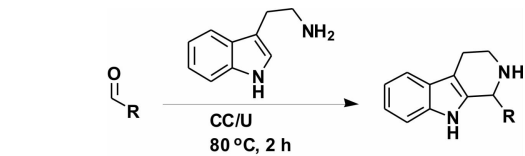


图 9 HANDY 等报道的合成咪啶类有机生色团

通过配体交换法在金属芯的表面形成聚合物, 聚集的银纳米颗粒在 440 nm 处吸光度增强, 吸光强度增强约 2 倍。随着等离子体激发的粒子聚集增加, 聚合物在 400 nm 处被 3,8-二氨基-6-苯基菲啶标记(图 11)。

是配体内  $\pi - \pi^*$  跃迁引起的吸收峰<sup>[39-41]</sup>; 而在 390 ~ 550 nm 的吸收峰则比较弱 ( $\epsilon = 9137 - 15221 \text{ M}^{-1} \text{ cm}^{-1}$ ), 而且发生红移<sup>[42]</sup>。室温下的激发光谱和紫外吸收光谱表现出一致性。在 77 K(玻璃态)下的荧光发射光谱发现, 配体 3-6 表现出橘红色的

磷光现象。HC<sup>^</sup>N 则为绿色的磷光现象(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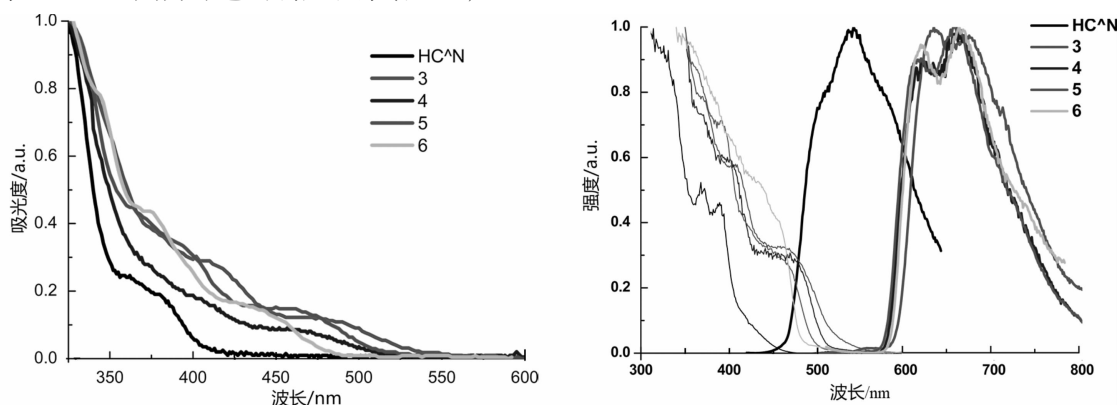


图 12 (左)HC<sup>^</sup>N 和配体 3-6 在 CH<sub>2</sub>Cl<sub>2</sub> 中的归一化紫外吸收光谱 (10<sup>-5</sup> M);(右)77 K(玻璃态)下 HC<sup>^</sup>N 和配体 3-6 在溶液中的归一化的激发光谱和发射 (10<sup>-5</sup> M, 2-Me-THF for 3-5, CH<sub>2</sub>Cl<sub>2</sub> for 6)

2017 年, QIN 等<sup>[23]</sup>报道了一锅法合成的含羟基的 6-苯基菲啉类有机生色团在良性与不良性混合体系中, 形成了纳米聚集体, 并观察到了荧光强度

逐渐增强的现象。同时探究了该类分子在离子识别领域的应用也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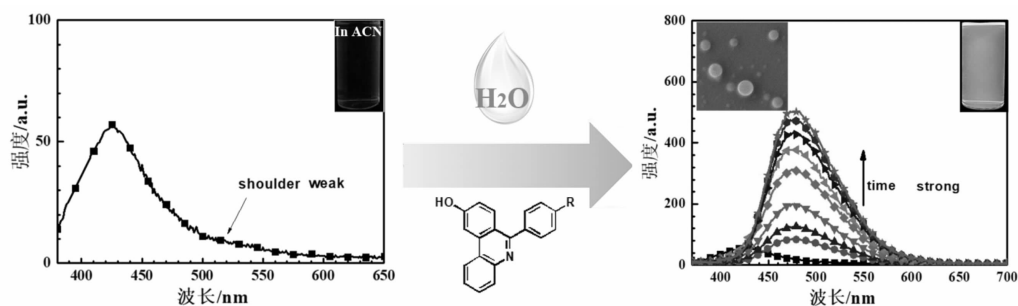


图 13 室温下 6-苯基菲啉类有机生色团在 MeCN/H<sub>2</sub>O 溶液的荧光增强现象

### 3 结语

目前, 6-取代菲啉类有机生色团的合成方法主要是通过分子内环化法和 Pictet-Spengler 反应来构建 6-取代菲啉类有机生色团, 这些方法通常需要在高温、过渡金属催化、酸(Lewis 酸、Bronsted 酸等)催化、多步串联条件下进行, 而在温和条件下(无酸、室温)合成的报道极少。因此, 寻找高效、简便、条件温和的合成 6-取代菲啉类有机生色团的新方法首先需要一种简单易得的底物。本文也综述了该类分子在光物理和光化学性质方面的研究报道, 尤其是在离子识别领域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

#### 参考文献:

[1] KOBAYASHI E, KISHI A, TOGO H. 6-Arylphenanthridines from Aryl o-Biaryl Ketones with 1, 1, 1, 3, 3, 3-Hexamethyldisilazane and Molecular Iodine[J]. Eur J Org Chem, 2019(44):7335-7347.  
 [2] THIRUPATAIAH B, REDDY G S, GHULE S S, et al. Synthesis of 11,12-Dihydrobenzo[c]phenanthridines via a Pd-catalyzed Unusual Construction of Isocoumarin ring/FeCl<sub>3</sub>-mediated Intramolecular Arene-allyl Cyclization;

First Identification of a Benzo[c]phenanthridine based PDE4 Inhibitor[J]. Bioorg Chem, 2020, 97:103691.  
 [3] ARASAKUMAR T, SHYAMSIVAPPAN S, GOPALAN S, et al. One-Pot Approach to Pyrido-4-phenanthridinones by Palladium-Catalyzed Annulation of 4-Quinolones with 2-Bromobenzyl Bromides[J]. Synlett, 2019, 30(1):63-68.  
 [4] FEILCKE R, GODDARD R, IMMING P, et al. A Structural Study of Seven N-acylindolines and Their Pd(II)-mediated Intramolecular Oxidative Coupling Reactions for the Synthesis of Pyrrolophenanthridone Alkaloids[J]. J Mol Struct, 2019, 1178:341-351.  
 [5] FANG B, HOU J, TIAN J, et al. Synthesis of Phenanthridines by I<sub>2</sub>-mediated sp<sup>3</sup> C-H amination[J]. Org Biomol Chem, 2020, 18(17):3312-3323.  
 [6] SHABASHOV D, DAUGULIS O. Palladium-catalyzed Anilide Ortho-arylation and Subsequent One-pot Cyclization to Phenanthridines[J]. J Org Chem, 2007, 72:7720-7725.  
 [7] LINSSENMEIER A M, WILLIAMS C M, BRSE S. Synthesis of Phenanthridine Derivatives via Photolysis[J]. J Org Chem, 2011, 76:9127-9132.

- [8] READ M L, GUNDERSEN L L. Synthesis of Phenanthridine Derivatives by Microwave – Mediated Cyclization of *o* – Furyl (allylamino) arenes [J]. *J Org Chem*, 2013, 78: 1311 – 1316.
- [9] FAN J, LI L, ZHANG J, et al. Expeditious Synthesis of Phenanthridines through a Pd/MnO<sub>2</sub> – Mediated C – H Arylation/oxidative Annulation Cascade from Aldehydes, Aryl Iodides and Amino Acids [J]. *Chem Commun*, 2020, 56 (18):2775 – 2778.
- [10] SHOU W G, YANG Y Y, WANG Y G. Cascade Approach to Substituted 6 – aryl – phenanthridines from Aromatic Aldehydes, Anilines, and Benzenediazonium – 2 – carboxylate [J]. *J Org Chem*, 2006, 71:9241 – 9243.
- [11] XIA Z, HUANG J, HE Y, et al. Arylative Cyclization of 2 – Isocyanobiphenyls with Anilines: One – Pot Synthesis of 6 – Arylphenanthridines via Competitive Reaction Pathways [J]. *Org Lett*, 2014, 16(9):2546 – 2549.
- [12] 马丽芳, 吕文贤, 黄丹凤, 等. 菲啉类化合物的合成新方法[J]. *有机化学*, 2014, 34:962 – 967.
- [13] GUO W, LI S, TANG L, et al. Synthesis of 6 – (arylthio) Phenanthridines by Copper – catalyzed Tandem Reactions of 2 – biarylisothiocyanates with Diaryliodonium Salts [J]. *Org Lett*, 2015, 17(5):1232 – 1235.
- [14] PICTET A, SPENGLER T. über die Bildung von Isochinolin – derivaten durch Einwirkung von Methylal auf Phenyl – thylamin, Phenyl – alanin und Tyrosin [J]. *Ber der Chem Ges*, 1911, 44:2030 – 2036.
- [15] DUGGINENI S, SAWANT D, SAHA B, et al. Application of Modified Pictet – Spengler Reaction for the Synthesis of Thiazolo and Pyrazolo – quinolines [J]. *Tetrahedron*, 2006, 62(14):3228 – 3241.
- [16] YOUN S W, BIHN J H. Trifluoroacetic Acid – mediated Facile Construction of 6 – Substituted Phenanthridines [J]. *Tetrahedron Lett*, 2009, 50:4598 – 4601.
- [17] ZHENG Y H, LU H Y, LI M, et al. Synthesis, Structures, and Optical Properties of aza[4]Helicenes [J]. *Eur J Org Chem*, 2013, 15:3059 – 3066.
- [18] ZHANG X, XU X, YU L, et al. Bronsted Acid – mediated Reactions of Aldehydes with 2 – Vinylniline and Biphenyl – 2 – amine [J]. *Tetrahedron Lett*, 2014, 55: 2280 – 2282.
- [19] HANDY S, WRIGHT M. An Acid – free Pictet – Spengler Reaction using Deep Eutectic Solvents (DES) [J]. *Tetrahedron Lett*, 2014, 55(23):3440 – 3442.
- [20] QIN X, DING G, LUO Z, et al. A Mild Acid – free One – pot Reaction for Synthesis of New Phenanthridine Dyes [J]. *Dyes and Pigments*, 2016, 134:613 – 617.
- [21] ZHANG J, LAKOWICZ J. R. Enhanced Luminescence of Phenyl – phenanthridine Dye on Aggregated Small Silver Nanoparticles [J]. *J Phys Chem: B*, 2005, 109 (18): 8701 – 8706.
- [22] SICILIA V, FUERTES S, MARTÍN A, et al. N – Assisted CPh – H Activation in 3,8 – Dinitro – 6 – phenylphenanthridine. New C, N – Cyclometalated Compounds of Platinum(II): Synthesis, Structure, and Luminescence Studies [J]. *Organometallics*, 2013, 32(15):4092 – 4102.
- [23] QIN X, DING G, WANG Z, et al. Nano Aggregates of Amphiphilic Phenanthridine Dyes for Reversible Excited State Proton Transfer [J]. *Dyes Pigments*, 2017, 145: 538 – 541.

(责任编辑 吕志远)

## Synthesis and Application of 6 – Phenylphenanthridine Organic Chromophores

QIN Xiaozhuan, ZHOU Fenghai, QIAO Handong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 Food Scienc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Phenanthroline organic chromophores are important heterocyclic organic chromophores, which are important intermediates of natural products and drug synthesis. In this paper, the synthesis methods of 6 – phenylphenanthridine organic chromophores in recent years were reviewed, and the prospect of their application is prospected, which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by future scientists.

**Key words:** 6 – phenanthridine dye; organic compounds; synthetic method

# 山药多糖含量测定方法优化的研究

郑丽萍, 朱重阳, 张小梅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探究采用电导率仪测定山药多糖含量方法的可行性。采用三水平四因素正交试验对苯酚-硫酸法测定山药多糖含量的方法进行优化设计,结果表明,影响吸光度值的四个因素的主次顺序为硫酸用量>显色温度>5%的苯酚用量>显色时间。最优测试条件:硫酸加入量为7 mL,显色温度为30℃,5%的苯酚溶液使用量为1.0 mL,显色时间为30 min。不同葡萄糖浓度下的电导率,证实了葡萄糖的电导率与其浓度存在非常好的线性关系。在优化条件下,以葡萄糖标准溶液为参照,进一步测得山药多糖的电导率与其浓度同样存在线性关系。

**关键词:**山药多糖;苯酚-硫酸法;线性回归方程;电导率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5.023

**中图分类号:**TS255.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5-0116-04

山药可用于药物和食物,具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sup>[1]</sup>,其中有两种酸性多糖和一种中性多糖的多糖类成分是山药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sup>[2]</sup>,表现出增加人体免疫力、抗衰老、抗突变、抗氧化、抑制肿瘤和降低血糖等生理功能<sup>[1-4]</sup>,在医疗保健范畴具有宽广的运用前景。目前,实验室对于山药多糖的提取多采用溶剂提取法,即通过水或体积分数较高的乙醇水溶液等,利用溶质在提取剂中的扩散过程将山药多糖提取出来,得到粗多糖<sup>[4-6]</sup>。此外,山药多糖的提取方法还有超声波辅助提取法、微波辅助提取法和酶法,以及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多种方法结合使用等技术<sup>[7-8]</sup>。按上述方法提取的多糖一般含有杂质,为了提高多糖提取率和纯度,还需要将蛋白质、脂肪、色素等杂质分别除去<sup>[9]</sup>。山药多糖含量的测定方法常用苯酚-硫酸法和蒽酮-硫酸法<sup>[10-11]</sup>,另外也可以用HPLC法,但测量前需要尽可能去除色素、蛋白、单糖、低聚糖等<sup>[10]</sup>。

本文采用三水平四因素正交试验对苯酚-硫酸法测定方法进行优化设计,利用电导率仪测定山药在不同条件下的电导率,研究山药多糖溶液的电导

率与其多糖含量之间的关系,探讨利用电学特性进行多糖含量预估的可行性。

## 1 材料与方法

### 1.1 材料

铁棍山药:产自河南省焦作温县;苯酚、浓硫酸、葡萄糖、乙醇、氯化钾:均为分析纯。

### 1.2 主要仪器与设备

DHG-9053A 电热鼓风干燥箱: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400A 多功能粉碎机:永康市红太阳机电有限公司;HPC07SC-数显加热磁力搅拌器:美国A PLUS有限公司;AE124 分析天平:上海舜宇恒平科学仪器;UV-1800 紫外分光光度计:上海美谱达仪器有限公司;TG16 台式离心机:上海卢湘仪离心机仪器有限公司;SLDS-1 电导率仪:南京桑力电子设备厂;DJS-1C 电导电极(铂黑):上海罗素科技有限公司。

### 1.3 实验方法

#### 1.3.1 铁棍山棍的预处理和多糖的提取

选取新鲜的山药切成薄片,去皮,清洗,切成2~3 mm的薄片。将山药片放入电热鼓风干燥箱60~

收稿日期:2021-08-15

基金项目: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项目(210004);河南省2018年度科技攻关项目(182102110126)

作者简介:郑丽萍(1986—),女,河南郑州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新型材料开发及其性能研究。

90℃加热6~8h,直至山药的失重比基本保持不变,得到白色的干燥山药片,如图1a所示。随后,将干燥的山药片用粉碎机制成山药粉,如图1b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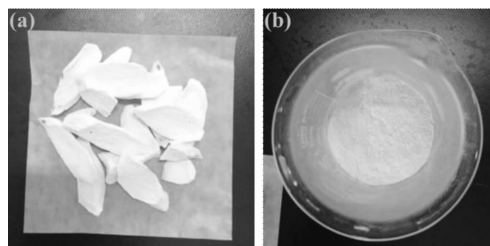


图1 实验过程中的山药片(a)和山药粉(b)的外观形貌

实验采用水煮醇沉法提取山药多糖。通过料液比、提取时间、提取温度、乙醇浓度4个因素进行正交试验设计,得出较高的山药多糖提取率的最优方案。高行恩<sup>[7]</sup>采用水煮醇沉法山药多糖提取最佳方案,得出山药多糖的提取率为7.57%,本试验得到的山药多糖提取率为3.44%。

### 1.3.2 铁棍山药多糖的含量测定

称取0.0101 g葡萄糖于50 mL烧杯中,加水溶解,转入100 mL容量瓶中,用蒸馏水定容,摇匀,制备成葡萄糖标准溶液备用。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出口植物源食品中粗多糖的测定苯酚-硫酸法》(SN/T 4260—2015)<sup>[12]</sup>,用移液管分别吸取葡萄糖对照品溶液0.00,0.20,0.40,0.60,0.80,1.00 mL,置于25 mL具塞试管中,再分别加入蒸馏水至体积为1.0 mL,加入1.0 mL 5%的苯酚和5 mL硫酸,混合均匀后置于数显加热磁力搅拌器,于30℃显色20 min,在490 nm处测定吸光度,空白对照以蒸馏水代替葡萄糖溶液。以葡萄糖浓度为横坐标,吸光度为纵坐标,制作标准曲线。

称取0.0139 g山药粗多糖于烧杯中,加入蒸馏水搅拌溶解,转入100 mL容量瓶中,加水定容,摇匀后,将待测溶液用1 mL移液管精密移取到具塞试管中,测定吸光度,根据标准曲线计算出山药多糖含量。计算式为

$$\omega = \frac{m_1}{m_2} \times \frac{V_1}{V_2} \times 0.9 \times 10^{-4}$$

式中: $\omega$ —样品多糖含量质量分数,g/100 g;

$m_1$ —根据标准曲线计算出的样品含糖量, $\mu\text{g}$ ;

$V_1$ —样品定容体积,mL;

$V_2$ —比色测定时加入样品液体积,mL;

$m_2$ —样品质量,g;

0.9为葡萄糖换算成葡聚糖的校正系数。

### 1.3.3 苯酚-硫酸法测定山药多糖含量方案的优化

吸取1.00 mL样品液进行单因素试验,实验选择5%的苯酚用量、硫酸用量、显色时间以及显色温

度进行单因素试验,因素水平见表1。根据单因素实验结果,选取苯酚用量(A)、硫酸用量(B)、显色温度(C)、显色时间(D)为考察因素,采用正交实验设计,在490 nm处分别测定吸光度,优化分析测定条件。

表1 正交试验的因素水平表

水平	因素			
	显色时间/min (D)	苯酚用量/mL (A)	硫酸用量/mL (B)	显色温度/℃ (C)
1	0.6	5	20	20
2	0.8	6	30	30
3	1.0	7	40	40

### 1.3.4 葡萄糖和山药多糖溶液电导率的测定

称取葡萄糖1.0000 g,用蒸馏水定容至100.00 mL。移取葡萄糖溶液5.00,10.00,15.00,20.00,25.00 mL,分别稀释定容至50.00 mL。将稀释溶液按浓度从低到高的顺序适量倒入1至5号试管中,保证液体恰好能淹没电导电极的极板。测试不同浓度葡萄糖溶液的电导率,观察葡萄糖浓度与电导率的关系。

称取山药多糖0.0139 g,用蒸馏水定容至100.00 mL。移取葡萄糖溶液5.00,10.00,15.00,20.00 mL,分别置于50 mL容量瓶中加入蒸馏水定容。将稀释溶液按浓度从低到高的顺序适量倒入1至4号试管中,保证液体恰好能淹没电导电极的极板。最后用SLDS-I型电导率仪测不同浓度山药多糖溶液的电导率,观察山药多糖浓度与电导率的关系。

## 2 结果与分析

### 2.1 苯酚-硫酸法测定山药多糖含量的方法研究

#### 2.1.1 标准曲线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出口植物源食品中粗多糖的测定苯酚-硫酸法》(SN/T 4260—2015)<sup>[12]</sup>配制葡萄糖标准溶液,用数显加热磁力搅拌器于30℃显色20 min,在490 nm处测定吸光度,空白对照以蒸馏水代替葡萄糖溶液。制作标准曲线和回归方程,将所测吸光度与葡萄糖浓度作散点图,并标出其标准曲线,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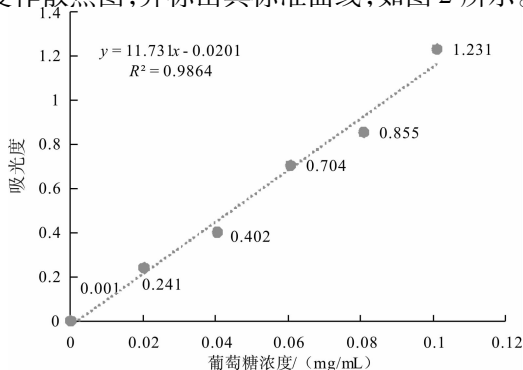


图2 葡萄糖溶液的吸光度与其浓度之间的标准曲线

由图2可知,葡萄糖标准曲线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y = 11.731x - 0.0201$ ,  $R^2 = 0.9864$ 。其中  $y$  为吸光度,  $x$  为葡萄糖溶液浓度 (mg/mL)。该葡萄糖溶液浓度在 0.02 ~ 0.1 mg/mL 时,标准曲线线性关系良好,为山药多糖的测定提供参照。

实验所测山药多糖样品的吸光度为 0.445,按葡萄糖标准曲线线性回归方程  $y = 11.731x - 0.0201$  计算得出  $x = 0.0396$  mg/mL,再按照山药多糖含量计算式得出山药多糖含量为 25.64 g/100 g。

### 2.1.2 苯酚-硫酸法测定山药多糖含量方法的优化

苯酚-硫酸法测定山药多糖含量正交优选设计及结果见表2。

对表2进行正交试验结果直观分析,计算极差,确定影响因素的主次顺序。 $K_i$  表示所对应的实验结果之和,同理可得其他  $k$  值。另外  $k_i = K_i/3$ ,极差  $R = \max\{k_1, k_2, k_3\} - \min\{k_1, k_2, k_3\}$ 。

由正交试验结果得出,影响吸光度值的四个因素的主次顺序依次为硫酸用量(B)、显色温度(C)、5%的苯酚用量(A)、显色时间(D),最佳设计方案组合为 A3B3C2D2,即硫酸加入量为 7 mL,显色温度为 30℃,5%的苯酚溶液使用量为 1.0 mL,显色时间为 30 min。在最佳测定方案下,所测得的山药多糖含量为 33.99 g/100 g。

表2  $L^9(3^4)$  正交优选设计及结果

实验号	因素				吸光度
	A	B	C	D	
1	1	1	1	1	0.303
2	1	2	2	2	0.456
3	1	3	3	3	0.465
4	2	1	2	3	0.428
5	2	2	3	1	0.365
6	2	3	1	2	0.541
7	3	1	3	2	0.373
8	3	2	1	3	0.405
9	3	3	2	1	0.596
$K_1$	1.224	1.104	1.249	1.264	
$K_2$	1.334	1.226	1.480	1.370	
$K_3$	1.374	1.602	1.203	1.298	
$k_1$	0.408	0.368	0.416	0.421	
$k_2$	0.445	0.409	0.493	0.457	
$k_3$	0.458	0.534	0.401	0.433	
R	0.050	0.166	0.092	0.036	

## 2.2 山药多糖的电学性能研究

### 2.2.1 葡萄糖溶液的电导率

将铂黑电导电极 ( $K = 1.061$ ) 放入 0.01 mol/L 氯化钾溶液中,选取 20 到 200  $\mu\text{s}/\text{cm}$  的量程,进行校准,测量其氯化钾溶液电导率为 2.161  $\text{ms}/\text{cm}$ 。之后进行葡萄糖各系列稀释溶液的电导率测量。将所测电导率与葡萄糖质量浓度作散点图,并标出其标准曲线,如图3所示。

由图3可知,葡萄糖溶液在 25℃、浓度在 1.0 ~

5.0g/L 时,其浓度与电导率呈良好的线性关系,线性回归方程为  $y = 3.053x + 3.627$ ,  $R^2 = 0.9906$ 。设置仪器为 25℃ 时,48h 内对同一批葡萄糖溶液进行电导率测量,发现在不同时间测定的平均电导率值接近第一次测量数据,表明电导率与葡萄糖浓度的关系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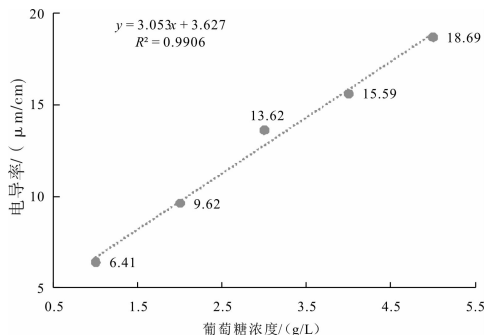


图3 葡萄糖的电导率与其浓度之间的关系曲线

### 2.2.2 山药多糖溶液的电导率

由图4可知,山药多糖溶液在 25℃、浓度在 0.0139 ~ 0.0556 g/L 时,浓度与电导率呈一般的线性关系,线性回归方程为  $y = 543.24x + 3.695$ ,  $R^2 = 0.95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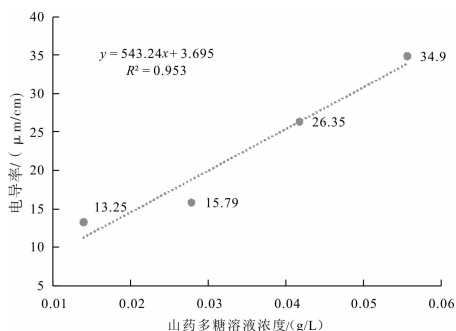


图4 山药多糖溶液的电导率与其浓度之间的关系曲线

通过比较相关系数,发现山药多糖溶液比葡萄糖溶液的相关系数低,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1)山药多糖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部分成分能表现出导电的性能,而部分成分的溶解性很差,导致电导率测试存在误差;(2)山药多糖在测电导率时,溶液里自由离子不稳定,导致测出来数值不准确。葡萄糖溶液的相关系数  $R^2$  为 0.9906,葡萄糖溶液的相关系数  $R^2$  为 0.953,这也说明糖类物质可以通过测电导率来计算其含量。

## 3 结论

以河南焦作温县的铁棍山药为例,系统研究了山药多糖的提取,苯酚-硫酸法测定多糖含量方法的优化设计,以及多糖含量与电学性能的关系,并针对研究进行了实验设计和分析。主要研究内容与实验结果如下:

(1)采用水煮醇沉法提取山药多糖提取,并对苯酚-硫酸法测定山药多糖的含量的方法进行优化。选取了四个因素进行单因素试验,在其试验的基础上进行了正交实验优化设计,以此得出最佳设计方案组合为  $A_3B_3C_2D_2$ ,即最佳的工艺条件为硫酸加入量为 7 mL,显色温度为 30℃,5%的苯酚溶液使用量为 1.0 mL,显色时间为 30 min。

(2)在最优条件下,葡萄糖溶液质量浓度与电导率呈良好的线性关系,线性回归方程为  $y = 3.053x + 3.627, R^2 = 0.9906$ 。山药多糖溶液的质量浓度与电导率呈较好的线性关系,线性回归方程为  $y = 543.24x + 3.695, R^2 = 0.953$ 。可依据该回归方程得出样品溶液所测得电导率,进而得出样品多糖的含量。

本文不仅对常用的苯酚-硫酸法测定山药多糖的方法进行了优化,而且对多糖含量的测定方法开拓了新的测定方法,即通过山药多糖的电学性能测定多糖含量,主要研究了山药多糖的电导率与其质量浓度之间的关系,建立方程,并以此计算出其中的多糖含量。由实验结果可知,山药多糖的浓度越大,电导率越高,且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这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

#### 参考文献:

- [1] 龚凌霄,池静雯,王静,等. 山药中主要功能性成分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进展[J]. 食品工业科技,2019,40(16): 312-319.
- [2] 秦婷,郭金甲,刘井利,等. 山药多糖的研究进展[J]. 中

国当代医药,2013,20(13):20-21,25.

- [3] 孔晓朵,白新鹏. 山药的活性成分及生理功能研究进展[J]. 安徽农业科学,2009,37(13):5979-5981.
- [4] 惠秋沙. 山药中多糖的提取及含量测定方法[J]. 农产品加工(学刊),2011(8):107-108.
- [5] 姜军. 山药多糖的分离纯化及其化学结构的初步研究[D]. 江苏:扬州大学,2007.
- [6] YANG W, WANG Y, LI X, et al. Purification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zation of chinese yam polysaccharide and its activities[J]. Carbohydrate Polymers, 2015,117(5):1021-1027.
- [7] 高行恩,王洪新. 不同提取方法对山药多糖含量及其体外抗氧化活性的影响[J]. 食品与发酵工业,2015,41(7):256-262.
- [8] 舒锐,姚甜甜,李燕,等. 山药多糖的提取技术研究进展[J]. 中国甜菜糖业,2015(3):28-29.
- [9] 余芳,朱秋红. 山药多糖提取纯化工工艺研究进展[J]. 江苏调味副食品,2013(2):13-16.
- [10] 刘明月,周维群,邹荣灿. 山药多糖提取分离纯化及生物活性的研究进展[J]. 现代农业科技,2019(22): 171-172,176.
- [11] ASAI G, ZHANG C, WANG Y, et al. Study for high throughput anthrone-sulfuric acid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polysaccharides[J]. Journal of Animal and Veterinary Advances,2013,12(19):1504-1511.
- [12]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出口植物源食品中粗多糖的测定 苯酚-硫酸法:SN/T 4260-2015[S].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2015.

(责任编辑 吕志远)

## Study on Optimization of Content Determination Method for Yam Polysaccharides

ZHENG Liping, ZHU Chongyang, ZHANG Xiaomei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 Food Scienc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feasibility was explored on using conductivity meter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yam polysaccharides. The three-level four-factor orthogonal test was used to optimize the design of the phenol-sulfuric acid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order of the four factors affecting the absorbance value were sulfuric acid dosage > color development temperature > 5% phenol > color development time. The optimal test conditions were obtained as the amount of sulfuric acid added is 7 mL, the color development temperature is 30℃, the usage of 5% phenol solution is 1.0 mL, and the color development time is 30 minutes. The conductivities fo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glucose confirmed that there was a very good linear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ductivity of the monosaccharide solution and its concentration. Under the optimized conditions, the conductivities of yam polysaccharide also showed a linear relationship with its mass concentration.

**Key words:** yam polysaccharide; application effects phenol-sulfuric acid method; linear regression equation; conductivity

# 回收磷酸铁锂材料金属元素浸出动力学研究

赵莉<sup>1</sup>, 王永志<sup>2</sup>

(1. 安徽新华学院 城市建设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88; 2.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安徽 合肥 230088)

**摘要:**采用盐酸对回收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中的金属元素进行浸出实验,重点研究了盐酸过量的比例、酸浸的温度、酸浸的时间等对金属元素浸出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盐酸过量1.2倍、酸浸温度70℃、搅拌速度200r/min、时间45分钟条件下,金属元素的酸浸出率可以达到98.2%,实现了磷酸铁锂材料中金属元素的有效回收。

**关键词:**磷酸铁锂;回收锂离子电池;再生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5.024

**中图分类号:**TM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5-0120-04

## 1 引言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在可预见的未来,动力电池将大规模退役并进入回收利用环节<sup>[1]</sup>。《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明确提出,应加强动力电池梯级利用和回收管理,引导动力电池生产企业加强对废旧电池的回收利用,鼓励发展专业化的电池回收利用企业,明确动力电池收集、存储、运输、处理、再生利用及最终处置等各环节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35号)也提出,要加快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制定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政策,探索利用基金、押金、强制回收等方式促进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建立健全废旧动力电池循环利用体系,因此对报废锂离子电池的有效回收不仅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而且可以缓解行业快速发展对于资源的需求,并能够实现节能和环保目标。

从报废的锂离子电池中回收有价值的金属元素研究也很多,利用湿法工艺对回收的锂离子电池材料中有价值的金属元素实现循环回收利用是目前行业采用的主流产业化方式<sup>[2]</sup>,湿法工艺回收锂离子

电池主要的工艺流程包括:模组的拆解、放电、单体的拆解、烧结、破碎、筛分、浸出、分离回收等工序,其中浸出工序主要是针对电池材料中有价值的金属元素的回收<sup>[3-5]</sup>。浸出反应利用的主要是酸浸方式,利用酸和电池材料中的金属元素反应生成可溶性的盐,进一步通过分离的方式把不同的金属元素分开回收。现在酸浸通常利用的酸有硫酸、盐酸和硝酸等,但是采用硫酸进行酸浸时,在后期的不同金属元素分离的过程,尤其需要进行沉淀洗涤的时候,会消耗大量的水,给环保带来很大压力。而采用硝酸进行酸浸时,硝酸的氧化性又会引入一些杂质元素,给后期回收利用金属元素的提纯带来麻烦。本文采用盐酸作为回收磷酸铁锂材料的浸出剂,主要研究在酸浸过程中不同的工艺条件,酸浸的效果,探究浸出工艺主要影响因素的最佳条件,为回收锂离子电池材料金属综合利用提供有效的参考。

## 2 实验

### 2.1 原材料

实验用电池回收料来源自合肥某电池回收公司,为报废的磷酸铁锂电池正极材料,取样测试其化学成分见表1。本实验所用的盐酸和过氧化氢都为

收稿日期:2021-06-28

基金项目:建筑结构安徽省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校级重点项目(KLBSZD202008);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2012216062);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AH201912216190)

作者简介:赵莉(1986—),女,山东泰安人,硕士,安徽新华学院城市建设学院副教授。



分析纯试剂。

表 1 回收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的化学成分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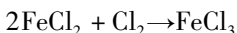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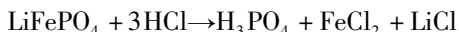
Li	Fe	Cu	Al
2.4%	18.8%	41.2ppm	48.3ppm

## 2.2 实验方法

本实验主要基于目前电池回收行业主流回收工艺,利用酸把回收磷酸铁锂废料进行溶解,把磷酸铁锂中的金属离子全浸出形成溶液,再通过过滤除去不溶的杂质。所用的酸可以是硫酸或者盐酸,考虑酸浸出的金属离子循环使用,再次作为合成磷酸铁锂的原材料,铁需氧化成三价铁,结合氧化剂的选择以及产业化成本优势的考虑,选择了盐酸作为酸源,氯气为氧化剂。

磷酸铁锂废料用盐酸浸出的过程,主要影响因素就是盐酸的用量、反应的温度和搅拌的强度,本实验设计便基于以上三个因素,每个因素考虑四水平进行设计开展,最终通过不同因素水平条件下数据结果确定最佳方案。

回收的磷酸铁锂粉料用盐酸浸出,然后再通入氯气进行氧化,最终得到三价铁盐溶液,该过程的主要化学反应为:



由于盐酸氧化性不强,铜的溶解度低,可降低终端产品杂质含量。且盐酸适宜溶解磷酸铁锂,过量不多。取 100g 回收磷酸铁锂物料放入 1L 的反应釜中,加入一定量的盐酸充分反应后,搅拌速度设置为 200r/min,再通入氯气进行氧化处理,反应过量的氯气,通过氢氧化钠溶液进行吸收收集,通过氢氧化钠吸收液中气泡的排出判定反应的进度,及时调整氯气通入的量。在回收物料用盐酸酸浸的过程通过调节盐酸的过量比例、反应的时间、反应釜循环水的温度等实验条件,得到不同条件下的浸出液,然后对不同的实验取样测试其中铁离子的浓度,从而可以计算出该实验条件下回收物料中金属离子的浸出率,从而可得到最佳的浸出工艺条件。

## 3 实验结果及讨论

### 3.1 盐酸过量不同比例对酸浸效果的影响

表 2 不同盐酸过量倍数酸浸液 Fe 含量

盐酸过量倍数	Fe 含量
1 倍	0.298mol/L
1.1 倍	0.301 mol/L
1.2 倍	0.275 mol/L
1.3 倍	0.251 mol/L

调整循环水的温度为 60℃,配置浓度为 2mol/L

的盐酸溶液,称取 100g 回收物料,按表 1 测试结果根据物料中铁的物质量,分别按盐酸过量 1 倍、1.1 倍、1.2 倍、1.3 倍不同比例加入盐酸进行实验,得到不同条件下的酸浸液,然后分别取样测试,结果如表 2 和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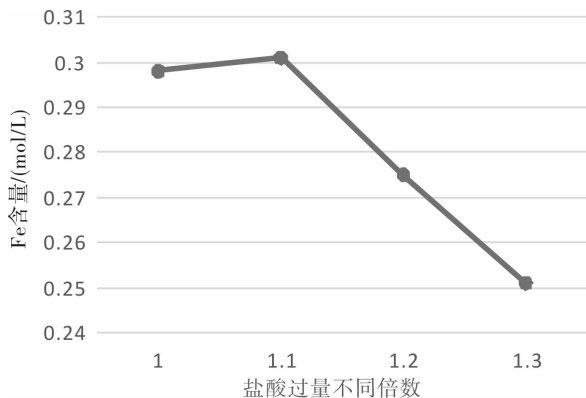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盐酸过量倍数酸浸液 Fe 含量

由图 1 中数据分析可知,当盐酸的过量 1.1 倍的时候,回收物料中的铁就可以被完全浸出,后面随着盐酸过量的倍数增加,铁离子浸出总量并没有变化。因此最合适的过量比例为盐酸过量 1.1 倍。

### 3.2 反应温度对磷酸铁锂浸出实验的影响

按盐酸过量 1.1 倍,称取回收磷酸铁锂物料,同时加入适量的 2mol/L 的盐酸,在搅拌速度 200r/min 和反应时间 0.5 小时固定的情况下,调节反应过程循环水的温度,得到不同温度下的酸浸液,并取样送测各样品中铁离子的浓度。测试结果如表 3 和图 2 所示。

表 3 不同反应温度下酸浸液 中 Fe 含量

循环水的温度	Fe 含量
60℃	0.163mol/L
70℃	0.194 mol/L
80℃	0.235mol/L
90℃	0.234 mo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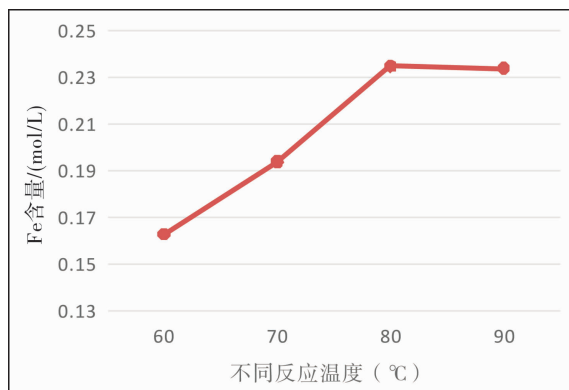


图 2 不同反应温度酸浸液 Fe 含量

从图 2 可以看出,随着循环水温度的升高,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溶液中铁离子的浓度不断升高,说明反应的温度对浸出率的影响比较显著,温度升

至 80℃ 和 90℃ 时,浓度相近,表明温度升至 80℃ 以后温度对浸出的推动作用达到峰值,且温度再升高,盐酸的挥发速度增加,导致酸的量过量不足,不利于实验的持续性开展。

### 3.3 反应时间对浸出实验的影响

按盐酸过量 1.1 倍量取对应的回收磷酸铁锂料和 2mol/L 的盐酸,反应过程循环水的温度控制在 80℃,其他反应条件不变,调整反应的时间,得到不同反应时间的酸浸液,对不同样品测试铁离子的浓度,如表 4 和图 3 所示。

表 4 不同反应时间酸浸液 Fe 含量

反应时间	Fe 含量
30min	0.203mol/L
60min	0.296mol/L
90min	0.335mol/L
120min	0.334 mo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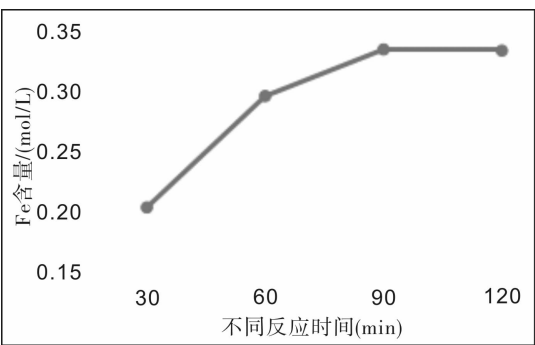


图 3 不同反应时间酸浸液铁含量曲线

从图 3 测试结果可以看出浸出反应开始随着时间的增加,酸浸液中铁离子的浓度开始呈上升趋势,最终达到最大值,时间再延长溶液中铁离子的浓度基本没有变化,证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酸浸实验最佳反应时间为 90min。

### 3.4 最佳酸浸条件下酸浸效率验证及再利用

在 1L 的反应釜内,按盐酸过量 1.1 倍,加入回收料和 2mol/L 的盐酸,反应温度在 80℃,搅拌速度 200r/min,反应时间为 90min,在此相同的实验条件下,平行做四组实验,并对四组实验的酸浸液进行铁离子浓度的测试,进一步计算出各组实验酸浸效率,其结果如表 5 和图 4 所示,测试结果表明,在实验验证的最佳浸出条件下,回收物料中 Fe 离子浸出率稳定,约为 99.4%。

表 5 最佳反应条件下酸浸效率验证结果

分组	酸浸效率
1	99.38%
2	99.42%
3	99.41%
4	99.39%

根据酸浸液中亚铁离子的浓度,通入一定量氯

气,控制氯气通入流量,以有多余氯气排出定义反应终点,用氢氧化钠溶液对排出的尾气进行吸收,继续搅拌至反应完全后,加入一定量磷酸一氨,用氨水调节 PH,可得到磷酸铁沉淀,过滤后在滤液中加入一定量碳酸钠,可得到碳酸锂沉淀,最终实现铁和锂的循环利用。对沉淀的磷酸铁锂烧结脱去结晶水并对其进行 XRD 测试分析,如图 5 所示,从 XRD 测试结果可以看出,通过回收废料得到的 Fe 离子最终合成的磷酸铁与磷酸铁标准卡片在特征峰上完全吻合,且无杂峰存在,说明本实验条件下得到的磷酸铁结构稳定,材料具有较好的结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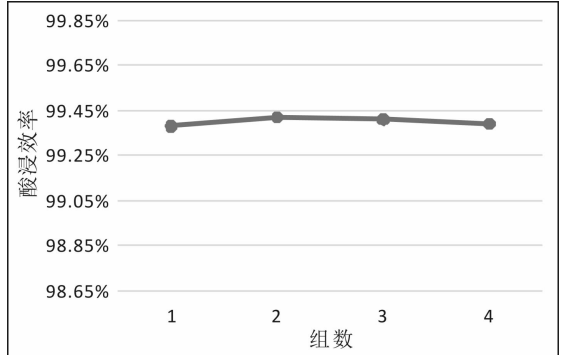


图 4 最佳反应条件不同组酸浸效率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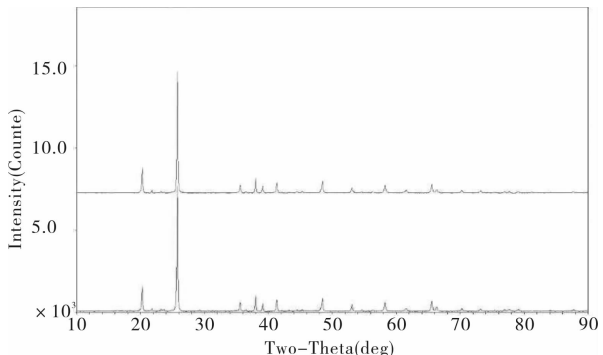


图 5 回收离子制备磷酸铁 XRD 图谱与标准卡片对比

对沉淀得到的碳酸锂进行锂含量的测试,结果在 97.2%,证明回收锂金属制备的碳酸锂能够达到电池级的标准。

## 4 结论

(1)通过盐酸酸浸磷酸铁锂电池材料,能够实现对电池材料中的 Fe 和 Li 金属离子的回收。

(2)盐酸酸浸磷酸铁锂废料的最佳工艺条件。使用 2mol/L 的盐酸,固定搅拌速度为 200r/min,盐酸过量 1.1 倍,温度为 80℃,反应时间为 90min 的条件下,磷酸铁锂废料金属离子浸出效率最高,达到 99% 以上。

(3)对酸浸液中得到的金属离子,通过一定的工艺流程制备得到的可循环利用材料磷酸铁和碳酸锂,经测试分析质量稳定,能满足再利用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YANG Y X, ZHENG X H, CAO H B, et al. A closed-loop process for selective metal recovery from spent lithium iron phosphate batteries through mechanochemical activation [J]. 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 & Engineering, 2017, 5 (11): 9972-80.

[2] WANG W, WU Y F. An overview of recycling and treatment of spent LiFePO<sub>4</sub> batteries in China [J]. Resources, Conservation & Recycling, 2017, 127: 233-243.

[3] ZHENG X H, ZHU Z W, LIN X, et al. A mini-review on metal recycling from spent lithium ion batteries [J]. Engineering, 2018(3): 361-370.

[4] 朱国才. 废旧动力锂离子电池回收再利用产业化进展 [J]. 新材料产业, 2018(3): 31-33.

[5] 乔延超, 陈若葵, 唐红辉, 等. 磷酸铁锂废料中磷、铁、锂的综合回收 [J]. 矿冶工程, 2018, 38(3): 118-122.

(责任编辑 吕志远)

## Study on Leaching Kinetics of Metal Elements in Recovered LiFePO<sub>4</sub>

ZHAO Li<sup>1</sup>, WAN Yongzhi<sup>2</sup>

(1. Urban Construction College, Anhui Xinhua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88, China; 2. Hefei Gotion High-tech Power. Energy Co., Ltd, Hefei, Anhui 230088, China)

**Abstract:** The leaching experiments of metal elements in recovered lithium iron phosphate cathode materials were carried out by using hydrochloric acid. The effects of excess proportion of hydrochloric acid, acid leaching temperature and acid leaching time on the leaching effect of metal elements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1.2 times of hydrochloric acid, 70 °C acid leaching temperature and 200r/min time of 45 minutes, the recovery of the metal elements was carried out. The acid leaching rate of metal elements can reach 98.2%,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effective recovery of metal elements in lithium iron phosphate materials.

**Key words:** LiFePO<sub>4</sub>; Lithium Ion Battery; regeneration

---

## 本刊声明

《中州大学学报》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编辑部上述声明,若无此意愿,请在来稿时注明。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和名义收取任何费用。

本刊一贯提倡并引领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原创性学术研究,始终对追求深邃的理论思想、高端的学术品位、扎实的原创成果、严格的学术规范的广大科研工作者保持敬意。真诚欢迎视角新颖、观点独到的高质量学术稿件。篇幅不少于8000字,学术规范参见《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本刊秉持优稿优酬。

# 方中空夹层钢管混凝土柱 - 钢梁单边螺栓连接节点 静力性能有限元分析

黄春晓<sup>1,2</sup>, 潘福婷<sup>1,2</sup>, 赵莉<sup>1,2</sup>, 王颖<sup>1,2</sup>

(1. 建筑结构安徽省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安徽新华学院), 安徽合肥 230088;

2. 安徽新华学院 城市建设学院, 安徽合肥 230088)

**摘要:**为了研究方中空夹层钢管混凝土柱 - 钢梁单边螺栓连接节点的静力性能,为工程的应用和进一步理论研究提供参考,利用 ABAQUS 有限元软件,建立此类节点的数值模型,并采用已有的试验结果验证模型的准确性。选取钢梁屈服强度、钢柱屈服强度、组合柱空心率、组合柱长细比、柱截面含钢率、螺栓直径、端板厚度和螺栓预拉力等参数,分别从节点极限承载力和初始刚度两方面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单调荷载作用下,该类节点核心区的极限承载力随着钢梁屈服强度、组合柱钢管屈服强度、柱长细比、螺栓直径、端板厚度和螺栓预拉力的增大而增大,随着柱空心率的增大而减小;初始刚度随着柱含钢率和端板厚度的增大而增大,随着柱空心率的增大而减小。

**关键词:**中空夹层;单边螺栓;静力性能;数值模型;参数分析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5.025

**中图分类号:**TU39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5-0124-05

## 0 引言

近年来,在高层和超高层建筑结构中,钢管混凝土结构较多应用在轴心或偏心受压构件<sup>[1]</sup>中,然而当构件长细比较大或者荷载偏心率较大时,形心处的核心混凝土不足以提供有效的抗弯承载力。中空夹层钢管混凝土(concrete filled double skin steel tube, CFDST)柱是在同心放置的两层钢管之间的夹层部位浇筑核心混凝土形成的一种组合构件,以其抗弯刚度大、耐火性能好、自重轻、塑性和韧性好等优点在超高层建筑、大尺寸灌注桩、输电塔、深海平台支架柱以及对耐火、抗冰冻要求较高的环境等结构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sup>[2]</sup>。

目前端板式螺栓连接节点的受力性能研究主要针对 H 型钢梁 - H 型柱,而闭口截面形式的柱体由于施工难度大导致研究较少。单边螺栓具有单侧安装、单侧拧紧、受力性能可靠和施工便捷等优点,较好地解决了闭口截面形式钢构件之间的连接难题,

常见的单边螺栓有 Hollo-bolt 和 One side-bolt。

王静峰等<sup>[3]</sup>以柱截面空心率、端板形式等为参数,进行了方套方 CFDST 柱单边螺栓连接节点的拟动力试验,获得了各种工况下节点的动力特性和破坏模式。杨文伟等<sup>[4]</sup>通过 4 个中空夹层钢管混凝土 - 钢管 K 形搭接节点的抗震性能试验,得到了组合节点的破坏形态和抗震性能指标。霍永伦等<sup>[5]</sup>进行了单边螺栓连接的圆形 CFDST 柱 - 钢梁组合节点的抗震试验,研究表明组合节点具有较高的承载力和良好的滞回性能。目前,关于该类新型节点的工作机理分析及数值模拟的研究较少。

本文利用 ABAQUS 有限元软件,考虑材料本构关系、复杂接触和界面摩擦等问题,建立外伸端板连接的方套方截面 CFDST 柱 - 钢梁组合节点的静力模型,利用已有试验验证模型的准确性;深入研究材料强度、组合柱空心率、螺栓直径、螺栓预拉力和端板厚度等参数对组合节点核心域弯矩(M) - 转角

收稿日期:2021-08-11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重点项目(KJ2019A0885、KJ2020A0795);建筑结构安徽省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校级重点项目(KLBSZD202008)

作者简介:黄春晓(1989—),女,安徽六安人,硕士,安徽新华学院城市建设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钢结构、组合结构方面的研究。

( $\theta$ ) 关系的影响规律, 以期为此类节点在工程领域的设计和应 用提供科学参考。

## 1 有限元模型建立

### 1.1 模型设计

该节点由方套方截面的 CFDST 组合柱与 H 型钢梁拼接而成, 节点为中间层中柱节点, 构造如图 1 (a)。钢梁与外伸端板之间、钢梁腹板与上下翼缘之间采用焊接连接, 组合柱翼缘与外伸端板之间采用单边螺栓连接。

典型节点算例的设计参考实际工程常用参数范围, 采用 1 : 1 的比例建立典型节点模型: 组合柱高 3600mm, 外钢管为 400mm × 400mm × 16mm, 内钢管为 240mm × 240mm × 16mm, 柱截面空心率  $\chi = 0.65$ ; 钢梁截面为 H450 mm × 200 mm × 9 mm × 14 mm, 梁长 3384mm; 外伸端板尺寸为 650 mm × 250 mm × 16 mm; 钢材牌号均为 Q345B, 核心混凝土为 C50, 螺栓型号为 10.9 级高强单边螺栓 M20, 节点构造图见图 1(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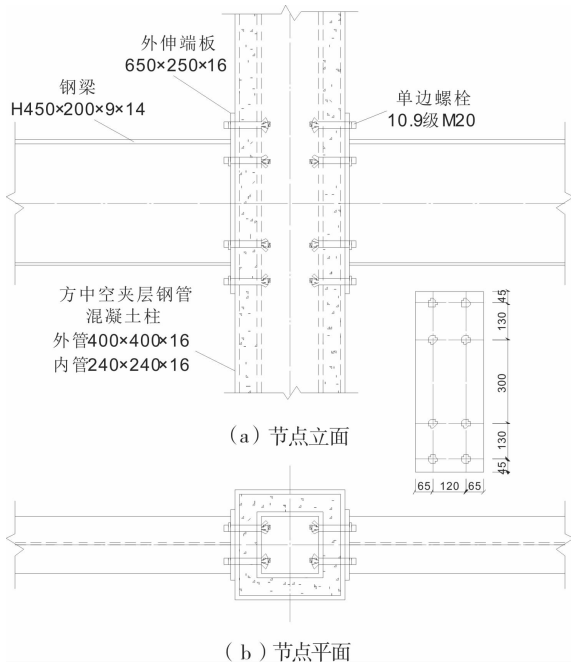


图 1 典型节点构造图

### 1.2 材料性能

内外钢管采用的钢材应力 - 应变关系选用二次塑流模型<sup>[6]</sup>, 单边螺栓采用的高强钢材选用双线性强化模型<sup>[7]</sup>, 如图 2 所示。

柱内核心混凝土采用文献[8]中的应力 - 应变关系曲线, 数学表达式如下式所示:

$$y = \begin{cases} 2x - x^2 & (x \leq 1) \\ \frac{x}{\beta_0(x-1)^\eta + x} & (x > 1) \end{cases} \quad (1-1)$$

式中:

$$x = \frac{\varepsilon}{\varepsilon_0}; y = \frac{\sigma}{\sigma_0}; \sigma_0 = f_c; \varepsilon_0 = \varepsilon_c + 8 \times 10^{-4} \xi^{0.2};$$

$$\varepsilon_c = (1300 + 12.5f_c) \times 10^{-6}; \beta_0 = \frac{f_c^{0.1}}{1.2 \sqrt{1 + \xi}};$$

$$\eta = 1.6 + \frac{1.5}{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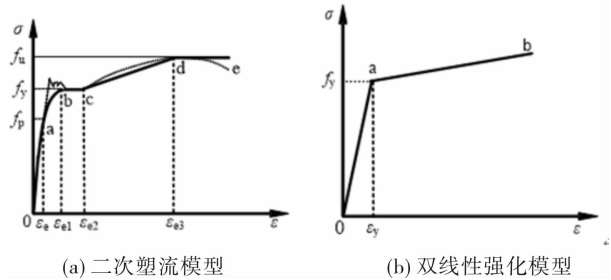


图 2 钢材的应力 - 应变关系

### 1.3 网格划分和接触定义

节点模型中各组件均采用 8 节点的六面体 C3D8R 单元进行模拟, 对节点核心区部位利用网格加密法精细划分, 如图 3 所示。涉及的接触有内外钢管与核心混凝土、外钢管外侧与外伸端板、外伸端板与单边螺栓、内外钢管与单边螺栓、核心混凝土与单边螺栓。模型中所有的接触界面法线方向采用“硬接触”, 切线方向采用库伦摩擦(组合柱与端板之间摩擦系数取 0.8, 内外钢管与核心混凝土之间摩擦系数取 0.45)进行模拟。H 型钢梁与外伸端板之间的焊接连接采用“绑定”约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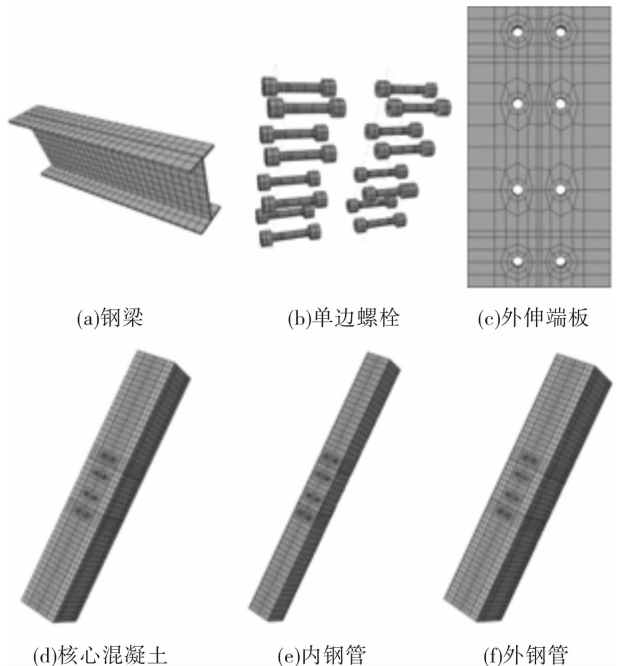


图 3 节点部件的网格划分图

### 1.4 边界条件和加载制度

该外伸端板连接的组合节点计算模型如图 4 所

示。在柱底、梁两端和柱顶加载点处设置参考点进行耦合,柱脚按照铰接进行模拟,即  $U_x = U_y = U_z = 0$ ;左右钢梁两端各自同时施加  $X$  和  $Z$  向的位移约束,即  $U_x = U_z = 0$ 。加载时第一步对单边螺栓施加预紧力,第二步在组合柱顶施加轴向力,第三步采用位移控制加载水平荷载  $P$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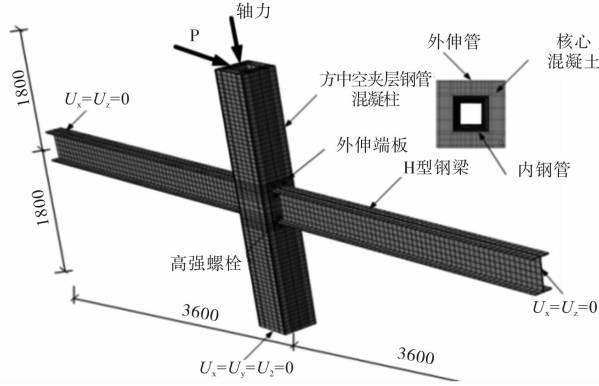


图4 外伸端板连接节点计算模型

## 2 有限元模型验证

### 2.1 已有试验概况

选取文献[9]中外伸端板连接的实心方钢管混凝土柱-钢梁单边螺栓连接节点静力试验进行数值模拟。钢梁型号为 H300mm × 150mm × 6mm × 10mm,梁长 1700mm;组合柱外钢管为 200mm × 10mm,柱高 1625mm,所用钢材特性的具体参数见表1;核心混凝土抗压强度为 33521N/mm<sup>2</sup>,弹性模量取44.34N/mm<sup>2</sup>;梁柱连接采用 10.9 级 M20 单边摩擦型高强螺栓。

表1 钢材材性

试件	厚度 (mm)	屈服强度 $f_y$ (N/mm <sup>2</sup> )	极限强度 $f_u$ (N/mm <sup>2</sup> )	弹性模量 $E$ (N/mm <sup>2</sup> )
钢梁翼缘	10	349.3	492	$1.87 \times 10^5$
钢梁腹板	6	312.5	508.3	$2.16 \times 10^5$
钢管柱	10	349.3	492	$1.87 \times 10^5$
MES1 端板	12	323.3	436.7	$1.98 \times 10^5$
MES2 端板	18	274.4	414.4	$1.93 \times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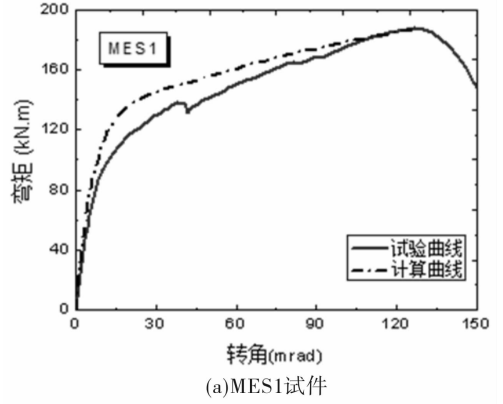
### 2.2 有限元结果与对比

采用上述方法对 2 个组合节点进行建模分析,得到了外伸端板连接节点的弯矩-转角曲线和破坏模式,并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见图 5 与图 6,总体吻合良好,验证了有限元模型的合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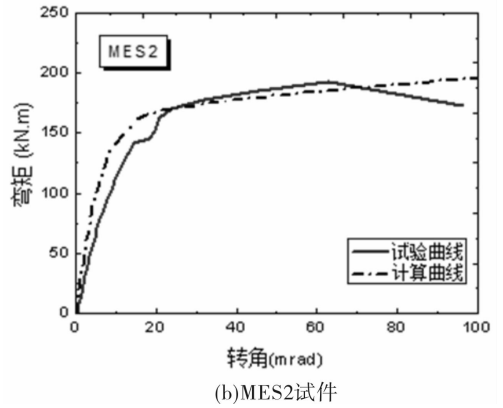
## 3 参数分析

针对本文前述的外伸端板连接的方套方截面 CFDST 柱-H 型钢梁单边螺栓连接节点,选取了钢材强度(H 型钢梁屈服强度  $f_{y,b}$ 、柱钢管屈服强度  $f_{y,c}$ )、几何参数(柱空心率  $\chi$ 、柱长细比  $\lambda$ 、柱截面含

钢率  $\alpha$ 、螺栓直径  $d$ 、端板厚度  $t_{ep}$ )和荷载参数(螺栓预拉力  $P/P_0$ ,  $P_0$  为《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2017<sup>[10]</sup>规定的 10.9 级 M20 螺栓预拉力,  $P_0 = 155\text{kN}$ )对节点承载力和初始刚度进行参数分析,参数取值见表 2。不同参数对组合节点核心区  $M-\theta_r$  关系曲线的影响见图 7。



(a)MES1试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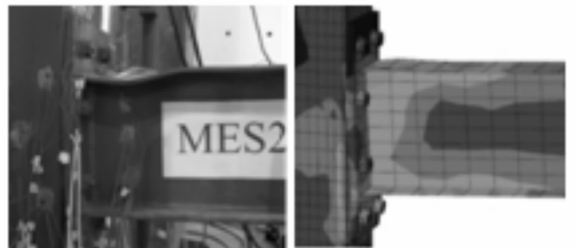


(b)MES2试件

图5 节点区弯矩-转角关系结果比较



(a)MES1试件



(b)MES2试件

图6 试件破坏形态结果比较

表2 参数类型和取值

参数类型	参数	参数取值	典型节点参数
钢材强度	$f_{y,b}/\text{MPa}$	235, 345, 420, 550	345
	$f_{y,c}/\text{MPa}$	235, 345, 420, 550	345
几何参数	$\chi$	0.49, 0.65, 0.76	0.65
	$\lambda$	17.92, 30.72, 51.19	30.72
	$\alpha$	0.14, 0.32, 0.54	0.32
	$d/\text{mm}$	16, 20, 28	20
	$t_{ep}/\text{mm}$	8, 16, 28	16
荷载参数	$P/P_0$	0.25, 0.75, 1.0, 1.5	1.0

(1) H 型钢梁屈服强度  $f_{y,b}$ 。由图 7a 可知, 节点极限承载力随着  $f_{y,b}$  的增大而增大, 初始刚度基本保持不变。与 235MPa 相比,  $f_{y,b}$  取 345、420、550MPa 的极限承载力分别提高 18.5%、25.9% 和 33.3%。

(2) 组合柱钢管屈服强度  $f_{y,c}$ 。由图 7b 可知, 节点极限承载力随着  $f_{y,c}$  的增大而增大, 初始刚度变化并不明显。与 235MPa 相比,  $f_{y,c}$  取 345、420、550MPa 的极限承载力分别提高 21.4%、28.6% 和 35.7%。

(3) 组合柱空心率  $\chi$ 。由图 7c 可知, 节点弹性阶段承载力和初始刚度随  $\chi$  的增大而减小, 后期塑性阶段变化不明显。与 0.49 相比,  $\chi$  取 0.65 和 0.76 的极限承载力分别降低 3.1% 和 6.3%, 弹性刚度则降低 34% 和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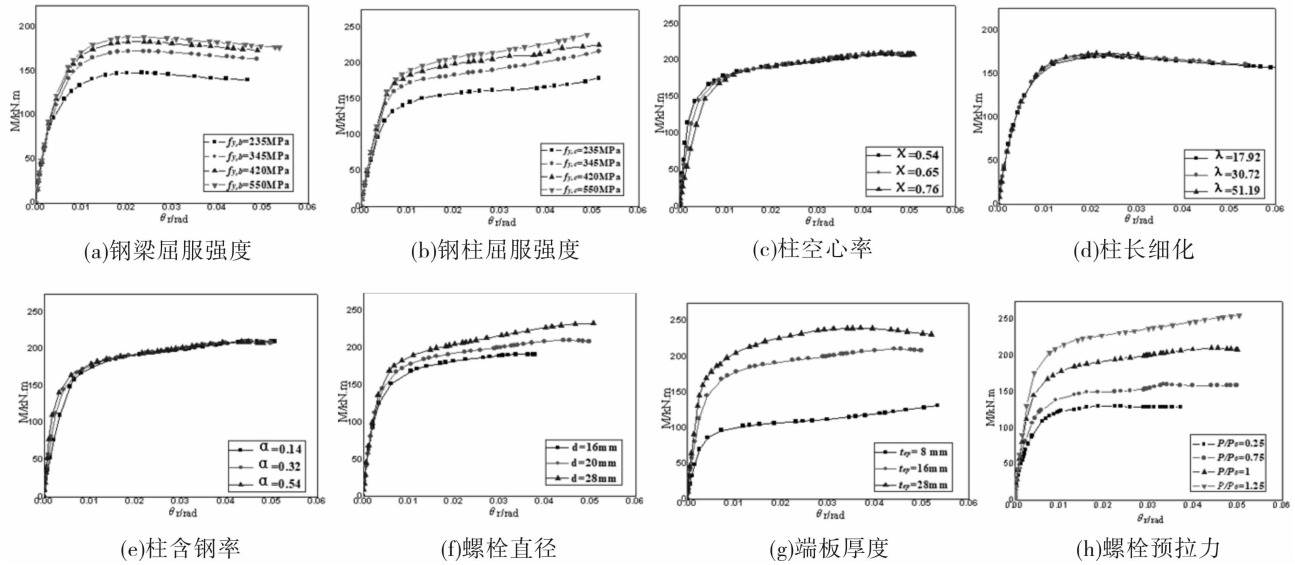
(4) 组合柱长细比  $\lambda$ 。由图 7d 可知, 节点弹性阶段承载力随  $\lambda$  的增大而增大, 初始刚度变化不明显。与 17.92 相比,  $\lambda$  取 30.72 和 51.19 时, 弹性阶段承载力分别增大 2.9% 和 8.8%。

(5) 组合柱含钢率  $\alpha$ 。由图 7e 可知, 节点初始刚度随  $\alpha$  的增大而增大, 对承载力的影响并不明显。与 0.14 相比,  $\alpha$  取 0.32 和 0.54 时, 弹性阶段初始刚度分别增大 40.8% 和 76.1%。

(6) 螺栓直径  $d$ 。由图 7f 可知, 节点极限承载力随  $d$  的增大而增大, 对初始刚度影响不明显。与 16mm 相比,  $d$  取 20mm 和 28mm 时, 极限承载力分别增大 9.4% 和 15.6%。

(7) 端板厚度  $t_{ep}$ 。由图 7g 可知, 节点极限承载力和初始刚度随  $t_{ep}$  的增大而增大。与 8mm 相比,  $t_{ep}$  取 16mm 和 28mm 时, 极限承载力分别增大 78% 和 106%, 初始刚度分别增大 74.8% 和 133%。

(8) 螺栓预拉力  $P$ 。由图 7h 可知, 节点极限承载力随  $P$  的增大而增大, 弹性阶段初始刚度影响并不明显。与  $0.25P_0$  相比,  $P$  取  $0.75P_0$ 、 $P_0$  和  $1.5P_0$  时, 极限承载力分别增大 14.6%、41.7% 和 75%。

图7 不同参数对节点  $M-\theta$  关系曲线的影响

## 4 结论

(1) 基于非线性材料本构关系, 采用有限元软件 ABAQUS, 建立了外伸端板连接的方 CFDST 柱-钢梁单边螺栓节点的数值模型。

(2) 与已有试验的现象和结果进行对比, 节点的破坏模式类似, 核心区  $M-\theta$  曲线吻合良好, 证明所建模型的准确性。

(3) 对于本文所建外伸端板连接的组合节点, 随着钢梁屈服强度、组合柱钢管屈服强度、柱长细

比、螺栓直径、端板厚度和螺栓预拉力的增大极限承载力增大, 随着柱空心率的增大极限承载力减小; 随着柱含钢率和端板厚度的增大及节点初始刚度增大, 随着柱空心率的增大初始刚度减小。

(4) 数值模拟分析表明, 单边螺栓连接的方 CFDST 柱-钢梁组合节点具有较高的承载能力, 可以在高层或超高层钢结构建筑中进行应用推广。

参考文献:

- [1] 韩林海, 杨有福. 现代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
- [2] 蔡绍怀. 现代钢管混凝土结构[M]. 3版.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3.
- [3] 王静峰, 仲力平. 方套方中空夹层钢管混凝土柱单边螺栓连接节点拟动力试验分析[J]. 土木工程学报, 2019, 52(9): 1-11.
- [4] 杨文伟, 高栋. 中空夹层钢管混凝土-钢管K形搭接节点抗震性能试验研究[J]. 建筑结构学报, 2020, 41(2): 42-54.
- [5] 霍永伦, 王静峰. 单边高强螺栓连接圆形CFDST柱组合节点抗震试验与分析[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44(2): 222-229.
- [6] 钢及钢产品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 GB/T 2975—1988[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1999.
- [7] 金属拉伸试验试样 GB 6397—86[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1999.
- [8] 刘威. 钢管混凝土局部受压时的工作机理研究[D]. 福州: 福州大学, 2005.
- [9] 陈莉萍. 半刚性钢管混凝土框架端板连接节点性能的试验和理论研究[D].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 2010.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50017—2017. 钢结构设计规范[S].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7.

(责任编辑 吕志远)

##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Static Performance of Square Concrete Filled Double Skin Steel Tubular Column – steel Beam Blind Bolted Joints

HUANG Chunxiao<sup>1,2</sup>, PAN Futing<sup>1,2</sup>, ZHAO Li<sup>1,2</sup>, WANG Ying<sup>1,2</sup>

(1. Key Laboratory of Building Structure of Anhui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Anhui Xinhua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88, China; 2. Urban Construction College, Anhui Xinhua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88,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static performance of the square concrete filled double skin steel tubular column – steel beam blind bolted joint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and further theoret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uses the ABAQUS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to establish a numerical model of such joints, and uses the existing test results verify the accuracy of the model. Select steel beam yield strength, steel column yield strength, composite column hollow ratio, composite column slenderness ratio, column section steel ratio, bolt diameter, end plate thickness and bolt pretension and other parameters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ultimate bearing capacity and initial stiffness of joi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monotonic load, the ultimate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core area of this type of joints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teel beam yield strength, composite column steel tube yield strength, column slenderness ratio, bolt diameter, end plate thickness and bolt pretension, and decrease as the column hollow rate increases; the initial stiffness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column steel content and end plate thickness, and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column hollow rate.

**Key words:** double skin; blind bolt; static performance; numerical model; parameter analysis